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8

中央文献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CNKI
PDG

ISBN 7-5073-1168-6/K · 561

定价:280.00 元(共 6 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②共产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 IV. ①K260.6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0268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开 12.25印张 304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元(第7—12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ЕВ

МОСКВА, 1999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413份，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1927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8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9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7、8、9、10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0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明其姓名全称。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1927年7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1933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2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1996年版。

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并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1937年4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至8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1937年8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

入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1927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武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1927年至1937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20年代末，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1928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和

“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1928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现在没有发现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1928年3月以后继续活动的材料。从1928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20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中国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中山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30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谴责和迫害。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1937至1938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1937至1938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院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机关、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左”倾或“右”倾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 and 执

^① 见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1970年版第170—176、180—188、209—218页。

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用各种“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倾向分子”和“敌对分子”所搞的“阴谋”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中等水平”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工作。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20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作出的修改。

随着30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火

案中赢得崇高声望的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并能于1934年6、7月间向斯大林提出必须重新审定已明显遭到失败的方针的问题^①——这一切促使斯大林同意（并非没有摇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新的策略。然而众所周知，以前的方针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否弃，而斯大林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七大的决议。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似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是暂时推迟到将来，即到反击日本的时候去实现，这有碍于清醒地总结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和以往的年代一样，在苏联的对外政策^②和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在中国执行的路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对这一构想持批评态度的“左倾”反对派的首领们被解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后，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事实和文献表明，这种看法未被证实特别适用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期。实际上，在国家关系方面转向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政策有其最初的动机，并由直到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冲突发展，即提出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所决定的。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20年代末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出的，正是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和苏联东西方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给苏联国际处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契切林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而使自己能够作出坦诚评价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在

① 关于季米特洛夫在重新审定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方针及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见K. K. 什里尼亚：《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和战争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莫斯科1979年版第36—45页；A. M. 格里戈里耶夫、A. B. 列兹尼科夫：《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载《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274—293页。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5—1974年版第5—10卷。

共产国际内无谓地谈论同子虚乌有的反苏战争准备的危险作斗争只能损害和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①。他认为,从苏联利益角度看, (“继1923至1926年实行的绝妙政策以后”)自1927年在中国采取的行动方针是“极大的错误”^②。契切林在1929年10月写给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信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在我看来,共产国际目前的方针是极其有害的……在中国,我们正穷于应付1927年致命方针带来的后果……我们把1927年对华政策的方针搬到了西方,这是可怕的,它正在全力破坏同德国的关系”^③。

“共产国际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的主导地位在30年代初,在1929至1933年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保持下来并有所加强。这表现在提出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战争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上。在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民主党,通过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在东方,这表现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对中国形势的“左”的估计的升级上——“新的革命高潮”(1930年)、“革命危机”(1931年)、“革命形势”(1932年)和夸大苏维埃运动的规模 and 实际作用上 (“苏维埃革命在相当多的地方取得胜利”、“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④)(1932年)。这一方针也决定了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国家关系的对抗性质,1929年至1932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① 1929年6月20日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见B. B. 索科洛夫:《鲜为人知的契切林》。摘自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解密档案,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2期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1929年10月18日契切林给李可夫的信。同上,第15页。

④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317、323页。(下称《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在论述苏联外交史的著作中,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不符合它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造成苏联国际处境恶化的左倾政策的原因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些作者这样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正是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充满了“世界革命迅速到来的期望”^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思想家和宣传员们的理论构想和评价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其中许多人,也还有共产国际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善良地陷入了迷途”,把希望当作了现实。但是在分析这种极左倾向的原因时,应当估计到,这种倾向早在 1927 年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进行反“右倾”斗争时早就发展起来了。正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浪潮中,在 20 年代末,许多共产党首先是一些大党(西方是德国共产党,东方是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新的领导。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中,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是一个极其主要的方针,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论证,并被认为是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宣传战争危险即将到来的思想和结合关于苏联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的论点在国内加剧“被围困的要塞”的形势,这些都被用来确立斯大林的专制,用来论证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

30 年代初对中国形势上述评价的暂时冻结以及对“苏维埃革命”的规模和作用的夸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加强联系着的。这些评价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批准的政策“正确性”,尽管文献表明,莫斯科有足够的材料可用来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力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对

^① H. B. 扎格拉金:《苏联外交成败史》,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88 页。

苏维埃力量的评价“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宣传夸大的极限”。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包括它们的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开始考虑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是1927至1931年间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直接参加下所通过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和中共领导机关的一系列决议中制定的。这些决议的大部分已收入为专家们所熟悉的文件集中^①。这一政策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由斯大林在192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以及布哈林在1927—1928年的著作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对于理解共产国际这几年里制定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其他领导人，如库西宁、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米夫、曼达良等的讲话，也还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中国研究所发表的文献^②。对形成苏维埃政策的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托洛茨基1927年及以后（根据“一个反对者的”原则）的立场^③。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它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方针的反应、中共领导人及其各派在制定和执行苏维埃运动方针时的作用，这一切

^① 见П. Е. 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莫斯科1932年版和1960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1917—1949）》，见《1917—1927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76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工人运动（1917—1949）》，见《1917—1949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共产国际》，莫斯科1993年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卷《论中国》，汉堡1990年德文版。

在其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同共产国际和地方组织的来往信件中,在领导人的著作中和在中共的报刊上都有反映^①。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那些年的许多文件已在西方一些国家^②、在台湾^③、在日本^④和在香港^⑤公开发表。

共产国际文件中涉及到这个时期苏维埃运动的内容和目标的一般性论点通常在中共的文件中毫不修改地加以重述。同其他各党一样,从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就共产国际某些决议和指示作出一些专门的决议。与此同时,和以往一样,党的领导层及其地方组织内的各个派别不仅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对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状况提出自己的评价,在某些时期里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计划。总的说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流行的评价和指导方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左”倾向,有时要比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更甚。这是同中共新的领导人中尚未根除的“左”的观点和情绪一脉相承的,这些领导人是在从似乎有可能实现激进方针但失去了机会的角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浪潮中进入党的领导层的。20年代末在共产国际内强调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以及在评价中国形势时

① 见《中共党史文件(1920—1949)》,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1927—1937年(五卷本)(下称:《中共党史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1991年版。

②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勃兰特等编,剑桥(马斯)1952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托尼·塞奇编,阿尔蒙特1996年版;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1961、1967年版;肖作梁:《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西雅图1969年版。

③ 《共匪祸国史料汇编》,台北1964年版;吴天威:《陈诚藏资料选目题解》,剑桥1972年版;杜诺万:《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共资料》,安阿伯1976年版。

④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东京1981年版第1卷,第3—7卷,竹内实:《毛泽东集》,东京1983年版第3—5卷。

⑤ 《中国共产党文件(1927—1930)》、《〈中康通讯〉文件选编》,香港1976年版。

“左倾”的滋长为中共党内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加强提供了土壤。

中共党内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表现是1930年形成并试图实现的李立三的极左主张和行动计划，李立三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的时期里实际上领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所指望的是，通过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暴动和罢工，借助于红军力量的冲击，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革命的“爆发”，从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①共产国际阻止了这一方针的实施，因为这一方针引起了中共领导层中的尖锐危机并给它的力量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但是在评价中国形势方面的左倾情绪的增长为中共活动中的左倾复发提供了土壤。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正当开始转向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像在1928年初那样又不得不克服中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批准的方针的惯性作用。

在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方面，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第三卷收集的几个主要部分的文件反映了这一过程的轨迹。

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作出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转向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武装暴动，从而形成了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城乡暴动时期。这些暴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组织遭到破坏，同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失去了联系。残存的一些组织和某些共产主义团体以及他们领导的为数不多的军队被驱赶到了偏僻的乡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

^① 关于李立三的纲领和共产国际在克服这一纲领中的作用，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和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载《共产国际与东方。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战略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328—345页。

生活和活动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主要在农村进行发展并同残存的和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取得紧密联系的时期。在进行暴动的过程中，党取得了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土地政策、组织武装部队和在乡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初步经验，进行了总结农村斗争的可能性及其作用的最初尝试。1927年底，时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中国的特殊条件，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军阀战争、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软弱，“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开始时它可能波及几个县并成为“初期暴动”，与发达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不同，“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冲而决的形势”发展^①。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出现了“割据”这个术语，反映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通向“最初在一两个省内”夺取政权的道路^②。同时，建立小块苏维埃地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可能性是同当时国内似乎存在着革命形势联系着的，当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暴动会与城市的暴动结合起来。

关于党遭到惨重失败和巨大损失的消息促使莫斯科修改了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在中国的行动策略，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的决议中和以更全面的形式在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定了下来。暴动的结局被认定为工农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的衰退和惨重失败。与此相联系，建议党采取暂时退却在“争取群众”口号下恢复和积聚力量的政策^③。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中所阐述的主要纲领性理论观点总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载《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第10期第294—296页。

② 《布尔塞维克》杂志1928年第13期第410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22、25页。

的说来反映了早在1927年确定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向“左”转，这首先表现为否认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统治阵营中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反帝爱国主义潜力，否认它们有解决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任务的能力。与此相联系，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的反帝革命、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①。

尽管统一国家也属于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评价形势时却指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分裂的开始”，作为中共斗争的主要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制度的任务。与斯大林的理论相适应，认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②。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文件中和宣传中试图把苏维埃运动同时看作是反帝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走狗和亲帝国主义势力）。这种尝试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没有带来明显的实际结果，因为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中国各阶层居民对这种运动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改变为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形式有所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

在20年代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中，对南京政权的评价的演变也是与上述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和潜力的评价相联系着的，从认定南京政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演变到认为它是地主资产阶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第16、18页。

级性质的政权^①。无论在这个时期还是稍后一个时期，共产国际都未能对南京政权的潜力作出恰当的评价。在评价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南京政权活动的性质和前景中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缘由：否认中国有按照“凯末尔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在 20 年代末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斯大林的讲话中所作出的有关结论的惯性作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们从世界经济危机中看到了有助于作出这种评价的补充论据。在中国和世界报刊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国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城市里广泛的失业现象和许多乡村地区闹饥荒的材料也对作出这种评价有影响。南京政府成立后相继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战争使人们得出“上层”深刻危机的结论。甚至在 30 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趋向调整和寻求实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尽管事实上承认南京政权是能够对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没有清醒地分析国民党在发展经济和统一中国方面的政策的内容和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只是“半承认”季米特洛夫在 1936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总之，蒋介石能够组织起四分之三的民族，但他不是争取统一中国、反对各派军阀、反对分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斗士”^②。这番话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长时期内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南京政府把孙逸仙的学说作为官方的理论，这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这一学说的各个方面以及一些国民党派别和左翼国民党人团体要维护和利用孙逸仙学说中最激进部分的企图采取否定的态度。

与“左”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排斥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①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机构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对南京政府评价的演变，见 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史学家论中国问题》，第 177—179 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86 年版第 265 页。

(“改组派”)以及谭平山和邓演达一类的“第三条道路”党进行任何交往的方针^①,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某些担心,唯恐这些势力会吞噬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共产党。此后,由于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解释为激化同“中间”势力的斗争,这一方针又成为共产党同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宗派主义自我隔绝的根源。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策略方针规定了对党在城乡的活动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城市来说建议采取退却和积聚力量的策略:恢复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恢复党在工会中的阵地,通过组织罢工以及口头和报刊的鼓动宣传工作将城市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②。

在农村,尽管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初尝试几乎各地都遭到挫折,而共产党人领导的小股部队经受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还是采取了“扩大苏区,巩固可能成为开展更大规模运动的根据地的地区”的方针。扩大游击队被认为是通向建立中国红军之路^③。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斯大林在接见代表时的讲话都谈到了这一前景。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建立中共武装力量的工作^④。

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指导党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人组织,争取在工会中发挥决定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1—32页。

② 中共六大关于组织工作、关于共产青年运动、关于职工运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和决定,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节40—59、72—77、78—86、112—123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0页。

④ 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39、92—99、107—110页。

性作用和最终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没有考虑到中共从事活动的现实条件。在这里，以及往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指示和中共的文件^①中都保留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原先固有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斗争水平、关于工人阶级由于受本国和外国资本最深重剥削而具有“特殊革命性”的过高估计。

随着南京政府工会政策及其工厂法^②效果的显露，对中共在城市里的地位开始产生影响的，是对残酷的警察监控措施与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宣传对于主要工人阶层和城市基层群众的影响的估计不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流行着这样一些观念，既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人贵族”的土壤，那就有利于将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些观念没有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即国民党的工厂法和工会法给大城市的熟练工人阶层所提供的最低限度工作保障，使他们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更不用说同失业工人分离开来了。

对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所积极响应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爱国主义要求和口号对于工人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不可避免地要对 30 年代初中共的活动产生影响。

从 1931 年底起，共产国际试图实施“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党组织应当独立领导爱国主义团体和爱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1929 年 8 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 248—251 页；第五次全国职工会代表大会决议（1929 年 11 月）—《中国职工运动文选》，北京 1958 年版第 2 卷第 309—312、339—340、343—344 页；又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 1957 年版第 238—358 页。

② 关于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工会政策见：B. И. 霍里科夫：《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2）》，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80—94、112—142 页；又见 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68—86 页。

国主义行动,同时把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这些尝试导致了爱国主义团体的分裂,使共产党人处于孤立状态,并成为警察容易获取的猎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代表于1932年初在“上海保卫战”期间批准的策略,即上海各阶层居民和保卫上海的部队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发动以武装抗击日本军阀占领上海的图谋的策略使中共的组织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和党在城市积极性的衰退^①。这一情况以及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屡遭失败、工作人员屡遭逮捕,促使中共作出决定,于1933年初将中共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这实际上是默认固守城市的尝试失败。

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具有另一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在表述一系列重要理论原理,首先在确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农民……希望拥有土地”)上^②,表现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原先固有的想法,要把从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搬到中国来,深信在中国自发的土地革命也业已成熟^③。同时,在考虑到中共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了中国农村形势的许多特征和特点、农村各阶层和各种组织包括传统性组织在内的行为和作用,以及中共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和途径。在代表大会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共以后在军事工作中所要碰到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答复^④。总

① 关于中共组织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立场及其后果,见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79—188页。

② 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页。

③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1920—1925年)第13页。

④ 《中共六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和《中共六大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有关于农民组织、游击战和建立红军的专门章节,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34—39、92—98页。

的说来,在中共六大以及随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制定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的决议,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不断加以利用,转入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和各种类型的中国农村反抗运动以及分化瓦解军阀队伍的轨道。实施这一方针使中共有可能利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利用当时统治阵营内部各派力量的混战,以便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地区,在国民党各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管辖范围的间隙地带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①。

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关心中共这方面的活动分不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中共农村活动的经验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拟定了一些指示,明确指出和规定了在农民土地政策、军事建设和红军作战策略方面的方针。这项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技术专家、参谋工作和侦察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许多人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领导了中国红军的集团军、红军的司令部和苏区的军事院校。具有在俄国和中国内战年代工作经验的苏联军事专家为军事院校的中国学生编纂了有关军事组织、游击战争策略方面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中国红军院校里也曾广泛加以利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曾设想“在总的革命高涨形势下,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是可能的”。同时认为,“这些省的政权也将会在几个中心城市里夺得”^②。以后的事态发展——苏区的扩大和红军在农村的发展、党在城市的阵地明显薄弱——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自己的方针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

^① 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 1980 年版第 125—129 页。

^②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 24 页。

年7月)》中,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主要是同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联系着的^①,而将“建立有充分战斗力和政治上经得起考验的红军”^②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在1931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城市处于政府当局和外国列强严厉管制的情况下,“工农红军自然将成为积聚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的中心,成为整个革命运动高潮的极重要的杠杆……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主要形式”^③。由此可见,在1927年秋至1937年夏的时期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计划夺取权力和首先在一些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类似广州革命根据地那样)建立苏维埃到得出结论,在“牢牢控制并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加强红军”作为压倒其他一切工作的主要任务^④。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把中共全部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农村中来。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这个术语。

事态发展表明,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的设想和预测相反,“苏维埃阶段”在中共的活动中不是战略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向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转变使中共有可能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尤其是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了根据地,而主要是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成为反对南京的各个地方派别有实际兴趣与之结盟的一支力量。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

①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280页。

②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页。

③ 同上,第296页。

④ 同上,第296页。

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收入本系列文件集第三卷的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还阐述了制定和实施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大量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的文件及其同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决定中共于1927年下半年转向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口号内容的演变过程和莫斯科在准备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一些专门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一时期在通过一些重大决议和向中国发出指示以前进行讨论的内容,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等等。

很大一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在实施六大后恢复中共组织的计划方面,在组织在苏联为中共培养干部方面,在分析党的领导层、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方面所做的工作。

破天荒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工作人员1929至1931年间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关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同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来往书信、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的记录。

第一次发表了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中国的米夫关于远东局活动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决议草案，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红军建设和农民土地政策问题的指示信，补充说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制定苏维埃运动方针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编者发现的关于莫斯科给中共及其工会经费援助的文献资料。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些文件对于了解经费援助的规模，而主要是对于了解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系统为在城市里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领导机构的活动提供财政补助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概念。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会国际系统在中国的工作大大加强，第三卷收入了大量资料，揭示了工会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方针和工作成果。

总的说来，本卷的文献资料和以前出版的文献资料一样，包含许多新的材料，既可以大大充实，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纠正现有文献中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评价。这里发表的文件为研究本文件集的中心议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内容，在每个部分的引言中都作了简短的说明。当然，在这些简短的引言中不可能详尽地探讨在文件中所涉及的议题和内容，这需要吸收其他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史专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者，都会对本卷发表的材料为对这一领域内迄今很少研究或者颇多争论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所提供的可能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在这些不仅为中国史和苏中关系史的专家而且为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中，作为例子，我们列举了莫斯科对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当时和以后将他们推举到党的领导地位上的作用问题。很自然，这里说的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第三卷和第四卷发表的文件，包括在共产国

际刊物上发表的已为人知的材料表明，从20年代末起，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都积极促使毛泽东进入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的行列，竭力维护和加强他的地位。早在20年代末，由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特别重视农村武装斗争的作用，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经常不断地特别提到“朱毛军队”（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的作用。从1929年底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已经讲“毛泽东的军队”，它的内部结构、政治工作的组织在1930年就被认为是其他部队的范例（第221、260号文件）。1930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同意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决定，尔后又建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在项英和周恩来到达那里以前，毛泽东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远东局领导下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建议重新审查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选举结果，毛泽东被留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同意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使他进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在1932至1933年间给予毛泽东以重要支持，当时由于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苏区的很大一部分军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开展批判毛泽东的运动，解除他的军队领导职务，甚至以“赴苏治病”为由让他离开苏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与莫斯科协商后发出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关于让毛赴苏的建议也被拒绝了，认为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冒险，是危险的。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坚持，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任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闻天取代他担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是没有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同意的。很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收到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作出决定将毛泽东的报告以单行本形式用俄文和其他多种文字出版。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当中只有毛泽东的名字被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以中国苏区名义向代表大会所发的贺词中也同样如此。王明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鉴于上述情况，莫斯科对1935年秋所收到的关于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共主要领导集体的消息作出积极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①。

文件表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至少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起高度评价了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并支持推荐他担任政治局的一些最重要职务（负责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和特种工作）。早在1920年至1930年初，远东局认为他与李立三不同是最有才能和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第206号文件）。周恩来1930年4至8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亲自确认了对他的这种看法。在此期间，斯大林曾接见过他，莫洛托夫也几次接见过他，他受委托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30年底至1931年初，远东局实际上随时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周恩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和苏区的工作。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他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兼红军总政治委员。

^① 应当指出，对阐述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的这种意见，近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上也得到了承认。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杂志北京1997年第4期第21—23页。

现在发表的文件为以下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提供了补充论据，即莫斯科曾极力主张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提拔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各级领导层中去，总之，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建立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体制。

本卷中发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秦邦宪（博古）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许多学生绕过中共同共产国际的通常联络渠道同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领导人交往的书信表明，东方书记处领导特别器重这批人，把他们看作是“可靠的”和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指望得到他们提供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情报，而往后逐渐地把他们提拔到中共和共青团领导机构的各种岗位上。毫无疑问，陈绍禹由于跟米夫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往的联系受到了特殊的信任。1930年7至8月间李立三主义“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冲突，随后在党内对批评自己方针的人进行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决定加速选拔“莫斯科派”的进程，以便保证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持久忠诚。众所周知，结果在1931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陈绍禹、沈泽民和其他许多“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被选进中共中央，陈绍禹还被选进中央政治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青团中央局推荐选拔秦邦宪为中央局书记（见第409号文件）。

然而，陈绍禹的这一提升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莫斯科派”在党内领导中占居主导地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完全清楚他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在党内缺乏根基。把大部分“老的”政治局委员，如周恩来、项英、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仍留在党的领导成员内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和张国焘还担任各大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一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1931年底陈绍禹去莫斯科后，被任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代表团领导人的高级职务，还得到了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重要职务的任命。他本人开始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所熟悉，并被选进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取得了国际性的知名度，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被认为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正如文献所表明的，莫斯科没有把他看作是“党的领袖”，是党的总书记的候选人。

本卷和以前的几卷一样，不可能收入值得人们注意的所有材料。出于篇幅的考虑，编者不可能将东方书记处会议的许多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解决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时的争论和探索的速记记录以及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决议草案都一一收入。莫斯科一些档案馆的某些尚未为研究人员开放的材料也未能收入本卷。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在发表一些用糟糕的俄文书写的文件（如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陈绍禹给米夫的信）时，编者只对某些明显的语法错误作了修正，总的说来保留了文件的语言特点。文件中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当时在文件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人民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苏区、国民革命军。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和词典中常用的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共产主义小组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H.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M. H.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 M. 莱特奈

尔, 教授 И. 克吕格尔, 教授 P. 费尔伯和博士 T. 特拉姆彼达赫。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的工作人员 Л. А. 罗戈娃、Е. Е. 基里洛娃和 Ю. Т. 图托契金, 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А. И. 卡尔图诺娃帮助发掘文件, 卡尔图诺娃还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发掘了一些文件。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B. И. 格卢宁、M. Л. 季塔连科、K. B. 舍维廖夫、M. 莱特奈尔、И. 克吕格尔、P. 费尔帕和 T. 特拉姆彼达赫撰写。书目索引由 K. B. 舍维廖夫编写, 并有 И. 克吕格尔参加。人名索引由 B. B. 拉林和 И. H. 索特尼科娃编写, 并有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和 M. H. 斯莫林娜参加。在编写人名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工作人员 K. K. 米罗诺娃提供的材料。

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H.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Е. К.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H.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H. 索特尼科娃。

本卷俄文版责任编辑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 责任秘书 H.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言

第二部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政策中

“左的”倾向的加强

(1928年9月—1930年初)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莫洛托夫、布哈林
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9月4日)……(21)
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1号记录(摘录)
(1928年9月6日)……(23)
132.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65号记录(摘录)
(1928年9月17日)……(31)
133.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
会议第6号记录(摘录)(1928年9月18日)
……(33)
134. 阿龙施塔姆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9月29日)……(36)
135.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
(1928年11月9日)……(37)
136.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28年11月12日)……
……(38)
137.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11月15日)……(41)

138.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11月24日) (43)
1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
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12月10日) (48)
140.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12月12日) (51)
141.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52)
14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举行的
会议第5号记录(192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 (54)
143.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91号记录(摘录)
(1929年1月7日于莫斯科) (56)
1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8号
记录(1929年1月29日于莫斯科) (59)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2月7日于莫斯科) (61)
1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
(摘录)(1929年2月8日于莫斯科) (65)
1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22号记录
(摘录)(1929年2月8日于莫斯科) (76)
148.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
电报(1929年2月12日于上海) (77)
1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小中国委员
会会议第10号记录(1929年2月18日于莫斯科)
..... (79)
150. 皮亚特尼茨基给托夫斯图哈的便函

-
- (1929年2月27日) (82)
151.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9月27日) (83)
1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布尔塞维克》
杂志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3月6日)
..... (87)
153. 米夫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3月26日) (92)
15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3月31日) (95)
155. 阿布拉莫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
(1929年4月3日) (99)
156. 卡佐夫斯卡娅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
(不晚于1929年4月3日) (101)
15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信(1929年4月) (103)
1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5月3日) (109)
15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9年5月6日) (111)
1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摘录)
(1929年5月23日) (114)
161.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
第2号信(摘录)(1929年6月4日) (115)
16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8号
记录(摘录)(1929年6月7日) (118)
163.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29年6月7日) (119)

164.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
第3号信(1929年6月7日) (122)
1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29年6月8日) (132)
166. 伏罗希洛夫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
(1929年6月8日) (134)
167. 别尔津和苏达科夫给希夫列斯的信
(1929年6月20日) (135)
16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
第4号信(1929年7月8日) (138)
169.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7月30日) (142)
1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90号)
记录(摘录)(1929年8月8日) (146)
1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八一国际
红色日情况的决议(1929年8月) (150)
172. 米夫和库丘莫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29年9月7日) (158)
1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号记录(摘录)(1929年9月13日)
..... (164)
174.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56号记录(摘录)
(1929年9月27日) (165)
175.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的信(摘录)(1929年9月30日) (166)
176.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9年10月3日) (178)
17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 (1929年10月7日) (187)
1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2号(特字第100号)
记录(摘录)(1929年10月15日) (188)
1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电报(1929年10月24日) (190)
1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1929年10月)
..... (192)
1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9年10月) (197)
18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的信
(1929年11月6日) (211)
1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信(1929年11月21日) (214)
184. 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
(1929年11月14日) (223)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12月4日) (237)
18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
(1929年12月6日) (242)
1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
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0日) (249)
1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3日)
..... (259)
18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成员的信(1929年12月14日) (268)
190.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记录(摘录)

- (1929年12月16日) (274)
1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7日)
..... (294)
1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9号记录(摘录)(1929年12月23日)
..... (306)
1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记录(摘录)
(1929年12月24日) (310)
1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30号记录(摘录)(1929年12月30日)
..... (319)
195. 瞿秋白给库西宁的信(1929年12月30日)
..... (321)
19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9年12月) (327)
197.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9年12月) (345)

第二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政策中“左的”倾向的加强

(1928年9月—1930年初)

本卷这一部分收录的文件，阐明了从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到1930年初这一年半时间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政策的基本走向和演变情况。大家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形势的评价是：“革命浪潮在低落”。到1929年底，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转而认为中国的形势是“存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时期”，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阶段”。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的方针为那种认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似乎是右倾的方针所取代。

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史中的主要事件、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问题、各军事政治集团的斗争问题、中共党史中的问题等，在一些文献资料集^①和回忆录^②中都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在各个方面的研究著作^③中也作了探讨。

但是，这个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以及它们同中共的相互配合情况，在文献资料集中则反映的很不够，在研究著作中也阐述的不够充分。在评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时，通常只利用早在1929年发表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几个指示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哈尔滨1981年第3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0年第4、5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S. 施拉姆编：《毛的通向政权之路，革命著作集（1912—1949）》，纽约1996年第3卷；托尼·塞奇编：《中国共产党走向政权，文献与分析》，伦敦1996年；肖作梁：《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1961、1967年第2卷。

② 李维汉：《学习与研究》，北京1986年第1、2册；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劳伦斯1972年第2卷（1928—1938）。

③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1980年；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册，北京1989年；《周恩来年谱（1898—1949）》（袖珍本），北京1989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1992年；索外畴（音）：《国民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1924—1931）》，香港1991年；R. 桑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1928—1931）》，西雅图1969年。

性文件^①。结果在我们所了解的研究著作中，这些问题通常在专门论述共产国际整个对华政策或其某些较大时期的部分中一带而过。

直到最近几年，研究者还接触不到联共(布)领导机构的决议和共产国际这个时期的许多其他文件，以及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机构活动情况材料^②，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及其部分工作人员同其代表和中共领导之间往来的书信。本卷这部分中发表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些文件同有关中共活动情况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合在一起，为我们重新更全面和更准确地阐释20年代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及中共政策的内容和演变原因开辟了道路，进一步说明了1930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所实行的左倾方针的起源，以及中共领导先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后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生对抗的根源。

中共六大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在华活动，首先是旨在恢复前一年被摧毁的中共组织网，以及中共在工会组织和城乡群众组织中的地位。

这里发表的文件包含有一些具体材料，谈到进行这项工作的方针，谈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重建党和共青团的地下组织、阶级(“红色”)工会组织，以及它们的领导机构时在组织宣传鼓动工作时的指导思想和作用。这里首次发表了联共(布)和共

^① 见：《共产国际》1929年第11期第11—20页(阐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信)；第28期第40—47页(阐述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信)；第38—39期第56—58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共工会工作的决议)；第51期第7—12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10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 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涉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远东局组成人员和活动问题的著述。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1996年版第235—236、268—272页；F.S. 利滕：《牛兰事件》，载《中国季刊》伦敦1994年第138期第493—512页。

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主要文件，以及它们就共产国际专门学校为中共培养干部的状况、问题和效果同中共领导往来的书信（第131、144、153、165、167、195号文件）。还第一次发表了一些说明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给予中共财政支援的规模的文件（第124、126、134、136、138、140、141、148、151、156、157号文件）。

这部分材料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文件中，以及在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文件中，对中国形势评价的重要演变和对中共策略方针作出的重要修正。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不久，就出现了对中共六大一些决议的修改问题。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所指出的，一是因为六大决议基本上是根据中共在1925至1927年时期的工作经验制订的（第129号文件）；二是因为中国1928年的事态发展也要求这样做。内战的暂时停止和国家主要地区在南京庇护下的表面统一，带来了国内经济的明显复苏。南京政府得到了各大国的承认，也取得了它们就给予中国海关自治和提高进口税率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允诺。警察配合国民党在颁布新工厂法和工会法时实行的积极政策进行了严厉的监视，结果摧毁了绝大多数以前同中共有联系的工会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在主要工业中心，大型企业里的大多数工人都被拉进了由国民党当局和“改组派”建立的工会。（在共产党的研究著作中，这些工会与当局控制的工会相区别，得名“黄色”工会。）党在工厂里的基层组织，数量大减，并仍在减少。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这里建立的小片苏维埃根据地已经丧失，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制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受到损失，不得不转移到敌人难以进入的地区。

如何评价形势，成了1928年11月为此目的成立的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第136号文件),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科研教学机构研究的课题。1928年底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专门的研讨会。讨论中援引了不少材料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内政外交形势发生的明显变化。但在评价这些变化时,明显暴露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存在着“局限性”:担心被指责为修正中共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六大决议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估计,而同社会民主党人或托洛茨基的立场“沆瀣一气”。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和社会民主党有影响的首领,都把南京政权的建立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有条件地)把中国形势的好转看作是这个国家沿着建立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积极发展进程的开始。托洛茨基把这种形势看作是反动派的长时期进攻,认为中共应选择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1905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相类似的方针(召开立宪会议,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等)。

虽然在研讨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作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南京的外交举动被看作是旨在掩盖其政策的亲帝国主义实质的蛊惑宣传,但是许多专家(如马季亚尔等)还是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中国,资本主义以某种方式取得一定的发展是可能的。加上关于中共处境困难的信息,这就使人得出结论:在中国,近期不会出现新的革命高潮^①。

中共讨论这些问题时,在对新形势的评价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1928年底到1929年初的中共许多文件和党刊文章中都说,南京同其他集团的冲突,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买办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民族资产阶级试图稳定国内局势,在这方面它首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种形势以及民族改良主义政

① 卅. 马季亚尔:《中国革命的现状——在共产主义学院的辩论》,莫斯科1929年版第11—12、23—24页。

策和宣传的影响的不断扩大，被认为是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巨大障碍^①。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为上述研讨活动作出了过渡性的结论^②。无论是这封信本身，还是对它的讨论（第146号文件），都反映出共产国际领导有这样一种担心，即中国新的发展进程会造成对中共地位的进一步削弱，总的说来会导致“革命前景的丧失”。信中（和对这封信的讨论中）指出了中国内政外交形势的好转，同时特别强调了“不要夸大这些事实的意义”的重要性。那种认为这些变化会给中国沿着基马尔道路的发展开辟可能性的看法，被宣布为是一种幻想。对中国形势作出评价是为了证明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结论的正确。所以断定，争取国家的真正解放和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是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利的”任务。等待国家的“不是克服而是加剧现有矛盾”，这“必然加快新的、比以前更加深刻的普遍革命危机的到来”^③。

信中认为，作为解决中共基本任务（即建立和巩固党的地下组织，克服党脱离广大劳动者阶层的状况）的主要条件，是“消除对国民党的幻想，揭露它的政策”。需要特别注意揭露从左的方面批评国民党的各种政治派别^④。这里指的是“第三党”和特别是“改组派”的举动。

信中提出的指导方针很一般，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中共活动的新条件。例如，提出的恢复和巩固阶级革命工会的措施（为红色

^① 见杨奎松：《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第190—193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2—179页。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3、165、167页。

^④ 同上，第142—144页。

工会寻找合法外衣，或要求给予成立工会组织的自由，自行争取它们活动的合法性；向“黄色”工会渗透，以便把群众从“黄色”首领那里争取过来并把工人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或者采取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办法)^①，都没有考虑到当局警察监视的严厉、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实际状况和影响，以及主要工人阶层的状况。我们先要指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和它们驻华代表后来的文件（第158、172、176、181、182、183号文件）中，对中共工会工作提出的建议是如何之脱离实际^②。在本着共产国际各个党日益加强反“右”斗争的精神来讨论这封信时，有人竟建议宣布“右的危险”也是中共的主要危险。但最后，中共内“右的危险”仅仅被认为是潜在的、与“国民党民族改良主义蛊惑宣传”相联系的危险。信中强调了克服“左的”情绪的必要性，其表现是过高估计政权的危机程度，推测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同时指出，目前中共六大决议对形势的评价仍然有效。

信中有一个论点反映了对中共所遇到的困难的一定理解，这个论点认为：“在理论上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即有利于武装暴动的形势的到来有可能推迟许多年”^③。

信的起草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讨论这封信的参加者，都认为这时恢复中共力量的基本途径是活跃党在城市里的工作。很说明问题的是，信中只字未提苏维埃根据地和中共在农村的武装队伍。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不能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5—176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9月27日作出的关于中共工会工作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2—195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排除（哪怕一时）对农村地区游击运动的镇压行动^①。十天前，在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讨论给朱毛部队援助问题时，有人说，在决定这个问题时，必须“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的发展前景出发，必须弄清楚在进一步展开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第144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中的主要论点，被预先规定为是对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的指导意见。这些论点实际上确定了3月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共产国际驻华新代表机构直至1929年9月的立场。首次在本部分中发表的一些关于这个代表机构活动情况的重要文件，使我们能够弄清迄今一直没有搞清的它的人员组成问题，而主要是能够阐明它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同中共领导的相互配合情况。

在1929年，代表机构的成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共代表（代表团）雷利斯基（领导人）和埃斯勒、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兼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马西。整个这个代表机构就是也研究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共产党工作问题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负责组织联络和转交经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分部仍由阿尔布列赫特领导。

代表机构的报告和书信、它的决议和给中共领导的信（第154、161、164、168、171、176、181号文件）表明，由于地下工作条件复杂，关于党的活动的材料，代表团几乎完全是从同有限的党的领导人的接触中和从翻译中共的文件中获取的，而中共的文件常常很不完整，转到代表团手里为时甚晚（第161、181号文件）。关于国内形势，关于罢工等等的信息，代表们在很大程度上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3、卷宗116、第18页。

是从报刊材料上得到的。代表机构很晚才收到指示信、通报材料、关于共产国际及其各党情况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出版物。所以代表团在给莫斯科的七月信中说，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情况，它不得不根据它的成员在2月动身来中国时了解的材料向中共作出通报（第168号文件），而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文件只是到9月底10月初才收到（第173、183号文件）。

除语言障碍外，下面这个情况对代表机构的工作也有影响：除了乔治·哈迪，它的工作人员中以前谁也没有研究过中国，没有到过这个国家，没有同中共哪一位新领导人接触过。有许多文件暴露出，代表团成员对中共六大的一些基本决议一无所知（第168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代表团的信中曾指出过这一点（第172号文件）。这种情况在中共领导的眼中没有提高代表团的威信。很说明问题的是，它试图干预政治局的人员组成问题（让蔡和森回到政治局），但遭到了坚决的拒绝（第161号文件），而代表团对中共二中全会决议的修改意见（第168号文件）也没有被采纳。

但是，随着根据可以接触到的通报对情况的逐渐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很快就能对中共的主要问题和弱点、它的领导班子的力量配备、它的工作方法、它的个别领导人，特别是李立三的立场（“李立三那里所有人都是右的”）、它在实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职工运动策略时会遇到的实际困难（第161号文件）等等提出贴近实际的想法。在代表团直至9月底以前的报告和决议中，对中共在罢工运动中的作用、对一些政治运动的结局（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借5月1日和5月30日的时机组织了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第164号文件），为纪念中东路事件，于7月和8月1日也组织了示威游行（第171、175号文件），与这些活动相配合开展了一些政治运动）还是作出了很冷静的评价。

关于中国发展情况的一些通报和代表团在信中向东方书记处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开展反对孙逸仙“三民主义”的运动是否合适问题（第164号文件），以及关于冯玉祥和张发奎释放共产党人并宣称准备对苏联实行“友好”政策（第175号文件）的报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代表团试图促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策略作出修改，哪怕是部分修改，以使中共摆脱严重孤立的状态。根据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作出的反应判断，代表团试图自行其事的行为并非未被人察觉并遭到制止。（第182号文件）。10月初，代表团的立场就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来自莫斯科的信息的耽搁）很晚才反映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日益左倾。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这种倾向是与1928年底1929年上半年反右斗争的急剧加强（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其他党转而对“右派”和“右倾调和主义者”采取组织措施）有关。早在1928年底，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被更换^①。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上，联共（布）一些著名领导人被指责为“右倾”，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的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并将他清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5月，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被撤换。1929年5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美国共产党问题时，斯大林说：“右派”看不见“欧洲革命形势的高涨和新的革命高潮的日益成熟……。明天在印度和中国将会有新的信号”。^②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华政策的“向左”转，清楚地体现在它给中共的一些指示中，这些指示要求中共修改中共六大关

① 因“调和主义”被清除出党的领导机构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成员之一：埃斯勒。

② O. B. 库西宁：《新时期和（在斯大林领导下）共产国际工作的转折》，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7页。

于在本革命阶段“不加剧”反富农斗争的论点，还体现在它既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又反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富农”^①的指导方针上。同时，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再次建议向中共领导说明，根据中共中央一个通告中关于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关于资产阶级试图给封建势力以打击，改善农民状况、排挤列强和实行海关自治等的论点来评价形势，这是不能允许的（第163号文件）。

1929年7月3日至1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华政策的日益左倾。在这次会议的材料和决议中，关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国际性质”和关于“右的危险”是共产国际各党中的主要危险的结论占据了中心地位。虽然莫洛托夫和米夫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现在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在日益形成还为时过早，但莫洛托夫，特别是米夫仍断定，“出现这种声势浩大的高潮的‘前提和征兆’现在正在形成”^②。

为了论证这个论点，米夫首先引证了中国罢工运动的高涨。皮亚特尼茨基在会上发言时援引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团的信，信中谈到，中共在组织罢工工作中的作用还很小（第164号文件）^③，而米夫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了论战，他断定，党保持了“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工人的经济斗争已经发展成为政治斗争^④。其次，米夫引证了农民和农村各种秘密社团自发行动的高涨，以及中共游击队，而首先是朱毛部队保存了实力并取得了成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1929年6月7日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82—186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速记记录》第1册，莫斯科1929年版，第277、335页。

③ 同上，第3册第141、142页。

④ 同上，第123、124页。

功^①。从1929年夏天起，中共在农村的积极军事活动，特别是朱毛部队的活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中常常被看作是日益形成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中共内部形势的评价发生的主要变化，推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向左转”，这种变化表现在米夫在全会上发言时所作出的这样一个结论上：中共内右的危险具有“威胁性的形式”^②。在这方面对中共起推动作用的，还有全会上极力强调的一个论点，即在大多数党内，“右的危险”表现为“尾巴主义”，即主观因素也就是党的工作落后于客观的、有利于革命危机成熟的事态发展。

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工会工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重申了把红色工会变成群众性工会的任务，提出了一些在中国的条件下不切实际的建议，即“自行把这些工会从地下转为公开，实行向‘黄色’工会渗透以便消灭它们的方针，实行独立领导日益高涨的经济斗争的方针”^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策中出现“向左转”的新动向，是与中东路冲突的发展和关于南京与冯玉祥、阎锡山和“改组派”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消息有关。

在9月7日的信（第172号文件）中，东方书记处领导指示代表团（和中共领导）积极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建议“派出最强有力的同志去领导罢工运动……，并将其纳入反对国民党各个派别的政治轨道”，同时还援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指示，要求一旦取得成功时，要提出组织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任务。信中本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的精神，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速记记录》第1册，第335页。

② 同上。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共工会工作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2—195页。

建议争取取得工会工作和其他群众组织工作的半合法形式。信中认为,党的“一些组织”对配合中东路冲突宣传保卫苏联和挫败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所持的“消极态度”是“右倾”的直接表现。在党的口号和策略上必须考虑到对居民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工人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当局的民族爱国主义宣传,但信的作者不顾这一点,而要求“开展运动去反潮流”,“首先要在保卫苏联和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直接口号下发动工人”。

信中特别注意到,不能允许存在任何支持“改组派”的倾向,不能允许存在任何“复活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并且论证说,这种统一战线必须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代表似乎就是“改组派。”与此相联系,重申了加剧同孙逸仙主义作斗争的方针。同时,文件中还指出了发展和加强游击队和农村苏区的新的实际可能性。9月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米夫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象征性的标题:《中国日益形成的革命高潮》^①。

10月,当弄清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联合支持南京^②,而各派集团之间新的内战已成事实时,莫斯科在对形势的评价上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中国进入了“深刻民族危机”时期,而群众运动正经历“革命高涨的初始阶段”。

10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团的指示(第178号文件),其中建议要千方百计利用业已掀起的“中心斗争”来开展群众运动。建议组织革命的职工运动在当局控制薄弱的地区尝试走出地下状态,在罢工运动中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和“努力开展政治罢工”,除此之

^① 见《共产国际》第38—39期,第21—31页。

^② 如见I.阿基拉:《在帝国主义之后,远东新秩序研究(1921—1931)》,坎布里奇1965年版,第264—267页。

外，在指示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关于巩固和扩大“游击运动，特别是在毛泽东地区和在满洲”的游击运动的指示、关于占领军阀放弃的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力求协调湖南、湖北、福建和广东的游击行动的指示。

指示要求开展对国民党各个派别的揭露活动，同时强调指出，“应加剧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主要斗争，反对试图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的左翼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这些指导方针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基本战略原则”的解释在中国的运用，它要求加剧同中间势力的斗争。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签发的这个指示是用电报发给中国的。

指示的基本论点和指导方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于1929年10月26日通过的给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件中作了详细说明。指示补充说明了对中国形势和群众运动状况的新的评价。按照这个评价，“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民族危机时期”，“群众革命运动”的状况被认为是在“兴起”，是处于“革命高潮的开始时期”^①。信中说，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潮的特点之一是“农民战争”，即农民的自发行动，而主要之点是“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地区，南方游击战连绵不断”。信中说，苏区和农村游击战“将是以后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一个途径”^②。信中还认为“工人运动的兴起”是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这里明显夸大了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的趋向。信中还指出了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薄弱、红色工会薄弱及“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占据优势，指出了党没有解决争取大多数工人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6、198页。

② 同上，第171页。

级和掌握对它的自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导权的任务^①。考虑到这些方面对于共产国际关于革命高潮标志的“传统”概念的影响，这些意见稍许降低了对以后形势发展前景的估计。这封信在中国只是到12月中旬才收到（第205号文件）。

1929年10月，代表团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9月底在中国收到了上面谈到的东方书记处9月7日的信和第十次全会的材料。代表团对这些文件作出的反应反映在它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中和它10月3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第176号文件）。

决议中认为，南京政权的内外政策已遭到彻底失败，并造成了经济的崩溃，因而大大加剧了各派集团和居民阶层反对南京的斗争。据代表团预测，各派集团之间再次开战的结局将是汪精卫集团取代蒋介石政府。汪精卫集团从左的方面对南京进行了蛊惑性的批评并提出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保护劳动者利益等虚假口号，以此来掩盖其亲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实质。鉴于这种情况，决议中建议党揭露所有“改组派”集团和国民党的政策，并实行旨在由争取实现部分要求的斗争过渡到直接政治斗争的策略方针。

信中特别强调，不允许同那些声称对苏联和中共表示友好的将领进行任何接触和谈判。建议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加快发展群众性组织，要求取消豪绅和地主的自卫队，解除警察、宪兵队的武装，释放所有政治犯，“逮捕所有封建主、豪绅、地主、富农和将领”，自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要求把所有贫苦农民和工人武装起来。

即使适用于这些地区的这一套指导方针也是进攻策略，实际上预先设定了当局的彻底垮台。此外，这个策略是把希望寄托在群众性政党身上，这明显不符合代表团不久前的文件中对中共实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9、200页。

力的估计。总之，这些文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代表团试图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作出“反应”，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东方书记处的指示。

在10月24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去的电报中，代表团得以作出以下报告（第179号文件）：还在收到莫斯科指示之前，就下达了相应的训令，“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利用很好的客观形势”，“已向各个重要的和被运动包围的省份派去了指导员”等等。同时这些乐观的报告也伴随有谨慎的保留：“但是，党在组织方面的薄弱和敌人不断的镇压，不允许我们百分之百地利用形势”。

代表团的十月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助长了中共内仍存在的左倾观点和情绪。早在6月，李立三在中共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说，“中国的革命危机在日益加深”，而只是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信中对形势作出的评价才被接受^①。全会的《政治决议》在分析促进中国革命发展的因素时，突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对苏战争威胁的日益增大”^②，这就是后来在李立三的左倾纲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论点。

从7月起，与中东路冲突相联系，中共领导把宣传保卫苏联口号的指导方针看作是实际实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直至1929年12月，他们排除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在中央的文件中，流行这样一个论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将成为爆发世界革命的时刻，将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③。

8月，随着同陈独秀论战的开始，更加强调同右派和右倾取消

^① 《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9期第44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台北1965年版，第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80页。

^③ 中共中央1929年7月24日发出的第42号通告，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198—199页。

主义倾向的斗争，相应地中共向左转的趋势也有所加强。陈独秀批评中共中央对中东路冲突的策略和口号，后来还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方针并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评价（“革命浪潮长时期低落”等）^①。

在代表团十月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影响下，在爆发了内战和红军部队与张学良部队在满洲地区发生了直接武装冲突的情况下，1929年11月，中共领导中形成一种理论，实际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包含了1930年得名“李立三路线”的行动纲领的所有基本内容。这个理论是在11月18日至26日举行的江苏省党组织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并得到了会议的认可。鉴于中共高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和江苏党组织（包括中国最大的上海党组织）在整个党内的作用，这次会议就其意义而言相当于党的中央全会或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正是在这里，李立三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世界大战、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关于中国和中国革命在发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等理论的要点，以及关于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的客观性质、关于在中国条件下能够和有必要由人数不多的先锋队采取积极行动，通过组织政治罢工、士兵哗变和红军部队的进攻行动来加快革命的到来等论点。

按照李立三的评价，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尽管部分与会者持反对意见，这些说法和评价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中有的是迫于被划为右派和取消派威胁的压力）并写进了会议决议^②。

^① 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1994年版第61—70页；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1989年版第2册第45—68页。

^② 关于会议过程及其决议的详细情况，见陈顾清、王南：《中共江苏“二大”与李立三错误的形成和发展》，载《近代史研究》，北京1985年第6期，第79—93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并不了解会议讨论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实质。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会议情况的信中，它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在所有问题上会议都坚持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立场”（第185号文件）。但即使晚些时候代表团对这次会议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第205号文件）。

在代表团12月份的文件中，对中共在这次之后的工作问题反映的不多。其主要原因，看来是代表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冲突尖锐化了，把其他问题推到了次要地位。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共领导坚决不同意代表团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对中共活动的评价（第175号文件），决议中说，“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富农问题上和在工会工作中犯了“右的”错误。特别令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痛心的是，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导方针的角度指责它“倾向于”把广西将领俞作柏看作是“拥护成立革命组织自由、出版自由等的人”。虽然决议中说，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纠正了或正在纠正所有这些“偏离党的总的来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倾向，但中共领导认为，作出这种评价是试图把他们的活动视为一系列的右的错误（第186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竭力否认对俞作柏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因而他们得以在广西建立红军部队和苏区^①。他们声明说，指责他们同俞作柏有接触，这是基于传闻，没有确凿根据。

在发表的文件中，反映了争论的过程、双方的立场和论战激烈时双方使用的论据（第186—189、191、193、204号文件）。代表团拒绝修改决议的提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作出反应时，指责代表团“一贯右倾”，在如何对待陈独秀这样的尖锐问题上“搞

^① 关于与中共同俞作柏的接触有关的事件，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27—1931）》，第136—138页。

调和”。双方在没有达成妥协后,决定诉诸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带着专门的报告去莫斯科(第193、196、197号文件),代表团决定派雷利斯基去莫斯科(第205号文件)。

关于争论过程的文件和特别是双方后来的报告(第196、205号文件),更加补充说明了代表团和中共领导之间的接触情况,虽然在评价一些情节时,需要考虑到论战对观点差异的夸大(这些不同观点可能是以交换意见的方式提出的)。

十二月论战,集中在过去的问题上,没有涉及中共的现时政策。其结果是加深了中共领导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之间的隔阂和相互间的不信任,更加减少了后者得到党内和其领导内部情况通报的可能性。代表团怕被莫斯科怀疑犯有“右的错误”,因此对中共政策中“左的”倾向的通报就十分谨慎。

12月中旬,正当中国的论战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收到了政治书记处的十月来信(第205号文件)。在西方和中国的研究著作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指示直接促进了李立三行动纲领的形成^①。实际上正相反,这个指示暂时阻止了李立三行动纲领的进一步发展和变成直接行动纲领。在普遍左倾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月来信对中国形势的评价,与江苏省党组织十一月代表会议的评价和指导方针相比,还是谨慎得多。这也体现在12月对内战的制止上(这次内战最后以南京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下一年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次停战是短暂的。

^① 如R. 桑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1928—1931)》第101页;R. 桑顿:《中国政治史(1917—1980)》,博尔德1982年版第33—34页;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1988年版第154—159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册,第63—64页。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9月4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莫洛托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敬爱的同志：

我认为，再次提出挑选和紧急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问题是适时的^①。

即使在让瞿秋白和张国焘同志作为中共代表留在莫斯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显然也无法保证对党的领导。

举行中共六大的经验^②和后来对中国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团工作情况的观察^③，使人担心，由于中国党明显缺乏有威信的（个人和集体）领导，在中共内会出现一些内部困难。

现在只有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当中挑选中央的这种核心（如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

但是，这些处于派别斗争接连不断条件下的领导同志，本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还不够坚强，还无法与那些瓦解党的派别相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不断帮助，恐怕他们未必能完成党内的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3月22日作出关于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决定，见第78号文件。

② 见第409页注③。

③ 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任务。

何况中国目前出现的客观形势仍然非常严重（南京中心对中国的表面统一、美国的政策、左翼资产阶级集团即“第三党”、“汪精卫和陈公博”的活跃、农民运动的连绵不断）。

看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中国代表团本身就曾不止一次地坚持认为，需要对问题作出积极的解决。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库丘莫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9，第 109—11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1 记录

（摘录）

1928 年 9 月 6 日于莫斯科

听取：11. ——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决定：11. ——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决定并通过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草案（见附录 1 和 2）。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政治局 1928 年 9 月 6 日会议
第 41 号记录，决定：11 附录 1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 1928 年 8 月 10 日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的决议

1. 中央监委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系苏联军校和其他学校的中国学员在 1927 年试图组织储金互助的一种尝试，根据中央监委掌握的材料，这些同志没有给自己提出其他任务。

2. 中央监委没有材料证明，过去和现在存在某种固定的组织。

3. 中央监委认为，指控被怀疑参加这个互助会的同志反党、

反革命、与国民党右翼军阀分子有联系、支持(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试图夺取中共领导权和实现这类政治目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考虑到中共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需要有非常严格的统一和纪律,而在准备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同志、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以及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当中,存在任何小集团都会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变得复杂化和难以进行;按照同乡关系而不是党的原则组成的小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中共的斗争增加困难。所以中央监委建议所有与这种尝试有关系的人,要立即取消这类小集团。

4. 认为“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已被撤消。

5. 责成由(1)皮亚特尼茨基、(2)国际监委代表(索尔茨同志)、(3)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4)雅罗斯拉夫斯基和(5)米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告苏联境内全体中国学生书,说明党内的小派别、对党的纪律的小的破坏,或即使是为了进行互助而要建立秘密组织的小的尝试,都会给在极其困难的不合法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号召在有中国留苏学生学习的地方立即消灭不健康的非同志式的关系,号召做强有力的、友好的、同志式的、团结一致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同时把做这种工作看作是在中共队伍中为进行革命斗争做准备。

6. 在各学校的中国学生大会上宣读这个号召书,并举行座谈会,彻底消除互不信任气氛和互相中伤等行为。告诫所有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派别斗争、吵架、互相中伤和无根据的诽谤等的一点点表现,都会招致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7. 认为有必要让相应的上级领导机关,重新考虑对那些因被怀疑参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而被调离的学员的调离问题。

8. 向米夫同志指出,他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学生大会上,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说存在地下组织,并且未在任何相应的党的机

关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9. 此案解决办法在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协商后，还要同国际监委协商。

核对无误：维纳格拉多娃

政治局 1928 年 9 月 6 日会议
第 41 号记录，决定：11 附录 2

**告苏联境内中国劳动者大学和其他学校全体
中国学生、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
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中共党员和
候补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书**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约有 1500 名中国同志在苏联各个学校学习，准备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大军某个队伍中的积极成员，或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应该准备根据共产国际的号召，参加中国的实际工作，投身到为摆脱国际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国内军阀政权、资本家和封建主的压迫而正在进行忘我斗争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去。

你们知道，进行这种准备，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多么困难。苏联工人阶级准备尽力保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它的这种援助不仅体现在道义同情上，而且它准备承担相当大的物质牺牲，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正是履行这种国际义务，在苏联开办了中国劳动者大学并在苏联其他学校安排了对中国 1500 名积极分子同志的政治教育。这需要我国劳动人民付出可观的财力和人力。在苏联培养中国革命者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在共

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积极帮助下,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心脏里,在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最大的试验室里,中国同志拥有充分的物质和政治条件来深入研究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检验自己党的经验,清查过去的错误。他们可以根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历史上的经验,根据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经验对自己的经验作出正确的评价。

而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中国革命阶段。在1926年至1927年间,中国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之后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国民党由一个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手挽手反对帝国主义的党变成了一个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右翼”领袖还是“左翼”领袖,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国民党企图通过实行空前残忍和野蛮的白色恐怖来扼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战斗的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有30多万忠实于革命的人们已牺牲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或被他们绞死和枪杀。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劳苦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英勇斗争仍在进行,一刻也没有中断。我们相信,中国劳动人民的客观生活条件和中国的阶级关系,在存在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终究是会使中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为了使这个事业取得成功,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列宁主义的精神,对工农群众努力做好革命工作,需要有严格集中的、有布尔什维克素养的,并在自己的队伍里实行铁的纪律的党。为此,必须培养新的干部、新的补充人员,你们这些在苏联在联共(布)领导下准备参加战斗的同志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你们面临着怎样的任务。

你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掌握列宁主义理论上。你们应该根据这个理论仔细研究、检验和考虑国际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特别是东方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重大问题。你

们应该研究苏联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你们中许多人还是在中共在合法条件下工作的时候来到苏联的，所以尤其有这个必要。因为你们中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条件，从事地下工作需要有人在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坚定性，需要其他的特殊技能和更认真的准备，所以尤其有这个必要。你们应该不浪费一分一秒地来研究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组织群众工作的经验。你们应该研究和掌握开展工农运动的实际方法和党的组织工作原则，还应该学习军事艺术，因为当你们手握武器捍卫党的要求，捍卫工人阶级的要求时，这些对你们都是有用的。你们应该学会无条件地使一切其他想法、一切其他利益都只服从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

同志们！你们应该检查自己并应该说你们中许多人离这个要求相差还很远。你们中许多人就在不久前不仅本人而且在政治上同国民党都还有联系。我们知道，这种联系不是经常容易断绝的。为此需要有非常坚定的原则性，要在斗争过程中逐渐培养这种原则性。我们知道，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深厚的乡土观念，对你们中许多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联的生活条件也会使你们产生某种孤独感，因为你们在这里不可能立即掌握民众的语言，但你们在民众当中可以受到教育，并为以后从事革命工作做准备。你们要善于克服这些影响，因为它们妨碍你们中许多人认为自己是统一的无产阶级大家庭的成员，而这个大家庭又是服从于统一的意志即共产党的意志的。

8月1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会议审理了所谓“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此案促使我们提醒你们以上这些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代表和几十位中国和俄国同志，会前积累了一些材料，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培养中国同志的学校的状况的理所当然的担忧。这个案件是1927年在这里学习的一些中国同志组织储金互助时发生的。我

们不认为同志们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好和害处。相反，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要表现出同志式的互助感情。我们鼓励他们作为统一的共产党的成员要准备从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互相进行帮助。若是公开作出这种尝试（联共（布）所有委员会都设有党的同志互助会），取得党的允许，那就不会发生任何令人不安和有害的事情。但这次情况不是这样。相反，同志们认为必须秘密进行这件事，这引起了负责中国学生同志教育工作的同志的不安。例如，卢贻松同志向周策等同志谈到组织“互助会”，按照章程第一条缴纳会费、有荣誉会员和他本人是该会会员等情况。在中央监委会议上，卢贻松和其他同志解释说，他们讲章程和荣誉会员是开玩笑，没有任何章程，等等。中央监委认为，这些同志的错误是，他们拿可能造成严重有害后果的事情开玩笑，用开玩笑来掩盖这种严重的事情，因为这种秘密组织进行活动，不受党的监督，可能起到很有害的作用，会按集团、同乡关系瓦解统一的共产党大家庭，会造成按省际关系和接近于行会组织的亲缘关系原则而不是党性原则建立组织的有害倾向；如果不按党性原则建立有原则性的集团，那就会在这种秘密组织起来的同乡会的掩护下产生和形成无原则的或反党的集团。这对在苏联的中国同志来说尤其有害。他们必须克服前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在他们之间出现的那些摩擦：无论如何要克服因向军校推荐学员和因所谓“区委主义”^①而发生的争斗的种种余波和以前的其他错误。无论如何要克服在对参加所谓“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者产生怀疑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不信任感。

党没有根据断定存在这种定型的组织。党掌握的材料也没有提供根据可以用来指控建立互助组织的同志反革命，与军阀、国

^① 指中共莫斯科区委的活动。详见《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俄文版第668页。

民党右派和（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有联系，等等。但是党坚决谴责未经党的允许根据上述原因建立这种组织的尝试。

同志们！你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允许在我们中间，在像中国这样的党的工作条件下，不经党的允许，不受党的监督，建立哪怕不完全定型的组织，那会给共产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啊！不排除这种组织在以后的发展中有可能超出互助范围、具有政治性质。中国留苏学生同志的社会成份非常复杂，他们缺乏经验而又不十分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组织有可能使他们走上很危险而又很有害的严重派别斗争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联共（布）和中共如此在意这个案件。现在在中国学生当中存在着不健康的、非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证明这种危险是现实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都应该从这个挑唆你们中许多人吵架的案件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我们表示相信，你们将会通过共同的努力来纠正这个错误，你们不会因此给本来就有许多困难的联共（布）和中共制造新的困难。我们号召你们大家在同志式的相互信任基础上和睦地去为革命事业做理论准备和实际准备，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去巩固自己的党和共青团。我们不想使犯这个错误的同志遭到党的惩罚，而认为有必要采取党的教育措施。但是同志们应该明白，如果采取党的教育措施还不够的话，那么党就不能不对那些未经党的允许参加在中国留苏学生中间建立的并且不受党的机构监督的任何组织和集团的同志采取最极端的组织措施。同志们应该公开与这种组织和一切其他类似组织作斗争，因为这是争取实现十分必要的最大团结的斗争。不是集团的团结，不是家庭的团结，不是同乡的团结，而是党的团结、阶级的团结。

同志们！摆在你们大家面前的，是宏伟的、全面展开的、在全世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你们属于在极其困难的刽子手政权和白色恐怖条件下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民。但你们现在是在最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条件下，是在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

的国家中受教育。你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个差别。你们应该记住，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联共(布)在自己的队伍里为了保持坚如磐石、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清除了一切集团。

你们应该有这种意识：就是在中国，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们号召你们大家去培养这种团结，去建立最大限度的同志式的党的团结，去克服不健康的非同志式的关系，去根除还存在的相互不信任感。

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团结万岁！

共产国际的两个为争取革命在中国和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并肩战斗的兄弟党——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核对无误：维纳格拉多娃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03，第 1—2、5—1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件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132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 65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9 月 17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6——关于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更名问题。

决定：6——鉴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同孙逸仙大学合并，采纳合并后的学校关于授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名称的建议。

中央书记

〔附录〕

1928 年 7 月 21 日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克里尼茨基同志

请在您同意情况下，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大学更名问题。

按照中央组织局以前作出的关于我们学校共产主义化的决定^①，现在我们在学生构成、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方面已完全转到共产主义高等院校轨道上。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由于中国共产党

^① 见第 99 号文件。

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和孙逸仙思想的斗争^①，他们建议我们提出取消我们学校以“孙逸仙名字”命名的问题。

出于这些考虑，请（在您不反对情况下）向书记处提出用新的名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取代以前的名称“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的问题。

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完全支持这个建议。

校长 帕维尔·米夫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59，第 1、3、6、114 页。

记录为铅印稿，附录为打字稿，原件，中央书记签字辨认不清，米夫签字为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133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核心小组会议第6号记录^①

（摘录）

1928年9月18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布哈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卡冈诺维奇和西塔罗夫同志

听取：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人员组成问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分配问题。

决定：2——基本上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方案，作以下变动：（4）任命阿尔诺特同志为库西宁同志负责东方书记处工作的副手。

听取：8——关于米夫同志的报告问题。

决定：8——在卡冈诺维奇同志未弄清楚这个问题^②之前，把米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在孙逸仙大学的工作问题作为悬案。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1928年9月18日会议第6

① 文件副本寄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② 1929年3月15日联共（布）中央组织部批准任命B. II. 威格尔为新校长。

号记录，决定：2 [附录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分配

9. 东方地区书记处。任命库西宁为书记处书记，阿尔诺特为库西宁的副手。

任命米夫为东方部部长（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属该部工作范围）。

任命舒宾为中东部部长（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属该部工作范围）。

任命斯特拉霍夫^①为近东部部长，威廉姆斯^②为副部长（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其余法属殖民地属该部工作范围）。

1928年9月18日会议第6

号记录，决定：8 [附录2]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昨天我（通过克里尼茨基和塔利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正式提出了解除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继续兼任学校的工作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绝对不行的。试图物色副校长和相应地减轻我在学校里的工作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为了事业，必须解除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或者学校里的工作。

中央宣传鼓动部坚决主张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

① 瞿秋白。

② Б. Д. 米哈伊洛夫。

作。我也认为这样做更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向俄国代表团核心小组提出解除我的工作并由另一同志取代的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帕维尔·米夫

1928年9月15日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69，第 1—2、8 页、24 页—24 页背面。

记录为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 1 为打字稿，原件，附录 2，亲笔签字。

134

阿龙施塔姆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9月29日于莫斯科

乌德罗^①：

请转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②。

“1928年给你们寄去158000美元，分5次，即19000、50000、14000、35000、40000。

其中给中国的经费，1至6月每月6000美元，7至10月每月9000美元，以及通过开展运动募集到的59000美元。

给朝鲜，1至10月每月1000美元，外加援助款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

给印度尼西亚，1至6月每月1250美元，7至10月每月500美元，共计9500美元。

给日本的经费直接寄去了。等候支出报告。

布雷克^③”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a，第144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詹姆斯·多尔森。

③ Л. Я. 阿龙施塔姆

135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 79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11 月 9 日于莫斯科

听取：11——关于取消“不许干涉中国”协会问题（中央书记处 1928 年 11 月 2 日决议，会议第 77 号记录，决定：20）（报告人：克里尼茨基、克德罗娃同志）。

决定：11——采纳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关于取消“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的建议^①。

代中央书记 布勃诺夫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76，第 1、4、8 页。

铅印稿，亲笔签字。

^① 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草案中，克里尼茨基建议“暂停协会的工作，以便在中国工人革命运动高涨时可以恢复协会的活动”。皮亚特尼茨基支持这个意见（见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76，第 138、141 页）。

136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28年11月12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

主席：米夫同志

米夫：同志们，我简要通报一下东方书记处关于成立常设中国委员会的决定^①。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现在在这里。我们给这个中国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为此目的，在开始讨论包括有许多问题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与目前的在华工作情况有关的一些一般性政治问题。我们中国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有许多方面：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②上提出这个问题，起草一系列与中国现在的具体形势和我们所掌握的那些材料、中央通告和信函有关的政治指示。与此相联系，看来，我们还需要讨论中国共产党本身提出来的许多口号，因为这些口号从我们党的角度来看，其可行性、正确性和持久性引起一些怀疑。在

① 文件没有找到。关于建立这个机构的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委员会1928年6月12日会议上作出的，见第106号文件。

② 见第410页注①。

组织工作方面需要给中国共产党以帮助。我们还准备制定一系列关于基层支部、地方委员会、党的秘密工作等等的训令、指示和规定。

最后，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应该是总结经验，首先是研究广州起义的材料，因为中共六大已就纪念广州起义^①周年日的必要性向各兄弟支部发出了呼吁，各国无产阶级都要纪念这个日子。

但是，在着手具体研究整个这个计划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一些一般性问题，同志们，这不是因为目前的形势促使我们要对我们在中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中国问题所作出的原则性决议作出什么根本性的修改。看来，现在还没有作出这种修改的理由。但是这期间还是流逝了相当多的时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事件。对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作出评价，为的是使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讨论和从中得出的结论成为我在上面所说的更具体、更系统和更有计划的工作的基础。

在这方面，看来我们需要讨论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发展进程，以前，即在中共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和共产国际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只能对其作出推测。现在有些材料已给我们提供了根据，可以作出更明确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经济生活作出展望。

最后，同志们，我们还需要专门讨论中国的外部情况问题和现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因为一些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受它们之间某种妥协的影响还是有所活跃，至少比以前更活跃了。鉴于中国出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必须讨论总的政治形势。虽然中共六大工作期间这些情况就存在，但那时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用来对这些情况作出某种总结和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评述政治形势，也应包括讨论国民党最近召开的五中全会的结果及联系拟议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所描述的发展前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86页。

最后，同志们，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工人运动和罢工运动的许多补充材料，更具体地说，还有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等等。这些情况再次说明，为了给做实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作出更具体、更明细，更区别对待的指示，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仔细的研究。因此我们也打算听取以下四个报告：1. 沃林和马季亚尔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报告；2. 帕夫洛夫同志关于中国外部情况的报告；3. 别尔津同志关于中国军事集团和军事形势的报告；4. 斯皮里多诺夫^①同志关于一般政治形势和党的状况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之后，打算组织热烈的讨论，所有出席本会议的同志都应积极参加。现在我们想作些变动，因为一些报告人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请求把他们的报告推后一些，因此具体到今天，请听取帕夫洛夫同志的报告，然后如有必要，别尔津同志从军事方面作补充，其余报告以及讨论，我们挪到下一周，在下周一^②听取沃林、马季亚尔和斯皮里多诺夫同志的报告，之后就所有这些问题展开总的讨论。

如果同志们不反对这个程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进行（通过）。为了让同志们了解情况，我可以告知中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宣读中国委员会成员名单）^③。如果对确定的程序没有反对意见，那就请帕夫洛夫同志发言。我们要不要制定什么会议规程？报告人要求给一小时时间。（没有反对意见，通过）^④。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28，第 1—4 页。

打字稿，经过修订的速记记录，原件。

① 张国焘。

② 1928 年 11 月 19 日。

③ 委员会组成人员不详。

④ 报告和对会议出席者提问的答复没有发表（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28，第 5—45 页）。

137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阿尔诺^①同志：

1. 您10月30日的电报^②收到了。您在电报中请求在决定4中指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预算。现告知11月和12月预算(10月预算已告)。

中国，每月9000美元，共计18000美元。

朝鲜，每月1000美元，共计2000美元。

日本，美元12000美元，共计24000美元。

2. 您总要求寄钱，而我们这里根据您的支出报告作出的综合报告说明，您那里的钱是够用的。由此我得出结论，您显然没有按我们的指示拨给经费。

3. 您可以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钱去解救布林斯基^③，他们那里应该有近30000美元用于这种目的的储备。这个情况我在6月6日已电告您^④。

4. 关于让你们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共工作一事，您可转达，我坚决反对这样做，但我们还要建议中共中央的地方委员向中共中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任弼时。

④ 见第96号文件。

央政治局报告这个情况。

5. 关于公司注册问题^①，我们将讨论可以怎么办。
6. 我在等候财务支出报告。

米哈伊尔^②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41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大都会贸易公司”，见第 126 号文件。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138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11月24日于上海

米哈伊尔^①：

利用布劳德去您那里的机会给您寄去我8至12月份的支出报告^②。

我对报告有以下意见：

1. 我很难履行会计对各种手续的种种要求。我本人力求把报表做得尽可能完整。但我还是认为，不应忘记，我们毕竟是在保密也具有某种意义的地方工作。我本人尽管遭到大家抗议，还是写了收据。我们的所有开支，除很少的几笔外，都有证明文件。但终归不能要求我提供半年的证明文件，因为我无法保存档案。

2. 我无法向会计提供我们外汇的证明文件，因为钱是寄给我的。其实，最简便的办法是问柏林，从那里取得给我寄钱的证明文件。我希望您知道，我不便常以收款人身份出现，我引起银行的注意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从国外进口商品，不向国外寄钱，却总收到汇款。要知道，终归外汇汇率不是秘密，如果会计买一本好手册，我认为她能很容易地确定她所需要的汇率。那我不必再做这件事了，因为我肩上的事情太多，不能再管这件事了。

3. 我认为，我在我们机关工作10年了，至今还没有给人以口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实来对我产生什么怀疑。因为这里的工作是与某种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无法超出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请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信任我，满足于我寄去由我提供费用的人的一切原始收据，不要让我提供过多不必要的证明文件（只有坐在您所熟悉的机关里的同志能这样做），要么尽快派一个您更信任的人来。得不到信任就不能在这里工作，并且最终会发生很多令我不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对我们来说，到处都是最野蛮的条件，无论货币还是通讯，没有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无法满足会计老爷们想出来的那些要求。

4. 我不接受会计部门关于按汇率计算我们薪金的建议。我想，梅季斯知道，吃饭，付房费不是按汇率而是用硬通货支付，因此没有什么必要提出这种建议。

5. 我认为，与其说我转给日本人款项，还不如说我未补款给他们，因为在我的支出报告中，有一笔款项是给到10月1日而不是7月1日的。由于不好同他们联系，我是提前几个月拨出的。

6. 我不给任何人拨出多于告诉我的款额。但根据您的口头说明，如果我这里钱不够，我可以不拨款。由于有我不了解的原因，汇款很不正常，所以我经常不得不拖延拨款。例如，尽管您指示按预算拨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一大笔款项，但因为有以下想法我还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1) 我只有很少的储备金。

(2) 我不能完全用光现金，因为这样做会搞垮我的贸易企业^①

(3) 您关于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款项的指示很不清楚。您写到，我可以按个人负责的条件向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款项。我从未得到指示，说明哪些钱属于哪些人。因此按照您的意

^① “大都会贸易公司”，见第126号文件。

见，我个人应为这些款项负责。我当然不想这样做。而如果我想这样做，那么我的责任就意味着我欠债约 10 万美元。因此我不得不立即请求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款项给我下达明确的指示。我离开时，有人对我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所有款项都要经过我们的手。您是不是取消了这个程序？我需要知道这个情况。

谈谈我们在上海的生意。我们的尝试获得了很大成功。我成功地把生意做大了，上半年营业额就约有 50 万。从掩护角度看，我们的工作恐怕也是顺利的。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准确地作出决算，但我们已经有了小的利润（做这种生意根本不用我们花一分钱）。我现在拥有一个联合企业，最近两三个月至少给我带来 2 万的利润。我的联合企业不做投机生意，您可以放心，而在于既然人们知道我们的公司是金融公司，他们自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不追求大的利润，所以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和加强。我曾想开一个商店，为此在最繁华的街道上租了房子。现在我找到了合作伙伴，他们将用自己的资金开这个商店，而我作为商品顾问参与经营。这意味着即便买卖不做了，我也会得到 20 万的百分之十，将用于购买商品，这笔钱存在银行里，我收到证明商品已装船的文件后，就可以拿到。您可以看得出来，我成了专业进口商。但糟糕的是，我是一个人，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接我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工作扩展到整个远东和其他国家。谁也不会想到，在全世界设有分支的公司可以做这种工作。不过这还是将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很遥远并且无须我们付出什么代价）。但我需要的是，要给这个事业以关注，哪怕是一点点关注也好，我指的是帮助我在西方物色另两个可以在这种事业中加以利用并且能够帮助掩盖痕迹的人。所以我非常需要一名有经验的、可靠的记帐会计。需要一到两名有商务经验的人。现在我不得不依靠与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人，他们当然乐意欺骗和出卖我。由于我一直有其他公务在身，经营规模又必然越来越大，所以很清楚，我

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我知道物色人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注意到我们能够利用这项事业来掩护我们在远东的整个工作，总还是可以物色到的。

然后必须注意我的欧洲订约方^①的工作。必须很细心地监督这个公司。遗憾的是，我连这个公司的一份财务支出报告都没有收到。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说它在乱花钱，但是没有支出报告使我处于很可悲的境地，我无法全面汇报工作，因为我不知道柏林为我支出了多少钱，不知道那里的开支是多少。

处理这件事需要谨慎。一方面，我应该通过提供订单帮助这个公司给我汇款，但是由于下述原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公司采购部的出价很高，如果我要通过他们购进货物，那我就要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这个采购部简直对业务一窍不通，我们通过它提出的所有订单都没有按期履行，所以无论如何要为我们的采购部物色更合适的领导人。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始终都让莱文盖姆汇款。其实可以找到许多其他人通过银行汇出两千马克。无论如何也要让一个人从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些研究。我很抱歉的是，我对这个问题花了太多的精力。但要知道我也是为了这个事业才在这里的。如果有人帮我们忙，我保证，在一年内我们将在整个远东都设有分支机构。

作为第三个问题，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解决我们事业的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如何处理利润的问题。我建议把它存起来，以便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您不应忘记，我已经向所有银行证明，我拥有15万两白银即10万美元的资本。根据这一情况，我可以贷款100万美元。所有银行都对我这个顾主很感兴趣。但是为了使始终都能感到安然，必须使我在银行里始终都能保持有至少四分之一名义资本的储备金。我想用利润来积蓄

^① “中国贸易公司”，见第126号文件。

这笔款项。1月1日后，我将给您寄去第一份收支平衡表，从中您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完全抵偿了最初的开支，并且有了很小的利润。但在最近三个月我们就会有不少于两三万美元的利润。这个情况我是根据已经签订的合同知道的，这些合同将在这个时期完全履行。我请求您允许我积蓄约10万两白银，并用这笔钱建立固定资本。我希望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复电。

第四个人问题是，谁是我们公司的所有者。我请求找一个法人，一旦需要，他可以是我的股东并通过法庭要求归还所有款项。这个人应立即在柏林找到公证人，并通过公证人向当地总领事（哪位都行）作出声明，说他是我的股东，我们公司50万马克资本，我们公司应在某某领事馆注册，所有者是我和他，他代表我全权处理这里的事务，等等。做完这件事后，我将给您寄去实有全部款项的期票，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您可以通过这个人要求归还全部款项，并在所有问题上都控告我一个人。

这个问题我曾力求通过柏林加以解决，但不知为什么那里的人在暗中抵制我。我想，这是出于不愿意同我们建立联系的考虑吧。需要找一个不自己的生命担心并在需要的时刻能张罗的人。

我还有很多问题，但在一封信里是讲不完的。我想暂时就写到这里。

您的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a，第79—84页。

亲笔签字。

1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
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12月10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在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材料里，有关于把党的最积极的工作人员之一，即蔡和森同志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消息^①。

这个决定(是中央非常小范围的组成人员作出的，因为这时党的著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向忠发、李立三和蔡和森回到了中国)违反了代表大会的基本组织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是要保证中国党为数众多的派别在党的六大的统一政治路线基础上进行合作^②。

需要指出的是，蔡和森是因为1928年底1929年初的错误被清除出中央和书记处的，这尤为突出地说明了中央的内部冲突在迅速加剧，因此难以保证它的团结一致。

关于蔡和森同志的一些材料。蔡同志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工作^③。回到中国后，他没有避免犯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与其他中央委员(甚至与瞿秋白)相比较，他采取了更

① 1928年11月20日蔡和森被清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② 见第118、120号文件。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于1926年11月22日到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

左的立场。

1927年八月会议^①后，他坚决同谭平山和陈独秀断绝了关系（他同后者的关系曾是很密切的）。这之后不久，他被中央派到北方（北京）工作，在那里他犯了一些政治错误，现在（几乎过了一年）这些错误成了清除他的理由。东方书记处在1928年3月就知道他的这些错误（即在策略问题上的盲动主义错误及在组织问题上的极端民主化和尾巴主义错误）。好像出席六大的全体代表也知道这些错误，他们在一些会议上，包括在审议组织决议时，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

蔡和森同志（在党的六大前夕，即1928年5月底）来到莫斯科时，已经意识到党组织盲动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并彻底站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②和后来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立场上。实际上他所持的态度有些独特，比所有其余人更附和迅速成长起来的党的最健康的工人领导核心（向忠发、苏兆征等）。蔡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后来又和在代表大会^③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全会一致选入政治局和书记处。

瞿秋白、周恩来和李立三（即上届政治局负责党在1927年十一月全会后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核心）无论在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对他都是抱有敌视态度。（蔡和森的主要著作《中国机会主义史》^④，毫无疑问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它不仅是突出反对陈独秀的，也是反对瞿秋白的）。

由此可见，清除蔡和森同志，无疑在客观上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朝着加强党在代表大会之前的领导班子方向的一种变

① 见第83页注①。

② 见第65号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④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史》，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29年第1期，第1—77页。

动，而这个班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六大否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还需要研究中央第X号^①通告中关于组织问题的一段话，其中含有对（与广东委员会相对抗的）上海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批评，因此这段话也是针对在代表大会上反对老中央极左错误的主要一批同志（以项英为首的上海代表团）的。

对上面所说的，还应补充一条关于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的意见，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把方向盘转到争取群众斗争上来（如忽视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提出“同小资产阶级联合”口号、在罢工斗争中允许在一些场合承认香港的仲裁，等等）。

由此得出：（1）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无法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使中央委员会和党团结一致，尖锐的党内冲突就必然会迅速扩大，这会损害党的健康发展和削弱党在争取群众斗争中的阵地。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应该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②。

（3）作为可供选择的派到中国来的人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提出泽连斯基、列普谢和米夫同志。

（4）鉴于即将举行日共代表会议和决定朝鲜方面的问题，远东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工作并同它们进行联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远东部 库丘莫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349，第124—126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没有指明号数。

^②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140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12月12日于莫斯科

电 报

上海

米哈伊尔^①致阿尔诺^②。请拨出1929年第一季度的款项，给成年中国人49743美元、成年日本人^③7307美元，给年轻中国人4120美元、年轻日本人^④256美元。见第507/508号电。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70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А. Е. 阿尔布列赫特。

③ 分别为：中共和日共。

④ 分别为：中国共青团和日本共青团。

141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阿尔诺^①

现告预算委员会关于1929年度预算的决定。

(1) **中国——共产党**：拨给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于党在这里的开支和东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如果将成立东方出版社，则该出版社方面的部分支出要由得到它的书籍的党的预算补偿)。扣除百分之三后，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

(2) **中国——共青团**：每季正式预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还将有援助款项。第一季度可以给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额另告。

(3) **日本——共产党**：拨给30769美元，扣留1538美元(用于同中国共产党相同的目的和因相同的理由)。扣除1538美元后，剩29231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

(4) **日本——共青团**：每季度预算256美元，一年1024美元。

(5) **朝鲜——共产党和共青团**：按照决定，在由我们掌管以前不拨任何款项。

(6)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请求把预算款交给它的代表^②，以便

① A. II. 阿尔布列赫特。

② 詹姆斯·多尔森。

他确认收到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行委员会拨出的款项。

米哈伊尔^①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3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14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远东部举行的会议第5号记录

192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中国代表团的斯特拉霍夫^①同志、余飞同志，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马马耶夫同志，步兵学校司令部的纳扎罗夫同志，工农红军参谋部军校管理局的奥尔洛夫同志。

听取：1——关于对军校工作的领导问题。

决定：1——军校的军事训练和党的教育工作由按联共(布)最高机关的政治指示行事并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保持密切联系的军事部门负责。

2. 全体中国学员要向专门部门的长官递交个人意见书，代表团不直接受理中国学员的任何意见书。

3. 代表团以下列方式参加领导工作：

- (1) 在学员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 (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参与决定指示性问题；
- (3) 经军事部门允许同支部局进行谈话；
- (4) 定期通报从军事部门得到的情况；

(5) 作出的所有涉及学生的决定，都要按军事部门系统通知学生，如果有必要的话，并附中国代表团对这些决定作出的说明，

^① 瞿秋白。

其内容应让军事部门（第四局）知道；

（6）认为让斯捷潘诺夫^①同志留在步校是暂时的。

请学校政委^②在最短时间内仔细审查斯捷潘诺夫同志，并告关于他继续留下来是否合适的意见。

听取：2——关于学员健康状况问题。

决定：2——健康状况令人担心，一些学员的肺结核病活动期明显在发展。必须遣送 13 到 15 名危险病号。责成奥尔洛夫同志提出有诊断书的病号名单。

听取：3——关于饮食问题。

决定：3——责成奥尔洛夫同志弄清学校的经济状况并作出报告。

签字：斯特拉霍夫
马马耶夫

全宗 495，目录 54，卷宗 380，第 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陈中。

② 何人不详。

143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91号记录

(摘录)

1929年1月7日于莫斯科

听取：5——根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①的报告提出的决议草案。(参见中央书记处1928年12月21日决定，会议记录第68号，决定：8)^②(报告人：克日扎诺夫斯基、季曼施泰因、皮亚特尼茨基和诺林同志)。

决定：5——批准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作以下修改：

(1) 第1条按以下表述修改：“查明，在总的政治路线正确并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委会和支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情况下，学校还是未能克服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还是未能完全保证顺利完成中共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既是因为在领导机关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又是因为学生的社会成份不能令人满意”。

(2) 第26条按以下表述修改：“彻底根除学生中的集团纠纷和斗争因素，在学生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团结^③。”

^① 1928年9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C.M. 季曼施泰因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

^② 1928年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③ 在文件的最后稿中，这条修改意见变成了第2条中的(1)(见附录1)。下面的建议在决议最后稿中没有采纳。

责成学校领导人（校长和支部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3）第2条第5点按以下表述修改：“责成季曼施泰因同志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交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管学校和学术机构工作的委员会管理”。（见附录1）

中央书记

第91号记录，
决定：5附录1

根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出的决议案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29年1月7日批准）

1——查明，在总的政治路线正确并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委会和支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情况下，学校还是未能克服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还是未能完全保证顺利完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既是因为在领导机关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又是因为学生的社会成份不能令人满意。

2——为了顺利完成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面临的任务，认为必须实行以下措施：

（1）彻底根除学生中的集团纠纷和斗争因素，在学生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团结；

（2）在最近几年，争取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的工人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七十；

（3）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计划，在充分实行中国

化的情况下，要保证足够深入地学习联共（布）党史、布尔什维克策略和组织原则，以及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4) 组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将毕业的学员到大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从事生产实践活动；

(5) 责成季曼施泰因同志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交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管学校和学术机构工作的委员会管理；

(6)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和组织调配部在一个月期限内取消兼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职务的做法^①；

(7) 责成莫斯科市委和联共（布）哈莫夫尼切斯克区委加强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的工作的领导。

(8) 责成宣传鼓动出版部监督对中央作出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根据中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赞同的改进该校工作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9) 不晚于今年 11 月，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报告，以及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专门委员会的副报告^②。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91，第 1、3、7、22 页。

记录为铅印稿，附录为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中央书记签字辨认不清。

① 指 П. А. 米夫兼职。1929 年 3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解除了 П. А. 米夫的中国劳动者大学校长职务并任命 В. И. 威格尔出任该职。

② 见第 189 号文件。

1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8号记录

1929年1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米夫、斯特拉霍夫^①、张彪^②、别尔津和库丘莫夫同志。

听取：1——中共中央请求在海参崴为失业工人和武装运动参加者组织专门的短期训练班。

决定：1——（1）认为在远东为中国同志和武装运动参加者组织短期军事训练班是不合适的。

（2）建议中共中央从大量武装斗争参加者中挑选人员（350人），派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3）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召满主要班级新生后，应利用余下同志上预备班（工人系），以便在他们结业后，除部分预先确定要派回中国外，把他们分配到军校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4）将这些决定紧急通知中共中央。

听取：2——关于援助朱毛问题。

决定：2——（1）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

（2）讨论信件时，要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发展前景出发，弄

① 瞿秋白。

② 张国焘。

请在继续开展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

(3) 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

主席 米夫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380, 第 1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2月7日于莫斯科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看了中央1928年10月25日关于军事工作的第74号指示^①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这个指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指示的主要缺点是,对军事机关的工作持公式化的和官僚主义的看法。整个指示贯穿着这样的指导方针:军事部只有在建立了指示所规定的军事部的复杂机构之后才能开始做实际工作;大量的分部都要确定编制,要为各分部起草书面训令,收集各种统计材料。在第3页上,第1条就这样说:“中央军事部^②一结束建立所有军事机构和挑选相应工作人员的工作,就应该开始做计划工作”。同样错误的态度还更明显地反映在第5页上的第15条中:“成立所有省级军事委员会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该同一些军事单位建立联系”。

对党的军事工作的这种“超计划”的态度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不能用于党的工作。

为了避免由军事部组成官僚主义的机关,要着手执行六大的

① 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434,第7—12页。

② 原文如此。可以译为中央委员会军事部。

决议，同时也要完全遵循本时期实际工作的需要和条件来着手建立军事部机关，并且在具备简单的机关结构的情况下，就必须开始做实际工作，不要等“结束建立所有军事机关”、“成立所有省级军事委员会”和制定“详细的条令”。军事机关只能随着实际工作的开展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根据需求和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由最简单的结构过渡到较复杂的结构。

至于指示中不止一次提到的为各分部工作起草的“详细条令”，如果不是在严格考虑到当前的实际任务、现有的条件和以前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话，那么这样的“条令”是没有用的。此外，这种“手写宪法”从保密角度来说也不很适用，制定这样的“宪法”没有特别的必要，因为东方部有很详细的六大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见特别训令^①）它可以通过作出直接具体的工作指示来领导分部的工作。

指示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它没有明确提出像军事部同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是什么关系这样重要的问题。根据指示可以得出，“要任命一名长官当中央军事部的头，主管全部的工作”，并且作为军事部一个分部的所谓军事委员会要隶属于这名长官的领导，而这个军事委员会“由军事部长官，中央政治局、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各一名委员，几名书记，中央代表和一些军事专家组成”，它应该是“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的专门机构”（第1页第3、4条）。

在党的工作中，包括在军事工作中，“一长指挥”的原则是不适用的。军事部的工作不应由一名“长官”来领导，而应由一个在一名中央领导成员主持下并经常得到中央的政治指导的（三人）集体来领导。一句话，在这里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大的有

^① 见第92号文件。

关指示^①

所谓的“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军事部长官领导的机关，它的作用是不清楚的。如果它的任务应该是归口统一所有与军事工作有关的党中央机关（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等）的工作，那么这种统一工作，实际上通过中央对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和通过对军事部领导机关成员（三人小组）的相应选拔也可以和应该做得到。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吸收党的其他中央机关的代表，乃至与党关系密切的组织的代表“参与讨论各种问题”，但是在中央和军事部之间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为此建立常设的“夸部门”机构，更不要说像第74号指示所规定的隶属于军事部长官领导并有庞大编制的机构了。

指示规定，除了军事部外，还要建立五个完整的分部（即联络、士兵事务、特殊使命、组织和指挥）。所有这些分部都要设“一名部长和几名顾问和工作人员”的职位。不能同意搞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更何况指示中所确定的分部职责，表明有某种过于搞狭武主义和文读主义的倾向。例如，指挥分部的工作应该是“调查和统计革命和反革命力量，收集和绘制军事地形图、作战计划”等。再如，按照指示应该设一个完整的组织分部，其职责是“登记和统计党的所有军事工作人员”。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指示的整个错误指导方针，它把军事部的工作主要归结为学院式的和办公室式的统计、计算、制定计划和绘制地图的职能。

而实际上，军事部只有从事实际的具体工作，它才有存在的权力。因此在建立军事部的组织结构时，必须从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军事任务出发。这样的任务是：（1）敌军工作（对中国军阀

^① 指中共六大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83—492页。

和外国列强军队的工作)；(2)训练、组织和武装(工农)革命军队的工作。因此必须从建立领导这两个主要方面工作的最不复杂的机构(分部)着手成立军事部。此外，可能还有必要建立像担负获取武器、秘密运输和联络的这种职责的特殊机构。

不言而喻，完成上述任务没有一定的统计是不行的，如统计敌我双方力量，统计军事工作人员，可能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还要统计一种“作战计划”。但是这种工作不应带有学院性质，而应同完成直接具体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它不能与其职责是领导积极的实际工作的那些机关的工作分隔开来。

指示中对共青团只字未提。而共青团必须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共青团无论在中央的还是在地方的军事部领导机关中都应有自己的代表(如三人领导小组中的一人应从相应的共青团委员会挑选)。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对74号指示作一些修改，重申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六大指示的义务。

东方书记处 帕维尔·米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476，第1—2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① (摘录)

1929年2月8日于莫斯科

库西宁：中国党的全会^②快举行了，因此起草了要致全会的信。这里只讲对形势作总的评价问题。我们还打算起草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特别决议或训令，想必最好能由红色工会国际来完成，或者由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一起来完成。可能还需要起草组织训令。不过，我没有把握，这件事应由我们莫斯科来做，还是最好由当地来做。

这封信只确定总的方针，就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如何评价形势。丧失革命前景的危险越来越明显。很说明问题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半年或两个月前还只是讲实行社会革命，现在则声称，如今在中国，已建立了一段不确定时间的反动统治，在中国似乎出现了资本主义专政，资产阶级专政，与

^① 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草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O. B. 库西宁报告了草稿内容并就讨论结果致闭幕辞。参加讨论的还有张国焘、C. H. 古谢夫、B. A. 瓦西里耶夫、B. 乌布利希、H. A. 米夫、J. H. 格列尔、C. A. 洛佐夫斯基和H. A. 皮亚特尼茨基（见全宗495，目录3，卷宗115，第11—44页）。

^②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过去相比似乎发生了根本变化^①。

实际上，这是右的倾向，我们一直把它作为托洛茨基主义予以揭露，甚至在极左时期也是这样，而现在已公开予以揭露。在对形势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分子试图说明，没有发生任何新情况，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似乎同以前的北京政府一模一样，在政权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首先，与过去相比是有变化的。但不是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另一种东西，是几个阶级的联盟，也有资产阶级参加。其次，反动集团的政府，虽然是中央政府，但它没有能力实现中国国家的统一。

指出列宁在1910年所写的一些文章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些文章中，列宁反对对民主主义高潮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丧失信心的同志^②。

如果说那个时候列宁在俄国就强烈反对这种不想再谈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那么我们在中国就有更多的理由这样做。在中国，土地革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实质是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新的国民党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今天它的将领也像以前的督军一样各自独霸一方。这些军阀之所以能够支撑下去，是因为在中国还存在着半封建主义残余，而在各军事集团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列强。

由于在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左右逢源，即一方面是对美国和另一方面是对英日集团的“忠贞不渝”，国民党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这里也可以再一次看出，给海关自治赋予很大意义的托

① 见莱斯·埃文斯、拉塞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年版，第345—397、399—401页。

② 可能指列宁的文章《为什么而斗争？》和《政论家札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210—215、236—300页）。

洛茨基分子对形势的评价是多么的错误。

虽然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关税自主权，但毕竟还是许诺给他们以自主权，并且所有大国都承认他们。对南京政府来说，2月1日新的关税税率就应生效，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它试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互相角逐，在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取得进步。在这方面，政府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是使政府的收入有所提高和在表面上显示海关自治。但这不会给帝国主义列强造成任何危险，因为它们能够迫使中国在制定海关税率时考虑它们的利益。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这种税率不违背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也会对制定新的税率表现出热情。

去年在中国有什么变化？如果认为没有什么变化，那是不对的。在各个不同地区，经济有一定的活跃。但不是在所有地区，而是在一些地区。这种活跃多半对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的工业有利。中国许多工业部门还不景气。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毕竟已不同于1926年至1927年时期。内战结束后工业已有一定的恢复，但还不是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消除。有些同志认为，近期的这种经济发展意味着革命高潮的长期推迟。相反，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的活跃只会导致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

工人阶级的状况仍然有某种消沉情绪。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活跃。最近几个月的罢工运动就是证明。中国的罢工斗争毕竟席卷了2000多工人。（有人从座位上喊：谁在领导罢工运动？）是的，这是很薄弱的地方。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起任何主导作用，或者说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在多数情况下，罢工是自发的，没有领导，或部分是在“黄色”工会领导之下，这主要是在企业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倾向。关于对克服消沉情绪的速度估计和对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潮的估计，

在中国党内多多少少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许多中国同志喜欢作短暂的展望,好像在从窗子里向外张望,等待那里突然发生革命奇迹。这个奇迹应该怎样发生,他们不很清楚。他们夸大国民党政府和……的差别。他们在谈论资产阶级和广西集团的战争,在谈论因此会出现革命运动高潮。此外,他们又希望通过组织游击战等来加快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实际上怎么能实现这个高潮,他们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但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要在革命高潮问题上掌握方向,客观上讲还没有什么基础。一开始我认为,我们的张彪^①同志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但现在同他再次谈话后得知,这些意见分歧是由语言困难造成的。我们讲革命运动高潮时,译者译成革命运动规模。一开始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意思。但并非如此。规模,这是革命高潮的最高点。张彪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最后弄清,他同意我们现在的评价。

我相信,在中国同志中间存在着右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着眼于不确定的时间,是把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到不确定的期限。因此我们在信的草稿中特别警告说不能这样做。

除了根据对目前形势的评价对革命前景作出这种说明和首先对中国关系中的巨大矛盾^②作出阐述外,以及除了要求对行将到来的高潮的到来速度作出清醒的估计外,我们认为具体揭示策略上的分歧有很大的意义。在中国的运动中,毫无疑问,既存在左的立场,也存在右的立场。大概可以说,右的危险更多些。但就前景而言,我要说,这种危险在党内不像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那样大。因为党在很大程度上同工人群众失去了联系,他们现在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处在国民党的强大影响之下。同时

① 张国焘。

② 原文如此——译者。

国民党既想通过强有力的镇压来消灭共产主义运动，又想通过采用改革者的法律从思想上对群众施加影响。这些法律当中有些是很激进的，如上海委员会颁布的劳动法^①。现在在建立工会，即“黄色工会”，其垄断权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

考虑到这一点，必须非常严肃地提请中国党注意右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左的倾向已经被克服。在最近的党代表大会^②上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首先指出了同左的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对的。当时左的倾向非常突出地以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以前这在某种程度上曾是右倾的一种表现）等形式和以惩罚不愿意罢工的工人的方法表现了出来。

目前的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搞军事冒险主义再没有1927年那样的土壤了。盲动主义残余多半以玩弄革命词藻的形式存在。这不很危险。最糟糕的是，消极等待新的高潮的到来和对群众工作的某种抵制，不懂得可以以什么形式和什么革命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只寻找机会主义的卑鄙行径，或者抵制群众工作。

最重要的是，最近的党代表大会在给党的指示中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脱离广大群众，并根据这一点制定了现在针对各种倾向的指示。我们试图在信中准确地说明，危险是以怎样的具体形式存在着的，并且首先强调了提高党的积极性以避免作出任何错误的结论。

以前，在中国党内是这样，凡谈到同反对盲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的地方，都采取了很具体的组织措施。谁是机会主义者，就干脆把他枪毙掉。我们想在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他们不要再开始搜索机会主义者或盲动主义者，而要在企业

^① 文件是由上海政府于1928年12月8日颁布的。

^② 指中共六大（见第409页注^③）。

和工会中做实际工作。

党的组织状况很糟糕。由于革命失败我们党受到很大损失。今天党还没有摆脱混乱状态。党没有心情做地下工作。反动派的打击严重摧毁了它的意志。今天，党的组织状况这样糟糕并不奇怪。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情况时，我有一种惊慌感。我得出的印象是，党没有看到危险性。但是在我看到党的领导的训令^①之后，我应该说，党的领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它很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办。训令的方针是正确的，尽管一些次要的提法并非完全无可指责。至于实际执行，我认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企业里的支部非常少，不仅是因为我们在大企业里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产业支部，而且还因为支部本身的生活很糟糕。

我们应该十分坚定地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基本任务以及工会工作上来。这只不过是我們工会工作的方向。必须在“黄色”工会外面建立抗衡力量，这是对的，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的对手不能轻而易举地站出来反对我们。如果我们想把“黄色”工会中的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并揭露国民党领导人，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可能，国民党领导人不允许工人组织起来，他们想把（“黄色”工会）组织作为最好的组织保留下来。一些类似情况已经发生。我们应该要求同这种做法作坚决的斗争，争取通常的民主，并在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要求赋予工会会员充分的权利。国民党领导人要求由官员挑选出来的工人支持国民党。这也需要予以拒绝。

我相信同志们看了这封信。米夫和张彪同志比我更熟悉这个问题，他们将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广泛的阐述。

* * *

① 可能指中共中央1928年10月17日发出的第7号通告《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39—654页）。、

库西宁的闭幕词：

我很高兴古谢夫同志对思想巩固工作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我在草稿的最后部分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古谢夫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任务的意见。在草稿中我已特别提出四项任务：1. 思想巩固工作；2. 组织巩固工作；3. 工会工作；4. 反帝运动。所有四项任务都同样重要，不能突出一个贬低另一个。不能说先是这一个后是另一个。在一个地方我还说，党为革命做准备的工作不仅要与群众的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而且要把两者联系起来。不能把两者分开。如果我们对他们说，最近他们只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四项基本任务中的一项任务上，那我们就会犯错误。

党应该争取工人。在这方面，情况显得特别糟糕。

古谢夫有点儿错误地理解了我，如果他认为党员总数只是4000名的话。不是这样的。可以怀疑是否有4000名工人，但党内知识分子要多于4000名，而农民，如果可以把他们称作党员的话，则比两者加起来还要多。这还是很薄弱的联系。不过有一点是可靠的，这就是农民在党内占优势。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促使党去努力争取工人，去做工会工作和活跃党在企业里的工作，去巩固自己。

国民党在开展反帝运动，在开展反日运动。我们共产党袖手旁观，只是大叫国民党是反革命，这样做对吗？或者必须使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这种运动，揭露国民党领导？

思想巩固工作也是必要的。但当我把我们老的党，如瑞典党同年轻的中国党作比较时，我应该说，中国党站得高得多。你们看看瑞典党最近的政治决议，在这些决议里，你们连一个政治词汇都找不到。你们再看看中国党的呼吁书^①。那里有错误，但不能

^① 可能指1928年11月5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82—688页）。

像瓦西里耶夫那样用放大镜看一些错误的提法，并在此基础上构想错误的路线。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党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党。我怀疑洛佐夫斯基能兑现他许下的由共产国际派出一些好的……的诺言。我们请求洛佐夫斯基同志在两天内提出具体建议。

很重要的是，要让中国同志得到好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多中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理解只是一个字“列宁”。我们自己知道，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阅读列宁的著作，而且也需要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不过需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有名的著作译成中文。这不比译成日文复杂，然而在日本已经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克列普斯同志可以向中国党提供很好的帮助。

古谢夫同志的议论与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到的并无联系。古谢夫强调从组织上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我认为，这里的情况与俄国党内情况不同。幸亏我们还没有……。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考虑到中国党内情况。党对自己的队伍已经进行了几次相当大规模的清洗。一部分最恶毒的机会主义者已被驱逐出党。(座位上有人喊：被枪毙了)。不过我认为，部分同志由于不完全理解党的正确工作，现在想……，这不是很高的思想和组织水平。因此我想在信中更明确说明，什么是右的危险。但这件事必须做得很具体，使用一般语言是不能给中国同志多大帮助的。

当有人说我对右的危险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或者像希塔罗夫同志所说，没有正确分配比例(希塔罗夫：不是没有正确分配，而是夸大了)时，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严重指责。就是说我是错误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草稿的整个第一章有根有据地分析了右的危险的实质，有13页，此外，还用4页半的篇幅具体分析了向合法化的倾斜和右倾的其他表现形式，即用15页或16页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关于左的危险只写了两页半。我主张关于右的危险可再写几页，但那时必须做到一切都要说得十分具体，

而不只是笼统地表述。在我们东方部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一开始我应该强调指出，怎样和以怎样的方式来谈右的危险。我不主张讲右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党的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强调了消灭左的倾向、盲动主义残余等的必要性。忽视合法的工会工作等等属左的倾向。如果我们现在讲主要任务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那么同志们就会这样来理解这件事，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即消灭左的倾向，他们不必认真对待，不必把这些指示贯彻到底。他们会说，现在共产国际下达了相反的任务，现在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个任务上，这样我们才是好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像希塔罗夫所认为的那样也是不对的。他认为，党的消极性似乎只是与右的倾向有联系。这种消极性不仅与右的倾向而且也与左的倾向有联系，它与两种倾向都有联系。我在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谈到同志们只是在等待出现革命奇迹的地方，我就指出了左的倾向。他们提出了关于把国家分成不同作战地区的盲动主义计划。那里也应该有武装。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作任何尝试来使工人阶级革命化。实质上，这也是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区分机会主义的两个方面，即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对待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消除消极性，也必须克服左的倾向。

瓦西里耶夫在东方部做得很简单。他从中央通告中选出一些错误提法，然后断定，主要任务是同机会主义和右的危险作斗争。这里他得出一个虚假的概念：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党的领导班子中，在目前的中央。但中央的同志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者。他们基本上都是很左的同志。总的来说，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如果说他们也有倾向，那么他们是左而不是右。我不想以此来说明他们不会犯右的错误。但他们的倾向不在这个方向上。把他们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不对的。说机会主义代表在中央那也

是错误的。如果瓦西里耶夫想坚持这种看法，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盲动主义看作是机会主义的标志。但这是幼稚的。这是幼稚病。如果把盲动主义算作机会主义，那就会抹杀一切界限。在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军事冒险主义被正确地视为左的倾向，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取消这种看法。我们的任务是警告党右的危险、右的倾向。我在信的草稿中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我们应该对这个右的危险作出清楚的界定，以免造成混乱。

在关于右的危险的专门部分中说：

“这个右的倾向的根子，自然是在于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革命力量 and 对其共产党先锋队领导作用的不信任，在于对前途丧失信心。

如果考虑到执政的国民党现在正竭尽全力要把大量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工人阶级群众置于它的长期影响之下，那么这个右的危险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则是特别危险的。^①”

接着还说：

“去年相当频繁的退党事件以及自愿到国民党机关登记的事件，警告了党内右的危险的严重性。但这种危险在党外，特别是在工会运动中更为严重。绝对需要实行坚定不移的同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作斗争的方针，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即在这种摇摆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地方，都需要这样做。^②”

如果同志们说，右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我不反对。但不能抽象地肯定，也不允许忽视消灭左的倾向的必要性。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关于右的倾向，我们可以写上两页，但不能抽象，而要具体指出什么是右的倾向。

关于发展前景，古谢夫做了描述，并建议更要在国际形势的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0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1页。

框架内探讨这个问题。我同意，需要作补充，要指出苏联。但我不想过于强调中国革命受国际形势的左右。可能在中国，革命高潮来得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早。我在这里看到了相当近的发展前景。（皮亚特尼茨基：在中国是短暂的前景？）。

不完全是短暂的，那里的动力和矛盾是很大的。（希塔罗夫：信中说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接着还说，这意味着理论上是可能的。请看看列宁对理论上的可能性和设想中的可能性是怎么讲的。他讲的同上面所说的是一致的。

格列尔同志，这是对谈左的危险的一句话的理解的一个大的错误。意思完全不同。信中说明了什么是左的危险。

乌布利希同志，对工人罢工情绪估计不足，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同意需要再次强调这一点，但不能说，这只与右的情绪或倾向有联系。很多左的同志或有左的情绪的同志，低估了像参加经济罢工这样一项工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还不够“革命”。

在关于富农问题方面，党的代表大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未必需要在这里作出修正。

我很高兴，红色工会国际的同志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们同意，不仅在“黄色”工会外面，而且在其内部都需要做工作。

我想建议现在把信的草稿作为基础。有些地方需要再看看。可能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不大的委员会。我还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想在最后审定时也要考虑他的意见。

乌布利希：建议把信的这个草稿作为基础，并责成由库西宁、米夫、斯大林和格列尔同志组成的小委员会作最后审定。

通过。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115，第 3—10、50—57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1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会议第 22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2 月 8 日于莫斯科

听取：4 (201) ——一致中共中央信的草稿。

报告人：库西宁。

参加讨论者：张彪^①、古谢夫、瓦西里耶夫、乌布利希、希塔罗夫、米夫、格列尔、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

决定：4 (201) ——把信的草稿作为基础。责成由库西宁(负责人)、斯大林、米夫和格列尔同志组成的小委员会作最后审定^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115，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张国焘。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62—179 页。信的最后定稿考虑了斯大林的意见和建议(见全宗 558，目录 1，卷宗 3374，第 1—22 页)。

148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的电报

1929年2月12日于上海

中国代表团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我们收到了关于削减我们预算每月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的电报^①。考虑到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我们打算再次申明我们的理由，请求增加预算。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过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中国代表团本身很了解我们的理由，因此我们不再作详细说明，只希望代表团尽力捍卫我们的请求，并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确实需要增加预算。当然我们很清楚，共产国际难于拨给这样一笔款项，但我们还是认为，它会给我们以支持。

现在在中国，宣传鼓动工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以前我们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代表阿尔诺^②同志达成协议，他将拨给我们20000卢布专项经费用于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新的印刷厂很快就要开业。我们已就印刷价格问题达成协议并支付了一点定金。突然阿尔诺同志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禁止他拨出专项经费。他服从这个指令，取消了以前的决定，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因为我们已经签订了协议并订了货。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

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明这些情况，争取它允许拨出阿尔诺电告的 20000 卢布专项经费。

致中共兄弟般的敬礼！

中央政治局 向忠发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4，第 14 页。

打字稿，副本。

1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远东部小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0 号记录

1929 年 2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出席：米夫、库丘莫夫、阿布戈夫、诺林、张彪^①、约尔克、托金同志。

听取：1——关于莫斯科的中国杂志。

决定：1——向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提出修改以前关于中国杂志的决定的问题，东方书记处不再出版这个刊物，转由中国大学出版^②。

听取：2——关于为中共出版中文版马列主义书籍问题。

决定：2——责成由弗赖耶尔、库丘莫夫和诺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一周内就利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文出版社来满足中共的需要问题准备具体的建议。

听取：3——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决定：3——为起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成立由约尔克、弗赖耶尔和库丘莫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① 张国焘。

^②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机关刊物《共产杂志》。1929 至 1930 年在莫斯科由瞿秋白编辑出版。

约克尔同志负责召集^①。

听取：4——关于出版俄文版和中文版中共六大决议和速记记录问题。

决定：4——（1）向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提出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出版中文版中共六大速记记录问题^②。

（2）责成瓦格纳同志弄清关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用手摇油印机）出版 50 份中共六大速记记录并将其作为手稿发给有关机关的问题^③。

（3）责成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科研所出版社通过国家出版社出版 20 到 30 印张的速记记录缩编本，发表主要报告和辩论的摘要。指定沃林、舒尔曼和阿布戈夫同志为这个缩编本的编委^④。

听取：5——关于出版批判谭平山宣言^⑤和南京政府土地法草案^⑥的论文集问题。

决定：5——认为有必要出版两本论文集，批判性地分析：（1）谭平山的纲领；（2）南京政府的土地法草案^⑦。

责成以下同志为第一本论文集撰写文章：科穆纳尔、那利曼

① 见第 162 号文件。

② 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04—407。中文版中共六大速记记录没有出版。

③ 第 4 点边上有批注：已完成。同海默同志达成协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承担百分之五十开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担百分之五十。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表示同意。Я. 瓦格纳。1928 年 2 月 22 日。俄文版中共六大速记记录 1930 年在莫斯科出版。

④ 中共六大速记记录缩编本没有出版。

⑤ 见《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民主革命时期）》，北京 1981 年版，第 11—50 页。

⑥ 见《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科研所通讯》，莫斯科 1929 年第 6 期第 5—10 页。

⑦ 论文集没有出版。

诺夫、丘贡诺夫、戈卢别夫、伊思美洛夫、张彪、斯特拉霍夫^①和舒尔曼。

责成以下同志为第二本论文集撰写文章：沃林、古德科夫^②、克雷连科^③、奥布霍夫^④、达维多夫、马季亚尔、艾森施塔特。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80，第 12 页及其背面。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分别为：王稼祥、俞秀松、周达文、陈绍禹、张闻天、张国焘、瞿秋白。
② 沈泽民。
③ 傅胜兰。
④ 竺廷璋。

150

皮亚特尼茨基给托夫斯图哈的便函

1929年2月27日于莫斯科

绝密

托夫斯图哈同志：

政治局监察机关有人问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事^①。

现在我可以告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已经委派。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27，第 62 页。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3月22日作出向中国派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决定。(见第78号文件)。

151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2月27日于上海

致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

我们已就当前党的工作的政治条件作了详细的报告^①，在这封信中我们只想谈谈我们在得知基本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后所面临的主观上的困难。

至于工作方法和这个基本政治路线，由于有党的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指导^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出路。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要求我们准备进行顽强而艰苦的斗争。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为争取广大人民群众而斗争，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永远不能取得胜利。

但是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现在遍布整个中国，在这种气氛中，我们感到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如果这些困难不能排除，尽管我们有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我们也不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这些困难中的最主要困难，一方面是干部问题，另一方面是财政问题。

白色恐怖从我们的队伍中夺走了大量工作人员。六大之前我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409页^③、第514页注^②。

们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六大之后被杀被捕的人数大大增加，六大后新中央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杀被捕。更不要说干部中的被害者了。最近两个月，有满洲、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总共21个省的省委被摧毁。在一些场合省委的全部成员都遭到了迫害。至于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情况更糟糕。为了建立新的机关，需要人员和款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困难。

但是这还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可能提出和安排群众工作。自发性斗争经常发生，困难仅在于我们不便向群众中渗透。在白色恐怖情况下，在席卷全国的失业浪潮中，在工厂大量裁减工人、复员士兵现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非常难于向群众中渗透。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动员工作人员做这项工作，我们力求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职业，以期更便于做这项工作。然而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因此现在我们在群众工作中的组织基础非常薄弱。从组织方面来说，我们的党还不是群众性的党：我们只是在全力以赴地向这个目标靠近。党的工作者很难找到便于他们做工作的职业和取得这样的地位，我们很难在群众中建立和巩固党组织的影响；党没有足够的经费。很难从同志们身上募集经费。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困难。

此外，最近在敌人力量有所加强的地区，农村苏维埃受到了严重损失。在许多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久经考验的军事工作人员陷入了绝境，党又不能给他们什么帮助。他们自己应该设法找工作，应该设法通过某种途径向群众中渗透并同他们建立联系。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这项工作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不能希望它能在短期内完成。党很不愿意放手不管这些身经百战的久经考验和有经验的军事工作者，但是要知道，为了把他们保留下来，就是拿出最低限度的款项，党也需要一大笔经费。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困难。

我们知道，宣传鼓动工作和监察工作具有很大意义。我们为这些工作创造的条件非常不利，指的是出版报纸、秘密运输宣传鼓动书籍、支付通讯和监察员费用等。就拿士兵运动来说吧，在许多反动军队里自发地爆发哗变，而我们没有力量承担领导工作。我们可以利用动员士兵的运动，但我们没有钱派人到军营里去做宣传鼓动工作，更不要说提供经费发展运动了，我们连自己的组织都无法建立。这是第四个困难。

中央机关在上海时曾受到中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巨大打击，它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央发动了进攻。如果中央一旦被摧毁，那么全中国的工作就会蒙受巨大损失。现在中央急需经费。如果现在这样提出问题：任何一个组织遇到经费困难时，都应当有自己的储备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一点儿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因为在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储备金。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困难。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群众中为自己建立基础，使我们党成为群众性的党。我们知道，党的经费应该从群众中而不是从其他什么来源取得。我们更清楚为革命花钱收买人员的危险，因为这终归会导致党的瓦解。理论上这是十分清楚的，实际上我们也在竭力这样去做。然而在我们的群众基础还太薄弱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使我们无法推动工作。在过去的月份里我们竭力节省开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我们在党内的基础会更加薄弱。

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突然减少了我们的预算。我们知道，过于夸大的预算会导致党的腐化。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经费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财政困难是如此之大，以至到了我们都无法克

服的地步。

我们深信，这些困难只是短时间的。我们把群众工作一开展起来，就能找到其他来源，也就是说，群众会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在群众中建立牢固的基础，那么将来必然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但问题在于，建立和巩固群众基础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更何况现在我们主观上的力量太薄弱，而形势又要求我们毫不迟延地加以充实。

我们希望您理解我们的这些困难，并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您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我们最初的预算，此外，根据那个预算，您还可以拨给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的作用主要在于恢复国内被摧毁的党组织和恢复在农村失去的地位^①，为此中央必须拥有军事干部。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无法解决专项经费问题，那我们请求您将此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讨论，以期它能在我们处于绝境时给我们以帮助。我们的工作现在正处于危急状态。我们期待您尽快给予答复。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4，第 16—1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

1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 《布尔塞维克》杂志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①

1929年3月6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党在遭到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给它造成的惨重失败之后，刚刚开始恢复元气，只是不久前才根据党的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纠正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因此党中央机关刊物的作用、它的布尔塞维克坚定性、它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摇摆形式的不调和性和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政治事件及时表示的同情，以及同工人积极分子的密切而经常的联系，对于党更快地布尔塞维克化和巩固党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果说中央通告向较小范围的党的工作人员做了对党的路线即六大路线的政治解释工作，那么正是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把这个政治路线传播到了工人阶级群众之中。

日前，东方书记处系统地翻阅了它所收到的1928年7月至11月^②间的各期《布尔塞维克》（第20至28期）^③。在这封信中，

① 见第623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应为5月至9月——译者。

③ 我们最近收到的本子（第29期和第30期），无疑表明在杂志的编排上有某种改进，但在这封信中没有利用，因为根据这两期还难以判断进行改编的成效。在这封信中，我们谈了我们所发现的在《布尔塞维克》的编排上的主要不足之处和我们认为为了迅速顺利地克服这些不足应该采取的措施。

我们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看法。

杂志的政治路线不是很明确。它反映了1928年6月至11月^①间中央领导指导思想上的摇摆。

在《布尔塞维克》杂志第23、24、25、27期刊登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发现对政治形势的完全错误的、受到中共六大谴责的“左的”评价，认为形势的特征是存在着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提出了武装起义问题，并将其视为近期发展的前景。

下面我们举出几个反映这种指导思想的例子，附带说一下，除了所援引的片断外，在文中或在《布尔塞维克》其他期中，还可以看到这类说法：

1. 例如，1928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7期，我们在《已死亡的国民党之五次会议》一文中读到：……“不见……工农革命运动也一天一天剧烈而普遍，飞快要到全国总暴动的前途吗？”……在第23期中，我们读到：“济南事件^②后，各地的工农革命，特别是广东、江西、湖南的工农革命已从防御转入进攻……现在可以看到有计划的进攻”……

与此同时，在杂志中，早已受到党谴责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有公开的反映。

在《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一文（8月10日出版的第25期）中，我们看到了掩盖真正阶级斗争的例子。作者^③在把豪绅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区分后说，“上海的买办阶级，他对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不大禁止”。

8月20日出版的第26期所刊登的《列宁式的代表会议》一文，专门论证了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毫无疑问，中央8月1日

① 原文如此。应为5月9日——译者。

② 见第473页注③。

③ 罗登贤。

发表的有名的《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书》为杂志赋予了这种指导方针（这个呼吁书刊登在第25期上，中央在其中直截了当地说，“与日俱增的战乱、剥削、压迫、恐怖之下，中小资产阶级大多数，已从幸福的梦中醒觉过来”……，“共产党绝不抛弃维护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等）。同时我们注意到，《布尔塞维克》总是为军阀纠纷、国民党内部斗争拿出过多的版面（有损于杂志的其余栏目），明显夸大了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我们在不久前发出的《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①中预先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错误。

2. 杂志上刊登上述文章以及许多其他错误的或有争议的文章，编辑部未作任何保留性声明或说明。编辑部也没有提供指导性政治文章。这种情况必然会使党迷失方向，无疑会造成中央机关刊物声誉的下降。

3. 分析题目的分配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央机关刊物在上面所说的时期里，第一，给党建问题的版面太少（当然是在保密允许范围之内）。在80篇文章中只有两篇论述这方面问题；第二，给论述工农运动的文章的版面很少（80篇中只有7篇）；第三，给一般理论问题的版面也很少；第四，给苏联问题的版面更少；第五，根本没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第六，不成比例地用许多版面分析国民党和军阀的斗争；第七，没有拿出版面论述同“左翼”国民党和第三党的斗争。

杂志对中国国内和国际性质的一些重大事件一般都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但是许多极其重要的现实题目（如饥荒）没有反映。

4. 谈一般问题的文章同党的具体任务联系不够。大多数文章都是以一般号召结尾。这类文章的明显例子是《怎样继续五卅运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6页）。

动》一文(?期^①),整个文章作了历史概述,没有作出一个具体指示,因而也就没有回答标题上提出的问题。

5. 对《布尔塞维克》杂志各期的仔细研究,促使我们特别注意到杂志的编排工作。引人注意的是对材料没有做编辑工作。我们在上面指出,编辑部对一些文章的有争言论点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说明它们是有争议的。甚至在同一期内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路线(见第23期)。此外,几乎在各期中,许多文章都太重复,内容贫乏,水份很大。看来,编辑部压缩工作做的不够,有时有的材料没有做任何文字加工(例如第21期中的克鲁的一文,用整整一页的篇幅将中国资产阶级同可怜的老“野鸡”做了“形象的”比较)。编辑部刊用需要作出说明的材料,却没有做任何注释(例如在第24期中,刊登了联共(布)中央的呼吁书^②,但没有向中国读者说明发出这个呼吁书的背景、理由等)。

6. 杂志中的多数文章使用的语言很费解(长句子、许多搞不清楚的新术语),中等文化水平的工人积极分子也很少能看得懂。

下面我们提请中央注意以下具体指示:

1. 应该承认,在确保广泛发行的同时,把《布尔塞维克》提到应有的高度是中央当前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目前条件下,较好编排的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站得住的铅印机关刊物,应在聚集党的力量和培养新干部方面起到巨大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作用。

2. 必须建立由中央领导同志组成的中央机关刊物责任编辑部,至少要由两名同志组成。

3. 应该吸收中共在国内(包括在地方工作的)和国外的优秀文学人才和理论人才来进行合作。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认为

① 原文如此。文章刊登在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第20期上。

② 见联共(布)中央《告全体党员全体工人书》,载《红色报刊》,莫斯科1928年第11期,第1—4页。

可以在莫斯科成立《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分部，以便吸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的一些负责人作为固定的撰稿人。

4. 必须对题目的分配做这样的调整，要充分论述党建问题和工农运动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有关的一般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应给予固定的版面。对国际革命运动（特别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实践、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情况应给予更多的注意。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文章也是一样。

5. 完全有必要发表指导性的编辑部社论。

6. 应直接改进编辑工作，以达到文章最大限度的简洁和叙述的明了、节省版面等，根除上面谈到的不足之处。

7. 尽管创办了平行的通俗性周刊《红旗》^①，《布尔塞维克》因此成了双周刊，并且主要是中共的理论刊物，也应力求使语言通俗易懂，但又决不应影响其内容的理论水平。

实行所有上述措施，无疑将会有助于扩大《布尔塞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助于巩固党的政治思想地位和它的布尔塞维克化。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76，第 3—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红旗》周刊，后来是三日刊，1928年至1930年间在上海出版。

153

米夫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现简要地向你们报告一下我们对你们在最近一封来信中所涉及的问题的看法。

1. 关于财政问题。由于米哈伊尔^①去外地休假，很难指望在最近解决这个问题。此外，由于种种削减开支的做法我们现在遇到一些财政困难，没有理由指望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你们的请求。但从我们自己方面还是要采取一切措施在有关机关面前捍卫你们的请求，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把结果告诉你们。

2. 关于学生问题。你们关于学生教育问题的信^②已转给学校^③，学校将采取你们所建议采取的各种措施。另告，今年毕业的学生都将进行4个月到6个月的生产实践，都能在中国做一定的专业工作。至于征招新生问题，必须再派来300名同志。一开始我们建议向莫斯科派150名同志，后来又要求派200名。作出第二个决定，是因为我们认为在海参崴举办短期训练班不合适，而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办工人系（广泛预备系）更有好处，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指向忠发1929年2月27日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И. А. 米夫的信（见全宗530，目录1，卷宗57，第19页）。

③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指望同志们在工人系结业后，部分返回中国，其余留在军校学习或者转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基础班^①。所有派来的人必须都是工人。你们在当地可以挑选一定比例的农民，只有在个别和特殊情况下可以派知识分子，即对革命有特殊功绩和有很长党龄的同志。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迄今为止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电告，你们还是没有执行这个条件。到来的30名学生中工人很少，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没有党龄，对革命没有什么重要功绩。我们明确地建议你们要更认真地对待征招新生工作，尽可能加快新同志的派遣工作。此外，你们必须注意派来同志的健康状况。多数新派来的同志由于他们患有严重的疾病和传染病未被学校录取。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按现有规定将这些同志遣送回去，费用由你们承担。

至于你们请求派一些同志到中国工作的问题，现通知如下：我们和俄国最高领导机构一样，都反对派遣古德科夫^②同志。必须让他能够结束在学院里的学业。至于普罗列塔里耶夫^③，如果我们很信任他，也就派了。在这里他没有害处，甚至还有用。在中国可能相反。既然我们对他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认为暂时把他留在莫斯科更合适。如果我们收到你们的再次要求，那我们不反对把他派回中国，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次派遣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代替你们要求的同志，我们在近日将派遣戈卢别夫^④同志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和翻译，以及具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的同志。

3. 关于苏兆征。我们最先告知，关于苏同志之死的噩耗使我

① 见第144号文件。

② 沈泽民。

③ 卜士奇。

④ 陈绍禹。

们感到很悲痛，并对这个重大损失表示真诚的同志式的哀悼。我们要采取措施在工人和劳动群众中宣传苏同志的生平事迹。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收集和准备出版关于苏同志生平事迹的文章和资料专集^①。请告你们从自己方面打算做什么工作。关于苏同志的家属问题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但通过与一些同志的初步交谈，我们的意见是，让苏同志家属到莫斯科来不合适。最好为在中国赡养苏的家属拨出固定的抚恤金。

4. 关于刘伯坚家属问题。刘确实被派到军政学校^②去了。但这个学校不承担任何赡养学员家属的义务。因此我们认为，让他的家属到苏联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5. 把我们关于《布尔塞维克》的信^③给你们寄去。这封信是根据《布尔塞维克》以前的几期起草的。很希望尽快得到你们对这封信的看法。

6. 日内，我们将写完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在这封信中，我们打算弄清楚你们就农民问题进行的争论，并针对你们一些领导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不正确意见和近几个月在党的总的工作形势中发生的变化，作出关于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策略的指示。

7. 你们收到我们最近的一封信了吗？信中谈到了所有基本政治问题^④，你们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79，第 33—3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全宗 534，目录 1，卷宗 453，第 73—74 页。

^② 指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③ 见第 152 号文件。

^④ 见第 620 页注^②。

15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3月31日于上海

秘密

罗伯特斯^①的信 关于中国当前形势

在中国，现在即将再次爆发内战。蒋介石已派军队进攻桂系，进攻汉口，俘虏桂系重要军事领袖、作为出席国民党三大^②的代表去南京的广州军阀李济深。与此同时，在山东，军阀张宗昌无疑得到了日本人的武装和资助，他从曲阜赶走了南京部队。新的战争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革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既没有解决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问题——因此各外国列强同各军阀集团、各阶级和反动统治阶层联手起来；也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因此半封建和封建势力、地主、豪绅、买办、各省地方军阀又重新加强自己的军事地盘。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中国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掩盖了国家实际上的四分五裂，由于军阀力量的消耗和革命民主主义取胜的危险，这种统一只不过是战争中的喘息。战火再起决定于以下因素：

1. 以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和以英日帝国主义为另一方在南京政府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美帝国主义支持南京政府的资产阶级

① I. 埃斯勒。

② 国民党三大1929年3月15至18日在南京举行（详见《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卷，第174—204页）。

势力，而英日帝国主义支持桂系和封建半封建势力。

2. 中国资产阶级同地主、豪绅和买办之间的斗争。蒋介石派无疑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军事代表，而桂系代表地主、豪绅和买办的社会政治利益。在南京政府内，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正在进行。

3. 各军事集团之间的角逐。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试图解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即统一国家、恢复统一市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等问题，但是，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不吸收民主革命力量参加或置这些力量于不顾，它必然要借助于老军事集团进行这种没有希望的尝试，必然同封建半封建军阀集团联手，不断地向外国帝国主义作出让步。这样一来，任何一次这种战争，包括目前的战争，都不能解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采用反革命方法进行的每次这种解决问题的尝试，都会造成新的反革命结果和加剧矛盾。因此，目前的战争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战争，尽管各军阀集团背后都有各种阶级在撑腰。

蒋介石集团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广东集团要强大。因此它能够比较迅速地取胜。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其他因素，例如由于某些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的（而不只是默默鼓励的）和有利的干预，战争拖延下去，那么其结局就难说了。

问题在于，英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广西集团。

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怎样的方法利用目前的局势呢？日本会利用满洲集团反对蒋介石吗？如果英国和日本从国际政治方面考虑，即注意到美国，放弃公开动员中国军阀力量的策略，并宁愿以保持中立的代价来争取南京政府作出让步和投降，那么蒋介石就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但是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无论其结局如何，都不能加速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蒋介石可以战胜广西集团，但他显然不能战胜他与之有某种联系的封建势力，因为他反对土地革命，反

对民主革命力量。如果广西集团被打败，那么豪绅、地主和买办会重新为自己建立阵地，重新集结自己的军阀集团，因为这样一来它们老的生存条件会保存下来。

蒋介石集团提出了以下口号：统一中国，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广西集团的口号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蒋介石用国民党三大作武器。蒋介石的鼓动宣传显然更有成效，对我们更有危险。两个集团互相指责说，它们在促进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战时措施在加重对民众的压迫。南京政府禁止不经当局允许举行罢工，对举行集会也是一样。

目前的局势——军阀战火再起——客观上对我们是有利的。我担心，党太弱，同群众联系太少，难于对这种局势作出反应。党的宣传口号是：“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对军阀战争！”、“打倒同军阀串通一气掠夺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打倒国民党政权和南京政府！”、“争取中国的真正统一！”、“工人、农民、劳动人民，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建立苏维埃中国！”。

工人的要求是：随物价上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打倒禁止罢工的国民党，打倒黄色工会领袖，红色工会万岁！

农民的要求是：反对将农民军事化，反对征用农民住房，反对征收战争税，反对实行高地租，反对军阀的走狗——土豪。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反对取消自由的国民党，反对征收各种捐税，反对没收轮船和铁路。

士兵的要求是：发放军饷，反对军官压迫，不上前线（不言而喻，我未援引所有要求，而只是典型的要求。铁路职工、兵工厂工人、海员和妇女的专门口号还在制定中）。

据政治局的同志说，现在在党内存在以下情绪：许多同志认为，没有任何机会为革命做工作。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恐惧，一句话，很消极。一些同志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是民主和封建之间的战争。因此无论如何应该支持南京政府。的确，这样的同志

不多，然而这是在某些同志那里可以看得到的最危险的情绪。也还存在一些盲动主义思想残余。有的同志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自然会爆发革命，只需要在军事方面做准备。在这封信中，我还没有对这些情绪作出清楚的说明，即它们在哪些组织中，在党的哪些机关中，在哪些重要工作人员那里存在，程度如何。由于交流困难和语言不同，只能解决很缓慢进行的工作。为了利用目前的形势，我们对党和工会党团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动员。

在认真研究总的形势和党的状况后，我将写下一封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63—67 页。

打字稿，副本。

155

阿布拉莫夫^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摘录)

1929年4月3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不过应该说，整个这段时间要做的工作（当然主要是开会）好像非常多，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来。

（1）现在中国的事情最使我感到不安。我同时给您寄去卡佐夫斯卡娅写的信，她在信中讲了事情的实质^②。从这封信中您可以看出，我们的朋友^③简直是异乎寻常地把事情搞乱了。最近他按标准划了预算，现在中国同志坚决反对，抗议削减预算，由于这次削减现在他们的整个工作都垮了^④。看来，由于阿尔诺^⑤实行奇怪的政策，他们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我们要求他作出解释。当然，谈不上什么增加，因此我们在中国人面前很难为情。阿尔诺的这种“首创精神”使我感到不安。特别令我不安的是与他的企业有关的事情。他要求设立大笔储备金，以可能发生种种不幸事件相威胁，而且他是这样说的：如通常所说，应该感谢苍天，他

① 信的作者是根据第156号文件确定的。

② 见第156号文件。

③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④ 见第151号文件。

⑤ A. E. 阿尔布列赫特。

的信顺利寄到了^①。我不认为可以同意阿尔诺把他的储备金再增加 40000 美元的建议。我们要就这个问题给他去一封信，他当然会咒骂的。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便这里的工作能继续下去，保存现在的领导班子。当然，也许我是错误的，因为整个这件事我了解不多，但我再说一遍，我对情况有这样的认识，因此很担心。德国右派和左派都宣布格哈德^②被派到中国去了，这就更加重了这种担心。我给阿尔诺写信，请他加倍小心……^③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25，第 56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F. 艾斯勒。文件没有找到。

③ 下面删去了信中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日常工作的部分。

156

卡佐夫斯卡娅^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摘录)

不晚于1929年4月3日^② 于莫斯科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 弗里茨^③ 到了。阿布拉莫夫在写信谈阿尔诺^④ 的情况^⑤。

阿尔诺寄来了整个1928年的支出报告^⑥。报告的收入部分完整，只有几个不大的差错，我们要问问他。

报告的支出部分，如果审核实际拨款，不是很清楚。如根据报告判断，阿尔诺拨给中共的款项要比应该拨给他们的多。共多拨出15500美元（我们已经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拨给了他们。因此1928年最后四个月他每月拨给他们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同志给斯大林写了充满绝望的信^⑦。信的副本送给了我们。他们认为，与去年相比，他们的经费几乎削减了一半（现在每月拨给他们约33000墨西哥元）。相差确实几乎一半，但是：（1）他们认为，只拨给了1928年下半年经

① 信的作者是根据第155号文件确定的。

② 日期是根据第155号文件标明的。

③ Ф. К. 费尔格德。

④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⑤ 见第155号文件。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见第151号文件。

费，而要用于全年；(2)可能他们认为，按月拨给他们的46000美元加上定期拨款属正常拨款。

另一方面，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拨给中共的款项比应拨给他们的少了一半。可能每个党的多余部分是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钱里出的，何况阿尔诺对弗里茨说，他那里再没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钱了，而根据我们的计算，他那里还应该有余额约60000美元。确实，我们没有计算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拨给日本、朝鲜等的款项，因为根据支出报告看，它们没有被列出。可能这些款项被纳入给中共的拨款中了，但没有指明这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钱。所以实际上这个余额恐怕要少于60000美元。

关于整个情况我们给阿尔诺写了一封详尽的信^①。

至今还没有收到来自柏林上海公司^②的支出报告。

全宗495，目录19，卷宗426，第57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大都会贸易公司”。

15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4月于莫斯科^①

不久前收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信^②中说：“在3、4个月内，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总共约有250人……这些学生中能工作的人很少。根据目前的统计：能在工厂和支部里担负工作的不到20人；能在地方组织里工作的不到30人；能在省委里工作的不到20人；能在中央机关里工作的总共只有3、4个人；而其余的什么也不能干……从学习本身角度看，这些同志可能只是表面上熟悉理论，实际上对党的组织问题、工会运动问题等什么都不了解。甚至从理论的修养方面来说，他们都难于同资产阶级思想或同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思想作斗争。因此很少能利用他们来做宣传鼓动或组织工作。特别是很少能利用他们来做组织和工会工作。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经验和1927年后在中国采用的联共（布）工作秘密组织形式。因此即使仅从他们的学习角度来说，也难于利用他们来增加我们对世界工会运动的了解。当然，如果我们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还更难说会是什么样……”

再有，据中国报纸报道，约有30名回来的学生投靠了南京政府。他们在报纸上公布了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名单和在回国途中

① 日期是根据第195号文件标明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的联络点地址。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南京政府用来在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当中，在上海、大连等港口从事间谍活动。在这些背叛的学生当中，有的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得到了很肯定的评价。最近几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少花费了约 500 万苏联卢布，而取得的成绩仅表现为，在回来的 250 名学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可以用来工作。他们的学习如此不符合实际，他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基本任务方面，未能取得最起码的成绩，未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保障。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提请特别注意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状况，并请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负责同志向我们作出工作报告。

在总结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状况的调查工作时，我们认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已经积累了一些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培养了翻译干部，出版了一些中文书籍。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培养干部和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奠定了基础，现在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克服不健康的现象，更顺利地完成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不健康现象表现为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混乱，还表现为，一方面它不给学生提供掌握联共(布)实践经验和参加苏联实际生活的机会，结果造成了学生生活的闭塞，另一方面它不把普通课程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教员质量的不合要求、教科书和教员的不够中国化，有造成学生的学习同中共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危险。学校里的一般经济生活不能令人满意，对学生的学习的有影响。学校对党支部在广泛合作、自我批评、自我检查、建立和巩固积极分子队伍等问题上的工作的态度和它在消灭学生中不健康现象方面的工作的态度比较机械。这些都给学生群众造成了对学校不满的条件。学校里的长期混乱状态和不能令

人满意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早就存在的不足之处，至今还未能根除。当然，造成根除这些不足之处缓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工作中的困难、学生成份不令人满意等，但终归也有主观上的原因。这些不足之处未能彻底而迅速地根除，也导致了学生中不满情绪的增大，这些不足之处的存在一直是争论的基础，是纠正学生那里存在的错误倾向的障碍。同错误倾向的斗争，即同右倾和调和主义的斗争，以及同中国学生那里存在的民族偏见的斗争，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可以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没有走上联共（布）中央指出的工作轨道。

联共（布）中央任命的新校长威格尔同志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①。我们认为，这是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的一月决议^②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改革的开始。中共代表团表示同意这个决议，并在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改革开始之前提出以下建议：

1. (1) 联共（布）中央应在实践中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经常性工作吸收很多的优秀教员和工作人员。这批新的力量，一部分应参加党支部，以便加强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工作，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加强这个领导班子。要消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部分工作人员身上妨碍进行改革的惰性。

(2)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由联共（布）建立的中共的党校，因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组织上要受联共（布）中央领导，但同时也应同中共中央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第一，在接收新生时，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应向中共中央详细说明接收学生的条件。只有取得中共中央的同意，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才能确定其接收学生的数量。第二，中国劳动者共产

① 见第 602 页注①。

② 见第 143 号文件。

主义大学向中国派遣毕业生时，应向中共中央报告每个毕业生的鉴定情况（学习状况、政治水平，对党的态度、工作能力和爱好）。第三，要定期（每三个月一次）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中国代表团以汇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学校学习和党的生活情况。（3）党的工作的头等任务是提高（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水平。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提高固定工作人员的素质。同时要采取实际措施来研究执行联共（布）中央有关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的指示的方法。

2.（1）改组翻译局。首先要建立编辑委员会并开始做实际工作。在最近要修订翻译出版物，采取措施提高译文质量。为迎接下一个学年，还要更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提供必要的书籍，而且还在于为中国党奠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基础。因此要有固定的翻译干部。至今，翻译人员都是从学习了一年或一年半俄语并且没有学习过翻译技巧（提高中文水平）的同志当中挑选的，而大致过一年时间，这些翻译人员往往都被派回中国，这时再挑选新的翻译人员来做这项工作。需要根除这种现象。必须建立固定的翻译组。在这个组里，除了专业学习外，还要专攻俄文和中文。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译文质量（已经译成中文的书籍，对于工人同志来说，多半都看不懂）。

（2）要立即成立工人教科书编写委员会。要编写符合工人水平的小册子并在近期出版。

（3）要尽量吸收中国同志当较低文化水平的小组，特别是工人小组的教员。现在已经需要从有能力任教的中国同志中挑选教员和为满足下一个学年的需要成立教员培训组。

（4）责成教学部同中国研究所^①一起制定教员和教科书中国

^① 指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

化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应包括出版论述中国问题的书籍、编写含有中国问题的各种教科书、成立研究中国问题的教学组等内容。

(5) 基础班定为两年，预备班定为一年。各组学生划分不只是考虑学生总的水平，而且也考虑中国党的需要。必须实行定向学习：“用中文学习是基本因素”；因此现在就必须分成俄文组、非俄文组和翻译组。这些组的课程要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来定。

(6) 加强军事学习。要列入特别科目“武装起义”。

(7) 根据学年水平^①有步骤地增加关于中国问题的课程，并要把这些课程同实践联系起来。

(8) 实行按组、按科目学习制：学习的科目有党的一般的和特别是在秘密条件下的组织和宣传方法、工会的组织、开展职工运动的方法、农民运动、妇女工作、共青团工作等等。要在最后一学年下半年按一定的学生数量加进这些课程。要利用俄国党秘密活动时期的经验并要吸收优秀的教学力量参加这项工作。

(9) 改进图书馆的工作。增加新的必要的中文图书数量。

3. (1) 学校的机构应力求做到精简。要尽量把多余的在编人员（现在有 396 人）减少到相应的水平。

(2) 坚决清查学校的财务，制定财务计划，整顿学生的经济生活。

(3) 简化学生集体的工作，要使学生感觉到社会工作不仅不影响学习，而且为学生提供积累实际工作经验的机会，要整顿学生的生活。

注：第 2 点的两点补充：

(10) 学生应参加苏联工厂、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的会议。要给学生增加学习联共（布）实际工作经验方面的工作。

(11) 整顿教学、党支部和社会工作方面的各种会议。首先要

① 原文如此

注意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

在我们看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基本目标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懂政治和能够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为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党之间需要建立密切的联系。要从中国的需要出发，进行有步骤的工作，克服一切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始终考虑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于中国党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加了联共（布）中央为检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于去年11月成立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代表团赞同得到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决议。此后，代表团很关心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议的贯彻执行情况。它注视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存在的不足之处实际上是否在克服。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目前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这些不足之处不仅未能根据中央的决议迅速加以根除，而且有时还有所发展。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没有走上联共（布）中央指出的工作轨道。

全宗 530，目录 4，卷宗 43，第 28—35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5月3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英美之间角逐的对象。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都在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仅竭力要巩固或争夺经济和政治阵地，而且还要为未来的太平洋战争巩固和争夺军事阵地。此外，它们还利用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内哄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国的内战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日英美之间帝国主义战争的小型预演。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的斗争，同反对他们彼此之间的会导致掠夺民众和加强帝国主义者地位的战争是分不开的。

配合举行红色日^①活动，在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等一般口号外，必须提出专门的中国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捍卫中国而斗争！”、“帝国主义军队和舰队撤出中国去！”、“打倒国民党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反对国民党军阀战争！”。

至于举行红色日活动的方式，要根据当地条件制定具体的计划。一般说来，中国共产党应通过举行游行来动员广大群众，而在有可能的地方，也可以举行持续时间不长的罢工。红色日活动及其准备工作应当成为共产党和共青团严肃认真的反军阀工作的

^① 8月1日。

开端。

我们在士兵群众中有影响的地方，我们应该鼓动士兵组织工人和士兵的联合游行。一定要出版党和工会机关报的专号，千方百计利用合法的报刊，出版一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小册子和反对中国国民党内战的单行本。

东方书记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77，第 11 页。

打字稿，副本。

15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9年5月6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东方地区书记处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的信收到了^①。信中的指示我们无法执行，完全不是因为
我们主观上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要向你们做些说明。

1. 按照你们的条件我们无法派出 350 名学生。在近两年期间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老干部成了白色恐怖的牺牲品，而幸存者
甚至还不够应付日常工作用的，因此我们无法派他们中一部分人
到你们那里去学习。新的干部还只是在培训。其中多数人文化程度
很低，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只有在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掌握一些
实际工作经验后才能把他们派到莫斯科去。确实，中共中央确定
了三分之二产业工人的比例。但是在省里，除江苏和广东外，找
不到工人同志去学习。知识分子干部剩下的更少；其中多数人成
了白色恐怖的牺牲品；一部分人变成了消极分子，摇摆不定；一
些人不想去莫斯科学习，例如金宽^②、郑超麟、林育南等同志不想

① 见第 153 号文件。

② 何人，不详，音译。

去莫斯科，虽然中央作出了这个决定。一小部分工作积极并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因为这样做对工作太有害。你们确定的条件完全不能执行，如果不向莫斯科派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志，也无法实现你们的希望。我们建议在海参崴办短期训练班不是为了在那里培养干部，而主要是要提高那些在（广东）海陆丰失败后被解救出来并具有红色战斗部队作战知识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志的素质。

2. 比较积极参加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有病。完全健康的同志很少。这是中国党和工农群众中的普遍现象。在最近几年的激烈斗争中，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干部，没有条件关心自己的身体。如果遵循这样的条件，即患有你们开出的许多疾病中任何一种病的同志学校都不能录取，那我们连一个学生也派不了。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在省里，由于怕这条限制，决定不派同志。中央能到哪里去找同志呢？我们最多能接受以下（排除疾病的）三个条件：1. 严重的肺结核病；2. 传染的性病；3. 传染的眼病。你们提出的条件我们不能完全执行。除了我们列举的三种疾病外，我们请求放宽条件。否则谁也不能去上学。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能执行你们的决定。这次预定派出的学生不能按时起程。这是因为许多地方机关垮掉了，所有预定派出的学生都不能很快动身。

3. 我们希望至少卜士奇（普罗列塔里耶夫）将被派回来。

4. 陈绍禹（戈卢别夫）还没有来到上海，请电询海参崴。

5. 我们认为，最好把苏兆征同志的遗属也派到莫斯科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1. 中央其他成员，如张太雷、王荷波的家属都得到了彻底的一次性抚恤金。在中国，苏同志的亲属不能是例外。2. 苏同志的儿子和女儿是很聪明的孩子。在中国没有他们可以受教育的相应学校。在莫斯科，有理由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有才干的斗士。苏同志的妻子可以在莫斯科做点工作，如果

需要的话，她可以在管理女生宿舍方面做些工作。因此我们认为，派他们去莫斯科是适宜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中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6，第 65—67 页。

打字稿，副本。

1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

(摘录)

1929年5月23日于莫斯科

政治局1929年5月20日决定

27——关于鲍罗廷同志。

认为鲍罗廷同志在其在华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错误，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有重大违反纪律的过失(公然不执行指示、向中共中央隐瞒这些指示等)，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根据这些情况对鲍罗廷同志进行了谴责，同时认为他可以从事目前在塔斯社的工作，但认为现时让他担任特殊政治性质的负责工作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741，第1、5、9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61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第2号信^①

(摘录)

1929年6月4日于上海

绝密

1929年6月4日信摘录

在上一封信^②中，我们向你们谈了同志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的这种看法还在加强。我们有一些优秀能干的同志，但没有任何经验，常常不联系群众，不了解群众，不善于对基层组织里的辩论、争论等现象作出反应。按照中央的训令，我们的口号应在会议上进行讨论。自我批评，不能被很好理解，造成一种偏向（没有提出目标），似乎党只是在犯错误，仅此而已。同志们是这样被教导来反倾向的：当一名工人，即我们的一名来自采煤工人支部的党员^③，问政治局委员：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时（这名工人在支部里有两周时间没有听到有关我们和有关国民党的情况了），同志们说这是右的倾向，而如果来自区委的一名工人提到对官吏的监督时，那么现在同志们则会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因

① 信的作者和编号是根据第164号文件确定的。文件全文没有找到。发表保存下来的И. А. 皮亚特尼茨基1929年6月19日给B. M. 莫洛托夫的信的摘录时，删去了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部分。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何人不详

为这个同志不信任中央。在这方面好像政治局委员起了带头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两种倾向”。在他们那里所有人都是“右的”。他们的唯一手段是压制，或者诉诸纪律。这当然还不是毁灭性的，但很危险。需要寄希望于我们去帮助同志们改变“教育”方法。这种原则性，即维持纯洁性，占用同志们许多时间。他们无法掌握运动。如果再加上警察制造的困难，那很清楚，我们党不是运动的领导者。我们对运动作出了统计并作了总结。在党开展的运动中有五一节行动。从材料中你们可以看到五一节的方针^①。为使同志们明白，在推翻国民党之前就可以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斗争，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五一训令^②具有实践性质。同志们没有写笼统的话。我们的工会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正确。邮电工会采用老办法取代了党^③，而铁路工会印发了很好的传单。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很难说，从报纸上可以看出是做了些事情。印发了传单，在墙上张贴了口号。许多工厂停工了。但是是我们还是工厂主让工厂停工的，很难说。报纸上说，一些工厂主，即国民党人，解雇了工人。国民党反对举行庆祝活动，它解释说，五一节是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日，而在中国没有资本家，中国工人没有斗争对象。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举行了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同志们准备了一个一般的报告，从中你们可以想象到开展运动的情况。我谈几个小问题来结束中国问题。蔡和森根据个人愿望离开了政治局。我们尝试跟同志们谈了让他返回政治局的问题。向忠发坚决反对，并说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会削弱政治局的威信。这对我们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好像大家都参加了反蔡的政治运动。从代表大会^④回来后，直隶省委作出了反对蔡和森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和王藻文的尖锐决定，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①。同志们纷纷指责他们在会议前后所犯的各种过错。我们同蔡谈了话，他给我们留下了被击败和有病的样子。他们都怕进行自我批评。蔡声明说：“我没有工作经验，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听我说：我参加政治局，影响了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而我影响了工作，我请求休假”。蔡作出这个声明之后，对政治局进行了批评，政治局同意蔡去你们那里。需要给他治治病。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76—77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16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会议第 38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6 月 7 日于莫斯科

听取：2. (312) —— 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的草稿。

报告人：米夫同志。

讨论参加者：斯特拉霍夫^①、米茨凯维奇同志。

决定：2——批准信的草稿。责成库恩、斯特拉霍夫和米夫（负责）同志对信的文本作最后审定^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144，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瞿秋白。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79—189。

163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29年6月7日于莫斯科

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代表团

亲爱的同志们：

1. 现寄去经政治书记处批准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①。发这封信拖延了一些时候，原因是需要在我们的机关里对这封信作更仔细的讨论。

请务必写信告诉我们，中国同志是如何对待这封信的，他们提出了哪些意见，领导在了解信的内容后作出了什么决定。

顺便告知，我们收到了讨论我们政治信件的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记录^②。但从记录中看不出什么人发表了什么看法，看不出讨论后作出了什么决议。

我们担心，他们将向各级组织散发这个记录而不是我们的信，这个记录掩饰了许多问题^③，因此我们的信似乎未失去其意义。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29年3月26日会议记录（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21，第137—161页）。

③ 1929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信的第37号通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26—144页）。

2. 请告你们对第30号通告^①的看法。这个通告对政治形势作了总的分析。其第二点谈到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根本矛盾；说资产阶级要打击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排挤帝国主义列强和实行关税自主；要调解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种分析与我们在地主资产阶级联盟问题上的看法是相左的。需要你们弄清楚，第30号通告中阐述的看法是偶然性的错误，还是在这些看法后面隐藏着一定的路线。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们要向中国同志作出相应的说明，进一步弄清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3. 还要注意到为了进行收买而“拉人”的做法，从我们收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基层组织都习惯于这样做。我认为有必要消除这种增加党的预算的做法，因为它采用了荒谬的方式，在中国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可靠的做法，可能导致基层组织向纯土匪方向堕落。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无助于提高党在劳动群众面前的威信。

4. 不能减少中央的通告和训令吗？我们有这样的看法：这种通告风要耗费很多时间，使人脱离现实工作。通告重复，散发对象狭窄，并取代了实际领导和群众工作。需要刹一刹通告风。

5. 请报告全会^②情况。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请告所有内部分歧意见。请谈谈蔡和森情况，免掉他的职务和现在让他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总之，请多给和常给我们写些情况。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①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8日发出的第30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54页）。

^②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又及：1. 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机关刊物《我们的话》^①的译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国大学^②截获了这个刊物（是通过海参崴寄来的），这证明托派建立了某种联系。据我们所知，除了上海，他们在香港还有巩固的基地。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请将托派在苏联的瓦解情况告诉中国同志。现将雅罗斯拉夫斯基最近谈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③寄给你们。在中国翻印这篇文章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人与其说跟随托洛茨基倒不如说是跟随拉狄克。

2. 在你们动身之前，我们曾建议你们用我们机关的一名熟练掌握德语的工作人员当翻译^④。我们无法合理地使用他。请速告，是否有必要派他到你们那里去帮忙。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7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我们的话》杂志，1929 至 1931 年在上海出版。

②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③ 可能指雅罗斯拉夫斯基以下两篇文章中的一篇：《变节行为的原则性论据》，载《真理报》1929 年 5 月 12 日；《托洛茨基如何回答和工人如何回答托洛茨基》，载《布尔什维克》，莫斯科 1929 年第 9、10 期，第 25—37 页。

④ 何人不详。

164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第3号信

1929年6月7日于上海

致东方书记处第3号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这封信里，我只向你们谈一点，即5月30日情况。其他问题我在第2号信^①里都谈到了，而除了5月30日情况外，没有发生新的情况。你们知道，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罢工的第四个周年日。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天不可能平静地过去。帝国主义报纸在5月初就开始谈论“1925年的不幸大误会”。这家报纸认为，那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几乎已经统一，国内状况在日益好转，煽动工人闹事者，即布尔什维克领事馆和代理人已被驱逐出境。因此大家都主张五卅周年日应平静地度过。国民党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这个周年日吸引开。整个5月，甚至还在这以前，就在做孙逸仙遗体移葬^②的准备工作。为这项工作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国民党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想说服中国劳动群众：其他一切事情都应该服从这件事。呼吁居民保持平静，努力生产，遵守纪律，等等。国民党告诫居民：共产党人，可能还有反动派，将试图利用5月30日来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活

① 见第161号文件。

② 1929年6月1日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

动。为了对群众施加良好的影响，国民政府从济南、青岛地区彻底清除了日本军队。国民政府答应值隆重的孙逸仙遗体移葬之际实行大赦。5月14日政府就宣布，孙逸仙遗体移葬期间，即从5月26日到6月1日为全国志哀期。其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当然，国民党也没有忘记警察方面的工作，采取了种种措施不允许举行任何群众大会、集会和游行。5月份，在中国有各种周年日。它们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清楚，党做不到纪念所有这些周年日。所以我们代表团还在4月份就讨论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问题，采取了以下方针：把五一作为国际节日加以庆祝，五一应成为动员群众迎接5月30日的开端。5月份的所有其他周年日（5月4日^①、1914年的5月9日^②、1928年的5月^③等）我们党仅提醒群众不要忘记，试图使所有力量都集中到5月30日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收到关于五一是怎么度过的报告。但从我们所掌握的各方面材料来看，应当预计到，过得不是很有声势。除了上海和上海省^④外，其他地方没有举行任何活动。具体情况是：从中华全国赤色职工总会^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上海，合法地举行了9个赤色职工组织会议。警察驱散了集会，抓了一些人。还举行了一个约有1000名“义和”厂代表参加的合法会议。在沪东区，约有1.3万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在沪西区，约有6000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在沪中区，有6个工会组织号召举行罢工，但没有说罢工是否举行。在上海以北，即在唐山^⑥，举了一整天的罢工。约

① 指1919年5月4日的群众性反日运动，抗议凡尔赛和会关于将山东省交由日本控制的决定。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15年5月9日。这一天中国政府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日本政府所提出的21条最后通牒的大部分条款。

③ 指济南事件（见第17页注③）。

④ 原文如此。指江苏省，下同。

⑤ 即中华全国总工会。

⑥ 原文如此一译者。

有4万工人参加。在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只举行了代表会议。在天津举行了局部罢工。在北京没有进行任何活动。这是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消息。政治局代表^①在谈5月30日准备工作时，谈到五一要举行4个群众大会，各有5000人参加。群众的情绪很好。他未能指出详细的材料。他们两人^②说，党没有进行充分的动员，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讨论五一活动时，我们研究了5月30日问题。虽然5月1日党没有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动员，但毕竟同群众取得了联系。5月1日过后，在上海爆发了一些罢工行动。在吴淞地区，一家纱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发生了冲突。农民和士兵也采取了行动。在沪宁铁路上，发生了两次反对把工人储蓄从外国银行转到中国银行的冲突。在法租界，有八家棉纺厂发生了反对解雇工人的总工行动。在闸北区，爆发了争取休息日的斗争。在沪北区，有两家纱厂要求提高工资。在沪中区，工厂和服装店的工人和职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同一个地区，运煤工也要求提高工资。在沪东区，电车职工和纱厂工人同企业主发生了冲突。最后是，在上海学生当中爆发了强大的运动。据同志们说，在上海约有50000学生。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在他们当中有很大影响。我们正依靠这50000学生。国民党没有任何影响。汪精卫的学生不止一次地起来反对蒋介石。5月7日，学生在国民党上海总部面前举行了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汪精卫派拟在5月9日再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在这里，政治局和上海省委在我们是参加这次大会还是召开自己的群众大会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政治局决定参加，而上海省委要组织我们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有两起游行：一起是汪精卫派600名学生的游行，另一起是我们的400名学生的游行。约有600名工厂工人加入了我们的游行队伍，所以我们的游行人数约有1000名。政治局曾把问题提到代

① 何人不知。

② 原文如此。

代表团处，我们进行了讨论，有3名政治局委员和一名上海省委书记^①参加，对问题作出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解决。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解决，而是政治上的解决。我们说明了政治局错在哪里，上海省委错在哪里。我们单独的大会应该提前一天举行，以便做好准备出席总的大会。政治局在谈到让我们去参加总的大会时，没有向上海省委说明这一点。政治局委员们认为，我们应当和群众在一起。但如何理解这一点，经我们作简要解释后，我们大家都赞同代表团的建议：全力以赴为5月30日做准备，少些学究式的争论。这种争论妨碍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考虑如何不犯右的和左的倾向，而不犯错误的最好保证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国民党开始实行镇压。校舍被警察包围。有三所学校关闭。得到教授和国民党支持的国民党学生，决定解散学生组织，建立在国民党保护下的唯一“联合”组织。这引起了强烈的骚动。改组派最后作出了让步。所有这些情况，说明群众情绪在高涨，促使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同志着手为5月30日游行做准备。中国同志赞同这个建议，但向我们描绘了党的状况，说很糟糕，并告诫说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同志们。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一名代表和七、八个工厂支部各一名代表组成的为5月30日做准备的党的上海委员会。实际上同志们成立了过分庞大的委员会。他们让政治局和上海各出两人，基层支部出17到19人。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未敢将其取消。同志们做了纠正，成立了执行委员会。而后又决定由政治局作出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并要把这个决定传达给基层组织，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而不是交下面讨论“正确与否”。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局“指挥部”在讨论之后，没有决定什么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传达到了基层组织。如果这些组织认为，政治

^① 原文如此。应为：江苏省委书记，即罗登贤。

局的建议不错，那就会得到执行。换句话说，否则党就要不断地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决定试一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同志们对党是否理解有些怀疑。实际上党并非这样糟糕，它对问题很理解，对需不需要举行游行没有任何争论。只是共青团有一两次争论。5月25日以前党进行了准备和动员。各区委、支部讨论了“如何执行政治局决定”的问题。最后同志们决定成立宣传组、组织组、消息传递组和涂写组。从党内工作转到群众中工作。在制定工作计划时，上海发生一起事件，这种事件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发生，只是未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就是有两名英国士兵殴打两名中国人，最后打死了一名中国人。同志们在未听到我们任何建议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想到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现在他们抓住这个事件不放。需要说一下，这个事件使群众大为激动。现在根据我们的提议，在工厂、店铺里，在邮电职工和学生中间成立了张学良（被打死的人）治丧委员会。这些治丧委员会举行了代表会议并成立了总的上海委员会。工厂治丧委员会多半由三名同志组成，其中仅有我们一位同志。在市委员会里，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力量对比，不过无党派人士占居多数。该委员会承担了对5月30日庆祝活动的领导工作。工厂、团体和工会组织分别派代表团到死者家里进行慰问。死者家属到工厂、店铺和治丧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感谢工人的帮助和悼念。在死者灵柩旁组织了工人、学生集会。从所附的5月30日英文报纸剪报^①中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同志们做出了何等出色的工作。当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同志们不是在各种场合都能对付得了国民党和改组派的演说家和建议。但是这与所进行的工作相比是小事一桩。5月27日同志们都到工厂去了，尽管时间短暂还是做了大量工作。我不向你们详细描述整个情况，因为你们可以从附上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传单中，以及所附的资产阶级报纸剪报^②中了解到。我

① 剪报没有找到。

② 记录、传单和剪报都没有找到。

只简要地说一说。5月30日行动是由合法的委员会领导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党内动员。印发了约70万份各种传单、1万份我们合法的报纸^①。多数工厂举行了以5月30日为题的集会。5月30日行动完全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把这次行动同工人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约有3万人参加了游行。举行罢工的工人也约有3万人。6月1日,我们同政治局的一名代表^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们通报了结果,他确认了报纸上报道的情况,并作了一些说明,如怎样捣毁电车、汽车、报馆等。在法租界的一家纱厂门前,有7000名工人举行了集会。此事发生在早上4点到6点工人换班的时候。工人们挤满了整个街道,开出停车场的电车过不去。警察乘车赶到,开始驱散工人。于是发生了搏斗。这时很自然砸碎了电车的玻璃。我觉得,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人们就会责怪这些参加大会的工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捣毁汽车事件。游行队伍在行进,迎面疾驰而来某个可鄙的帝国主义者的一部汽车,直冲游行。怎么办?我认为,工人们正确地采取了行动。而捣毁国民党报馆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张学良治丧委员会决定在5月30日由整个工人、学生游行队伍为他送葬。5月30日早晨,当送葬组织者率领上千群众来抬灵柩时,发现夜里国民党宪兵已把灵柩转移到国民党党部,逮捕了死者家属,并有宪兵在那里等着逮捕前去的人。游行同宪兵进行了短暂的搏斗之后,有人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党部!”口号,结果捣毁了两个国民党报馆^③。可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向你们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使你们别以为这件事的发生

① 可能是《上海报》,1929至1930年在上海出版。

② 何人不知。

③ 指《民国日报》和《申报》报馆。《民国日报》1915至1932年、1945至1947年在上海出版,《申报》1872至1949年在上海出版。

是出于什么指示。在所附的一个剪报中好像援引了我们党的传单，是由一名游行者捣毁报馆之后书写的。这个例子是个很好的证明，证明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优秀的革命者。这里的人称这是个宣言，写得很好，我们动笔墨的中国同志谁也写不出来。

5月30日这次游行是我们党在遭到惨重失败之后的第一次群众性工作。同志们讲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在一家工厂，我们的同志走上讲台说：“男女工人们，明天都去游行吧！”另一个同志走到他身边说：“你发什么号令？你问问群众想不想去？”同志们拦住游行队伍，开始讲话。群众不听，而是喊口号，向前疾驰。在这里，我们向同志们说：这就是你们的榜样，无需写很长的传单和宣言。同志们对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一些支部提议庆祝7天，举行游行。政治局对结果并不满意，有意要对一些支部进行严厉批评。我们劝同志们不要这样做。不能在一开始领导群众性游行时就进行严厉批评，因为这样做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受到惊吓。当然，糟糕的是我们在街上向游行者发表演讲的同志^①，看见警察和（拿着棍棒到处打人的）印度人时就惊呆了。能严厉批评这位同志犯右倾，犯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吗？我认为，不能。所以我要劝同志们，我觉得代表团其他成员也要劝同志们。为了便于同志们对5月30日作出总结，我们代表团要为政治局和省委作出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同志们将较容易为基层支部作出自己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要指出宣传鼓动工作、运动的高涨和党的能力，指出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但在总体上决议要说，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并号召继续做工作。我们的印象是，8月1日同志们要纠正5月30日以来所犯的错误。我不向你们讲错误了，因为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决议中看到^②。5月30日的准备工作对其他工作也有影响。如我们党没有针对孙逸仙安葬一事做任何工作。我

① 何人不详。

② 见附录。

们没有让同志们注意这件事，因为我们对同志们能否应付此事没有把握。在这里，关于孙的三民主义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打倒三民主义！”的喊声接连不断。上海兵工厂（2000名）工人拒绝在6月1日孙逸仙安葬日举行纪念活动，他们照常上班。300名服装店职工在大会上从口袋里掏出孙的照片及其遗嘱并把它们撕成碎片。这个事件的发生并没有我们的影响。代表团还没有讨论这个现象。怎么办？要不要传播和抓住“打倒三民主义！”口号，我本人没有坚定的主张。也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这样做。如果你们给我们写信的话，请谈谈你们对此事的看法。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奥斯藤^①

又及：5月30日后发生一些罢工行动。在天津，有六家日本纱厂举行罢工。在上海，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好像不够有力。我们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②了，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见太平洋书记处书记^③。

附上一些剪报，虽然你们是会收到这些报纸的。

奥斯藤

[附录]

秘密

远东代表团关于5月30日的决议^④

5月30日，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举行了示威游行，进行的很

① H. A. 雷利斯基。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

④ 文件副本送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别尔津、阿布拉夫、库西宁。

顺利。尽管存在白色恐怖，尽管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威胁，1万名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还是在国际区、在法租界和在中国城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示威游行。警察在一处驱散了游行，他们又在另一处集合起来，表现出了了不起的战斗精神。

这次示威游行显示出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群众战斗精神的唤起，一是我们党动员群众的能力的提高^①**，这是通过在群众中做强有力的工作，通过动员党的力量和通过把符合群众需要和发展水平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口号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取得的。5月30日游行的准备及其进行，是改善地下工作处境和利用合法半合法条件的很好例子。

这项工作增强了同志们的战斗精神和决心，为他们提供了现在在党的日常实践活动中应该加以利用的做共产主义工作的大量各种不同经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重新把党同群众更加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项工作是有步骤地和仔细地进行的，使党不仅学会了在上海地区如何领导群众，而且也学会了在全国范围内如何领导劳动群众的斗争。

当然很清楚，无情的镇压和这个斗争阶段党的工作所处的十分艰苦的条件，揭示了在准备和组织游行方面以及总的来说在党的状况和活动方面存在的一些弱点。认识这些弱点（已认识到）并在近期为纠正和彻底消除这些弱点作出努力，经历过5月30日游行的党就会变得更加巩固。党应该在这一成绩的大课堂上进行学习，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改进工作方法上，以便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改进在企业里的工作，扩大在农民中的影响，等等。

为了有步骤地以群众为基础（通过继续采取和发展5月30日在上海成功地进行示威游行时所采取的方针）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国民党的斗争，党应该立即着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

^① 根据英文原件标出的黑体字（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489，第3页）。

中国军阀、保卫苏联的强大运动，应该把这场运动继续下去，最终要使群众参加八一国际红色日活动。

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在8月1日，即向反动派宣战15周年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中国党的任务是，利用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这个国家一些地区的独特条件，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仔细为这次运动和游行做好准备。

这次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但由于像满洲（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武汉和广州这些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特殊利益和重要意义，对它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5月30日在上海进行的示威游行的成功结局意味着，尽管有种种困难，尽管存在残酷的迫害，在做认真仔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党在8月1日也能够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方面不会比柏林、巴黎、伦敦、东京和所有世界其他中心城市的党组织逊色。

全宗514，目录1，卷宗487，第97—100页（雷利斯基的信）；卷宗489，第1—2页（附录）。

打字稿，雷利斯基的信为原件，又及后为亲笔签字，附录为副本。

1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29年6月8日于莫斯科

国际列宁学校的工作经验表明，除了扩编的两年制教学班，还需要有短期的培训班，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有理论素养的党的工作者的缺乏。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决定，从目前的秋季起在国际列宁学校开办这种短期培训班。党的一些负责人短期出差不会对党有很明显的影响，这些同志在学校里比较短时间的逗留，不会造成他们脱离自己党的实际活动，但却能使他们当中每个人很快就具有肯定更好的理论素养回到实际工作中去。

但是短期培训班决不意味着任何一名普通党员都可以参加。相反，有限的学习时间要求付出很紧张的劳动，要求参加者同党的直接实际工作有有机的联系，要求他们具有对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直接领导经验。

办这种培训班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借助于一般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另一方面通过直接积极学习联共（布）在准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和在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方面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扩充和加深同志们已经积累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

培训班学习期限定为9个月，即从1929年9月1日到1930年6月1日。

给培训班提出的任务，只有各党在选派参加学习的同志时都很

重视都很认真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

给每个被选派的人提出的必要要求应该是：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立场，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党，在阶级斗争激烈时靠得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共产国际中其他倾向作斗争时立场坚定。被选派的同志应该具有实际工人运动工作经验，以及党务工作方面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

将接收至少具有地区党的负责工作或工会工作经验的同志，以及最近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并完成党的负责工作的同志。

挑选人选时，要优先选择那些能够进行紧张脑力工作的工人。此外，还必需考虑到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即必须保证同志们在培训班结束后能够根据自己党的指示在本国党的领导工作中找到用武之地。

在理论教育方面，鉴于总的来说我们党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不很高，主要要求同志们具有相应的理论发展条件（理解理论问题的能力）。

鉴于确定教学语言为德语、法语、英语和俄语，被选派的同志应掌握其中一种语言。

只能接收身体健康、未患那种需要长期治疗因而而影响进行正常学习的疾病的同志。所有来学习的同志都要进行体检。鉴于莫斯科住房不够，来学习的人不能带孩子和成人家属。

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属可以从学校得到他们国家最低生活标准的救济款。学员不发衣服、鞋和内衣。所有被选派的同志最迟在1929年8月20日应到学习地点报到。9月1日准时开课。迟到一周以上者不再接收。

参加这次培训班的人数，给中国党15个名额，给日本党10个名额。

请你们关注一下这些同志的物色和及时派遣工作。

东方书记处

全宗514，目录1，卷宗487，第101—102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166

伏罗希洛夫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摘录）

1929年6月8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

在政治局最近这次会议上，我同布哈林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会上讨论了中国问题^①，有人提出一种想法，认为有必要在满洲边界上举行军事示威。布哈林坚决反对。我在发言中提到，布哈林曾把中国革命与我们的革命如此等同起来，以至认为中国革命的灭亡就是我们的灭亡。布哈林作答时说，我们大家都发了言，他说，就是你伏罗希洛夫一个人主张支持当时屠杀工人的冯玉祥和蒋介石。这种无耻的胡说八道极大地触怒了我，我控制不住自己，当着布哈林的面说他撒谎，耍流氓，还胡说了一些其他的话，所有这些是在有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布哈林是个败类，他善于在人面前说些无耻的谎话，同时在他那始终狡诈虚伪的脸上作出特别虔诚无邪的可耻表情。这件事我现在明白了，还是我做的不对。

但坏就坏在神经上，该死的神经使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个场面过后，布哈林离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再回来。托姆斯基好像未作出反应。主持会议的鲁祖塔克，依我看是要我遵守秩序，但他哼哼哈哈地敷衍了几句……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件（1925—1936）》第123—124页。

^①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8日会议。

167

别尔津和苏达科夫给希夫列斯的信

1929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工农红军军政学院院长希夫列斯同志

抄送：工农红军参谋部军校管理局局长库兹明同志

我^①在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在您的学院和其他军校的中国人培训问题上作出最明确的规定。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报经一些上级机关批准，所以耽搁了。这就是您所说的一些问题解决迟缓^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不久我们就能够为所有中国班作出明确的有目标的指示和改进军校管理局对他们的领导。

我按您所列的几点答复如下：

教学问题：（1）在我们解决了今后如何进行组织和培训中国同志方针这些原则性问题之后，军校管理局将向您下达下一个学年的训令。现在我可以指出以下情况：可能重心要转到对地下工作、党委军事部等单位领导人的培训上。在教学大纲中，像武装起义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历史和策略、地下工作技术这样的科目要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从中国同志当中培养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具有巨大意义，而且需要比以前更多地吸收像您们这样有经验的党组织参加这项工作。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 A. JI. 希夫列斯 1929 年 6 月 12 日给 Я. К. 别尔津的信（见全宗 550，目录 1，卷宗 8，第 70 页及其背面）。

（2）明确将来培训中国同志的总的组织框架后，教员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我们未必能给您提供了解中国情况的教员。您需要从自己的教员中挑选，或者从毕业学员中挑选最合适的人做这项工作。

（3）一些教具（30张武汉市平面图、在莫斯科举行的单方武装起义演练模型、中国地图）交给了巴兰多欣同志。而且向他说了，下一个学年您可以指望得到哪些教具。盖利斯同志的著作《武装起义》^①正在印刷。巴兰多欣已通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作者订购了一些关于同一个问题的小册子，到秋天要准备好俄文版本和中文版本^②。

党的问题：（1）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将对特别班党的工作作出指示，同它已经达成协议。

您将从业那里得到第2、3、4点的明确指示，比如，我可以帮助您搞清楚，如何向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和如何在这里解决问题。

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党员的工作将加快进行，以使可靠的一批人都转党，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催促通过相应的党的上级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清党显然首先涉及的是联共党员和候补党员的中国人。中共党员的党费暂时可以交学院支部局。

但是，我再说一遍，关于这些问题，不久您会收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方面的指示。日常生活问题：（1）只有在个别特殊情况下，向家属提供物质帮助，无论如何不能把这当作一种制度。应该注意到，在您的学院里中国同志的经济状况比军校学员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要好得多。

（2）如果不超过拨给你们的中国学员生活标准，你们可以购买雨衣。不会拨出用于购买雨衣的专款。

（3）关于派中国人去休养的问题，您将会收到军校管理局的指

① 见奈贝格（盖利斯）：《武装起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

② 《武装暴动》，莫斯科，出版年不详；《武装暴动论文集》，莫斯科，出版年不详。

示。至少（不少于一半的部分款项要由学员本人承担。只能为3名最困难和有病的学员作例外处理。

对不去休养的人作放假处理要很谨慎，主要是给在莫斯科有家的人放假。

（4）你们不要付野营的费用。

其他：（1）关于补充新的人员和您所负责的学院的补充程序问题不久将告知。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材料（中共六大决议）^①日内将通过军校管理局寄给您。

不久您还会收到一些材料。总之，我们要尽量把这件事安排得好些。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 别尔津
第四处处长 苏达科夫

全宗550，目录1，卷宗8，第176—177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莫斯科，1928年。

16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第4号信

1929年7月8日于上海

致东方书记处第4号信

亲爱的同志们：

虽然，亲爱的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到了我们的信，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继续向你们说明我们的工作情况。6月20日至7月1日期间在我们的首都^①举行了中央全会^②，有来自5个省的20位同志参加。全会议程是：（1）政治局报告；（2）形势和任务；（3）工会；（4）组织工作。农民问题没有提出，因为除了大家都熟悉的一般空话外，同志们中谁也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全会召开前，有几个委员会做了准备工作，每个委员会有我们的一个代表参加。工作相当繁重。最难的问题是；红军、工会、游击战，奇怪的是还有组织问题。在红军和游击队问题上，同志们提出：组织游击队，把它们集中在红军周围，把红军集中起来。所有这些当然是以日益兴起的革命运动为基础的。首先需要两天时间进行讨论，要

① 指上海。在发表的全会文件中，由于保密原因会议地点说的是广州。

②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全会的准确日期不详。一些材料说，全会在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举行。另一些材料说，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举行。有些文章说，全会在1929年6月底7月初举行。全会部分文件是在7月9日、24日以及8月6日由中共中央批准的。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47—357页。

弄清楚这两个集中是什么意思。之后提出了革命运动是否高涨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先锋队的程度，城市是否做好了准备等问题。在这里，当然同志们提出了中国的特殊条件，引证了中共六大决议，最后同意了现寄给你们的我们的修改意见^①。据说全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不知道会上是否改动了我们的修改意见^②。在工会问题上，曾对提纲的性质进行了争论。同志们认为，中央全会的提纲是给党的积极分子写的，因此应该是政治性提纲。关于这一点，在委员会里曾发生过很大的争论。后来问题移交到我们同志的联席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相当坦率的争论，同志们同意为作实际指示写出提纲，批评对工会工作的玩弄一般政治空话的领导^③。在组织工作方面：提纲作者^④在同极端民主化辩论时写道，对党内平等的要求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民主，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争取群众的手段。我们在委员会中的代表主张作这样的改动：民主是我们的目的，但要根据条件来实行。据说，全会拿列宁的著作论证了这种主张的荒谬，好像作了修改^⑤。最后的提纲我们还没有拿到。我写的东西只是从谈话中得知的。全会的社会成份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知识分子全会。他们答应给我们履历表，我们将寄给你们。我们代表团对这些问题没有大的争论。最大的争论是，我们要不要出席全会。经过长时间争

① 见附录。

② 修改意见未被采纳。见《二中全会关于目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载《民族殖民地问题学生会中国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0年第3（64）期，第10—3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79—211页。

③ 原文如此。

④ 周恩来。

⑤ 全会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说：“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见《民族殖民地问题学生会中国研究所通报》，1930年第3（64）期，第4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17页。

论，决定只参加一项议程，即第二项议程，并且由罗伯特^① 同志一人参加。我们中的一些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对，但服从了多数。罗伯特以代表团名义通报了关于联共、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情况。当地同志的问题不清楚。他们要文章和报告，而我们自己，除了（2月份的）老材料，没有看到你们的任何新东西，所以只字未提这件事。日本彻底垮了。我们很重视中央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挑拨离间行为^②。我们还不了解详细情况。我们难以寄出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我们能收到你们的東西？我觉得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工作条件在日益恶化。天气越来越热，我们浑身是汗。你们能从电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但你们不采取任何措施。请注意！以后怕是会发生事的。此致

敬礼

奥斯藤^③

[又及]米夫同志！我给您寄去我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两次全会^④ 的文章。我是根据当地的材料写的。我想，应刊登在《共产国际》^⑤ 上，当然，如果可用的话。请关照一下这件事。如果《共产国际》编辑部同意刊登，要用我“家里”的化名^⑥ 发表。

奥斯藤

[附录]

-
- ① Г. 埃斯勒。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在上海逮捕加藤（佐野学）。
③ И. А. 雷利斯基。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共产国际》杂志（见第64号文件注7）。
⑥ 化名不详。

代表团对中共二中全会政治提纲的修改意见

8——关于红军。

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农民进行的闻所未闻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在一些农村，甚至在一些省引起了暴动。暴动的农民储存武器，进入大山和森林里，从那里开展游击战。党不要阻止这种暴动。党应力求领导这种暴动，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加以革命的利用。我们领导这些暴动队伍的同志，以及我们在暴动队伍活动地区的所有组织，都应竭尽全力确保这些队伍不蜕化成土匪集团。与此同时，党还应该向全体劳动人民说明，在一些农村、县，以至省的暴动，如果不组织起来，就不能取得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组织起来的、由共产党同时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才会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只有这种群众性的武装暴动才能保证劳动人民取得胜利。

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现有的个别红军队伍应该解散。但频繁的农民暴动和军阀军队士兵投奔红军的现象，迫使领导延缓执行党的六大的决议。现在红军驻扎在苏区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同农民的大联合和对军内生活的整顿，红军战士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红军可能成为全国革命红军的萌芽。为此必须使全党、全体劳动群众关照红军，向它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红军应该保护贫农和中农，使之不受军阀匪帮的侵犯。

苏区的存在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它们实行阶级路线并依靠劳动人民、贫农和中农的坚定支持，它们受到劳动人民的推举并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名字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苏区的存在，会败坏苏维埃政权思想的声誉。因此中央应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从研究中得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03—104 页。

打字稿，原件，又及和署名为亲笔签字。

169

雷利斯基^①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9年7月30日^②于上海

供讨论

贼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监狱里的同志

中国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驱逐帝国主义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建立民主工农共和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吞噬成千上万最优秀，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共产党蒙受着巨大的损失。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无情地屠杀落入它们手中的同志。被杀害的克拉欣、布哈罗夫^③和数十名其他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多数同志（即党的积极工作人员，他们个人国民党领袖都认识）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住处，经常更换地方，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患疟疾、肺结核，年纪很轻就死去了，如苏兆征同志。现在在由帝国主义管理的中国监狱里有我们的数万战士在受折磨。猖獗的恐怖为救助这些同志增加了难度。被捕的同志常常出于保密的考虑对警察局和法院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行动，党甚至不知道这些同志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是否被当作匪徒或强盗绞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法院的长期审判、监狱里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使人对被判处20年或10年监禁的同志能不能活着和健康地坚持到革命的到来感到绝

① 作者是根据信的语言和风格确定的。试比较第161、164、168号文件。

② 收到的日期。

③ 相应为：陈乔年和罗亦农。

望。这种情况，以及急需有经验的、经过考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促使负责同志考虑解救狱中同志的各种办法。

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负责同志的交谈中，听到了关于这些办法的建议。现在解救狱中同志的最普通最流行的办法是用钱赎人。一些同志对此做了各种设想。一些人说赎出个别刚刚被捕尚未受审的同志，另一些人说按两三个人一组赎出，而最后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①交谈时，甚至谈到赎出差差不多400名同志。如果说在最初的交谈中，我仅限于提出一些意见或建议，那么在提出赎出400名同志这个具体建议后，我得出结论，需要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要么这是幻想，那就需要趁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害，尽快制止这种议论，要么这确实是现实的事情，那就需要尽快将其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加以解决。我意识到，这件事靠政治局或代表团的决定解决不了。这是各共产党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里说的是保存党员，而且是最优秀的党员的健康问题，也可能是生命问题。因此我决定同中共中央委员同志们就此问题进行书面交谈，当然，最好是进行私下讨论，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这里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反对用钱赎出狱中同志，我阐述自己的理由，同时请中共中央委员同志们也阐述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理由。集中所有意见和对各种理由作出分析后，我们再决定今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从以下观点看，不能采用赎出狱中同志的办法：

(1) 赎出狱中同志的办法，会把争取释放被捕革命者的斗争化为乌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该有步骤地开展争取释放被捕者的群众性运动。应该让数百万中国工农参与这种斗争。每一个被捕的革命者都应得到工农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每一个落入监狱的人都应同工农取得联系，向他们通报狱中生活情

^① 何人不详。

况，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刽子手如何侮辱被捕者，等等。只有这样工农才明白，被捕的革命者在为他们的利益进行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在逮捕和屠杀工农，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人，而是反对所有工农。采用赎出被捕者办法，做不到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向工农掩盖其卑鄙行为。我们共产党人赎出同志时也必然不透露某某革命者被捕了。

（2）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逮捕了数万名革命者。党不能赎出所有人，而只能赎出一部分。这肯定会在被捕革命者中引起不满情绪，造成他们的争论和误解。而这会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有利。

（3）谈到赎出一些同志，我们共产党人必将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警察局代表打交道。这些刽子手将知道我们的同志。我们同警察局谈到一些同志时，就要向它（警察局）指出，哪个同志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毫无疑问会有助于警察局同我们作斗争。

（4）我们今天赎出一个同志，没有任何保证，明天不把他逮捕。在赎出时，警察局很容易搞挑衅行动。某一个混蛋同意放我们的同志，而另一个同那一个串通好的混蛋，会在另一条街的一个角落里再把这个同志抓起来。

（5）在各共产党中，始终存在着解救不解救狱中同志的问题。可能同志们都知道，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人都在坐牢。而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至波兰，被判刑和处决的不比中国的少。尽管如此，所有党都不这样做。

（6）从狱中赎出一些同志的做法，会使被捕的革命者成为共产党和警察之间进行交易的对象。这会使我们更难于吸引工农参加解救被捕者的斗争。因此我反对用钱赎出狱中同志的做法。我建议在工农中进行有步骤的群众性的解救被捕者的工作来代替这种做法。为此要成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该会应该有数百万会员，而不是现在这样，它是党的一个部门。要着手为被捕者募集捐款、衣物、食品等。每个工厂、城市、农村都应该成为一些监狱的支援单位。这

些单位应给被捕者写信，应到监狱里会见被捕者。被捕者家属应受到所有工农的关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着手制定计划，如何为改善被捕者在狱中的条件而进行斗争，如何为被捕者寄送书籍、文字材料和食品，如何使被捕者同党取得联系，等等。

这种工作定能建立起一支由被捕者组成的、暂时不能作战的革命军部队。被捕者将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他们在狱中经受斗争的锻炼。如果用钱赎人，被捕者将是交易的对象。这会给党带来损害。

我不排除赎出一些同志的可能性，但此事不应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或任何别的上级机关来决定，而只能由党的安全委员会，如果有这样的机构的话，或政治局书记处来决定。

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些是我个人的意见。可能同志们要说服我，请告诉你们的意见。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06，第 110—112a 页。

打字稿，副本。

1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92 号（特字第 90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8 月 8 日于莫斯科

听取：6——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政治局 1929 年 8 月 5 日会议第 92 号记录，决定：20），

（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以加拉罕同志的名义通过梅利尼科夫同志转交外交人民委员部对朱绍阳质询的答复^①。

责成梅利尼科夫同志派领事馆一名业务人员到第 86 号会让站转交这个答复。

（2）在哈尔科夫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一条关于布留赫尔同志因被任命为特种远东军司令动身去远东的新闻简讯^②。

抄送：加拉罕同志；用密电告布勃诺夫同志。

政治局 1929 年 8 月 1 日决定

听取：18——布勃诺夫和佩列佩奇科同志的电报^③。

①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 1967 年版第 12 卷，第 444 页。

② 发表的新闻简讯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决定：同意布勃诺夫和佩列佩奇科同志的建议。

抄送：佩列佩奇科同志。

听取：19——关于中东铁路问题。

决定：（1）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答复通过张学良的信转达的奉天的建议，指出：

1. 张的建议是使破坏奉（天）北（京）协议的行为合法化，苏联政府绝对不能同意；2. 重申我们在答复蔡运升第一个建议时提出的建议，说明苏联作出这个让步是出于其爱好和平的政策。责成由加里宁、莫洛托夫、加拉罕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答复。

（2）建议梅利尼科夫去赤塔。

（3）在报刊上加强宣传运动。

（4）最大限度地动用一切施压和镇压手段。

（5）立即（于8月2日）在报刊上公布梅利尼科夫同中国人的整个谈判过程，并作出相应的评论和指出日期^①。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多列茨基同志——（3）和（5）；

温施利赫特同志——（4）；

亚戈达同志——（4）；

萨韦利耶夫同志——（5）；

波波夫——（5）。

政治局 1929年8月5日决定

听取：20——关于中东铁路问题。

决定：（1）以外交人民委员部名义给梅利尼科夫同志寄去答复：

^① 见1928年8月2日《消息报》；《苏联外交文件》第12卷，第426—429页。

“请答复蔡，您没有任何权力同蔡或同朱绍阳进行谈判。苏联政府的观点在加拉罕给张学良的信中已作了全面阐述”^①。

(2) 公布关于史汀生等人计划的电报，利用这个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挑衅性侵略政策^②。

(3) 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果断措施加快完成以前提出的任务。

(4) 8月8日提出关于蒙古情况的报告。指定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为报告人。

(5) 责成由温施利赫特（主席）、加拉罕、皮亚特尼茨基和特里利塞尔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于8月8日就派遣一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问题向政治局作出报告，委员会由温施利赫特同志召集。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和（5）；

温施利赫特同志——（4）和（5）；

特里利塞尔同志——（3）和（5）；

多列茨基——（2）。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9年8月6日

听取：32——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梅利尼科夫最近的电报提出的建议。

① 同上。

② 指美国国务卿史汀生1929年7月25日向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国政府提出的备忘录，其中含有这些国家集体干预苏中中东路冲突的计划。详见：1929年7月26、30、31日和8月6、8、9日《消息报》；《苏联外交文件》第12卷，第760—761页。

决定：(1) 梅利尼科夫同志应该答复蔡，他没有得到允许同蔡或同朱绍阳进行谈判。如果朱绍阳带来奉天政府或北京政府的书面答复，那就让他通过电报局或第 86 号会让站转达。

(2) 梅利尼科夫同志应该通知报界，他去外地休假，而他本人到离赤塔不远的疗养院等候莫斯科的指示。

抄送：加拉罕同志；用密电告布勃诺夫同志。

听取：33——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采纳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1) 在远东成立特种军。

(2) 任命布留赫尔同志为该军司令。

(3) 批准立即下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以下命令：“1929 年 8 月 6 日。1. 把目前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合并为一个军，授予它‘特种远东军’名称。2. 任命布留赫尔同志为‘特种远东军’司令。3. 布留赫尔同志立即履行其职责。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

抄送：温施利赫特和特里利塞尔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7，第 129—13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 八一国际红色日情况的决议

1929年8月^①于上海

对八一的评价

为了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15周年之际，举行八一国际赤色日，党本应动员中国百万民众，反对已经准备好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保卫苏联。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党本应围绕中国军阀在帝国主义领导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的挑衅开展群众性的解释运动，本应把群众从解释运动引导到举行群众大会、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阴谋勾当。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未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预演。这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运动，由于帝国主义者同国民党和军阀结成同盟而具有现实性，因此党应该竭尽全力动员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要非常明显地突出中国劳苦群众保卫苏联的问题。

……^②应该指出，中共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开展的运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是中央未能领导全国运动的准备工作。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党没有在

^① 日期是按内容标明的。

^② 原文为删节号，按意思应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区域做系统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可怕的白色恐怖和一些省份距离的遥远，中央未能对这些省份给予足够的注意，而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据点上。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新鲜，中央从5月1日和5月30日运动中已经领悟到了。在这些运动中，一些省份没有表现出动员群众的任何才能。我们在对5月30日运动的评价^①中已给中央指出，八一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域进行。尽管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和不止一次地亲自提醒，党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几乎是在劳苦群众中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度过的。整个党的工作仅限于散发党的传单。无论中央还是我们都没有得到关于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的消息。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党的过错，因为群众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工人和贫农的情绪是有利于运动的。天津电车工人罢工、广州铁路员工罢工、中东路总罢工、上海罢工、农民暴动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重新出现八一运动的这个主要不足，不能只用警察和技术条件来作解释。这里暴露出了那个可悲的情况，即中共在中国还没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工厂支部网几乎不存在（只有百分之七的工人党员）。农村和城市支部不是劳苦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还是为自己服务的小派系。虽然在像武汉或广州这样的地方，工农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中央领导机关不领导省，不关注省和地区的实际工作。省委书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都讲一些更抽象的脱离工厂、城市、农村实际生活的问题。中央机关淹没在给省起草和下发大量通告、训令的工作之中。这些通告和训令不是提请省和地区注意实际工作，而完全是提供专论党所面临的各种确实很重要，但

^① 见第164号文件。

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学术论文。

在全国，上海是个例外。确实，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有 80 万劳动者，其中 50 万是产业工人）。这里实行着劳动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帝国主义政策，中国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资本合作，中国军阀在同帝国主义军事和警察当局合作，在上海这里，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在非常迅速和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在上海，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非常公开地在向中国劳动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在上海，可以看出，居民发生了很明显的阶级分化。在这里，工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但是在上海工人斗争中，最主要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共产党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到了上海。这里集中了全部最优秀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力量。因此上海无产阶级是全国工人的先进队伍，而上海党组织是工人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因此党所开展的运动，若在其他中心城市不能取得成功的话，在上海则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5 月 1 日在上海度过得很好，而 5 月 30 日，无论中央还是我们都认为党取得了很大成绩。8 月 1 日也是这样。在全国很平静，而上海组织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尽管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实行猖狂的白色恐怖，尽管有 500 人被捕，并且其中 3 名党员和 1 名非党员被枪决，还是成功地对群众进行了动员。印发 150 万份各种传单，出版半合法的日报^① 3000 份，而在 8 月 1 日出版 1 万份，出版 3 期《红旗》^② 和 1 期《布尔塞维克》^③，动员三分之二上海党组织党员，这些说明党做了大量工作。党善于把党内的组织性和刚毅精神传播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学生当中。上海党组织在中央指导下领导了纺织工人、码头工人、服装工人和自来水工人的罢工。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上海学生革命运动。当然，在对劳动人民斗争的领导工作中，上海党组织还

① 指《上海报》，1929 至 1930 年在上海出版。

② 《红旗》，见第 635 页注①。

③ 《布尔塞维克》，见第 623 页注①。

犯了一些错误，不是始终都表现得很稳健，很有本事。个别党员未能在其岗位上坚持到底，害怕了。这些不足之处在逐月减少，党在变得越来越好。

由出版社准备的条件和在党内进行的动员，使得党能够着手在劳苦群众中做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指定的八一专门委员会^①，在成立合法和半合法八一委员会的工作中，表现出许多首创精神。上海 20 个左翼工会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在这次会议上选出由 11 人组成的八一委员会（其中有 6 名非党工人），以及该委员会同另一个半合法的反帝同盟（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同盟、上海反帝同盟和青年反帝同盟）委员会和一些学生代表机构的合作，说明上海党组织在中央的经常指导下，已具有把合法和半合法斗争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的本领。这些委员会的及时建立，把党同工厂里的群众联系起来，便于党接近非党群众，最后确保党有可能动员群众。这一点首先在 7 月 14 日显露出来了，当时中央根据关于中国军阀挑衅性地占领中东铁路的消息，通过反帝委员会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尽管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抵制，这次大会还是举行了，有 5000 人参加，而且多数是工厂工人。党能够召开地区的和工厂的工人集会，以及在工厂附近召开飞行集会，毫无疑问都应归功于存在由左翼工会代表会议建立的半合法的八一委员会。

在 7 月 14 日群众大会上，党所做的强有力的工作和群众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以及上海发生的罢工事件，惊动了所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从 7 月 14 日起，上海逐渐变成了军营。警察徒步和骑马巡逻不断地在城里转来转去。工人区以至一些工厂还有专门的巡逻队。开始进行大逮捕和搜查。除实行恐怖外，国民党还着手组织群众大会。上海国民党党部像是一个祖巴托夫组织^② 它在自己的口号、传

^① 委员会于 1929 年 7 月 15 日成立，由 13 人组成，委员会书记是罗登贤。

^② 见第 661 页注^①。

单和决定中，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抛出了反帝口号，作出了反对治外法权、联合法庭和赛马赛狗的决议。国民党只在这些欺骗性口号上附加了它的唯一真正的口号，即反对苏俄的口号。当地的国民党开始取消罢工，呼吁工人复工，开始改组邮电工人、服装工人和药业职工工会。国民党举行的群众大会伴随有飞机、汽车、音乐、舞蹈和茶。中国的以至帝国主义的工厂主强迫工人参加国民党的群众大会，让工人放下工作，并为他们参加会议的时间支付工资。国民党群众大会的成功，首先在于国民党利用国家力量，强迫国家和社会职员以至工厂工人参加这些会议。但不能把一切都归到经济和政治恐怖上和国民党人搞阴谋诡计上，并以此来解释国民党群众大会为什么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指出，国民党群众大会和集会取得成功，确是因为国民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恐怖和国民党的工作必然对群众产生影响和削弱群众的激情。这在7月26日有具体的表现，当时共产党在日英领事馆门前召集的示威活动，只集合了1000名参加者，而7月14日的示威游行却有5000人参加。共产党7月26日的示威游行引起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实行更加猖狂的恐怖和全力以赴。用武装巡逻队和机枪汽车加强了警察巡逻队。（法国、中国和国际）三个警察指挥部开始协调行动。逮捕了约500人，其中有50名党员。在八一前夕有3名党员和1名非党积极分子被枪杀。由于几乎过往的中国人人人都要被搜查，很难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材料。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报纸用“共产党搞阴谋”来吓唬居民。逮捕行动切断了中心区和一些区的联系。部分党员慌张起来。出现了个别的机会主义，以至我们在工厂里的同志的畏缩行为。这在铁路员工、自来水工人那里，在兵工厂和在电车工人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最重要的中心区域，我们的同志以各种借口（会开枪射击，会指责我们搞破坏活动，群众不愿意，等等）拒绝率领群众上街，回避号召群众举行罢工。

中央领导和上海领导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由于没有足够的斗

争经验，领导没有尝试采用新的接近群众的方法。领导只是在最后时刻才了解到个别的机会主义和畏缩行为，因此未能作出反应，同时这也说明领导和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够好。8月1日的成果微乎其微，尽管很好地做了准备工作，尽管上海党组织的所有成员表现得无比忠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省委和中央坚定不移和路线正确。7000名罢工工人和1800名示威游行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在上海，8月1日不是全体工人的斗争日，而只是群众的先锋队、最有觉悟的革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日。8月1日的成果说明，党没有解决好对5月30日和7月14日的态度问题，党的动员能力减弱了。

上海组织尽管做了强有力的工作，并从5月30日和7月14日取得了经验，但在8月1日竟未敢率领群众上街，对这种情况无论中央还是上海党组织和全国的所有领导机关都应该作认真研究。我们丝毫不想贬低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特别是上海党组织作出的成绩。但我们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地、严厉地给同志们指出同志们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和疏漏。我们很理解党的艰苦工作条件，同样我们也考虑到恐怖，但只用条件和恐怖不能解释8月1日发生的情况。除了恐怖和艰苦的工作条件外，对8月1日结果产生影响的还有这种情况：我们党同广大工人群众联系不够，省委和中央未能扩大工厂支部网，未能对工厂里的党员进行教育。据从政治局委员那里得到的信息说，上海有300多家百人以上的工厂，在60家工厂有党的工厂支部，红色工会已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20家工厂，其余220家工厂处在党和红色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上海组织是最无产阶级化的组织，但还是由三分之一的工人和三分之二的非工人组成。六大以来，中央和省的积极分子没有增加工人成份。这非常明显他说明，党脱离了产业工人。党不具有足够布尔塞维克化的原则和把工人的日常要求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能力。这从我们宣读的关于8月1日的通告和训令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文件中，中央泛泛地述说了政治形势、中东路问题实质，但根本未给省组织指出，如何把这

些同工人微不足道的工资、很长的工作日、一周内没有一天休息日、饥饿和水灾、帝国主义在上海建设新的铁路等联系起来。虽然中国工人具有阶级本能，但很少受到国际主义教育。党未能在中国劳苦群众中宣传苏维埃俄国。既然工人不知道苏联是什么国家，那就可想而知，共产党人召开工人保卫苏维埃就不可能得到响应。党甚至没有尝试在工厂里建立工厂八一委员会，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党不具有“一切到群众中去，一切经过群众”的原则。领导同志认为，不需要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因为“支部和红色工会可以履行这种职能”。这样的看法说明，他们低估了群众的作用。简要叙述的这些不足之处对8月1日的结果是有影响的。对这些不足之处，不是从谁有过错的角度，而是从将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如果中央在《红旗》或《布尔塞维克》上开辟标题为“8月1日是怎样度过的”的专栏，这是最好的研究方法。首先工厂支部成员、地区书记和基层工会工作人员应该写文章。题目比方说应该是：（1）“为什么8月1日兵工厂工人没有罢工？”（2）“为什么8月1日电车工人没有上街？”（3）“为什么自来水支部没有完成党委托的任务？”等等。工人自己写这样的题目可以为我们揭开8月1日失败的秘密。省委和中央将根据这些通讯报道为全党提出较好的评价。

我们在上面提出的意见，必然推动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将来更加大胆地努力地开展保卫苏联和反对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日常群众性运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在中东路上继续推行的政策，今后会造成帝国主义者从中国一侧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应该开展解释性宣传运动，在工厂里举行集会，要在会上作出抗议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决议，要把这种活动同每个工厂工人的要求联系起来，要善于解释中东路上的全部冲突，同在华日军的增加、帝国主义海军的增加、国民党最近关于服兵役和军队开支的决定、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建大门的行动、水灾和饥荒、地租、国民党

关于工会和农村自治的反动方案、工资的减少、工厂工作日的延长、日本企业的歇业等等联系起来。在作坊、工厂、协会、俱乐部、农村、庄园和学校举行的每次会议，最后都要作出决议和选出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可以各种各样，如“保卫苏联委员会”、“苏联之友委员会”等。党举行抗议枪杀工人和革命者的行动，应同取消一切死刑的要求、给予罢工和红色工会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党必须倡导成立工厂救济被杀者家属委员会。除了为被杀者家属募捐外，暂时不给这些委员会提出任何任务。在存在一些这样的委员会之后，才召集这些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成立自己的中心，同时将自己的工作同现存的其他委员会协调起来，或者合在一起，或者组成共同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委员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0，第 26—35 页。

打字稿，副本。

172

米夫和库丘莫夫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29年9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1. 随这封信给你们寄去政治书记处关于职工问题的决议^①。这封信还是在莫斯科未给中共中央夏季全会^②准备职工工作提纲“草案”^③时写的。“草案”的基本方针是对的，但被大量的次要问题淹没了。正因为如此，从我们方面强调指出职工工作的主要任务就特别重要。我们认为，这些任务是：（1）争取领导日益兴起的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现在这种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或是在国民党左翼集团领导下进行的；（2）建设红色工会（在党内提出取消这种工会的机会主义建议是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加强在群众性黄色工会和政府工会中的工作，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实际去做。关于在群众性黄色工会组织和国民党工会组织中做工作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在中国党的提纲中）说了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出现转机。这一点我们确信不移。最后，你们必须打破通过上层机关做工作的老习惯。最基本的是要在企业里做系统的工作。不在工厂里建立基层的、支柱性的职工组织，就谈不上成立红色工会，谈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2—195页。

②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③ 文件没有找到。

不上在黄色工会里进行有效的工作和完成中心任务，即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

2. 至于“草案”本身，我们现在不对它做详细分析，因为我们等来的已经不是“草案”，而是得到批准的全会决议。顺便说说这个文件的形式。“草案”像通常的所有中国文件一样很冗长，以至地方党组织和积极分子看来会经常放过主要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建议同志们把通告和其他文件压缩到最短限度，要短小精悍，不要上百次地重复同一个政治指示。必须使党养成遵循（代表大会、全会等的）基本政治指示的习惯，这些指示其实不是一天写成的，并且提供了比较长时期的方针。这样会使中央避免匆忙作出一些考虑不周的结论和提出一些有争议的提法。同时根据保密方面的考虑，完全有必要减少文件的产生，因为文件越多，失败的危险就越大。因此加强《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特别重要，因为所有的基本政治指示都完全可以通过党定期出版的刊物下达。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我们期刊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

3. 现在谈一些重要问题，在东方书记处决定中已有反映的问题除外。仔细看过党的材料后，我们深信，党对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特别是对左翼派别（改组派、第三党等）的态度还不十分明确。必须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特别是鉴于在即将到来的北方集团（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首）和南京之间的战争中，改组派将会起很大的作用。我们毫不怀疑，在党内，支持汪精卫之流的倾向，表现得比同桂系战争时期更加强烈，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里可能发生的偏离布尔塞维克路线的行为，其根子是在一些理论提法上，而这些提法在党的许多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同志们常常断言，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之间“有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这个提法不对：所有资产阶级派别，包括“左派”本身，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提出关于没收地主土地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自己的政纲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始终都会去捍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就是说在土地

问题上基本上接受地主的立场。对立的观点发展下去。势必导致承认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千方百计地要恢复某种形式的民族统一战线（例如，以有必要同革命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为由来为建立这种统一战线提出依据，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好像就是改组派和其他这类派别）。在群众运动活跃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坚持同“左派”进行认真的斗争，因为只有他们在群众中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4. 与此相联系，还需要提出你们所询问的孙逸仙主义问题^①。必须毫不动摇地强调反对孙逸仙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既然掌握了部分无产阶级）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工人阶级中的一种资产阶级影响。以前我们承认孙逸仙主义的革命意义，这完全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转入反动阵营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孙逸仙主义成了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旗帜。

5. 不排除近期南京和北方集团之间冲突加剧并导致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要利用这个机会，从冲突一开始就在一些地区设法争取半合法的工作形式（首先是工会工作），为此要利用各种隐蔽形式；要削弱，而在有的地方或许要完全抛弃黄色国民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运输、贸易等的混乱必然造成工人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进而加强罢工运动。必须派出很强的同志去领导罢工运动，组织和扩大这种运动，并把它引上反对国民党所有派别的政治斗争轨道。一旦成功，必须提出组织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指示）^②。你们写道，似乎全会批准了六大关于取消红军队伍的决定。但六大没有这样的决定。相反，大会主张巩固游击队，认为建立红军的任务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连绵

^① 见第164号文件。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提纲、决议和决定（1929年7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20—21页。

不断的军阀战争、地方主义、接连不断的农民运动等等，所有这一切，即使是在最严重的反动时期，都能为我们提供建设队伍和保存苏区的可能性。一旦爆发新的战争和出现群众性农民运动的新高潮，完全可以重新复活这个运动队伍。同时必须注意，不能让游击队蜕变为骑在农民脖子上的匪徒组织。只有把这些队伍的武装行动同农民争取减税或不交税，以及反对豪绅政权等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进一步扩大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苏区。

6. 顺便说一下，在你们的《两个全会》一文^①中，你们完全回避了我们的“政权归苏维埃！”口号问题，代之提出了民族民主共和国口号。共产国际六大以后，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取消这个基本的口号^②。看来，产生这种情绪的理由是希望同小资产阶级、学生等的运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在着重强调有必要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时，还是应该这样做的，但不降低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同志们贬低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的分化程度，有时把（汪精卫）改组派领导的运动当成了我们自己的运动。

7. 我们根本不知道，党在中东路冲突方面在做什么工作。报纸上什么也没有。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党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开展直接反对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要比在使反革命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国家遭到失败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直接保卫苏联更容易些。看来，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拉进了反苏冒险行动。这些社会阶层施加的压力对党的某些环节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开展运动，在有必要反潮流的地方进行反潮流。一些党组织内的消极性应予以消除，因为它是右的倾向的直接反映。在目前状况下，这种倾向在党内和在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23 号文件。

国内都特别有害。因此需要强调开展反美运动，这也比以前的反日反英战斗要困难得多。应该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资产阶级反对我们，而且比较广泛的学生阶层等也反对我们。正是在了解这些情况后，必须尽最大努力首先把工人发动起来，以保卫苏联和同背叛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任务的、完全投靠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为直接口号。必须向满洲派遣一些认真的工作人员，动身前要向他们作出指示。瓦解驻扎在边境上的军队，组织部队转到苏联红军方面，开展敌后游击运动，组织铁路和煤矿的罢工运动等，这就是直接在满洲的基本任务。

8. 春季我们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①。党对它的出现作出反应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据我们所知，现在只有几个从莫斯科回去的学生。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要利用拉狄克的声明^②。要注意到，这些学生在这里时只同他有联系。但是我们要提醒你们，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时（中国党还不大想象得到托派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还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在党内右的危险是主要危险。从中国寄来的所有文件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右派的立场明显暴露出来了。在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广泛解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特别是关于布哈林的决定^③。

9. 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① 指《我们的话》杂志，见第665页注①。

② 见《托洛茨基反对派领导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声明》，《真理报》1929年7月13日。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提纲、决议和决定（1929年7月）》，第76—78页。

10. 请寄更详细的工作报告。我们答应回复每一封信。至今我们没有收到全会的材料。为什么？我们还在等候对关于农民问题的信的讨论结果。我们相信，它会遭到一定的抵制。必须督促把这封信立即散发到地方组织。

致同志式的敬礼！

米夫
库丘莫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0，第 1—2 页。

打字稿，副本。

1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

（摘录）

1929年9月13日于莫斯科

听取：2.（18）——关于加强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

决定：2.——（1）责成中共中央在北满采取措施，加强在工人、农民、铁路员工中，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

（2）建议中共中央在南满加强在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在南满铁路上工作的中国工人中的工作。

（3）向中国派遣一位负责的中国同志，就中共在满洲的任务对中共中央作出指导。

（4）向哈巴罗夫斯克^①派一位中国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5）在莫斯科各学校动员50名中国同志，派他们去东方加强在北满的工作。还要吸收居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

（6）责成中共中央及其驻哈巴罗夫斯克代表采取紧急措施，在满洲出版和散发中文报纸和传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4，卷宗1，第11—12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海参崴。

174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 156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9 月 27 日于莫斯科

5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确定马季亚尔、弗赖耶尔、库丘莫夫从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固定工作。（报告人：叶若夫同志）。

（1）满足请求。

（2）解除马季亚尔同志在国际土地研究所的工作，库丘莫夫同志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和弗赖耶尔同志在农民国际的工作。

中央书记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779，第 1、12 页。

铅印稿，无签字。

175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摘录）

1929年9月30日于上海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我向你们谈谈每个党的工作情况和它们的状况。先从中国谈起。从我们给你们寄去第四封信时（7月7日）^①起，中共的最主要工作是围绕中国军阀占领中东路事件进行的工作。5月对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搜查，已使党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从中国一侧进攻苏联有所准备。在5月30日举行的纪念1925年五卅运动周年日游行中，中共指出了哈尔滨的搜查事件，号召群众起来保卫苏联，并且指出，由帝国主义领导的中国军阀彻底参加了反苏联盟。在整个6月期间，党把这个问题同发生的所有罢工和骚动联系在一起。党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上海一收到关于占领中东路的消息（7月13日），党便于次日，即7月14日打着反帝同盟^②旗号在上海召集了示威游行活动。尽管对于地下党来说时间是如此短暂，而且遭到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抵制，但是游行活动还是聚集了5000名参加者并且具有高昂的战斗情绪。我已经提到，整个6月份，党为组织集会、游行

① 见第168号文件。

② 指上海反帝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同盟。

和罢工以抗议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反苏行动进行了准备，同时为八一游行做了准备。请允许我在这里指出，西欧局把8月1日定为红色日的消息^①，我们只是在7月中才得到。

我不向你们详细阐述党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进行了动员，因为我们在对8月1日评价的决议中已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个决议^②我给你们附上。有一个令人伤心的情况，这就是除江苏和广东外，中共在其他省份还没有能力动员群众。除江苏和广东外，在所有其他地方，党的工作仅限于散发传单、口号。如果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的话，例如在天津或在福建，那么应该说这些游行是党的游行，而不是动员群众。而在最主要的工作地点，即满洲三省，几乎都不存在党。例如在哈尔滨，至今同志们根本都不管那里，尽管同志们加紧做了工作，派去了人员，但未能在那里建立党的据点。从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过一两天就会被逮捕。除江苏和广东外，其他省情况也是如此，同志们不能工作较长的时间，不断地逮捕破坏了好不容易安排的工作。

党的这种组织状况根深蒂固，同志们无法克服。中国同志都是很好的革命者，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党，在日常工作中也表现出了某种才能和智慧。同志们在实践中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和指示。甚至还取得了某些成绩，但中共还不是全国的党，而只是某些省的党。中共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千百万劳苦群众中去。中共没有在主要工业中心地区建立常设据点。

在一些省份和像武汉和广州这样一些过去阶级斗争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党的积极分子几乎被彻底消灭，或者不得不移居国外，而

^①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每年举行八一国际红色日以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决定。1929年举行国际红色日的具体口号是由共产国际西欧局于1929年5月8日提出的（见《共产国际西欧局呼吁书》载1929年5月12日《真理报》）。

^② 见第171号文件。

新的积极分子党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在与同志们的交谈中，提出了各种原因。一是中国民众习惯于个别集团或个人从事政治，这种工作不是民众的事。民众只能响应政治家的号召。二是运动的组织形式与中国民众格格不入。在中国，从来没有我们所说的党，在中国，斗争形式始终带有武装斗争性质，而不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地做进行斗争的准备。三是无产阶级弱小，政治上不太发展，各省有方言差异。在这里，当然唯一的办法是在工厂、庄园和农村努力开展建立党支部的工作。但同志们做这项工作很困难。他们更多地是做突击性工作的准备。红军的存在和活动是最好的例子。在调动党的全部力量向民众说明军阀占领中东路实质、在吸引民众参加罢工、游行和在建立保卫苏联委员会时，党也号召红军保卫苏联。就是红军这一小批人在几天内也发动了攻势，打败了军阀，占领了四座城市，今天给政府造成了不少麻烦。当然，我们能够预见到对红军不利的结果，但我们认为，红军今天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

我在上面提到，7月14日的游行在上海进行得很好。这给同志们造成的印象是：上海工人为积极支持苏联做了充分准备。同志们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反行动（见对8月1日的评价的决议）。上海组织要求不间断地进行7天游行。同志们没有重视我们的建议：在7月份不要再举行游行，而要全力以赴为8月1日做准备。他们拟定7月26日再次举行游行。游行虽然不是战斗性的，但规模不大^①。同志们毫无根据地认为，原因在于党没有做好工作。我们认为，原因不在于没有做好工作，而在于不是时机。工人都被恐怖吓坏了。7月14日进行了游行，又要求他们举行八一游行。不能要求群众这样频繁地进行游行。8月1日同志们才看到，尽管党做了很好的工作并有客观条件，但频繁的游行未能取得成功。

由于中共在中东路问题上做了工作，可以说，至今这方面的工

^① 原文如此。

作在江苏省做得最好。这里不仅在上海举行了游行，而且在镇江、南通等城市也举行了游行。紧随其后的是广东省及主要城市香港。同志们在这里仿效上海成立了八一委员会。7月27日和8月1日举行了游行。据说，参加者约有5000人。在香港出版了三日一期的半合法报纸^①。我们在20个工会里有依靠力量。再后是直隶省及主要据点天津。在天津有半合法的保卫苏联委员会。那里举行了保卫苏联周。举行了游行，但没有材料说明有多少人参加。在这个省的开滦煤矿，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准备，但由于缺少有经验的领导人，运动没有扩大开来。在（北京附近的）京东县，为了配合保卫苏联活动，我们利用了农民的抗税运动。在满洲，尽管中央做了很大努力，向那里派遣了人员，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而且党受到了损失（两个被派去的同志^②被捕）。原因是：至今党在哈尔滨未做任何工作，中国工人漠不关心（在这里好像同志们犯了错误）。在湖南、安徽、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份，只是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

中央的工作：同志们坚持出版两种半合法的报纸。一种在上海出版^③，一种在香港出版^④。所有大的省份现在都出版定期报纸。还印发许多传单，同志们说，这些传单都是基层组织印制的。《红旗》^⑤每三天出一期。《布尔塞维克》^⑥每月出一期。我们认为，出版和宣传鼓动工作做得较好，并且越来越好。组织工作可以说也是这样。举行了党的二中全会和共青团中央全会^⑦、江苏省军事工作会议^⑧和铁

① 可能指《香港小日报》，出版时间不详。

② 刘少奇和孟用潜。

③ 可能是《上海报》。

④ 可能是《香港小日报》。

⑤ 《红旗》见第635页注①。

⑥ 《布尔塞维克》见第623页注①。

⑦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二中全会，1929年7月在上海举行。

⑧ 指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1929年7月底8月初在上海举行。

路职工代表会议^①。现在在筹备红色工会代表会议^②和江苏省党代表会议^③。这以后打算召开青年工人（工会）代表会议和中央组织工作会议^④。

党和共青团的强有力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和军阀的疯狂恐怖。谁也不知道被捕的人数，因为省里的消息过一个月才能传来。从报纸上得到的印象是，在进行大逮捕。需要估计到，这些逮捕行动不仅涉及我们而且也涉及各个反对派，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归入共产党人一类，在报道中经常把我们说成“反动派”。帝国主义当局把每个被捕者都交给了国民党，这种情况在7月14日以前未曾有过。在7月份有6人被捕，他们是上海邮政业和制衣业罢工的组织者。其中4人在八一前夕被枪决，借口是他们杀害了一名宪兵（谎言），这4个人是汤久芳、陆永生、李有臣和桂福生（音）。其余两个人各被判处15年监禁。8月24日江苏省军事部被帝国主义分子破获，并于同日移交国民党。8月30日有4人，即政治局委员彭湃、杨殷^⑤和“散发传单的共青团员”颜昌颐 and 邢士贞被枪决。第五个人张际春原是军事学院学生，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报纸上报道说，好像他投靠了国民党，虽然现在同志们对他的看法还是很好的。一些省在以匪患和开小差为借口杀人。江苏省军事部的被破获与奸细活动有关。同志们知道谁是奸细^⑥。恐怖和8月1日的失败，正如同志们对我们所说，在党内造成了各种不满情绪、动摇思想，以至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如人们所说，从你们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各种营养

① 关于举行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的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1929年11月7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

③ 指中共江苏省党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举行。

④ 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1930年7月22日在上海举行。关于举行青年工人代表会议的材料没有找到。

⑤ 杨殷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⑥ 白鑫。

(见中央给学生的信^①),他们加强了自己的活动。陈独秀一直是中央的反对派,现在着手出版给中央的信^②。这些信件同时也会落入组织的手里。据同志们说,陈独秀同托派结成了联盟,他们一起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并将自己的活动纳入到这个组织里。安徽市委^③作出了反对中央的决定。上海的一个支部也站出来反对中央。在政治局看来,毫无疑问这是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分子做了工作。政治局公布了陈独秀的信件并作了答复。公开进行了辩论。陈独秀的信无疑是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反苏的。政治局的答复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见附录)。当然,陈在自己的信中相当聪明地抓住了中央的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中央已在你们或我们的帮助下,而且常常是自己主动地作了纠正或正在纠正。从中央派到省里去的同志,认为派他们下去是流放。有各种流言蜚语,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这种现象。政治局的同志有些不知所措。李立三说,中央没有威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④贬低了中央的威信。彭、杨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害,削弱了中央的工作能力,降低了它的威信。彭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很有声望。同志们遴选卢^⑤入政治局,任命罗迈为江苏省委书记。有瞿秋白从你们那里回来的问题,因为需要人从事理论工作。整个这项工作现在落到了李立三的肩上,而他有很大的缺点,虽然他是一个很有活力和能力的同志。同志们常常抱怨财政状况不好。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意见对否,因为不了解开支情况。我和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对占领中东路事件的态度通信》,载《共产国际》莫斯科1929年第48期第43—45页;第49—50期第62—74页;《反对陈独秀和机会主义》莫斯科1930年版,第63—110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⑤ 原文如此。显然是罗登贤。

阿尔诺^①几次要求同志们向你们提出支出报告，但没有结果。为了在全国开展好工作，毫无疑问，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②，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小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国民党在按照好细工作的常规搞暗中破坏活动。国民党学生得到指示，要潜入我们的组织。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打交道理论上好了一些，但又有新的问题，阿尔诺没有钱了，不能及时满足所有人的要求……^③

关于泛太平洋会议^④情况、每个国家的工会状况和工会的任务，乔治^⑤同志专门写了一封信，我在这封信中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中国的政治形势。最近两三个月出现的暂时沉寂局面在结束。国民党关于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革命外交”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所有国家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暂时”还不可避免。它们靠增加在华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暂时”。日本在大力加强自己的占领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报刊试图把这种做法说成是日本对苏军进犯满洲的预防性措施。

英军装备得到了加强，补充了一些新的潜水艇。城市里的志愿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显然指《布尔塞维克》、《红旗》、《上海报》和1929年至1930年间在上海出版的《劳动》。

③ 下面删去关于日本和菲律宾的文件部分。

④ 指第二次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1929年8月15日至21日在海参崴举行。

⑤ 乔治·哈迪。文件没有找到。

军在扩充，只从俄侨中征招兵员。拒绝放弃治外法权和加强军事力量，说明国民党在对外政策上遭到了彻底失败。这次帝国主义者不认为需要像处理关税自治问题那样作出某种让步。帝国主义者也拒绝向国民党提供裁军贷款。

而在对内政策上情况如何呢？国民党关于各省服从中央政府，关于取消一些军阀军队等的种种决定都是一纸空文。没有一个将领执行。国民党缺少财政经费，试图抛弃顽固的将领，但这些将领用老办法在自己的省里聚敛钱财，从而使南京失去了经费来源，南京派到省和军队里的改组人员不能取得任何成果。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甚至可以说已经垮台。省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成员大批辞职。多数辞职者在同蒋介石进行各种交谈后又复职了。

经济状况在不断恶化。中东铁路的关闭特别影响到中国的整个工业和商业。歉收和水灾扩大了闹饥荒的地区。米价从每担 15.5 元涨到 17 元，而且还会上涨。当地的市场容量萎缩了。支付能力降低，货币贬值。这些情况以及争权斗争，致使广州的整个财团和中国的一些金融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起来反对南京。情况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这个反对派集团发表宣言，号召人们支持改组派债卷^①。报刊上不谈改组派的计划和行动。但大家都说，由阎锡山和冯玉祥统帅的多数小军阀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据我们的朋友说，广东（南京）和广西（反对派）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据说，在武汉城设有基地的张发奎是蒋介石的相当强大的对手。反对派在取胜后将推举担任领导人的主要人物是汪精卫。据报载，他已从国外返回。但很清楚，日本是支持阎和张的。而美国则主张南京政府要稳定，因为这符合它的资本扩张政策。这是政治方面，而在经济方面，整个经济危机的重负都落在工农身上。在全国，工资在减少，工作日却在增加。工人不仅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在红色工会领导下开展了进攻性斗争。多数罢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工由于国民党的计谋和恐怖以及我们的软弱，以同意以前的工作条件而告结束。工人很少取胜。罢工常常以企业歇业告终。在天津，日本人解雇了约3万名工人。在上海，每天有一家罢工的工厂关闭，工人被抛上街头。工人的积极性在提高。6、7月份，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上海的发展势头最强大。7月份在上海每天罢工人数达2万人。现在每天有5000到7000人。国民党竭尽全力要破坏这个运动。关闭或（比这更糟糕）改组工会。国民党官吏借助于警察措施实行自己的政策。邮政、兵工厂、铁路工人和城市工人作为国家工人无权举行罢工。未预先取得国民党同意在私人工厂爆发的一切罢工都被认为是背叛，组织者要被逮捕。国民党颁布了新的工会法案^①。这个法案将所有工会都置于行政机关的直接领导之下，并且反对中国工会加入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国民党进行蛊惑宣传。国民党的市党部组织一些人沿街检查谁穿进口布料衣服。一旦发现这种衣服（常常发生在女人身上），首先就要被盖上带有某种爱国主义口号的印章，其次，如果此事发生在租界，那么爱国主义者就会躲开，而如果发生在中国城内，那就会说什么此人在制造中国工业危机。这种工作对帝国主义没有触动，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交易没有任何影响。由于进行这种工作，国民党可以掩饰它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并说它国民党抵制帝国主义商品和帝国主义本身。然后国民党工会、党的部门和政府机关开展一种运动，使中国企业主身边没有一个外国人。在无论属于帝国主义者还是属于中国资本家的中国工厂（满洲省和日本占领区除外），基本上都没有外国工人。这些工厂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师、官员、守卫和警卫的职位。国民党当然要把侧重点放在这些地方。工人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国民党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它试图使他们得到这些高薪而清闲的职位。通过这种手腕，国民党又可以玩弄反帝词藻，而不给帝国主义带来任何损害，同时把积累起来的群众反帝能量

^① 见《工会法》，载《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0年和第2(62)期第22—30页。

引上错误的轨道。

歉收和水灾扩大了闹饥荒地区。陕西、湖南和福建省确实发生了饥荒。挨饿的人没有从当地军阀或南京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救济。美国救济灾民的组织报告说，它可以为居住在铁路附近的3000万灾民提供服务并能就近运送食品。这当然是最低的比例，如果注意到陕西或福建的道路，那就应预计到这种救济甚至未达到灾民的三分之一。这次饥荒和封建主、军阀的压迫造成了农民接连不断的骚乱。农民纷纷参加在闹饥荒省份边界上活动的红军。部分军阀镇压挨饿的民众，同时实行蛊惑人心的政策。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发奎将军从监狱里释放了共产党人。在目前的反对南京的立场上提出了“同样对待所有帝国主义者”的口号，同时还提出了“同苏联友好相处”的口号。南京政府本身考虑到农民对军阀的仇视，匆忙公布了农村自治方案。这个方案兜售警察统治制度，给农民定出比现在的部分军阀政权更加严厉的规章，把所有农村都交由政府指派的官员统治。但是，一方面是目前封建主、军阀和豪绅对农民的压迫、这些农村压迫者的肆意妄为和骇人听闻的镇压等，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做工作，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这个方案会得到农民的一定同情，他们会把这种虚伪的农村自治看作是对封建主、军阀和豪绅政权的摆脱。惟有我们做解释工作，惟有我们组织农村贫苦农民同一切压迫者，即无论是封建主、军阀和豪绅，还是国民党人作斗争，才能抵制这种欺骗性的方案……^①

中国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二月来信的决议^②，我们早就连同我们的意见和与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出的印象给你们寄去了。同志

① 下面删去关于日本的文件部分。

② 指中共中央于1929年5月15日发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的第37号通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26·144页）。

们对7月农民问题来信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需要对列宁如何使用“整个农村”一词作一些说明和回答同志们的问题，“如果富农同军阀和封建主作斗争的话”。最主要的问题是把富农分成半封建主和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上，李立三想约定同资本主义富农在一定时期的共同利益。但在作出简短的说明后，他完全同意了你们的信。同志们答应写些弄清问题的短文。现附上政治局最初的决议案和同志们所接受的我们的修改意见^①。同志们报告说，最近从你们那里又回来26名学生。这种不事先通知派遣学生的做法，使同志们感到有点不安。最好你们事先电告，为什么派遣这些学生。

最后是我们的工作。6月以前，我们奉你们之命做中国和日本的工作。但是同日本关系断绝后，我们不得不只做中国的工作。我们知道这很不好。但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我们的过错。为了做菲律宾或爪哇的工作，需要到那里去。可是中国这里的事情不允许我们离开。最初要结束与共产国际来信有关的事情，随后要筹备全会，再后是8月1日和中东路问题，还有泛太平洋会议。这占用了我们每个同志的时间，当然不是全部时间，但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需要频繁地同中国人会面和举行我们的会议；在中东路问题上，我们以你们的名义发表了宣言。并已及时电告你们。后来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反帝同盟都发表了宣言^②，党和共青团也发表了宣言^③。在出版的泛太平洋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通讯^④中发表了文章。这些通讯有相当大的数量散发给了国内外的外国报纸，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冲突的宣言，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29年8月13日第1742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军阀掠夺中东路宣言》（1929年7月17日），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1985年版，第287—289页。

④ 指《远东通讯》，1929至1930年和1932年在上海出版。

并译成了中文。菲律宾、新加坡的报纸转载了所有重要文献。在中东路问题得到某种解决后，我们将做其他国家的工作。我们将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同日本取得联系。但我们当中谁也不去那里。不过需要去菲律宾和新加坡半岛。

又及：我们向这里的党通报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和共产国际本身的情况的工作糟糕透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全会在7月举行，而刊载决议的《国际新闻通讯》^①我们在9月19日才收到。同志们，我们在帝国主义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电报（布哈林被开除、伏罗希洛夫辞职、斯大林生病等）。我们知道这些消息当中哪些接近于真实，哪些属常见的谣言。但是在通报情况时，不能凭直觉，而必须依据事实。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一般邮局寄出或托人带来的信息，到我们手中常常是雨后送伞。如果信使每月来一次，肯定有助于改善通报工作，并且你们会及时得重要消息和材料，而不是过了几个月才收到。

最后一刻，我们收到材料说，当局决定消灭……^②。朋友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道路。

帕维尔^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35—137；139—14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国际新闻通讯》柏林 1929 年 7 月 23 日第 63 期，第 1485—1514 页；1929 年 7 月 26 日第 65 期，第 1531—1537 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H. A. 雷利斯基。

176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9年10月3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中共政治局委员^①

亲爱的同志们：

我给你们寄去两个文件。一个是论陈独秀书信的一篇文章^②。应尽快在《红旗》^③第一版上刊出。不要在文章结尾加任何署名。也不要提及这是代表团的文章。

第二个文件是代表团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决定^④。这个文件只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不得在党报上发表。应仅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在指导我们的策略时参考。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谈我们的策略的部分。这个部分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代表团竭力让你们注意到，你们不应同自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苏联的朋友的军阀进行任何交谈。如果这些军阀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那么他们就应接受我们党的全面领导，并应公开宣布这一点。而如果他们只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拥护者或者是蒋介石的反对者，或者是改组派的拥护者，那就要同他们这些中国劳苦群众的欺骗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在这些军阀统治的省份，我们党应该发展群众性的工农组织。建立各种群众

① 文件上有批注：致莫洛托夫同志。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红旗》（见第635页注①）。

④ 见附录。

组织。提出解除军阀部队武装，取消封建主、豪绅和地主卫队的要求。

解除警察、宪兵和狱卒的武装。释放所有被逮捕的人，而不仅仅是共产党人。逮捕所有封建主、豪绅、地主、富农和军阀。农民不必交税。要把这些捐税重负都加到有产阶级身上。工厂要实行8小时工作日。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无需征得任何人同意，无论是工长、工厂主还是当局。在所有工厂你们都要组建红色工会。甚至在存在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工厂里，在有一定数量工人未参加工会的地方，你们都要组建红色工会。你们要组建工厂委员会。要举行工人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代表大会。要建立工会、农会和农业工人协会的市、县、省领导机构。你们要要求所有贫苦农工都武装起来和解除封建主、豪绅、地主、工厂主、工长、黄色工会首领、国民党人和改组派的武装。现在要派人去做这件事。你们必须做这件事。要想方设法利用做群众工作的机会。要保存并向改组派隐蔽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和支部。应该派专门的同志去做群众工作，而不是整个组织做这项工作。

你们要力求译好这些文件。在最近的会晤中，同志们应该对我们说，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致同志式的敬礼！

奥斯藤^①

[附录]

中国的现状

1. 在帝国主义者当中

美英关于海军装备的谈判虽然没有任何实现的基础，但还是不

^① 11. A. 雷利斯基。

能不引起日本的不安。美国同英国取得的任何哪怕是无关紧要的一致意见，对日本的舰队和商船队都会有威胁，因为现在日本在同两个各自单独行动的竞争者打交道，美英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它就会面对暂时进行一定配合的对手。

美国在中国的扩张对日本来说越来越危险。美帝国主义的顾问几乎完全控制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财政、工业、陆军、海军，以至驻外部门都是在美国顾问的直接监视下工作。出于共产党人都清楚的想法，美国的扩张在满洲省份或在满洲附近省份进行得特别猛烈，直接与日本占领区发生了冲突。虽然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在这两个帝国主义者之间，以及在所有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任何绝对的差别，虽然所有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协同进攻中国劳苦民众和进攻苏联，虽然中共在自己的工作中像反对所有反革命力量集团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帝国主义者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和可能由此而发生的争斗。由于出现中东路问题，帝国主义者之间一直存在的冲突加剧了。日本自己也像美国、英国一样参加了反苏联盟。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不是谁参加解决远东问题都是一样的。解决中东路问题对日本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所以日本尽力迫使南京政府和奉天政府在日本政府领导下进行活动。但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不能同意日本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垄断立场。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

2. 在军阀当中

无论是联合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小的军阀集团还是大的军阀集团，以及单独进行活动的右翼军阀集团和左翼军阀集团，都是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同盟者和支柱。每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同盟者和走狗，不仅在军阀当中有，而且在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当中也有。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军阀集团，它不可能是统一的，而是分裂成受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领导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经常进行争夺势力范围和政权的战争。虽然在这些战争中常常不无

中国资产阶级、豪绅和封建主各个阶层之间地方利益的冲突，但它们往往带有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性质。因此在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和它们所支持的军阀的情况下就谈不上中国的统一。

但另一方面，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迫使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了某种手腕，向群众掩盖中国的现实情况。这种手腕就是建立所谓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从来不是中央政府。它连国家的任何一个生活领域都没有统一起来。在一些省份仍然是在一些重大行动上听命于纽约、伦敦或东京的军阀、豪绅和封建主执政。广州起义后，帝国主义者帮助军阀欺骗中国民众也要了一些花招。这些花招就是关税自主^①、从青岛撤出日军、英国军事法庭惩治杀害中国人^②的英军士兵和帝国主义关于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等作出一些修改的含糊许诺。在这些欺骗性的花招中美国起了主要作用。然而就是不时搞的一些欺骗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也是不利的。最近，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对南京政府说，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应该保留。这种拒绝修改的做法，给了掌握着对外政策的蒋介石集团的对外政策以致命的打击。几乎与此同时，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没有执行它关于裁军、一些省份隶属于南京和让阎锡山和冯玉祥出国的决议。伴随内政外交上的这种政治失败，南京的经济发生了全面崩溃。在帝国主义唆使下，南京占领了中东路，因此同苏联的关系紧张起来。帝国主义需要中苏关系紧张，一是为了把中国军阀拉入反苏同盟；二是为了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中国。帝国主义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中国军阀撕毁了同苏联在1924年签订的中东路条约，逮捕了几千名苏联公民，捣毁了所有苏联政治经济机构，向苏联领土发动军事进攻，为此在中国和在苏联组织了俄国

① 详见阿亚克斯：《中国的关税问题》，载《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莫斯科1929年第6期第78—88页；第7期第86—89页。

② 指审判杀害中国商人张学良的列兵 T. J. 普赖斯。

反革命力量。苏联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所有建议，中国军阀都抛弃了，他们完全受帝国主义者左右，希望帝国主义者武装干预这次冲突。由于中国军阀的过错持续存在的中东路冲突，有可能造成中国工业和商业的彻底崩溃。所有中国银行、工厂和商业都限制了自己的业务活动。资金明显不足，出口和国内市场萎缩。在海参崴和哈尔滨之间运营的中国轮船公司遭到了彻底破产。在全国也可以看到频繁的破产现象。在中东路上和与中东路有关的工业部门工作的中国工人拿不到工资，也未得到政府的任何救济。仍在工作的工人，由8小时工作日变成了12小时工作日。工资减少，而且不及时发放。中国农村的封建军阀关系造成了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饥荒，今年席卷了约1亿人口。所有这些引起了各居民阶层对南京政府和今天执政的国民党集团的不满。金融资本家和商人要求撤换政府人员和降低捐税。军阀要求过于严厉的独裁者蒋介石辞职。农民参加了反对封建主、豪绅、地主和军阀的游击战争。城乡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建立红色工会，等等，并在中共领导下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发动做组织准备。上述情况是拿国民党政府的命运作赌注。

3. 政府变动的可能性

国民党政府辞职或其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某些人士的变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能力说服部分军阀或给他们钱。金融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拒绝支持裁军债券，同样帝国主义者也拒绝向国民党提供贷款。这就预先决定了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命运。下面只谈谈政府变动的方式和它的人员组成。

4. 是靠战争解决政府变动问题还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预计到，政府变动问题必定要靠战争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以下看法：虽然中国城乡资产阶级的部分阶层和军阀，对一些省份的控制出现危急而产生了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些主宰

者都是受帝国主义者操纵的力量，所以要预计到，关于中国未来政府问题的主要斗争将会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激烈展开。近半年来脱离阎锡山和冯玉祥控制的、与日本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军阀集团，最近在大肆进行活动。军阀中有声望的张发奎将军转到了他们方面。南京军队总监、蒋介石的右手胡汉民将军提出辞呈。有传闻说，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发奎同改组派和在中国富裕知识分子当中有一定影响的汪精卫达成了协议。这些计谋有理由可以相信是真实的，并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作出了努力。另一方面，今天执政的蒋介石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美国人参与了许多国家企业项目，如铁路改造、建立空中航线、派来凯默勒委员会^①等。法国人以贷款形式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同苏联作战用的飞机。英国人在没有拿到钱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钱为南京建造了军舰。此外，英国人还同南京签订了关于水兵学校、关于外国租界人行横道等一些协议。美英帝国主义者要能保证自己能够参加解决中东路冲突。这种想法为政府的和平变动造成了困难。在这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每个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的拥护者执政，并在冲突过程中尝试收买一些军阀和阶层。除帝国主义者之间利益冲突外，蒋介石集团的利益也逼迫它不战不退。如果另一个集团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目前的主宰者离开国家的钱柜和部分地离开帝国主义的钱柜，随之会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境，甚至把这个集团抓起来。而这个集团的自卫行动要求它武装防御正在进攻的集团。

5. 什么集团将执政？

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迫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让在群众眼里尚未威信扫地的领袖们的新集团执政。汪精卫很有可能掌权。但是他的政权将只能是虚构的。各省仍将由一些军阀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庇护者控制。中国劳苦群众今后将遭受军阀、封建主、地主和豪绅的压

^① 委员会准备了改革中国金融体制的建议。

迫，而全国将成为帝国主义者之间为解决帝国主义利益的新办法而进行争斗的场所。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铁路、水路和空中交通的控制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新政府毫无疑问将会使用关于保护中国劳苦群众、关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和关于同苏联友好等蛊惑人心的词藻。将会发表大量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劳工法等等的宣言、呼吁书和许诺，但所有这些将只能是空话和对劳苦群众的欺骗。与此同时，新政府将同工农革命行动进行无情的斗争，将迫害革命组织，而针对中共则要采取一切手段来消灭党的积极分子和削弱我们对日益高涨的革命的领导。

中共对正在发生的事态的态度

正在发生的事态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党目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和中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所有军阀集团和国民党集团都是中国革命的压迫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对它们要进行无情的揭露。要在工厂和农村组织和领导日常工农争取实现部分要求的行动，并把这些行动推向更高的水平。要向群众说明同压迫者的斗争和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全国进行这样的工作会加强党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当中的影响。党因此可以扩大自己的组织基础。这项工作使党更有可能通过吸收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加入党的队伍来实行党的无产阶级化。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日常斗争和通过向工农指出所有国民党集团和改组派都言行不一来无情地揭露这些集团，可以保证党成功地领导群众的革命发动，同帝国主义、军阀和所有中国资产阶级阶层作斗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我们党不能对发生的军阀战争进行任何军事干预。不能同自称是我们的同情者或者是苏联的同情者的军阀签订任何协议和向他们作出任何许诺。不能给予这些军阀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红军仍然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农民不受军阀、封

建主、豪绅、地主和富裕农民的伤害。一旦在靠近苏区和红军的农村发生农民暴动，苏区政权和红军应当采取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予支援。

鉴于汪精卫政府可能成为现实，党在目前时期应把最大注意力放在揭露它的蛊惑人心的做法上。存在着这种危险：汪精卫可能在劳苦群众中得到一些同情，同样在我们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集团中也会得到一些同情。只要我们揭露他，只要他的漂亮话同行动不一致，就会很快消除某些劳动者阶层对汪精卫的幻想。除揭露汪精卫和同所有其他派别作斗争外，今后党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保卫苏联。和平解决中东路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减弱我们对帝国主义准备对苏战争的注意力和我们的工作。

在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12周年纪念日之前，党应该广泛宣传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工农国家。党和红色工会应该号召中国劳动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去苏联。不言而喻，这场运动应同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党在11月7日的主要中心口号应该是：

十月革命12周年万岁！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万岁！

打倒策划的反苏战争！

阶级斗争万岁！

全世界劳动人民武装保卫苏联万岁！

世界的十月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和地主资产阶级集团！

工人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到苏联去，他们将看到没有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帮助工农如何管理国家。

联共（布）及其中央万岁！

中共和红色工会万岁！

全世界革命司令部——共产国际万岁！

除了这些口号，还应加上根据地区、工厂、农村、兵营和学校

情况提出的当地口号。

鉴于中国军阀战争连绵不断，所有重负都落到城乡劳苦群众身上，党应该举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周。为此，最合适的时间可能是从12月4日到11日这一周，因为这个时候是广州无产阶级起义两周年。在12月4日以前的时间里，党要在工厂、城市、庄园、农村、学校和军阀军队中做反对军阀和军阀战争的准备工作，同时以阶级斗争与之相对抗。在此期间，党应该印发专门的传单，在党和工会的报纸上刊登含有关于军阀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的捐税和各种款项的数字材料的信息。在每个工厂、庄园、农村、学校和部队都要举行群众大会、集会或专论反对军阀战争的演讲。在这些集会、群众大会和演讲会上应从广大群众当中选出同军阀和军阀战争作斗争的委员会。从12月4日到11日，这些选出来的委员会要组织罢工、示威游行，要举行这些委员会的省和中央代表大会。工厂工人应该到农村和部队中去，相反，农民和士兵应该到工厂中去，一起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等等。所有这些都应同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日联系起来。广州起义应该作为同帝国主义、军阀和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例子来广泛宣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79，第 19—29 页。

打字稿，副本。

17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录)

1929年10月7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你好！

……(2) 中国将出现麻烦。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士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入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

紧握手

斯大林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书信（1925—1936）》第167—168页。

1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2 号（特字第 100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10 月 15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9 年 10 月 9 日

听取：36——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5 日会议第 101 号记录，决定：15）。

决定：通过由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的指示草案^①（见附录）。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102 号
记录，决定：36 附录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指示
（1929 年 10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请电告中国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游击运动）的状

^① 根据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5 日的决定，参加委员会的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B. M. 莫洛托夫、K. E. 伏罗希洛夫、Г. K. 奥尔宗尼启则、Л. M. 卡冈诺维奇、Л. З. 曼努伊尔斯基、A. C. 布勃诺夫和 П. A. 米夫。

况、党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张发奎和改组派行动的方针。我们的初步指示是：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利用已经爆发的军阀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政治经济状况的普遍恶化。在反动政权明显削弱和群众运动日益高涨的地区，你们要组织革命的职工运动，尝试摆脱地下状态。你们要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你们要尽最大努力靠军阀部队，即解除他们队伍的武装，掌握他们的辎重车队来把自己的力量武装起来。占领和驻守军阀放弃的地区。力求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其基本任务是：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成立苏维埃。你们要争取把我们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的游击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尽最大努力通过报纸、传单、呼吁书和口头宣传来揭露国民党各个派别的反革命性质。党必须动摇统治本地区的任何军阀集团政权。同时要把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主要斗争矛头针对试图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的左翼国民党人和改组派。你们要坚持不懈地揭露改组派的虚假民主、骗人的反帝口号和土地口号。他们反对蒋介石独裁，只不过是实行其他军阀的独裁。我们认为党内特别危险的，是削弱同改组派作斗争的倾向，错误地把他们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贬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作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指靠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工农独立斗争。要特别重视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努力开展政治罢工。

政治书记处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7，第 167、178—18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1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9年10月24日于上海

绝密

米价的日益上涨、减少工资和延长工作日的企图，对工人骚动的加剧是有影响的。在工业中心城市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已经举行了工厂代表会议。11月7日将召开中华全国职工代表会议^①。在奉天兵工厂，在沪宁铁路线上和在扬子江水手当中可能将举行罢工。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有25000名“造反者”参加。围绕中东路开展的运动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希望有所改进，要利用整个形势。你们要干预，要使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同中国人取得联系。

歉收、饥荒和军阀战争的压迫对农民产生了革命的影响。在距上海200里的常州市，农民举行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在同警察的搏斗中，有一名示威者被杀害，3人受伤，多人被捕。在江苏、广东、江西、湖北和广西等省正在开展游击战。红军在进攻。

在芜湖和宜昌^②的军阀军队中发生了动乱和暴动。据情报说，驻扎在满洲里附近由郑长生将军统帅的整个第一炮兵师倾向于我们。你们要同他们取得联系。

我们在各个方面正利用很好的客观形势，开展独立的群众运动。

①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见第714页注②。

② 宜昌为估译一译者。

还在你们来电^①之前，我们就已经作出指示，要组织红色工会、农民协会，出版合法和半合法的报纸，武装农民，解除地主和封建主卫队的武装，加强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我们向所有重要的和已经开展运动的省份派遣了指导员。但是由于党在组织上的薄弱和警察的不断镇压，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利用形势。警察的活动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也涉及代表团，但它仍在进行会晤。

给你们捎去我们的报告。11月中再给你们寄去新的消息。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4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说的是第 178 号文件。

1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1929年10月于上海

秘密

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远东局在研究和讨论了提纲和关于辩论的通报之后,一致作出决议,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①是正确的。远东局认为,最近一年间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分析的正确性,并证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远东局重申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评价,认为这是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开始衰败和帝国主义的主要内外矛盾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无疑会直接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导致殖民地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加剧。远东局认为,六大之后时期,原则性矛盾已加剧并且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世界大战的威胁临近了,由于有英美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所决定的扬计划^②,这种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提纲、决议和决定(1929年7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② 指在美国企业主O.扬领导下制定的收取德国赔款的计划,该计划规定降低年度赔款数额,取消对德国经济和财政的各种形式的国际监督。

战争威胁的前提有了更清楚的形态。同时远东局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对抗而出现的最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者准备摧毁苏联。世界资本主义仇视苏联以实行五年计划所体现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仇视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众对苏联的支持的不断加强。远东局还完全同意关于不能在工业部门建立和睦气氛和由于民众的贫困化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市场问题将更加日益尖锐化的评价。远东局认为，在很广和更大的范围内采用合理化建议，只会加深资本主义的这些基本矛盾，扩大普遍失业现象，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为阶级斗争的加剧造成前提。远东局坚决反对“调和派的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在日益缩小，可以组织国内市场，而无政府状态只能在世界市场上存在”。同样，远东局赞同第十次全会的如下声明：“伴随着这些事件，政治反动派也会得到加强：国家机关和资产阶级将法西斯化”。“在有强大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法西斯将以社会法西斯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高涨的评价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种形势是由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矛盾尖锐化造成的。

远东局完全赞同第十次全会对“资产阶级与加入第二国际的党公开进行合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掌握政权”的原因的看法。它同意对它们的“成就”作出的分析和全会得出的结论，即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会给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产生深刻危机创造条件”，“表现为左倾化进程加快”，“给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造成有利前提”，并迫使共产党加强反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及其所谓“左翼”的斗争。

远东局一致认为，“国际无产阶级明显表现出来的左倾化和革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是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出现的新现象，这种现象“向各国共产党提出，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是直接面临的时期的最主要问题”。同样，远东局赞同对柏林无产阶级五一行动的评价和

对失败主义者和叛徒的所谓这次行动遭到了失败^①的论调的驳斥。

远东局同全会一起“满意地指出，在过去一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影响扩大了，各支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得到了加强，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支部清除了机会主义分子”。远东局同意，根据提纲中阐述的理由，“共产国际在党内政治方面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再有，远东局赞成这样的评价，认为“调和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原则问题上堕落到了右翼方面，并在共产国际中扮演了右派的角色”，成了“一切失败主义情绪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喉舌”。远东局认为，全会向调和主义者提出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全会完全正确地声明说，“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也有必要进行更有力的反右倾的斗争”。这种观点已被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并在远东局本身的实践中得到了运用。

远东局完全同意所有其他决议，包括同意“集中一切力量完成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和顺便“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工贼作用”的号召。远东局赞同全会“重申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关于解除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和“解除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职务”的决议。

远东局不仅保证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的这些决议，而且要在它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特别是在反对中共中机会主义危险和倾向的斗争中执行这些决议。中共在非常复杂的政治形势条件下领导着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它掌握着产业工人十分敏感的阶层，并在同各种民族改良派打交道，它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党的领导长时期认定，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业阶层和资本主义阶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意见分歧。对富裕农民的态度和把富裕农民分成封建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的倾向同样都是错误的^②。在最近的军阀斗争

① 详见 C. 古谢夫：《柏林的五月日子》，载 1929 年 5 月 22 日《真理报》。

② 详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82—185 页。

期间，政治局中有这种倾向，认为广西军阀俞作柏是建立革命组织自由、出版自由等的拥护者。广西省委没有及时得到政治局的明确而正确的指示，同俞作柏就在他的军队中的工作问题和他取胜后的前景问题进行了谈判。根据这次谈判，省委向地方组织发出通电，要求举行支持张发奎和俞作柏结盟的群众运动，声称如果这个联盟建立不起来，我们党就着手组织独立的游击队^①。

一些同志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似乎在存在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的企业里，无法建立红色工会组织。这些同志不明白，这种态度会给逐步取消红色工会准备基础，因为毫无疑问国民党和它的所有组织都会努力组建自己的工会。上述所有偏离党的总的来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倾向都是暂时性的，而且过去也是这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党中央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这些倾向。

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关于中东路问题，他给中央写了几封信，还散发到党的基层组织^②。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反对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就此问题由党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陈独秀以所谓中国工人在政治上不成熟和不理解这样的口号的这种机会主义理由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的左翼国民党观点。取代保卫苏联口号，陈独秀提出了苏联和现中国政府共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口号。陈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拒绝承认党的机构的决议，拒绝参加党的工作。陈独秀和他的拥护者的错误不是暂时性的，相反，它们还在沿着反共、反党方向发展。因此，陈和他的拥护者只有在承认和纠正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正确性并接受和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715 页注②。

远东局要同一切右的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要这样做，并且要帮助党掌握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从党的队伍里清除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80，第 17—21 页。

打字稿，副本。

1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9年10月于上海

致中国共产党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远东局提请中共政治局注意我们工会工作的严重状况。我们确信，在实行党的总体上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会工作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工会组织中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确实，党善于激发普遍的积极性，群众和学生的示威游行、广泛散发材料的行动、飞行集会、就英国士兵杀害张学良事件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等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些场合党对工人的要求产生了影响，参与领导了一些罢工行动，但我们未能在工厂、船坞等地方的工人当中扩大这种普遍的积极性并取得组织方面的成果。

客观情况，即土地问题尖锐化、军阀冲突、财政危机、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受压迫、粮食价格不正常、中央政府内部争执不休、军队不复员等，对我们是有利的。再有，以下情况对我们的工会工作也是有利的：

群众运动尽管近两个月来有所减弱，但仍在继续；诸如罢工行动不协调一致等很明显的缺点，对工人斗争有严重不利的影响，还应加以克服；大部分纠纷都是以失败或顶多以妥协而告终。罢工工人几乎一直都去找国民党，因为罢工失败的责任完全在它身上；国

国民党仍然试图取缔除官方的国民党工会之外的所有工会；禁止罢工；否认铁路工人、海员、政府职员、邮电职工，市政职员和公共企业工人有权建立组织；甚至在地方当局是由“左翼”国民党领导的地方（如天津、青岛、唐山等地），也采用了警察镇压手段；天津编草席^①工人和电车工人罢工后，改组派向帝国主义作出道歉；“左翼”国民党在唐山逮捕了那些不接受改组派提出的妥协意见的矿工；最后是包工头的苛刻条件和敲诈勒索行为——所有这些情况和很多其他情况都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很好基础，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指出可以用来消除所有这些现象的策略。

我们的情况怎样呢？尽管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丝织工业部门工作，但是在没有我们的同志的工厂发生罢工，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未能把工人联合起来，哪怕是在罢工期间，或者阻止他们去找拒绝听取他们意见的国民党。我们甚至建议让工人去国民党党部，要求说明“为什么国民党逮捕工人和叫警察来镇压工人？”当工人参加了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组织的工会的时候，我们在组织红色工会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证明有人还不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在罢工期间没有成立任何工会组织，工人遭到了失败，按照上海市长^②的命令复了工。我们不能指责工人不理解罢工策略或组织方法，因为他们做了自己的事情，举行了罢工，尽管他们参加了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组织的工会，并且他们不顾反对举行罢工的决定。罢工行动因准备不够和领导不力而遭到了失败，尽管有一些同志曾试图同罢工者保持联系并被逮捕。但是不只是罢工遭到了失败，而且我们的所有建议在冲突过后也没有实行，因为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建议有什么结果。码头工人罢工可以说也是这种情况。罢工时工人又直接去找国民党，要求帮助反对受贿的“领袖们”。确实，

① 原文如此。

② 张群。

码头工人没有得到国民党帮助后，对国民党怀有敌对情绪，甚至赶走了“左翼”国民党人。但这只是证明形势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可以作出判断，争取释放被捕同志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继续下去，也没有为被捕工人家属进行募捐，这样做本来可以作为同码头工人保持联系的一种手段。在上海工会联合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楚^①同志报告说：

“江苏省区委的一名负责同志说，我们要派一些同志去帮助罢工工人，但另一名同志说，这不需要，因为我们希望罢工工人能自己对付得了。现在情况是这样，群众可以进行罢工，但他们没有有本事的领袖。当他们来到国民党市党部提出自己的要求并要求在两天期限内作出答复时，市党部回答说，期限太短，至少还需要一周时间。对此工人中谁也不表示反对。当他们要求释放20名被捕工人时，国民党说，将释放18名，而不放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那两个人。对此工人也表示同意。”

这表明，区委领导机构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没有一致的意见。工人所犯的错误并不那么重要，但这些错误突出说明有必要在工会组织中做基本的党的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明显的缺点。

再拿缝纫工人罢工（在罢工中我们进行了很好的斗争）、印刷工人和药业工人罢工来说，在这些罢工中，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背叛了罢工工人。说“到处都发生了背叛行为”和满足于谴责怯懦或背叛行径，这是不够的。要看一看，在我们的工会工作中，还有没有其他缺点，由于没有对同志们进行认真的挑选和监督，会使一些软弱、不坚定的同志占据负责职位，之后经不起我们敌人的诱惑而成为叛徒。在天津、青岛和唐山，尽管群众的战斗情绪高涨，尽管国民党改组派叛变，正如报告所说，我们同这些冲突却很少有直接的联系。

① 音译，何人不详一译者。

我们收到的关于矿工罢工的报告是一部令人伤心的中篇小说。根据报刊上的报道判断,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的同志对矿工的要求有影响,但我们的调查者^①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报告了什么呢?他说:

“到了唐山,我立即召集我们的铁路职工和矿工同志讨论进行斗争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但由于情况严重和我们的同志力所不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们的多数同志对黄色工会漠不关心。”

拿派到南方去的调查者^②的报告来说,他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说:

“后来我出席了区委党和共青团书记参加的党和共青团联席会议。我同区委的一些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请他们举行海员总工会会议、工人代表会议和最重要的党的工业小组的特别会议。他们很情愿地同意了我的请求。但使我感到很惊奇的是,我在几天里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我去了区委,他们对我说,海员总工会会议再过几天举行,让我耐心等待。又过了几天,对海员总工会会议还是没有做任何安排。我很失望,但没有办法。区委找各种借口欺骗我。一些人说,没有合适的开会地点,另一些人说,他们很忙。最后,我气愤地说:“请告诉我真实情况。”他们无法再骗我了,对我说:“海员总工会已解散。我们怎么召开它的会议?”这使我感到惊讶,我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解散海员总工会。谁把它解散的?”他们回答说:“苏兆征同志死了,而……同志在坐牢。海员总工会是自行消亡的。”

1929年6月底,关于上海海员运动的年度报告说:

“至于组织工作,只能很悲观地说一说。由于缺少集体领导和能干而积极的分子,我们只招募了一些失业海员。没有稳定可靠的组

① 何人不知。

② 何人不知。

织。这是海员运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所报告的年度里，我们仅在秦记（音）。公司的一艘轮船上组织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小组。现在我们同这个小组没有联系，因为这艘轮船未来上海。9月，我们在爪（哇）日（本）中（国）公司的两艘轮船上招募了两名成员。就这些。”

我们认为，这些报告指出了很严重的情况，这不同程度地在全国都存在，不只是在唐山或华南，这个问题是纯党内问题。客观情况对做群众工作是有利的，尽管存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各种困难，而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狭小。只有通过为群众中做更有力的具体工作，才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从你们自己的报告中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实我们的论断，但上面举出的具体事实足以使人相信情况严重，对于开展我们党在工会中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并会导致我们的状况在最近几个月越来越恶化。

正当我们自己的队伍是这种状况时，国民党工会官僚的力量却在加强，尽管他们有许多不利因素，其中主要的不利因素对于改良主义来说是经济基础薄弱。虽然我们在对形势作政治分析时不能忽视上面这个情况，但是不能指望这个因素会影响改良主义的发展。还有另一些因素，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在事情涉及到帝国主义企业的情况下，国民党可以发展工会官僚，领导罢工，并在一定时间内利用反帝口号，“举行”罢工，当工人遭到失败并再次复工时，他们又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背叛行径。他们甚至可以取得企业主的一些小的让步，这种让步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官僚机构。然而，如果我们党在工厂里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在上海，国民党成立了自己的上海市总工会，并且不无一定成绩。通过工会登记，他们逐渐扩大了这个组织。他们不仅在上海这样做，有消息说，在其他中心城市也是这样加强工会官僚的，最近来自广西的报告^①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① 文件没有找到。

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尤敏^①同志报告说：“在北方，黄色工会对群众的影响很强大。不参加它们会议的工人要被罚款。同时，黄色工会官僚（改组派）同工长和原来的党员一起组织工人和领导他们的斗争。不能说，黄色工会在群众中没有得到支持。”关于黄色工会在（广西）梧州的发展情况，我们的同志报告说：“工会进行了很好的改组，并采取措施成立了梧州总工会。”报告指出，我们的工会都“垮了”，“国民党任命了领导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报告计算国民党工会在各工业部门的会员数字为10090人。这个报告指出，在南宁和柳州，由于实行白色恐怖，可以看到大致同样的情况。在来自云南的关于工会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大多数工会是黄色工会，名义上存在三种工会的总工会，不进行任何经济斗争”。

其他许多报告指出了黄色工会在各省的发展情况，报纸上无可争辩地指出了通过成立这样的工会和总工会对群众实行官僚主义领导的集中化。根据黄色工会近几个月来的这种发展情况，我们的阵地变得更弱了，因此必须揭露我们的一些错误和不正确的倾向。

我们不详细来研究指示中含有的所有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只指出两个严重错误。8月就俄中冲突给红色工会发出的指示^②中说：“如果发生战争，中国将是战场，工人状况定会恶化。”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应该直接说：保卫苏联和反对中国军阀及其帝国主义主子进攻苏联是争取最好生活的斗争。该指示的表述法会造成和平主义，而我们指出的表述法，在对其作出必要的说明情况下，会导致斗争。在标明9月22日发出的关于军阀战争的第12号通告中，列举军阀如何对待工人的例子之后说：“工人若反抗，那就会立即被杀害。”这样的表述法会影响斗争，在心理上起压抑作用，虽然是旨在揭露军阀。我们的任务是阐述能使工人进行反击的组织形式和有分

① 音译，何人不详一译者。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寸地进行宣传，向他们说明，只有通过有组织的行动，工人才能阻止军阀对他们的压迫和屠杀。这种方法可以激发积极性，而上述方法会造成垂头丧气和俯首贴耳。

现在我们来看看全会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①对群众运动的过高评价。这个决议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其中有一些条款，在全会期间我们远东局曾提请委员会予以注意，这些条款需要作修改，在我们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中，我们说群众运动在发展并指出了我们党的错误。我们的条款中有很多条款纳入了党的最后决议案，但关于自我批评的条款没有纳入。在党的决议中有以下字句：

“罢工浪潮此伏彼起。经济斗争迅速转为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工人群众直接攻击国民党。我们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成了群众斗争的主要口号。”^②

事态发展表明，这种夸大的说法，可以说明一些同志在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试图成立战斗的阶级工会，（客气地说）缺少在黄色工会中做工作的激情。除此之外，全会决议中的这种夸大说法也含有矛盾和悲观主义成份。决议说：“群众在中国革命失败后还有恐惧心理，不敢直接进行斗争”，并且“党不能领导群众斗争和加快瓦解和动摇黄色工会官僚”^③。在这里，我们在一个文件里看到了三个极端。除了其中的悲观主义外，所有三个极端都是绝对错误的。群众运动尽管有恐惧心理，但还在继续，并且将继续下去，但它缺少组织性和领导者，而这些只有我们党能够也应该提供。这样

① 见《中共二中全会：职工运动决议案》，载《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0年第3（64）期，第89—115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76—321页。

② 见《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研究所通报》第3（64）期，第90—9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79页。

③ 见《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研究所通报》第3（64）期，第9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80—281页。

做会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只有我们党能够适当地领导群众。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提高积极性加强党的领导。说黄色工会在瓦解也是不对的，因为虽说它们的会员数字是夸大的，但还不能忽视它们的官僚主义团结。这一点应该是所有领导同志都看得很清楚的。只有我们党积极进行活动才能够瓦解黄色工会和提高群众运动的发展速度。

这样的矛盾在江苏区委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①中也存在。上海的群众运动情况怎样呢？在5月到8月的四个月间，发生75次罢工，有54757名工人参加，而在1928年的这四个月间，发生了34次罢工，有72568名工人参加。由此可见，虽然在所说的1929年的月份，多发生41次罢工，但纠纷数量的增加却造成了罢工人数的减少。如果注意到1928年罢工占用880557人日，而1929年在同一时期只占用323393人日，情况就得更糟糕了。将这两个数字加以比较表明，1929年的罢工持续时间都较短，这可以说明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活动有所加强，而我们有组织的力量比较弱。这证明情况严重和有必要更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积极性和更富有同情心地对待纠纷和局势等。我们列举出上海的这些情况，不是要对群众积极性的总的高涨趋势提出异议。其实在中国北方，在上面指出的城市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正如你们自己的报告所说的，运动不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上海，我们的力量最强，但不得不根据事实指出，我们的阵地确实比较薄弱。我们可以看到，客观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而我们没有利用所有机会。我们看到黄色工会活动更积极了，群众对国民党没有表现出失望情绪，虽然他们本能地得出了正确的思想，因为不久前在上海和广州，就连国民党工会也向“中央政府”递交了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的请愿书。这证明远东局作出的指示是正确的，但没有得到执

^① 文件没有找到。

行。

党的全会过去三个月了，会后我们立即建议：1. 向党的支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小组发出关于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指示信；2. 起草通告，说明如何组织工厂委员会，它们应该起什么作用；3. 发表全国的直接要求的大纲作为我们所有政治经济要求的全国基础；4. 在所有重要中心城市成立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来领导群众工作；5. 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过去我们在那里影响最大并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部门。但是除了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有所改进外，没有任何指示要求实行我们的建议。

拿行动与要求大纲来说，它是远东局根据政治局代表^①的建议制定的，但是从中华全国总工会8月24日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迟^②同志说：“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强烈主张我们尽快发表行动与要求大纲，以阻止黄色工会掌握群众。我认为，发表这样的行动大纲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力求通过我们的工作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请求该书记处起草大纲草案，它同意了。”我们看到，由于事情涉及迟同志，他不想发表这样的大纲。我们的大纲草案^③在你们手里整整两个月了，而你们迟迟不处理。国民党群众恰恰在要求我们大纲中的东西，而“中央政府”颁布的“工会法”却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④现在我们当了群众的尾巴，如果我们在远东局建议的时候发表这个大纲，我们就能领导他们。关于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和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指示信没有发出，据我们所知，也没有下达指示要求成立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

关于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前景问题，应该指出这一情况：党

① 看来是项英。

② 音译，何人不详一译者。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中国职工运动：南京国民党与职工问题（1927—1931）（文献资料集）》，第73—82页。

的领导同志始终强调“通过赶走黄色工会领袖来掌握群众”的办法，并且党的全会不接受我们关于黄色工会提供机会的提法，在我们的提法中说：“是由黄色工会成员成立新的战斗的阶级工会还是通过赶走黄色工会领袖使黄色工会变成红色工会，这个问题，在我们未得到群众中的拥护者之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这纯是策略问题。”提出这样的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掌握职位视为目的，而不是把通过开展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群众工作来确立对群众的影响视为目的。通过做群众工作最后必然会成立战斗的阶级工会，因为工会官僚无论在什么国家都绝不会放弃领袖职位，更何况在中国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将工人战士处以死刑。这个问题会直接引出另一个问题：在一个工厂里能否存在两个工会？我们应当回答说，两个工会能够并列存在，并要说，否定这一点的人，无非是决定在存在国民党工会的地方，不尝试成立战斗的工会，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虚假的方面，这就是争取职位而不是争取群众。他们说：“要知道，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争取不到职位的。”但我们要指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争取得到职位的同志的背叛行为。这种背叛行径大都发生在多少是机械地并无需群众进行有意识的表决就可以得到职位的地方。应当弄清楚，我们有多少同志通过群众表决在黄色工会中得到了职位。党不应允许自己的成员成为黄色工会的负责人，除非是选举产生的。在黄色工会内部缺乏民主表决、言论自由等情况下，我们通过这种办法或许能破坏黄色工会的领导机构，你们可以看出，通过这种办法就会造成黄色工会的分裂，而不是产生民主的领导机构，因此在一个工厂里将会有两个工会。当然，新的战斗的阶级工会将会受到迫害，但这会提供很好的政治经验，最终使群众相信有必要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国民党叛徒。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采取这种策略，党才能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先把注意力放在群众的直接要求上，同时这种策略与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就会引起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等等。

我们的同志对于成立工厂委员会摇摆不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对我们在工会中的作用不理解。一些政治局委员断定，“由于在中国，工会起着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工人将会把工厂委员会看作是新的工会，因为每个工厂的工人都代表工会等组织”。这种论断只不过是把辩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实际上，这意味着：“因为在一个工厂里不能存在两个工会，也因为工厂委员会被看作是工会，所以不能成立工厂委员会。”从对待整个工会问题的这种态度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这种态度与对待我们的工会工作的居统治地位的态度是一致的。

我们从另一方面看一看这个理论。可以认为，国民党有可能将自己的“工会”强加给工人，特别是在企业主允许国民党进入工厂的地方。在惟一存在的组织是我们的不合法工会的地方国民党也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坚持“一个工厂只有一个工会”的理论，既然我们不能阻止国民党及其工会向工厂渗透，那么我们的战斗工会就会停止存在。当然，这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党坚持这种方针，实际上就给取消主义政策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海的阵地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同志应该同工人保持联系，如果工人参加国民党工会，那我们的同志应该在国民党工会中组织左派集团，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消红色工会。在有红色工会的地方，无论如何要把它保存下来，它应该成为我们在工厂工人当中和在黄色工会当中的整个工作的中心。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为生存而斗争，这就意味着要反对这样的政策：似乎在一个工厂不能存在两个工会。两种策略的差别在于，一种是要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而另一种会导致把群众丢给国民党叛徒。

鉴于即将举行工人代表会议^①，我们建议起草关于组织问题的

①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补充决议，说明工会组织结构，支持产业工会。真正的组织单位是工厂而不是工会。工厂是个部门。要成立包括全部工业部门，如纺织、五金、印刷、铁路、海员、商业等部门的统一工会。否则将会出现混乱：工人们在同一部门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要有有目标的要求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每个产业工会或左翼集团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这种途径我们也能争取做到，使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同志将在本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会中提出同样的要求。

鉴于可能发生军阀战争和“左翼”国民党的活动有所加强，我们的境况会变得更加困难，尽管有有利的客观形势。不应抱这样的幻想：似乎改组派若能取代蒋介石，他们就会给予更多的结社自由等等。他们在直隶和山东采取的镇压手段不亚于南京所采取的严厉。无论什么军阀集团掌权，也无论它们采取什么立场，对战士的迫害都会继续下去。但是改组派的纲领吸引了一定的阶层，包括在我们党周围的动摇分子。因此再推迟公开党在涉及职工运动的各种问题上的政策，那就是自杀。你们可以看到，改组派在笼络人心地为工会要求政治权利和反对蒋介石的工会法。我们应该在工厂里开展宣传运动，揭露他们，说明他们使用蛊惑人心的词藻是为了欺骗群众，并指出他们在广州、武汉等地的刽子手行径，指出冯玉祥在京汉铁路上的行为，冯在那里杀害了50名铁路工人，在河南等地枪杀纺织工人。不进行这种揭露就意味着给党的工会工作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活动增加困难。反对改组派的运动应该同工厂和工会里的一般工作（提出直接要求、争取成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等）、同我们反对军阀战争和反对在满洲进攻苏联的斗争等结合起来。

在这封信中，我们想指出工会工作中的一些弱点、不正确倾向和错误。我们未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出策略。但在远东局关于中国

职工运动的决议^①中、在太平洋决议^②中和在我们的行动和要求大纲^③中，党已经有了关于各种策略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包括工会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党的主要的初步任务是：

1. 为了克服各种错误和不正确倾向，要开始全面讨论工会策略问题，由政治局和远东局共同来讨论，并推广到党的基层组织。

2. 政治局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会工作上，并要关注远东局决议被党接受后毫不拖延地加以执行。

3. 在出版关于工人运动的文件时，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所有政治决议具体化和简单化，使一般工人能够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政策。

4. 要毫不拖延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我们的行动和要求大纲。

5. 要立即发出指示性通告信，说明如何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和我们在其中的任务是什么。

6. 要发出指示信，说明工厂委员会的意义和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在各种条件下和在在不法情况下如何成立工厂委员会。

7. 要出版通俗易懂的小册子，说明什么是工厂委员会，它们的性质、作用和罢工时的意义，以及它们作为组织战斗的阶级工会的基础的意义，等等。

8. 在党内开展一场运动，反对对红色工会的一切取消主义倾向，并主张在还存在红色工会的地方加强红色工会，同时指出我们整个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反对一切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成立战斗的阶级工会。

9.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应当扩大，要尽可能包括海员、铁路工人、矿工、冶金工人、纺织工人等主要部门的代表。这些成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第二次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文件集》，伯力1930年版；《泛太平洋月刊》，旧金山1929年11月第32期；亦见第716页注④。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员应负责在相应的工业部门做工作。

10. 中华全国总工会应是独立的工会机构，要不多于两名政治局委员负责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党的一切决议。

11. 应该让无党派人士进入战斗的工会的重要基层组织，所有可靠的党员工人都要给予他们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岗位，以培养他们将来担任领导职位。

12. 在所有大的中心城市成立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执行党的一切工会工作指示。这些委员会应当独立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地区委员会，因为后者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并将尽可能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组建。

13. 要特别注意发展合法或不合法的活动形式。

14. 要责成一名同志编写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及其组织和作用的简明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应在完成上述初步任务时出版。

远东局决定给你们发去这封信后，我们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①。这个决议重申了以前的所有指示和关于开展工会活动的建议，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把它们作为指示并在讨论之后努力开展工会工作。党应该迅速转到工厂、矿山、铁路、船坞等方面，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政治危机的左右，那时，群众迅速前进，而党只好做最基本的工作，这将是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真地看一看我们目前在工人运动方面的状况。

致同志式的敬礼！

以远东局名义 格奥尔格^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1，第 24—3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92—195 页。

^② 乔治·哈迪。

18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驻中国代表团的信

1929年11月6日于莫斯科

上海，致代表团

1. 给你们寄去一封关于中国问题的一般政治性的信^①，此信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批准。从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观点和我们对中国当前形势的评价。中国同志将如何对待这封信，请你们立即告知。如果说以前在这封信所谈及的问题上有争议，那么现在存在何种分歧？请不要拖而不答。在复信中，请告中国同志如何对待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对此我们特别感兴趣。

2. 我们至今未收到你们对我们关于农民问题和关于工会问题的信^②的答复。我们认为这两封信，特别是后一封信有很大的意义，并认为需要通过这两封信争取在中国党的整个工作中出现相应的转折。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这些文件保持沉默。

3. 你们从我们的电报^③中已经得知，拟定在1930年1月中旬召中共中央代表来莫斯科，向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共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要提出这个问题。来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5—203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195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的同志在作完报告之后或是返回，或是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那就派现在在这里的中共代表回国。需要你们预先告知选择的这位中央委员的姓名，并转送他的报告所需要的材料。

4. 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加强了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提供更详细的通报，以便我们能够在你们同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时向你们提供相应的帮助。

5. 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在台湾，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而且我们党在那里无论在农民运动方面还是在职工运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台湾共产党人以前与日本共产党有联系，联系特别薄弱，现在完全中断了。我们建议你们同中共中央协商，向那里派遣两三名有丰富经验、了解当地情况的中国同志，以期他们向台湾同志提供必要的帮助。请告你们能否做到这一点。总之，你们要同台湾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6. 我们要专门派一名同志去印度支那工作。我们争取让他同你们取得联系，请给予他必要的帮助。关于此事的更详细更具体的情况，我们另告。

7. 绝对有必要同印尼的同志建立联系。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有来自爪哇和苏门达腊的职工运动代表在上海。我们曾请求你们派遣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同志到莫斯科来，以便建立直接的联系和更详细地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但至今我们未收到你们就这个问题作出的答复。

8. 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1930年夏将召开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①。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东方国家，特别是远东国家职工运动的代表来参加会议。请告，现在这方面的前景如何？你们能做什么工作来保证中国及其你们与之有一定联系的相邻国家的相应代表团的到来？

^① 1930年8月15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4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9年11月21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到你们那里去的贝伦斯^①同志将向你们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他始终全面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他了解政治生活和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10月25日^②以前发生的问题我们不写了。只向你们通报新的情况。除了重心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经常性工作外，代表团一直就俄国革命12周年、广州起义两周年和临近的中国新年开展了运动，现在还在开展这方面的运动。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运动，更不要说就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日开展的运动，都是同中东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给地方同志下达的一切指示中，都很注意一个运动同另一个运动的这种联系，同时提出新的口号，动员群众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作斗争，保卫苏联。

工业中心城市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表现在工人的自发性罢工上)、农民游击战的逐渐增多、军阀军队士兵的不断暴动和由军阀战争所造成的中国农村闻所未闻的饥荒和压迫，使我们有权认为，共产党面临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如果善于做工作，我们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领导这场运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并在组织上得到加强。不能

① A. 马西。

② 可能是A. 马西离开上海的日期。

说,党什么也没有做。这种说法说明对党的力量和工作估计不足。党甚至有相当不错的工作成果。但是党的工作中的不足还是很大的。而在一些场合甚至出现了不能允许的 errors 和疏忽。党在整顿自己内部生活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以“群众是否理解我们的口号”为题不断进行的辩论已成为历史,虽然现在还能见到对“命令主义、民主主义等”的错误理解的一些反映。党和共青团中央的夏季全会^①、军事工作会议^②、中华全国工会代表会议^③、省铁路职工和海员代表大会等,对澄清一些问题应该是有影响的。如果再补充说明,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2月、7月和9月来信^④之后举行的,那就应该很清楚,这些信中谈到的原则性问题,是党的一切领导机构都可以理解的,并且所做的工作可以保证:所有这些问题不再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将确实得到贯彻执行。在手写训令和通告问题上也有一定的成绩。从9月起,中央有7名常设巡视员。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多数被派到满洲和发生军阀战争的地区去了。我们希望,派巡视员的尝试将有助于同志们理解长篇通告的危害。现在有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以促使同志们起草短的训令、通告和宣言,给一些组织更加实际的指导。如果把1月或2月以来的训令同7月或9月的训令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情况有好转,但就是现在也还可以发现一些训令或信函,如给第四军的信^⑤,根本搞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从政治上纠正手写文件中的错误或矛盾之处是不可能的。举个小例子。在这个邮件中,你们

①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见第682页注②)和中国共青团五届二中全会(见第713页注⑦)。

② 见第713页注④。

③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④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85、192—195页。

⑤ 可能指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73—490页)。

将收到由乔治·哈迪签发的代表团关于工会工作给政治局的信^①的副本。在这封信中，代表团从收到的文件译稿中引用了几段话。政治局收到这封信后，通过项和周^②同志对我们说，“没有一段引用的话是符合实际的，把这些引文同中文稿加以比较，则可以看出这些引文全都歪曲了原文”。在这里没有任何可能对引文加以比较，只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辩论来向同志们证明，问题不在准确性上或引文的不准确上，而在整个工作方针上。长年习惯于下达手写训令，同时谈到各种问题，这就使人难于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但事情并非没有希望。随着自己政治影响的扩大，随着党在工厂里的组织的加强和党在工厂里的积极分子的出现，加之共产国际经常提供帮助，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取得的经验在各个方面得到改进。在准备11月7日运动时就看到了这种改进。与过去的运动相比而言，在这次运动中就有一些新的积极的业绩。因为在过去的运动中，中央对各省的领导仅限于发表一个总的通告，而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有巡视员，这种领导是经常性的。上海带头，同它一起行动的有香港、哈尔滨、奉天和天津。政治局还没有收到地方上关于运动结果的信息，但从11月7日以前的巡视员通报中和从反动报纸上可以看出，有一些省动起来了。这是很大的改进。例如在满洲，两个月以前中央与那里还没有任何联系。在上海，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好。同志们报告说，工厂支部散发了传单。有党或共青团支部的工厂都印发了工厂报。有以下两个事实说明这次运动席卷了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

1. 在这次运动期间，红色工会发展了两千名新会员，建立了3个新的红色工会组织。一家大的日本工厂（1927年5月我们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工会）和两家新的工厂，我们根本还没有人去。

2. 党发展了130名新党员，其中有90名是来自大工厂的工人。

① 见第181号文件。

② 可能指项英和周恩来。

举行了红色工会管委会会议、地区代表会议和集会。就日本当局逮捕中国留日学生事件^①开展了广泛的运动。散发传单，在墙上和电线杆上写标语，这些活动进行的规模都很大。我们的示威活动拟定在3个地方举行，并在那些地方举行了。一个南京路的示威活动，约有600人参加，另一个是北京路的示威活动，约有700人参加，再一个是西藏路的示威活动，约有800人参加。你们可以看出，示威活动参加人数不多。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妇女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并表现得很活跃。在22名被捕者当中有9名是妇女，其中有两名工厂女工，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些情况，尽管示威人数不多，也应该承认工作成果是令人满意的。但政治局在这次运动中有两个不能允许的疏忽：（1）没有出版《布尔塞维克》^②。对此，同志们用警察局的规定来作解释。警察局的规定在8月或9月知道的，那个时候同志们就应关闭印刷厂。《真理报》^③固定每3天出一期。还有《红旗》^④和两个半公开的报纸^⑤。但没有出版纪念布尔塞维克革命12周年的《布尔塞维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2）在11月7日之前6个星期，我们跟同志们谈了在开展运动期间要选出工人代表团去苏联。同志们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做的了。甚至要求我们说明代表人数，因为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可以选出许多人，但不是都能去的。我们当即竭力向同志们施加影响，使他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可能性和理解来估计工人派代表团去苏联的可能性和他们的理解。但可以看出，同志们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们

① 1929年10月初，日本当局在东京和其他城市逮捕了100多名中国学生指责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搞破坏活动。详见《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日本的活动的迟到报道》，载《中国周报》上海1931年2月28日版第55卷第13期第457页。

② 《布尔塞维克》，见第168页注①。

③ 中文名称不详。

④ 《红旗》，见第635页注①。

⑤ 可能指《上海报》（见第671页注②）和《劳动》（见第716页注②）。

一方面确信可以做这件事，但没有做足够的宣传鼓动工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宣传鼓动工作。除了中央的指示外，在所有传单、呼吁书和文章中都没有（派代表团去苏联）这个口号。而共青团中央书记^①说，这个口号在共青团中央通告中也没有。当然，在这样做工作的情况下，上海工人连一名去苏联的代表也没有推选出来。收到来自省的信息之后，我们对11月7日运动作出了评价，就这两个疏忽向政治局谈了它应负的责任。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从8月1日起，在准备迎接11月7日的同时，我们一直在筹备纪念这个周年日。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反对军阀和军阀战争，并用这个周年日同反动的孙逸仙诞辰和逝世周年日相对抗。广州起义周年日，正值蒋介石和其他军阀进行军阀战争之际，在这些军阀中，广州的最主要干将张发奎起着不小的作用，因而得名“铁人”。所以我们建议政治局举行反军阀周。这一周应是从12月4日至11日。期间应举行很好准备的城市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革命发动。然后召开县和省的工会和农会代表大会。派代表团去广州瞻仰革命烈士墓和战斗过的地方。工厂、农村和军队的代表团进行互访。举行共同的工农兵群众大会。同志们关于反军阀周准备情况的通报是乐观的。但我们将等着看结果，并尽一切努力争取有好的结果。

党现在已经着手准备迎接临近的新年的运动，并把它同11月7日运动和12月11日运动结合起来。在闹饥荒、士兵暴动、发生罢工的情况下，中国新年具有很大的意义。而党有很大的可能性对这些情况加以革命的利用。首先党应该揭露有产阶级所谓新年之后有新生活、免去未付租金、发给奖金等欺骗。我们一方面要记住去年的运动提出“占领地主房屋”口号的错误，但今年还是要提出“成立农民委员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大米分给饥民”等口号。在目前

^① 关向应。

形势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和很实际的口号。

与这些运动相联系，随着革命情绪的高涨和党的积极性的提高，我们建议同志们举行发展新党员和红色工会会员周。这种活动应只在工业中心城市进行。上海发展2000名红色工会新会员和130名新党员的例子说明了这种发展活动是现实的。当然，对于地下党来说要保持必要的谨慎。有百分之七工人的党不能很好地做工作和领导革命。同志们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能这个发展周将在一月份……的时候举行。

关于经济罢工和工会工作状况问题，乔治·哈迪同志要给洛佐夫斯基写信^①，所以这里就不重复了。如果这些运动都开展得很好并且将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将提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所提出的政治罢工问题。

关于同志们对你们关于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的信的态度，我们在最近给你们信中已经写了，贝伦斯还要向你们详细讲。同志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要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种原则性的赞同意见，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你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点信中谈了很多。我们无法就同改组派的斗争问题同同志们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曾同意过你们和我们的意见。但是现在在我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和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报告之后（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改组派在目前战争中的作用并谈到了他们的机遇），同志们说，我过高地估计了改组派的作用，“因为在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基础”。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同政治局举行专门的会议。

关于改组派的问题很尖锐。给你们寄去我们给政治局的信的副本，信中指出，同改组派斗争不够，宣传苏联不够^②。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176号文件。

警察局对党的监视很严。应该预见到，国民党不知在什么地方获得了提供情报的人。两名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杨殷^①遭内奸陷害。内奸已被清除，这很清楚，因为我们方面没有牺牲^②。工作是很艰难的。还需要清除另一些人，必须这样做。11月14日，警察早一个小时来了，逮捕了委员会书记即一名委员、一名技术员和一个刚进屋的人，此人常作为党的代表出席这种家庭晚会^③。一切机会都会被警察利用。据同志们说，警察局知道政治局全体成员，在10月初就有传言，说有人跟踪李，我们建议他和周^④暂时放下党的工作，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同志们没有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实行了部分隐蔽的办法，但这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与同志们和同志们与他们经常见面。周甚至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现在他们不再出席各种会议。局势要求他们完全隐蔽起来，而另一方面，没有他们参加不能想象如何工作。可能他们的隐蔽对未出版《布尔塞维克》和对宣传鼓动推举代表团去苏联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影响。我们认为涅姆佐夫^⑤同志到这里来是必要的。

请告青年共产国际，他们的代表^⑥走了之后，我们一直在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并力求使开始的工作不断有进展。青年共产国际最近来信^⑦中谈到中国共青团的问题，提得完全正确，在那方面贝伦斯做了工作，我们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职业化”问题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没有任何危险。只不过是每个同志都要有工作，而不是靠党

① 杨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② 原文如此。

③ 被捕者是何人不详。

④ 可能指的是李立三和周恩来。

⑤ 王若飞。

⑥ A. 马西。

⑦ 可能指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10月给中国共青团中央的信（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326—341页）。

来养活，当然，必要的工资除外。但为什么这叫“职业化”，天晓得。

除中国之外，关于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工作情况，我们没有什么可写。

后来我们同日本没有联系。那里发生的事件需要我们参与。

我们不来专门谈与军阀从中东路方面进攻苏联有关的工作，因为除了贝伦斯要向你们谈的和你们可以从附件中了解到的，没有什么新情况。工作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明白并要加紧改进。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材料，我们在9月底10月初才收到。所附的代表团决议^①是一致通过的，这里出席会议的同志没有表示反对全会的决议。中国同志要译出所有决议和最重要的发言。一些决议，如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已在《红旗》^②上发表。所有决议都要在党内消化和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政治局要求陈独秀写出关于自己对这些决议的态度的声明，陈寄来了声明，说他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③。这当然是厚颜无耻的蛊惑宣传。他不过是想避开他的机会主义。政治局决定把陈开除出党^④，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并请求给以批准。除陈以外，不存在任何右的派别，更不存在它们的“明显右的纲领”。在这里，知识分子中的托洛茨基集团同工人从来没有联系，而最近它只是从事着习惯的活动。从他们的文件中你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只是在大喊大叫“机会主义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论据对工人不起作用。关于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右的危险，我们另写信给你们。代表团认为，我们关于这些国家的信息很少，在未听取这两个国家的党或同志们的意见之前，不能根据这些信息来责备

① 见第180号文件。

② 见《红旗》，上海1929年第48期第4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他们。在9月7日的信中，米夫和库丘莫夫同志说，我在自己的《两个全会》一文中绕开了“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代之提出了“民族民主共和国”口号^①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民族民主共和国”口号，而是“中国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这是个很小的差别。当然如果我再补写上“苏维埃式的”，那就更好了。但是这绝不说明我绕开了“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因为由共产党人提出的工农共和国口号，当然只能是苏维埃政权形式的。

由于担心你们责备我从同志们那里沾染上了写长信的习惯，我就不向你们列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我们所提及的革命风潮了。你们可能从报纸上和电报中比我们更了解这些情况。以备万一我给你们寄去一些剪报^②。这场运动的政治领导者是我们，虽然经常在进行时我们从组织上没有参与。

以代表团名义 （签字）^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49—15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72 号文件。

② 剪报没有找到。

③ 根据文字风格判断，文件是由 I. A. 雷利斯基签署的。

184

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

1929年11月14日于莫斯科^①

马西同志的报告

看了党和共青团^②最近的材料，对它们的状况，即总的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它们的情绪有了一个轮廓。

首先，我想提醒一下，今年共产国际通过了四个与中国有关的基本文件。这就是：二月政治来信，这封信对中国形势作出了很详细的分析^③，是筹备和举行中国党全会^④的基础。第二和第三个材料专门论述了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⑤。实际上是对二月政治来信的补充，比政治来信更详细地论述了相应的问题。第四个文件是10月通过的政治来信，这封信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形势^⑥。这是给中国党的指示，指出了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种日益尖锐的危机中，其方针和任务应该是什么。10月来信是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协商一致、同中国党一起建议发出的^⑦。首先需要说一说远东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明的。

② 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④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见第168号文件注1）。

⑤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195页。

⑥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5—203页。

⑦ 原文如此。

局本身的工作。远东局举行会议是相当有规律的。同中国同志的会面也是很有规律的。在工作中，他们当然不能研究与党有关的所有问题，但基本上定期讨论了日常的各种政治问题。

从组织任务和党的状况以及一些其他方面工作，如工会工作、农民问题等来看，比较难于对远东局的工作作出评价。

在远东局内部，无论同与中国党和共青团有关的共产国际指示，还是同这方面的青年共产国际指示，都不存在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共产国际在各种问题上的指示和一般的指示，都没有同远东局发生过分歧，而是补充了远东局的方针。在同中国同志的工作中，很少有同中国同志的辩论在远东局成员之间引起什么尖锐分歧的情况。通常在远东局内部，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在远东局进行相应辩论之后的情况下意见也都是是一致的。没有出现过远东局在什么基本问题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情况。在这里没有必要谈远东局的某些活动问题，如远东局受到警察监视、工作方法等问题。

我想，可以转到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上。可以提醒一下政治书记处十月来信中作出的分析。我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远东局自己在分析形势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政治书记处在信中分析了中国的形势，认为中国的形势完全证实了二月来信作出的评价。

二月来信在分析政治经济形势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政治形势就会变成现在实际上存在的这种形势，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它在内政外交政策上遭到了失败，它未能实现中国政治上和任何意义上的统一，未能阻止住革命运动，未能阻止住工业的萧条和工农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未能解决土地危机，未能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未能吸收民族资本，并且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反击。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垮台，由于第三时期的到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加剧，试图在我们现有这些条件下把中国拉进反苏同盟。中国处在再次进入各省官吏各霸一方时期的前夕。伴随着这种形势还有危机的急剧加深。农民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赤贫化。闹饥荒是中国广阔土地上常见的现象。由于南京政府遭到了全面失败，必然要实行某种能够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土地改革，还有可能增加捐税，等等。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农民在进行革命斗争，在中国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直接目标，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向农民武装的一般游击斗争形式过渡，向建立红军和发展苏区的阶段过渡。

在中国，近两个月来内战区域在不断扩大。甚至在上海周围地区也发生了规模非常大的抗捐税不交租的政治经济性质的农民示威活动^①。这些活动虽然就其内容而言是接受了我们的政治影响，但不是始终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建立游击队的行动也经常没有我们的直接领导。结果在这两个月，中国苏区和战争区域有相当广泛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农村见到的情况。在城市里，我们也看到工人运动有明显的发展和激化。在发生农民运动的同时，在城市里也有很强大的运动。在中国，危机加深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因此工人运动和工人斗争的发展速度提高很快。我们在分析这个时期的罢工运动时，必须对罢工运动和工人提出的要求的性质作出评价。越来越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了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了城市里不断发展的阶级冲突。总之，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工人的不满情绪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接触到非常广泛的罢工运动，而这种罢工运动之所以具有自己的政治内容，是因为它将与工人

^① 详见B. 维什尼亚科娃：《中国1929年的农民运动》，载《中国问题》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76—178页。

阶级的反帝反南京政府斗争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现在在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书记处十月来信中提出的党的任务，与我们在那里同中国同志一起制定的任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和为这次战争作准备的形势，来开展城乡革命运动，扩大运动，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的联盟，特别要更加发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斗争形式，使分散的力量能够变成带有明确政治内容的联合行动，变成带有政治内容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要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等等。这个方针是我们中国党的方针。原则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党的领导对中国形势的态度是正确的、客观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内部，完全没有任何误解、曲解，并在各种问题上没有危险的提法。实际上，在一些问题上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有一些误解和不准确的提法，有可能出现偏离正确方针的危险倾向。例如，我们知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反对南京政府的起义，基本上是由改组派组织的，当时这个派别未被看作是领导反对南京政府斗争的代表，然而在组织和联合南京政府反对派的工作中却起了突出的作用。谈到改组派，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在目前形势下的作用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在表达对南京政府不满情绪方面的活动，采用了特别广泛流行的方式并在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当中进行了特别有害的蛊惑性宣传。只要看看改组派的一些宣言，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在工人阶级当中实行的方针，这就是他们把反对南京政府即敌对的资产阶级阵营的运动，视为试图低估他们这些人士的作用来完成孙逸仙主义给他们提出的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使中国取得政治上的解放。

在党的领导中没有人认为改组派确实是代表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反对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不理解改组派作用的危险性。

一些中央委员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改组派不能^①推翻南京政府，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处境就会有所改善，并且将会有更多的结社自由，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区域将不是这么大，党和共青团就能够更公开地进行活动并有更多的机会来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②。但不言而喻，不能摆脱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危险。

这一点在评价军事形势时也可以看出。我们知道，桂系军阀集团同南京政府作战时，党内曾有一种倾向，认为桂系集团是能在客观上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派系。也存在要消除这种倾向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有这种倾向的残余。这种倾向也是与对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有关。它为后来出现的危险提供了口实。它不主张在群众中开展反对军阀战争、争取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活动，而居然尝试依靠战争来利用这个任务^③。有这种倾向的人曾试图同改组派和其他派别建立某种联盟，只是在中央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得以说服地方委员会，使之相信这是不对的，党必须是独立自主的，需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这一点。在谈到危机问题时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保卫苏联，曾有过同满洲边境上的某些支队、部队进行合作的一定倾向。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有过这种倾向，是在中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出现的。然而很清楚，原则上讲，给党的领导、给全党、给整个工人阶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党没有超出这个方针的范围，尽管出现过同改组派或同军阀的一些部队结成联盟的这种偏向。

与中国最近几个月出现的这种形势相联系，在党内，有一些讲话带有某种对立情绪。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是：能。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如今在中俄问题出现之后，陈独秀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以批评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方法作掩饰，就这个问题对党的方针展开了机会主义的进攻^①。陈独秀断言，不能把中苏之间的战争危险看作是直接危险，并让人相信，已开始进行的斗争在一定时间内会有发展，但实际上不是苏中之间发生战争的直接危险。由此可见，陈独秀完全歪曲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掩盖了这种局势的真正危险，掩盖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对苏联联合进行干涉和发动战争的主要危险，而且他实际上把整个问题简化为：不存在任何危险，不存在进攻苏联的危险，这场危机的结果将是通过争夺中东路斗争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

在分析形势时，他又提出了党在这场冲突中应坚持的方针，并强调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所有文件中，他不承认这是必要的，不承认由此也会得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不仅不承认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实际上讥笑这种情况，并且提出，党的方针首先应该是和平主义方针，反对可能给中国民众带来极大困苦战争。他不注意战争的性质，看不到我们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与我们对待对苏战争的态度不同。

他提出了反对南京政府曲解民族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同改组派的基本口号相抵触的^②。当中央对他的这些做法作出完全正确的答复之后，陈独秀在第二、第三封信中不得不放弃最初的立场，以批评党的宣传方法的做法来掩饰自己，并且不得不公开发表讲话和十分明确地（一清二楚地）宣称他是完全反对党的方针和党的领导的。

其次，在分析中国总的形势时，陈独秀持左派观点。此外，他实际上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对中国形势作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

① 见第259页注②。

② 原文如此。

评价，他把这种评价作为自己的评价，同时他与中国存在的托派划清了界限。但是他是根据中国总的形势来采取这种虚假的激进方式的，例如他断言，中国党的近期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解决一些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对形势进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可见陈独秀是个十分明显的机会主义者，他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直接任务。他在信中谈到直接斗争问题，十分明显，这些问题都是机会主义的。例如，他不仅是错误地，而且是机会主义地分析了俄中冲突，他认为，党在组织保卫苏联的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形式时表明，它支持盲动主义路线，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路线是中央的主导路线。他认为，从党的机会主义时期到目前时期，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认为，不仅如此，而且除了党的盲动主义活动外，党还采用了发号施令制度。他还认为，党的领导在不断地进行欺骗、出卖，等等。

陈独秀在同中央的通信中（顺便说一句，这不是陈独秀同中央的通信，而是他这样来加以利用的通信：当中央提出一个观点时，他就抛出自己的文件），是把他的文件写给敌对的组织和派别，以期在党外的机会主义分子中间散发。可见，他试图把所有机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反对中央路线和中央领导的分子都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可见，陈独秀现在正在成为集聚党内所有对立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心。陈独秀在中国代表右的危险，我们党的领导在同陈独秀进行尖锐的斗争时承认了这一点。陈独秀同中央的这次通信你们很快就会收到，并且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所以现在就没有必要详细谈了。

同陈独秀的斗争基本上是通过不断地答复他写给中央的信进行的。

在这些答复中，党的领导从解释保卫苏联的直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谈起，详细地回答了陈独秀

谈到的所有问题。同时党中央承认，保卫苏联的运动开展的不够，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开展的不够，在党内对这种斗争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最后说明自己在保卫苏联问题方面、在反对军阀战争和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方面的方针和党的任务，同时与此相联系揭露了陈独秀提出的机会主义方针。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认为是比较好的，如在上海就这些问题开展了运动。

由于在工人支部全体党员中进行了这种辩论，所以根本没有人支持陈独秀的方针。

工人支部没有被欺骗，它们共同的想法是，保卫苏联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用陈独秀的口号来取代。

学生支部在辩论开始时，态度并不是这样明确、这样正确。在学生（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当中，有某种调和主义倾向，其表现是：不理解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未能对与陈独秀对党的直接任务的攻击有联系的东西作出足够的评价。他们说，需要给时间阅读文件，研究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和党内右的危险等问题。但是在进行辩论之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上海的学生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团员都发表意见，反对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方针，只有一些党团员，好像是学生当中和党内团内具有不满倾向的领导人，仍支持陈独秀提出的方针，还反映出党内存在一些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学生支部同通过陈独秀及其理论暴露出来的右的危险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党员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解，而且党团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目前，托派本身的力量很小，没有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还不能在党内进行什么危险活动，不能充分表现出其反党和反共青团的积极性。

不过现在需要分析在党的实践活动中还能感觉得到的各种倾向。

在中国，存在盲动主义残余，在一些场合还有表现，这就是

发号施令思想、左倾残余等。这些东西还能见到，但数量在减少。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团内都越来越清楚，现在党内很大的危险是以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右的危险。

我们知道，党讨论农民问题的全会重复了党在六大上所犯的错误，即与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和如何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问题有关的错误^①。在全会上，在联合富农问题上、在坚持对农村半无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的这种态度上又犯了错误。

(中国同志)同全会后收到的国际来信所阐述的共产国际路线进行了斗争。

同中国同志一起对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的讨论很清楚地说明，来信中对党的领导在这方面的错误作出的分析是多么的正确。

一位同志认为，中国的富农分两部分。他断定，一部分已被深深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中，他承认这部分富农具有反革命性，他们是反动的，而第二部分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并将为民主主义目标而斗争，所以我们同这部分富农可以结成联盟，把他们吸收到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的联盟中来^②。需要说服这位同志，使他相信这是不对的。有一些同志支持这种错误的观点。还出现了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虽然辩论是在联盟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进行的，但同时也明白，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这次辩论搞清楚，同志们提出这些错误的做法，是没有正确理解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不理解与农民问题有关系，而农民问题又与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的不理解有关系，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有关系。我们还碰到了

^① 看来，指1929年7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40号通告关于农民运动的部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与基本精神》（见《中国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0年第3（64）期，第130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98—200、349页）。

^② 作者阐述的是李立三的观点。

学生问题。一些同志对学生的作用表现出不理解。

全会总的来说提出了理解学生作用的错误观念^①。它认为，在中国，学生总体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代表。在中国，学生群众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我们在学生运动方面的任务应该是，把所有学生群众联合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为实现他们的民主要求和学生要求而斗争。中国同志完全避开了学生内部的分化，完全忽视了学生中发生的分裂，忽视了最近在如何对待学生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完全破坏了为在贫困学生当中发展分裂^②而做的工作。至今情况就是这样。只是经过热烈的辩论后，李立三同志才放弃自己对待富农的立场，并完全承认共产国际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

很清楚，如果党的整个全会能接受这样的错误观点，重复错误，那么在进行一年的尝试之后，就需要为纠正这种错误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所以就开展了这场运动。

至于工会问题的信，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信中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方针实际上同政治书记处的方针是一致的，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政治书记处信中提出的方针对在中国实行的方针作了补充。

首先，我要说，我们不应只讲工会问题，而应与工会问题相联系注意党内群众工作的整个制度。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应建立群众性的政党，党还没有向这方面作出很明显的转变。党的无产阶级成份很少，在领导干部中无产阶级部分很小。党给予工业中心城市的注意力还很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群众工作

^① 指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关于学生运动的部分（见《中国研究所通报》第3（64）期，第26—2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03—204页）。

^② 原文如此。

中，党有很多缺点，还没有明显转到群众工作和群众组织方面来，这种情况联系工会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所有文件中通常认为，党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红色工会。但实际上是，红色工会运动没有发展，而好像是相反，红色工会运动的次数在减少，虽然在政治影响方面有这样的情况：当党和红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增大时，红色工会对罢工行动、对直接斗争的直接领导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对工人头脑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控制也在迅速减弱。但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对工人群众的官僚主义控制，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一些省份却都加强了。

红色工会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党没有做必要的工作。一些同志倾向于认为，中国革命浪潮现在很高，实际上提出了开展红色工会运动的问题，但他们悲观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采取措施开展运动，甚至有一些取消红色工会运动的倾向。

谈到上海工会，应该说，党在上海工会中的工作没有得到加强。我们有一些工会受到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控制。在这些工会中，没有始终如一的党团，没有有组织的少数反对派。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党对工会的悲观主义和一定的失败主义情绪，因为他们反对建立工厂委员会。他们始终认为，工人不懂什么是工厂委员会，他们以为，我们想组织新的工会，认为这会给工人队伍带来疑虑，他们想以此来证明不开展工厂委员会运动是对的。在扩展经济要求和经济斗争大纲问题上也是这种情况。为了发展日益扩大的群众运动，目前在中国需要有这个大纲。红色工会不仅自己没有为制订经济要求大纲做什么工作（大纲是在没有它们参加的情况下制订的），而且它们拒绝接受大纲，将其束之高阁，放在一边，不作出任何布尔什维克式的决定。

有过这种情况，罢工在未受我们影响的左右和党没有做特别多工作的情况下发生了，当时本来可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但只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在反帝同盟^①问题上，共青团指出，在联合工人并使之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参加反帝斗争和反军阀战争斗争方面，是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的。共青团明显指出了这一点，但党不是利用这种经验来开展反帝运动，而实际上却这样提问题，说这是青年的任务。这很清楚地表明，需要发出就工会问题发出的那封信。这表明，在党的群众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虽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党开展了很多群众工作和群众活动形式，特别是在组织示威游行方面。在国际红色日^②以及9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很多成功的示威游行。在发展和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方法和把合法、半合法和地下的工作结合起来方面，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党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许多成绩，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评价。但这些成绩不是很有基础的，因为它们没有通过工厂委员会和支部、没有通过黄色工会中的少数派组织来加强党在工厂无产阶级群众中的根基，没有加强红色工会运动。

对问题的答复

好像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我在报告中说，依我看，陈独秀及其周围的人是中国右的危险的主要代表。

在我的思想中没有这种看法。我所说的是，现在陈独秀公开代表党内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并集中了党内的异己分子。他在这方面的作用十分清楚，是把所有机会主义分子集聚在其周围的中心。

我所谈的另一种看法是，陈独秀同时也代表机会主义反对派。党内右的危险，如关于合法主义问题和关于党中央对合法主义问题的态度问题，一般地说是由其他成员代表的。这种倾向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这种倾向是要葬送我们争取合法工作可能性的政治

① 指在中国共青团中央领导下进行活动的青年反帝同盟。

② 8月1日。

纲领。过去在党内这种倾向是相当强大的，现在仍然相当强大。中央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并且针对这种倾向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同合法主义倾向不断作斗争的问题，这种倾向是党内右的危险的表现。在如何评价同改组派的斗争问题上也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党内右的危险的一种非常敌对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党的领导中也有某种反映，特别是在同北方军阀和同南京政府的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党没有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开展强有力的运动来反对改组派的纲领和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当中没有这样做。在党的机关中开展了反对他们的宣传活动。但是现在这种宣传活动带有6到12个月以前的那种性质和内容，也就是说，它没有很清楚地说明改组派现在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是党内出现右倾的危险，因为今天对改组派的作用估计不足，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对改组派同南京政府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估计不足。改组派是南京政府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而南京政府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好处，这个事实的意义在减少，在这方面，实际上应该说，改组派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采取了与南京同样的态度，差别仅在于他们更危险，因为他们隐藏了自己内心的目的，用左的词藻将自己伪装起来。

至于其他问题，如工会问题、农民问题、对富农的态度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反映了党领导内部的状况，反映了对我们在资产阶级参与方面的任务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任何取消红色工会的倾向，都是有各种各样理由的、非常大的右的危险的体现。在党的领导中，一些人没有公开提出取消红色工会问题和在实践中表现出悲观情绪，一些领导人分析了所有这些情况并作出结论，他们要坚持取消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党内右的倾向的反映，会造成很大的危险，而总的说来是右的危险。当然我们应该把这些人同集聚在陈独秀周围的机会主义集团区别开来。不言而喻，同前者的斗争并非同时就是同另一些现象的斗争，很清楚，我们应该

同陈独秀、同他的集团作斗争，但如果我们同时不同我所说的党内存在的右的危险的其他表现作斗争，那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53，第 54—68 页。

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9年12月4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利用机会向你们通报一些新的消息，主要是关于党内生活的消息，因为关于军阀战争结局和中东路情况，除了你们从电报和报纸上得知的情況外，我们不能通报什么新的东西。11月中旬，江苏省举行了党的代表会议^①，准确的消息以及会议的决议，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从初步的通报中得知，有60名同志参加了会议。上海的代表人数最多。来自企业的工人约占代表人数的一半。会议讨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农民问题、工会问题、中东路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②问题、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由此产生的党的任务问题，以及组织问题。这个议事日程和12小时的报告使会议持续了10天。我们主张开4到5天，但未被接受。会议对所有问题的讨论，都是以共产国际和政治局的决议为基础进行的。有13名工厂工人进入了选出的省委。进入省委执行局的有3名工厂工人、1名农民、3名知识分子和一些经过考验的老的党组织领导人。据同志们报告说，讨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

① 见第258页注③。

② 见第199页注②。

象的，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进攻苏联的行为作斗争的问题和保卫苏联的问题讨论得很详细。根据开展的运动以及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会议作出了关于实际完成所述任务的具体决定。12月4日至11日的反军阀周应该是这场斗争的起点。由于开展了群众运动，上海和各省的组织都在同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建立较好的联系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积极性、纪律性以及斗争的具体化都得到了加强。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党员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现有解决党对群众的政治影响问题的办法和对党内生活的整顿工作，授权会议作出了争取使党员数量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决定。在我们提议的发展党员周，江苏省党组织应发展700名完全来自企业的新党员。等看到会议决议和得到口头通报之后，我们再向你们作详细报告。11月27日我们听取了政治局代表关于党在全国的工作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根据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材料写成的。此外，我们还收到一些组织和巡视员的汇报。从上述报告中，即从谈到的材料和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党在全国的活动毫无疑问在日益加强。首先是满洲。那里两三个月前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今天党却能取得像平沈线上有4000名铁路工人罢工这样的成绩。在哈尔滨，过去说那里找不到一名党员，现在党出版了两个小报^①并在组织上得到了发展。哈尔滨发生的学生示威活动^②，说明党进行了较好的领导。由于党善于利用客观条件，8月份低落的罢工运动现在又在兴起，而在上海，10月份的罢工人数赶上了7月份的罢工人数。11月份也不落后于10月份。上海、青岛（工人同警察的斗争）和天津的情况说明，罢工斗争的火焰没有熄灭，也不会被熄灭。工人的工作条件在恶化。企业主以实行同盟歇业来吓唬工人和迫使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最

① 报纸名称不详。

② 11月9日在哈尔滨举行了反对日本保卫苏联的群众性示威游行。

落后的、被压制得不敢反抗的无产阶级分子——苦力也紧随产业工人之后起来进行斗争。不久前在北平发生的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得到了上海的响应。那里有160名苦力凑钱买了红旗，举行了反对其直接剥削者的示威游行，游行被警察驱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报纸称贫穷和饥饿苦力的这次游行是“滑稽的游行”。但对共产党人来说，它是个典型事例，说明甚至在被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当作牛马的这些苦力当中也开始觉醒了。而农民呢？农民的积极性也在一周一周地提高。除了农村暴动和暴动的农民投奔红军外，常常可以看到农民同武装警察、宪兵和国民党军校学生作斗争的情况。日益蔓延的饥荒迫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采取了蛊惑人心的许诺建立免费食堂的做法（北平）。成立了各种以军阀或他们的太太为首的饥民救济会。对苏联的挑衅性政策和内战摧毁了商业和轻工业。不断的借债和苛捐杂税搞得农民赤贫如洗，甚至将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置于当权集团的对立面。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助于党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把劳动者的自发行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一位政治局委员说，党在17个部队中设有支部。这些支部或者说联系在蒋介石军队中有很大发展，而在张学良军队中发展得较差。11月7日党在厦门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同警察的搏斗中，一名示威者被杀害。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很大的骚乱。在武汉，三周前举行了两千工人的示威游行，并冲击了警察控制地段。工人们解救了被捕的一名工人。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党的隐蔽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尽管国民党、中国警察和帝国主义巡捕全力进行追捕，但党在遭受两名政治局委员^①和一名中央委员（布林斯基^②）的重大损失后还是避开了追捕，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自己的活动。除掉奸细^③

① 彭湃和杨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② 任弼时。

③ 白鑫。

后,召开全国劳动代表大会^①和省党代表会议时都没有遭到逮捕。随着党的活动的开展,警察的威胁将会增大。但可以指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协商党在这个领域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

政治局代表在11月27日报告的结尾部分委婉地责备了代表团,说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同志们工作不积极。是的,我们确实在评价各方面工作时,很少谈做得对的方面,而更多的是想帮助同志们克服缺点,指出工作中的疏忽和将来如何改进,对同志们进行了必要的批评。从我们的信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对党的工作的评价。但我们不能避而不谈还存在的缺点。比如对这样的说法怎么能不批评同志们呢:在中央10月12日给红一师的信^②中,我们看到,说“蒋介石有改良主义倾向”,说我们的同志应该在农村提出“交纳累进税”(不是我们的口号)的要求。在中央给同志们作出的指示中,不要求把居民分成阶级,而是建议一般“惩罚都不要严厉”,“对待所有人都要一视同仁”(这当然是对缺乏理智的枪杀、放火等行为作出的反应)。在这封信中谈到我们的同志同岳维峻的军官的合作问题。在这封信中还不自觉地流露出城乡资产阶级冲突论,虽然有这样的附带条件:不能认为这些冲突会导致资产阶级一个部分消灭另一个部分的斗争。另一个例子。两名政治局委员遭杀害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③表示了很强烈的抗议。我们不能反对政治局的决定,因为考虑到有必要加强党的领导。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让少先队员^④同志转到政治局工作,是政治局方面负责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领导人,而脱颖而出的一名有才干的青年工人^⑤被任命为青年团书记。在上一周,同志们在

①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见第175号文件注17)。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A. 马西。

④ 关向应。

⑤ 袁炳辉。

向我们通报其他信息时，顺便告诉我们说，少先队员同志到满洲工作去了。我们十分清楚满洲那里的工作很重要，也需要向那里派遣有经验的负责同志，但我们还是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调走少先队员同志，会削弱对整个工作的领导，从而也会削弱对满洲工作的领导。削弱整个青年团的工作，这对满洲来说同样也是个重要问题。最后是从政治局排除了一名最积极的、反应敏锐的年轻工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求发电报把少先队员同志从满洲召回政治局工作。我们的要求使同志们感到有些惊奇，但我们说，这是最后决定，必须执行。同志们最后保证执行这个决定，10天后少先队员同志将回到这里。一位印度支那的同志^①来了。他在等候答应给他们的东西，拿不到他就不会走。暂时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些东西下落的消息。今后日本仍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弱点。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就一事无成，虽然我们经常提出各种建议，但那是不现实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求中共派一名代表到你们那里去^②。这是怎么回事？谁应是这名代表？带什么去？要不要我们之中谁陪同前往？为了更好地通报情况和便于将来工作，我们认为有必要让我们当中一位同志陪他一起去。

代表代表团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帕维尔^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154—15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见第 182 号文件。

③ И. А. 雷利斯基。

18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摘录）

1929年12月6日于上海

秘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的讨论^①

出席：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温裕成、罗登贤。

[李]立三：1. 在远东局的决议^②中，讲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反对右倾和特别是反对调和主义决议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值得我们注意。但仅在一句话中提到反对左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很不够的。说到中国共产党，在远东局的决议中指出，中央在以下三点上犯了“右倾”错误：（1）关于富农，决议说：“党的领导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村阶层和资本家阶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③这纯属歪曲。我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我引用了列宁《两个策略》一文中的一句：“在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外，谈不上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洛佐夫斯基、青年共产国际、别尔津。

② 见第180号文件。

③ 在远东局决议中说：“党的领导长时期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村阶层和资本家阶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间有统一的意志”（《列宁全集》第3版第8卷第84页—原俄译者注）。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①，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富农问题。中央在富农问题上确实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就是在党的六大上也没有搞清楚。

2. 决议说：“在政治局中，有把广西军阀俞作柏看作是革命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的捍卫者的倾向。”这是完全不对的。中央不止一次给广西的党作出明确的指示，说我们在广西的军事工作同在任何其他省的军事工作是一样的。贺昌同志在广西党代表会议上坚定不移地指出了这一点。广西党作出的决议也坚决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出了俞作柏如何欺骗群众。远东局决议中指出的东西绝对不是事实，完全是建立在不准确的传闻基础之上的。中央从来没有这种倾向。

3. 决议说：“某些同志坚持认为，在有国民党工会或黄色工会的工厂里，不能建立红色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动摇过。看了工人代表会议^②的材料，我更加坚信有必要在黄色工会里建立红色工会支部，用红色工会的纲领把黄色工会中的红色工会会员团结起来。远东局决议中指出的是事实，因为问题涉及到我，我将认真对待。但中央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中的指示，并支持在黄色工会中建立红色工会支部的做法。

这个决议总的精神是错误的。中共内最严重的危险是取消派和取消主义。决议特别注重中央的错误，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并在客观上有助于后者。如果在决议中这样说：中共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取消主义，中央犯了一些取消主义错误，那么这就完全正确了。

远东局确实为中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也有远东局领导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5—460页。

② 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做得不好的地方。中央应立即同他们讨论存在的问题，以期远东局修改前一个决议作出另一个决议。不然中央就要作出自己的决议，并把它连同相应的材料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项英：这个决议总的精神确实不好。它主要强调了中央的错误，但没有谴责中国取消派的错误。它只字未提取消派，并且幻想陈独秀将留在党内，放弃自己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并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决议在客观上会助长取消主义危险。

至于同俞作柏的谈判，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决议中的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在取消派散布流言蜚语，竭力在群众中和基层党组织中进行恶意宣传的时刻，这个决议当然会是为取消派效劳的材料，在客观上有助于他们。

至于在黄色工会中建立红色工会，在这个问题上，苏兆征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们已经表示同意。也许，远东局还觉得，我们还没有弄明白能否在同一家工厂公开存在两个工会的问题。

远东局还没有搞清楚中国问题，我们应该向它作解释。

[李]立三：在远东局的决议中没有指出它自己一贯的“右倾”错误。最初中央同远东局讨论左右倾向问题时，中央的意见是，右的危险是中共最严重的危险。当然我们同时不应削弱我们反对左倾的斗争。当时远东局不同意这个意见。第二次争论涉及游击战。远东局走到了捍卫取消游击战思想的地步。它的意见是，在目前条件下，游击战无疑会导致失败。我们问：“农民想进行游击战时我们怎么办？”远东局大致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应该教育群众，我们应该向他们作解释。”第三次争论的问题是，远东局认为为了保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稳定美英能够进行合作的看法。这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分析正相反。第四次，在讨论陈独秀问题时，远东局说，中共内右倾不会是严重的问题。我们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和托派结盟问题的严重性。可是远东局根本不理解

这种同盟的实质，它完全忽略了这种危险。决议涉及陈独秀的最后一节，证明远东局还是对他抱有幻想。陈独秀及其一伙不仅实行了取消主义路线，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团。远东局的同志同陈独秀谈过一次话，结果很失望。但是现在远东局寄希望于陈独秀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只是证明远东局一贯坚持“右倾”方针。

决议中划分了机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远东局不明白，在中国，托派就是取消派，就是机会主义者。

[周]恩来：在远东局的决议中和在我们以前同他们所进行的辩论中，他们始终表露出了对中国问题的调和主义思想。中央对中共内右倾危险的讨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共作出指示之前很久就进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说，主要危险是右倾，因此中共主要应该反对右倾。在远东局的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中央坚决反对右倾，而相反，决议抽出一些问题，加以夸大，并利用这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材料来指出中央右的错误，同时抹杀最严重的右的倾向——中共内的取消主义。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只会有助于取消派，是对取消派的调和态度。不言而喻，远东局知道，这是基本路线问题。中央几次在辩论中坚定地捍卫正确的路线，并同远东局进行讨论。远东局不把中共反对右倾的斗争作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问题上反映出了“右的”错误，而远东局自己只指出机会主义者，甚至期待陈独秀回到党内。

至于在黄色工会中建立红色工会，以前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确，但在乔治^①同志建议修改二中全会关于职工运动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在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决议之后，中央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此外，中央从未坚持过完全取消红色工会的方针。至于富农问题，过去中央无疑是犯了错误。

^① 乔治·哈迪。

但是在远东局的决议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解释是不明确的。至于俞作柏，决议中指出的根本不是事实，而蓄意夸大没有根据的材料，就是为了证明中央有右的倾向。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好。

这个决议是完全从调和主义角度来批评中央的。远东局的工作方法也是不对的。远东局在作出决议之前本应同中央商量一下。如果这个决议落入取消派之手，当然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材料。这种态度只会加剧纷争，妨碍我们的工作。此外，这个决议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根本不反对右倾。这种印象与事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此远东局负有责任。

中央要作出决定，派两三位同志去同远东局讨论决议，并要求它修改决议。或者中央应作出自己的决议并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果远东局坚持不接受我们指出的问题，那就只好派代表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对远东局的决议提出异议。还有一点：不要向政治局以外任何人讲今天讨论的情况。

[罗]登贤：决议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部分，如果落入取消派手里，对中共没有一点儿好处，而会成为他们的很好材料。远东局不明白，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不仅反对中央，而且也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不仅离开了党，而且还组织了另一个（党的）系统。忽视这个情况很不好。在其余问题上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温]裕成：昨天看了这个决议，我没有搞懂。今天经过讨论我才搞清楚。我想谈三点：

1. 总的意思是，远东局的批评没有事实根据。这也确实符合我第一次同他们交谈时他们对中共的看法，他们问我，十月举行纪念活动^①时是不是我们烧毁了“商业出版社”印刷厂。第二次，

^① 指纪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日。

他们警告我不要同军阀耍手腕。这些都证明，远东局常常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表示怀疑。

2. 始终对陈独秀没有坚定的立场。这证明。远东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调和派。他们不仅不能帮助中共反对取消派，而且相反，充当调和派。

决议证明，远东局对托派机会主义者的概念模糊不清，不了解这些取消派的本质。在其余问题上，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李] 维汉：我很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为加强远东的工作成立了远东局。但远东局只干预次要的问题，例如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一些同志的调动等问题，而不强调政治指导，因此没有起到其主要作用。我坚决反对这样的工作。

远东局的同志确实始终有右的倾向。他们同我们谈话时，掩盖了右倾危险。他们只是找中央的错误，责备中央。关于广西问题，他们几乎是在传播谣言，这些谣言在客观上助长取消主义，有助于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刚刚散布谣言，说改组派在同中共搞阴谋。远东局始终犯了右倾错误，并试图掩盖这些错误，寻找中央的错误。远东局夸大情况，针对我们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中共内调和派所讲的东西。

正当中共要征求远东局同意调动一些同志工作时，远东局根本未同我们商量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这样的工作方法完全是不对的。远东局的一位同志对共青团中央说，它应该反对同军阀耍手腕的做法。这一事实显然使人怀疑他想破坏中央的威信并唆使共青团中央反对虚构的同军阀耍手腕的做法。远东局是在远东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高的机构能这样讲话吗？至于中央在过去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决议中只字未提。例如，中央坚决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在直隶、江西、安徽、河南、广东问题上和在最严重的江苏问题上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六大的方针。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对此决议中什

么也没说，而是抽出几个小问题责备中央。如果这个决议在党内公开，那么最高领导机构即中央的威信就会受损害，并会在客观上助长各种错误倾向。至于如何解决问题，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李]立三：为了解决争论问题，需要：1. 立即同远东局举行会议；2. 起草决议，不管远东局是否接受我们指出的问题；3. 如果不接受，就立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电报；4. 中央要立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总报告。

[向]忠发：最后决定：1. 通过李立三的四点建议。2. 责成李立三起草决议。

晚上，[向]忠发同远东局会谈，请求远东局举行会议讨论决议，吸收中央参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21，第 299—305 页。

打字稿，副本。

1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①

1929年12月10日于上海

秘密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出席：奥斯藤、乔治、罗伯特、维利^②、李立三、周恩来、向忠发。

远东局建议由奥斯藤同志提出声明，然后由一位中国同志作出答复。

向忠发：我们不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大家来谈。

罗伯特：是的，每个同志都可以谈，但今天我们不可能都谈。可以确定举行另一次会议。

奥斯藤：首先，我要作两点简短的说明：1. 我们在中国工作9个月了，这期间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然，常有争论，但或是我们说服了中国同志，或是他们说服了我们，总的来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这不是对某个问题的争论。我们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写了政治局的一些右倾错误和摇摆，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认

^① 除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用英文举行的会议的记录的俄文译稿外，在档案馆里还保存有中共中央所作的记录的较短的中文译稿（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380，第7—10页）。

^② 相应为：И. А. 雷利斯基、乔治·哈迪、Г. 艾斯勒、Г. М. 别斯帕洛夫。

为这些问题有意义^①。政治局委员回敬我们说：你们有调和主义，你们是布哈林同志的拥护者^②。而这恰恰说明我们敌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党联共（布）的政策。这样的策略使我们难于同你们共事。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此艰巨，我们必须想办法，像以前那样对你们进行同志式的帮助，来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为此我们留在这里，只要共产国际信任我们，我们就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

第二点说明：决议是怎样起草的。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团是共产国际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共产国际还想了解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看法。这个决议是为共产国际起草的。因此它写得很短，没有很长的说明，仅供共产国际内部使用。很清楚，共产国际应该了解我们局对十次全会的看法。我们把这个决议的副本给了中国政治局，一是为了让同志们知道远东局对共产国际决议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因为在这个决议中我们也谈了中国党的情况。从形式上说，我们不是必须把这个决议给你们的，但我们给你们了，这表明，我们同你们共事，力求做到这样一点，即完全坦诚和保持同志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正题。李立三同志在中国政治局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我们现在在研究这次会议的记录），表示原则上同意我们的决议，但说其中有关于中国问题的三点不符合实际，没有反映中国中央的实际工作情况。这三点是：1. 农民问题；2. 俞作柏问题；3. 工会问题^③。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就这三点作出答复。

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说：“在农民问题上，总的说来中央有正

① 见第 180 号文件。

② 见第 186 号文件。

③ 见第 186 号文件。

确的路线，但经常偏离正确的路线，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在收到共产国际来信^①之后，李立三同志在我们的会议上还维护把富农分为资产阶级富农和封建主义富农的做法。我们在决议中指出了一点。我们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拿共产国际7月7日^②来信作基础。在这封信中，共产国际说，中国同志喜欢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作出机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考虑到中国富裕农民的特点，因此犯了大错误，使党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右的偏差，这对中国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接下来，共产国际信中说：“这样的观点不仅得到一些同志的赞同，而且在中央的许多关于党如何对待农民问题的决议和决定中都可以见到。”如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以下一般策略性的指示：“必须同富农结成联盟。再说我们总的路线也要求同富农结成联盟。”我不再援引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因为同志们都了解。事实是，共产国际谈到中国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代表团只是根据自己的观察重复了共产国际指出的问题。我们中国同志同意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这是右倾错误。这是在9月份的情况^③，而在12月份，同志们否认了这一点。同志们反对过这封信吗？我说信中谈的是对的。就这个问题我们彼此之间谈了很多，并且代表团对这封信作了正确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就应该要么同意这封信和代表团的看法，要么反对这封信和代表团的看法。但同志们记了两本帐：他们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但不同意代表团的看法，而代表团不过是重复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所谈的东西。这种记帐法是不对的，在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② 文件标明的日期是1929年7月7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6页）。

目前的革命高涨形势下，对党和实际工作也是不适用的。

同志们不同意我们的批评意见的第二点，是关于俞作柏问题。李立三同志说，代表团根据传闻而不是根据事实行事。我不讲我们同你们就此问题进行的许多次谈话，而这些谈话给我们造成了十分牢固的和准确无误的印象。我只讲我们可以用文件加以证实的事实。是不是广西特委发出过一份通电，要求张发奎和俞作柏结成联盟？^①中央曾采取措施反对这个通电。我不重复我们同李立三、周恩来和项英同志谈话的内容，因为我没有文件。但这样的电报是存在的，据同志们说，中央也反对发这个电报。

关于俞作柏，没有问题。代表团有东方书记处9月7日的来信^②，信中说：“在全面研究党的材料后，我们确信，党没有完全搞清楚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派，特别是同左翼改组派和第三党的关系。”我不作更多的引证。共产国际是根据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的材料写的这个情况。在共产国际来信所谈到的各个文件中，都存在这个没有搞清楚的地方，这也得到了我们亲身观察的证实，有时我们的观察还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10月12日，中央写信给鄂西第一师同志^③。在这封指示信中说，我们的同志应该同岳维峻部的负责人合作。信中还建议我们第一师的同志抛弃“在农村征累进税”的口号。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解放贫农和中农，征富农的税”。上面所指出的，不是右的倾向，不是机会主义倾向，而纯属社会民主党观点。我们说，一些领导同志对改组派抱有幻想。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说的。这一点写进了已寄给莫斯科的文件。为什么中国同志说我们说谎呢？在这里我们又发现，共产国际的看法得到了我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172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自己在当地的经验的证实，因此我们重复了这个看法。如果我们说的不对，那共产国际是会纠正我们的。我们对同志们的批评，一方面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另一方面是根据党的文件。

李立三试图据以反对我们的决议的第三点是工会问题。我们在决议中讲了什么呢？我们说，中国同志低估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同志们长时间反对建立工厂委员会，乔治^①同志可以作证。中国同志有取消红色工会的倾向。我们说的对不对呢？拿共产国际9月7日关于工会问题的来信^②说吧（中国同志说，他们接受这封信），在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必须同党内任何取消红色工会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这封信中我们还读到：“要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不只是在口头上。”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再援引了，其他同志也要谈这个问题。

我们只想提醒你们，在你们二中全会之前，即项英和乔治同志就为这次全会起草的职工运动决议进行争论时，我们是如何做工作的。多少次会议最后都没有达成协议。同项英争论时，三人^③都在场，还有我们整个代表团。二中全会后，我们多次谈到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我们的决议对不对呢？你们接受共产国际的信，可是当我们想贯彻执行这封信时，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在奉行布哈林路线。在政策上应该有一定的逻辑。同志们，你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

在我们的决议中有三点，李立三同志说你们不同意，并说我们应该作修改，否则你们就把问题提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我们向同志们声明，在我们的决议中，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国际决议

① 乔治·哈迪。

② 文件是在1929年8月30日通过的，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2—195页。

③ 可能指向忠发、李立三和周恩来。

或它的任何一个文件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决议是不能修改的。我们已经把它寄给共产国际了，而共产国际要给我们寄来它对这个决议的决定。如果共产国际肯定这个决议，那么这个决定对我们对你们都具有约束力。

我们应该说，李立三同志的第一次发言体现了党的精神，这样的发言我们可以讨论，虽然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但继李立三同志之后项英同志作了发言，他直入主题。李立三同志和项英同志应该记得，在我们二中全会前的会议上，我们曾对项英同志这样的说法提出过指责，他说，我们的意见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代表团未搞清楚中国问题，应该学习一段时间。李立三自己感到难为情，并说这是不对的。而项英同志说，这是翻译译错了。现在拿你们12月6日的谈话纪录^①来说吧。他说：“远东局自己还没有搞清楚中国问题。我们应该向它作解释。”同志们，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未能搞清楚中国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共产国际怎么能派一个不了解中国问题的代表团呢？如果共产国际能派这样一个不了解中国问题的代表团，那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本身不了解中国问题。项英同志真的认为共产国际同中国党对着干，能派代表团同中国党对着干吗？这是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他已经是第二次作这样的声明了。如果这只是项英同志个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特别去计较，但是继项英之后，政治局书记向忠发同志、政治工作领导人李立三同志、党的三个负责同志之一周恩来同志都发了言。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项英同志。向忠发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没有要求他遵守秩序。也许，项表达了你们所有人的意见，你们同意他的意见。你们是否都认为我们同中国党对着干？我们认为，你们所有人都要为项的发言负责，而不是他一个人负责。

考虑到项的发言带有反共产国际性质，我不答复这样的发言。

^① 见第186号文件。

在项同志发言之后，李立三同志作第二次发言，看来，有点儿受项同志的驱使。他一开始就攻击我们局，指责我们试图取消游击战，指责我们对美英之间关系问题的态度和对陈独秀的支持。我们来谈谈李立三发言中指出的这三点。我还要答复他的第二次发言中的最后一点，他说，机会主义者和托派是一回事。

关于取消游击战：4月11日，广东省委向同志们发出通告，说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必将引起士兵哗变，这些士兵应该到农村去，同农民一起举行暴动^①。不言而喻，在广东省委的这些指示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在一个地方讲到解除起义士兵的武装。这是4月11日的情况。7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央写信，谈到对农民的工作，说“还没有必要着手做农民工作，并直接发动土地革命、游击战和暴动。相反，中国现在的形势给党规定的任务是：利用小的冲突和扩大这些冲突，开展农民群众反对各种剥削的日常斗争，并把这种运动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上。”这是共产国际在7月7日即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讲的话。在代表团带来的二月来信中，共产国际说，在中国党内右倾危险是主要危险，同时建议同盲动主义作斗争^②。我们对广东省委的这些指示作了答复，并说这些指示是不对的。中央在第593号训令中也批评这些指示是盲动主义^③。代表团对游击战的取消主义表现在哪里呢？我们6月的意见与你们的意见和共产国际7月7日来信是一致的。

现在来看看一个月以后的情况。二中全会之前，谈到游击战时，我们同你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李立三和罗伯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经过这次辩论，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出现中东路问题和开始进攻苏联以后，以及在掀起农民斗争和我们红军采取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行动以后，我们在同你们辩论时都谈到了游击战问题，并向你们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你们接受了。我们建议你们组织、扩大和发动游击战，我们还同周恩来和项英同志谈了话，李立三同志也知道，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由此可见，中国同志对代表团的攻击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说，应该教育群众，或像李立三同志所说，应该教导群众，那我们只会是重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7月7日的来信。

周恩来：在二中全会期间我们讨论游击战问题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奥斯藤：这要拿二中全会决议来。我现在不能准确地讲出来。

周恩来：我们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说我们在二中全会前进行了讨论。

罗伯特：李立三和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还与这封信相联系谈到红军问题。讨论之后我们起草了决议。经过讨论，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再没有任何分歧了。这是在全会之前三个星期的情况。

奥斯藤：现在来谈美英问题。在这里，也像俞作柏问题一样，我们没有文件。昨天同志们提到的给代表团的信，我们还没有收到。代表团没有这样的决议。也许，在我个人给同志们的某一封信中有什么东西，因为我经常给你们写信。我还经常给你们的杂志写文章。如果你们为我提供这样的信，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可是现在我无法谈这个问题。在我个人的一个声明中（这个声明我是以文章的形式寄给你们的），我说：“美英讨论海军装备的会议，虽然不存在实现其决定的可能性，但也会使日本感到害怕。”这里绝对没有右的倾向。帝国主义者经常谈论实现不了的协议，但他们始终要谈论这种协议。我说过美英将组成联盟支持蒋介石进犯苏联吗？是的，我说过。我说过，在对苏作战中，美英将支持蒋介石和任何别的一个军阀。怎么，难道这不对吗？帝国主义者支持蒋介石和所有其他军阀反对中国革命和对苏作战。谁否认这一

点，谁就低估了反苏联盟。当然，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支持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种种矛盾。它们反对革命，反对苏联。

现在谈谈陈独秀问题。李立三同志说，代表团说过，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些同志也说，我们在中国不反对右倾错误。但同志们，你们怎么能同我们，同支持你们党内右派的代表团工作9个月呢？同志们，你们作为中国党中央委员，怎么能看到这一切而不提出抗议，不给共产国际写信，不要求把我们召回呢？我们工作得很好，可是现在你们硬说我们支持你们党内的右派。同志们，这是很无力的论据。我们反对你们党内的右派，反对托派，我们遵循共产国际书面的和口头的指示。至于陈独秀，我们也遵循共产国际的方针。我们来中国时，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斯特拉霍夫^①等同志都向我们谈了这里的情况，有什么派别，同志们是什么样，如何接近他们。在米夫和库丘莫夫签署的共产国际9月2日来信^②中说：“我们建议让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我们执行这个要求了吗？我们同陈独秀谈了吗？我们建议他写关于对党的态度的声明了吗？他写文章反对党。你们同我们商量后把他开除了。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共产国际。你们怎么能说我们幻想他能在12月份即你们已经把他开除之后回到党内和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你们在陈独秀问题上的说法是在反对共产国际，而不是在反对我们。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信来向你们证明。你们在党内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吗？是的，你们进行这种斗争，但我们认为，毕竟你们进行得不是很好。你们只是开除党员。你

^① 瞿秋白。

^② 原文如此。指1929年9月7日来信（见第172号文件，决定：5）。

们从中央开除了直隶省委的两名委员^①。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其中一人参加了国民党。但是你们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的文章多吗?作出反右倾决议的支部多吗?你们撰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小册子多吗?你们看一看苏联、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其他党。共产国际的所有党在许多年间都撰写文章、小册子等,这以后才把这些违反党纪者赶出党的队伍。我们希望你们进行这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想在这方面帮助你们。开除党员只应在被开除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进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争论。我们同你们谈反对陈独秀的运动时,曾就这个问题为你们作出过决议^②(这个决议你们已经发表),那时不存在任何分歧。我们只是要求进行这场运动要同保卫苏联这个重要问题结合起来。你们记得吗,你们向我们说过党内的某种消极性,我们建议你们把党的所有支部都动员起来,口号是:“保卫苏联和我们的实际任务”,并与这次动员工作相联系反对这位取消主义者,打倒他。你们对我们的这个建议也没有提出异议。

维利:已经10点了,我们需要把辩论延缓到下一次会议。不能拿中国同志的脑袋去冒险。明天是12月11日,街上已有严密的盯梢。下次会议在星期五举行。

周恩来同志反对休会,但他是少数。

全宗495,目录154,卷宗380,第22—31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开除中央委员王薰文和中央候补委员王仲一。

② 文件没有找到。

1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①

1929年12月13日于上海

全体出席^②。

奥斯藤^③：我们再来看记录^④。李立三同志在最后的指责中说，在我们的决议中把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区分开来了。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在周恩来同志的发言中，始终有一条红线，即远东局是搞调和主义的。周恩来同志没有指出任何例子，而是宣称，我们的整个工作始终是在搞调和。由此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他老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指责，认为我们没

① 除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用英文举行的会议的记录的俄文译稿外，在档案馆里还保存有中共中央所作的记录的较短的中文译稿（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9，第 10—13 页）。

② 见第 187 号文件。

③ И. А. 雷利斯基。

④ 见第 186 号文件。

有正确对待中国中央，因为讨论它的工作时不同中国同志商量。要知道，我们没有邀请同志们参加我们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应该明白，远东局不是向中共中央而是向共产国际提出自己对第十次全会的看法。

现在谈向忠发同志的发言。他和所有其他同志一样，说我们是调和主义者，此外他还指出，我们没有实行共产国际责成我们实行的崇高政策，而是干预中央的实际工作。但是他没有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干预给中国党的利益带来了损害，当然，他也举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例子。拿政治局委员少先队员^①的事情来说吧。我们已向向同志说过，我们认为，派少先队员去直隶是错误的，缺少他会影响政治局的工作，同志们使共青团失去了领导人。我们要求让少先队员回来是完全正确的。

下面答复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会议记录中提出的几点反对我们的意见。我们向同志们论证了我们的批评是符合共产国际路线和事实的。我们论证了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遵循共产国际路线的，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也没有必要通过像共产国际这样的党的最高机构来解决分歧。在9个月期间，同志们一直赞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方针。我们在自己的决议^②中讲了一点情况。我们说：“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错误是暂时的，同志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已经纠正了或正在纠正这些错误。”同志们要用12月6日会议记录来追求什么目的呢？中国同志要求代表团作出新的决议，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要求呢？中国同志想取得怎样的妥协呢？如果我们批评中国同志，他们会骂我们是布哈林分子，并说我们的工作反共产国际的，如果我们收回批评，那他们愿意说，我们是好同

① 关向应。

② 见第180号文件。

志。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机会主义。你们用自己的会议记录，用自己对代表团的攻击，造成了十分困难的局面，我们认为，你们是非常负责任的同志。你们有意采取了这一步骤。你们以为，在你们称我们是一伙布哈林分子之后，我们会同你们作出思想上的妥协。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认为，近9个月来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工作是正确的。我们在给共产国际的决议中作出的批评，我们也认为是正确的。这一点既得到了党内情况发展的证实，也得到了你们在我们的指导下开展的运动的证实。如果你们能指出，我们指出的错误都不存在，那我们愿意同你们讨论问题，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要以为，你们能通过讹诈来取得同我们的妥协。我们的意见是，在中国革命斗争日益加强和党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任务的时刻，你们所造成的这种局面对党没有好处。你们采取措施逼着我们用现在这种口吻讲话。我们等待你们承认自己的错误。

李立三：首先，我想作出声明并希望远东局的同志保持冷静。观察应当是客观的，那时你们才能抓住核心问题。奥斯藤同志说，他答复了我们记录中的所有问题，但实际上他没有答复任何一个核心问题。他谈的都是些小事和无关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提及。

现在我想说明政治局的核心问题。政治局对于远东局决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和国际纲领^①的第一部分的看法同远东局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决议对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谈的很少。我们认为，鉴于存在右的倾向和调和主义，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问题是很重要的。在你们的决议中对这个问题提及的很少，因此需要作一些修改。

至于决议中谈到中国党的第二部分，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是

① 原文如此。

以调和主义的精神起草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而要反对。为什么我们说第二部分暴露出了调和主义呢？因为你们指出，中国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很薄弱，还由于其他原因在中国党内存在着右的危险。这是对的。因此中央非常坚决地反对右的危险。在我们的二中全会以前和在我们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①以前，在你们来到这里以前，中国党同右的倾向进行了非常坚决的斗争。我们还指出右的危险是最危险的倾向。倾向于搞合法行动，搞和平发展和对资产阶级评价过高，这些都是右的危险，因此中央反对这些倾向。然而远东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它说右的危险和左的危险同样都是危险的。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远东局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在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和二中全会之前，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是反对右的倾向的。远东局知道这个情况，尤其知道我们反对取消派。

取消派极力要为中国中央的工作设置障碍，因此中央非常坚决地反对右的危险，认为右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在反对取消派斗争中，我们动员了从中央到支部的所有党员，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各省。在所有支部里都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决议。在我们同取消派进行了非常坚决的斗争之后，相对地说，我们是克服了这种倾向。但右的危险在党内仍然存在，仍然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它妨碍我们的工作。你们始终说中国中央同右的危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在决议中却只字未提我们反右倾的斗争。奥斯藤同志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只字不提我们反对右的危险的坚决斗争。不提我们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就会使共产国际和所有其他同志以为，中国中央没有同右的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它抵制这种斗争。当然，这是不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对的。

下面谈第二部分的第三点。决议指出，中央犯了右的错误；我们不反对这种批评；当然，中央是犯了一些右的错误。但决议中的批评夸大了错误的数量和后果。我们来看看事实。第一，决议指出，中央未搞清楚富农问题，因此对富农采取的策略不对。这个批评是对的，并符合事实，但在决议中有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这是很小的一点。我记不起来了，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援引这一点。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远东局的批评后，我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辩论中。在中国，没有一个同志不承认这些错误。我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明了这些错误，而奥斯藤同志说，我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怎么能作出这种论断呢？

第二，决议指出，中国同志不同意为了红色工会的事业到黄色工会里做工作。这也是事实。当然，中央犯了这种右的错误。但是在项英同志同乔治^①讨论了这个问题和中央谴责了项英之后，以及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所有中国同志都承认了这个错误，特别是在同你们的辩论中。（乔治：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对，这是事实。但奥斯藤说，我们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这不对。他怎么能作出这种论断呢？

第三点，决议指出了俞作柏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说，中央认为俞作柏将支持革命组织、言论自由等，还说广西省委给各地发出训令说，我们应该同张发奎和俞作柏合作并把他们同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关于俞作柏的问题，我同奥斯藤同志讨论过。中央指出了我们在广西的总的工作方针，和在军阀统治下的其他省完全一样，尤其在广西，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反对改良派的斗争。在广西，没有省委，而只有执行中央路线的特

^① 乔治·哈迪。

委。它作决议并向中央报告工作。也许，有一些在军队里工作的同志不清楚广西的形势，但他们的错误不能算到中央和特委的头上。我们手上有广西特委的工作报告和决议，可以证明这一点。远东局把俞作柏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并根据传闻起草决议，这在客观上意味着，远东局支持反对中国政治局的取消派，因为取消派利用这些传闻来反对政治局。决议明显夸大了中央右的倾向，特别是从数量方面。只字不提中央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你们也不提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首先，你们把批评整个中国党内右的危险放在第一位。这给共产国际和所有党员留下的印象是，好像中国党有右的中央。我要问你们，中国中央是右的中央吗？

第四点，决议指出了陈独秀取消派的错误。显然，这是试图减轻陈独秀的错误和取消主义。谈到对中东路问题的态度，决议只是指出，陈独秀的口号（即“不是保卫苏联，而只是同国民党的叛卖政策作斗争”）是虚伪的。当然，这是个错误，并且是个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同样严重的错误，如：反对同国民党联合，反对中国党六大和中国党二中全会，主张取消“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口号。代替这个口号陈独秀提出了召开全民代表大会（立宪会议）口号。所有这些错误，远东局都知道，但在决议中只字未提，这也是试图减轻取消派的错误。

第五点更严重。陈独秀因搞取消主义已被开除出党，他成立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党。不言而喻，远东局知道这个情况，但在决议中是这样说的：“如果陈独秀还想留在党内，他必须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奥斯藤：而对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是怎么处理的？^①）这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意味着你们还相信陈独秀，并认为

^① 可能指在 K. B. 拉狄克、Г. E. 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反对派代表人物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误入歧途之后恢复他们的党籍一事。

陈独秀还有可能回到党内。我们知道，现在陈独秀不仅是党的叛徒，而且是我们阶级的敌人。因此决议在这方面的精神，不是引导党去同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而是支持对陈独秀的信任。难道这不是调和主义？

在上述五点中，决议只字未提中央坚决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而只是抓住我们策略上的某些右的危险并加以夸大，减轻右取消派的错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同取消派作非常坚决的斗争，而远东局还是相信陈独秀会回到党内。让远东局给所有这一切起个名称吧。我只能将其称为取消主义思想。这样的方针不仅不会支持中国党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而相反，会削弱这种斗争，支持取消派。

因此我们反对这样的方针，并要求远东局纠正这个方针。不错，以前中央只字未提远东局的调和主义，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种印象。在中央和远东局的辩论和争论中，在许多场合中央搞错了，远东局作了纠正，这也是对的。有时远东局不同意中央的意见，但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它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认为，远东局的错误只是暂时的，不是政治路线错误。

但是在你们给我们这个决议后，很清楚你们有调和主义思想。因此我们把这次辩论同过去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并得出结论，远东局确实倾向于搞调和主义。没有必要详细说，我只指出几点。我认为远东局的同志会记得的。第一点：远东局的同志到来时，中央曾坚持认为，党内右的倾向是最危险的，远东局不同意这种看法。你们认为，右的危险和左的危险是同样危险的。二中全会期间，中央主张引导农民举行自发性暴动和开展游击战。但远东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坚持要求我们劝农民不要搞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的游击战。这就是说，远东局认为，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进行游击战。

第二点：从远东局给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远东局认为英美妥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只字未提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纲方面^①的冲突。中央不同意这种意见，而远东局在进行几次辩论后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得出结论。中央将反对这一点。

第三点：向同志同远东局的同志讨论陈独秀问题时，远东局的一位同志说，陈独秀和取消派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想，远东局的同志是会记得所有这些事实的。我们也可以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奥斯藤同志说，我们在以前未指出远东局的这些错误。这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种印象，而现在事实向我们表明，远东局存在调和主义。奥斯藤同志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远东局的意见，那为什么我们不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事实。当中央觉得在某些问题上不能同意远东局的意见时，它应该斗争到底。所以现在中央要求远东局纠正决议的第二部分，还要求你们纠正其精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你们知道，中央坚决反对取消派。这个决议助长了右的倾向，成了取消派反对中央的武器。奥斯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给共产国际起草的，不是给中央起草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决议必须是秘密的。如果你们不发表它，共产国际是会发表的。那么其他同志会从中得出怎样的印象呢？我不来作结论，但我希望远东局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和请求远东局满足我们修改决议的请求。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军阀战争更加激烈，党的工作也得到了很大加强，特别是在同取消派和右倾危险的斗争方面。所以我们希望远东局接受中央的意见，修改自己的决议。我们也希望，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争来争去了。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结束这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很快解决这

① 原文如此。

个问题，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很不利的影晌。

(鉴于时间已晚，会议延期到 12 月 17 日举行)。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80，第 31—38 页。

打字稿，副本。

18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的信^①

1929年12月14日于上海

秘密

远东局成员同志们：

看了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②并对它进行详细讨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以下意见：

1. 在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和分析国际形势的部分）中指出，“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破灭和帝国主义的主要内外矛盾迅速发展的时期……，承认主要矛盾的更加尖锐化，这就把世界大战的威胁提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临近了，这种威胁集中在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动上……，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者准备颠覆苏联……。在很广的和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采取合理化措施，只会加深资本主义的这些根本矛盾，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会造成加剧阶级斗争的条件……”决议还指出“资产阶级在把国家机器法西斯化，在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法西斯具有社会法西斯的特殊形式”。决议还指出“国际工人阶级明显在向左转，革命工人运动的新浪潮在日益高涨”。决议专门指出了右倾机会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洛佐夫斯基、青年共产国际、别尔津。

② 见第180号文件。

主义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的错误，并表示赞同第十次全会作出的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等的决议的精神。政治局完全同意这些意见。

但是政治局认为，只用几句话略微提一下左翼社会民主党和同它作斗争的重要性，而没有特别强调进行这种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其实，这个问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右派和调和派斗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不应该把它忽略过去。因此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决议中补充上这一点。

2. 在决议的第二部分（即在远东局看来，涉及中共领导方针的部分）中，政治局认为在其基本思想中有严重的调和主义思想。

第一，早在中共二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信^①之前，即远东局的同志刚到这里的时候，政治局就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倾向，并同党内右倾思想（如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错误的评价、倾向于搞和平发展和合法行动^②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当时远东局认为，中共党内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是同样危险的，由此远东局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最终远东局同意了中央的意见）。二中全会后，反右倾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出现中东路问题和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及其一伙同托派反对派分子联合，提出自己的取消主义思想，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党的六大和二中全会路线之后，中央更加坚决地从各个方面谴责了他们的错误，并向从中央到支部的所有党员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同这些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迄今为止大多数党员的一致意见已经战胜了那个取消主义路线（当然，反对右倾取消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② 原文如此。

主义的斗争依然是党内最重大的问题），并开除了几名顽固坚持取消主义路线的党员。这个事实，一方面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和它对于中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证明中央对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态度是坚定的和中央始终反对右的倾向。远东局的决议只字不提中共坚决反对右的倾向的斗争，而相反，强调说，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这当然会促使同志们错误地认为，中央特别抵制反右倾的斗争。

第二，远东局指出，中央对富农有不正确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在黄色工会中的策略，有一些同志坚持认为，不能在有政府工会或黄色工会的工厂里建立红色工会。远东局认为，这是右的倾向。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完全接受这个批评。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运动和职工运动的指示信^①后和在远东局批评中央之后，坚决纠正了这些错误并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关于广西问题，决议说：“在最近的军阀斗争期间，政治局倾向于认为广西军阀俞作柏是建立革命组织自由、出版自由等的捍卫者。广西省委没有及时得到政治局的明确指示，同俞作柏就我们在他的军队中的工作和一旦他取得胜利后的前景问题进行了谈判。由于进行了这次谈判，广西地委通过发电命令各地组织举行群众运动来支持张发奎和俞作柏结盟，同时指出，如果这个联盟不能建立，那我们党就要着手建立独立的游击队。”这无论如何不是事实。毫无疑问，这是根据毫无根据的传闻在夸大中央的右倾错误。远东局在批评党内右的危险时，首先指责中央有右的倾向，把批评中央右的倾向作为决议的主要部分，而把对取消派的批评不过是不加任何强调地放在最后一节。这种酌量的批评表明，远东局低估了取消派的危险和过高估计了中央右的倾向。同时远东局没有指出中央坚定地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可以肯定他说，这会助长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195页。

“右倾”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已是党内的严重问题。调和派说：“确实，取消派不对，但中央也犯了错误：双方彼此都应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的意见几乎与此相吻合。

第三，至于对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决议只是指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反对“保卫苏联”口号的讲话是错误的，而不管他公开抵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路线和党的六大和二中全会决议的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不管他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党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等问题上的严重取消主义。这不过是在减轻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右倾错误。

第四，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央同陈独秀及其一伙进行坚决斗争之后，在党内，从省委一直到支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全党一致起来同取消主义路线作斗争。但是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追随者不仅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右倾思想，而且走得更远，用最卑鄙的手段破坏党的组织，甚至同工贼和已背叛党的原党员联合在一起。显然，他们从党的反对派阵营转到了阶级敌人的阵营。因此中央坚决地把他们开除出了党。但远东局的决议说：“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队伍内，只有在他们放弃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承认和实行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显然，这是对“右派”抱有幻想，是对同他们的斗争持摇摆立场，在客观上否定中央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决定。在同取消派进行严肃斗争的现阶段，对取消派抱有幻想并对反对他们的斗争采取摇摆立场，不向同志们指出同他们作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在我们看来，这不能是别的，只能是调和主义。

由此可见，远东局一方面不提中央反右倾斗争，夸大中央的一些策略上的和局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减轻右倾取消派的错误，对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出党采取摇摆的立场。显然，远东局对中共反右派斗争持调和主义态度。政治局认为，这种削弱党

反右倾斗争并在客观上为右派，特别是调和派创造体面的借口的方针，对实行党的正确路线是十分有害的，并背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精神 and 路线。因此政治局坚决要求远东局端正决议后一部分的根本思想^①。

目前党内右的倾向之所以有发展，是因为全世界的阶级对抗在加强。将要发生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吓坏了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撤退，甚至转到敌人阵营。中共中有很敏感的产业工人阶层，容易犯右倾错误。甚至那些坚决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同志，常常也会无意识地犯右倾错误。如果远东局考虑这一点并尖锐地批评取消派，如果预先警告中央并批评它所犯的右倾错误，那么政治局毫无疑问会接受这种批评并会坚决执行它的指示。然而这个决议的调和主义思想无疑会削弱反右倾斗争，政治局决不会接受，而会坚决反对。

此外，政治局觉得，远东局的同志在对中共的指导工作中也犯有右倾错误，例如，认为中共内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是同样危险的，试图阻止进行游击战，缩小英美在所有中国问题上的对抗性，认为取消派问题不严重等等。虽然远东局应中央的坚决要求放弃了这些思想，但它还是应该将这些问题简要地提及一下，以便中共的同志有个正式^②而清楚的了解。要知道，政治局的所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尽管这些问题还没有涉及党的各级组织。

上面所说的是政治局对远东局决议的意见，提出这些意见是希望远东局给我们作出答复。

最后，我们觉得，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阀战争变得越来越复杂，群众的革命斗争越来越发展，因此党的工作应该大大加强。政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治局希望，迅速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以不致影响我们的工作。
希望远东局接受这些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政治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1，第 58—62 页。

打字稿，副本。

190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 171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12 月 16 日于莫斯科

听取：4——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调查结果（见中央书记处 1929 年 11 月 6 日决定，第 164 号记录，决定：6）

决定：4——决定（见特别文件）。

（1）赞同委员会^①的结论。

认为必须立即根据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着手改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2）认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极其不能令人满意，根本不能保证学校完成成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

（3）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鼓动出版部同中共中央一起根据对党支部进行清查的材料组织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人员的清查工作。

在学校里只留下毫无疑问经过审查忠实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那些以自己积极参加中国革命的行动证明自己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

为留下来的学生修订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学习期限。

（4）责成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

^① 指 1929 年 11 月 6 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的以 K. И. 基萨诺娃为首的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

动出版部同中共中央一起保证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补充中共的同志，即经过革命考验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

(5) 关于成立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现有的（外国）部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成殖民地大学的问题，交由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出版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仔细研究，以便最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中央书记处提出相应的建议。

(6) 预先决定解除威格尔同志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工作，责成他在新校长到来之前继续工作。

(7)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在一周内确定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的人选并提交中央批准。

中央书记

抄送：斯捷茨基、皮亚特尼茨基和威格尔同志

[附录]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一、对组织局 1929 年 1 月 7 日指示的执行情况^①

对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工作性质、方法和内容作出仔细分析后，委员会一致得出以下结论：

1.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根本不能保证学校完成成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

^① 见第 143 号文件。

务。

2.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基本上还是中央委员会（季曼施泰因委员会^①）在1928年指出的那些。

3. 组织局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当中彻底消灭派别纠纷和斗争的决定和关于在学生当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亲密关系的决定，都没有得到执行，由于没有对学生的质量构成作出果断的改变和没有对学校进行根本的改组，也不可能得到执行。

4.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同一决定中关于加强莫斯科州委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的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

至于哈莫夫尼切斯基区委，必须指出，其领导工作主要表现在作一般的指示上，即指出克服不足之处的手段和方法，而没有采取组织措施来加强这些政治性质和具体组织性质的指示。

5. 中央关于必须采取措施消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成份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新的招生方法，在接收工人成份的学生方面，不比老的方法好。

6. 未为学生组织生产实践和党的实践活动，在这方面只采取了初步的措施：为部分学生安排了生产教学，但据学校教学部承认，这项工作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7.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科研工作人员、教员、教研室领导、班主任、管委会成员等干部都没有保证。

8. 没有必要数量的能够保证对党的工作的领导，能够保证在学生集体中和在党小组中做政治工作，并能够为党的积极分子队

^① 指1928年9月21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的以C. M. 季曼施泰因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详见全宗17，目录113，卷宗687，第4、25.52—61页。

伍奠定牢固的布尔什维克基础的具有布尔什维克素质的党务工作骨干。

9. 目前对党组织进行的清查表明，党组织确实处于严重的病态，党的力量极其薄弱。

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政治状况

10.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总的政治状况的特点是，在支部生活中有以下政治上的、实践中的和日常生活中的反常现象：

- (1) 国民党主义。
- (2) 取消主义。
- (3) 颓废情绪。
- (4) 在中国形势问题上和中共任务上的右倾观点。
- (5) 反对党的路线，号召反对党的政策。
- (6) 调和主义。
- (7) 托洛茨基主义。
- (8) 民族主义。
- (9) 违反党的纪律和学习纪律。
- (10) 小资产阶级的绝对民主和公正要求。
- (11) 群众和领导有隔阂。
- (12) 对党的领导机构缺少起码的信任。
- (13) 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个人吵架斗殴。

在不同的时间，右倾观点在会议上、在小组里、在文章中和在墙报上都有表现，并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社会民主主义估计上（认为中国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统一起来，否定革命的前途，过高估计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等等）、对同富农联合的捍卫上和对中共任务的错误估计上（错误地解释六大的决议，公开和隐蔽地保护中共内的右派，过高估计经济斗争的意义和忽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等等）

造成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种极其严重的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

（1）学生的社会成份。尽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共（布）中央和党的下级机构不止一次地作出指示，要求将学生成份坚决实行工人化，但大多数学生就其社会成份和政治状况而言，都是不能满足为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所必需的条件和要求的。就是现在大多数学生还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失去阶级性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原国民党人，其中包括右派）组成，他们没有同他们所出身的那些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和情绪彻底决裂，部分人仍然通过氏族、经济和政治关系保持着联系，他们还没有彻底放弃国民党的观点和传统，虽然他们现在都是中共党员和联共（布）候补党员。在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是对1929年10月1日学生情况的统计材料。

总数 488 人的比例关系

社会出身		社会成份	
工人	9.7	学生	30.2
官吏和军官	5.7	农民	3.0
农民	0.4	教员、医生和工程师	14.6
教员	13.3	工人	27.9*
商人	21.6	职员	5.3
工厂主	3.0	军人	0.4
职员、知识分子	6.8	不明确者	18.6
不明确者	9.5		
			100%

100%^① *数字 27.9 很令人怀疑。

他们当中多数人来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时，带有在资

① 原文如此。

产阶级高等和中等学校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例如，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有 201 人，高等学校肄业的有 117 人，毕业的有 63 人（多数留学欧洲大学）。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的这种社会政治成份，也是所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摇摆的基础，有时也是直接反革命思想摇摆的基础，这种思想摇摆在目前的学生成份当中经常出现，决定了多数中国支部成员的思想观点在政治上的普遍不稳定。

(2) 中国反动派的现时统治。中国共产党总的状况、中共领导内部存在的政治分歧向学生中的转移。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和联共（布）同各种倾向的斗争。

(3)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历史中的国民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时期。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的侨居状况，他们脱离中国工人群众，同时同联共（布）广大党员群众和无产阶级群众及苏联生产生活完全隔绝，同国际环境完全隔绝。

(4) 学校的困难状况，此外，由于领导的缺点和错误而变得更加重了。支部局在工作中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同各种倾向作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正确地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右的倾向、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取消主义和同颓废情绪的斗争上，同时没有削弱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但它未能使这种斗争变得十分有效，结果思想争斗占了上风。这种斗争没有从组织上给以加强，也不是很深入，同时没有从集体中清除出思想上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支部领导不善于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由工人和学生当中经过审查的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牢固的共产主义核心。无论支部局还是管委会都没有从他们中培养骨干力量，本可以依靠他们顺利地进行同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工作和使学校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作。

自然，在领导和很大一部分较好的学生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

无论支部局还是管委会都没有系统地研究每个学生的社会政治面目，因此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都没有搞清楚学生的各种各样社会政治派别和与这些派别相联系的各种政治见解和色彩。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没有为争取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为自己建立工人基础，这无疑降低了争取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工作的效力，造成其不够深入，应该承认这是学校支部局和管委会的一个政治错误。

(5) 吸收学生参加苏联群众性社会团体的文化政治生活的工作做得很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做过实际的群众性工作。支部局对于改善整个学校机构的工作系统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没有吸收学生群众参加这项工作。进行自我批评时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主要不足是：由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政治形势特别紧张，围绕学校机构的具体措施进行的批评没有充分展开；第二个不足是：有时自我批评越出了党的批评范围，笼统地指责学校说，学校是“剥削群众的最高形式”。

(6) 学校领导和哈莫夫尼切斯基区委的政治错误是成立了独立于学生集体的俄国支部。

(7)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极其严重的政治状况，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正确而有力的领导造成的。

三、共青团组织的成份和政治状况

共青团组织的政治状况极其不能令人满意。就社会成份而言，共青团组织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以下数字说明了这个支部的社会成份的特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占39%，出身于大中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占42.5%，只有21.5%出身于农民和工人），没有实际参加日常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脱离苏联工人群众，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影响下，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有分歧意见

的情况下，不是统一的政治组织。从说明支部特点的所有材料中，可以归结出在支部生活中存在的在政治上、在实践中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说明党的集体的状况的特点：

1. 国民党主义，
2. 取消主义，
3. 托洛茨基主义，
4. 右的倾向和调和主义，
5. 小资产阶级的公正和绝对民主要求，
6. 违反纪律，
7. 对民主集中制缺少起码的理解、对党的领导机构缺少起码的信任，
8. 个人斗殴、颓废情绪，等等，等等。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区委不得不解散支部局和任命组织局，现在该局在制定根除所有缺点和加强工作的具体措施。

四、对教学工作总的评价

中央的基本指示（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由国民党大学改为共产主义大学）要求学校领导不仅要改变学生的社会成份、党的教育工作，而且要改变整个教学工作。

那么中央对学校这个方面工作的指示完成的怎么样呢？

1. 根据中央的决定修订了教学计划：苏联建设课由2小时增加到X^①小时，增加了联共（布）党史课的课时。增设了共产国际史课，共200小时。大大增加了中国学课程（中国阶级斗争史、中国经济、中共党史）的课时，总共284小时。

2. 党建课课时由4小时增加到6小时。具有最大意义的是学生开始在企业里进行实际工作。为部分学生安排了生产教学，部分在大型工厂里进行，部分在中央劳动研究所修理厂里进行。这项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远没有包括所有学生，并且在安排上还有许多问题。但这项工作取得的进展具有更大的意义，打破了无法在企业里为中国学生安排实际工作的神话。

3. 为了使学生在理论课结束后受到更专业化的培训和实际

① 原文如此。

的训练，为他们安排了党建、工会运动和共青团方面的专门工作（6个月）。专业化培训方面的基本工作计划安排在大型企业里进行。暂时还不好说这种实际训练的效果如何，因为还没有一期毕业生。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前的产品，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4. 教学大纲基本上是根据其他共产主义高等学校的大纲类型制定的。

5. 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体制和方法方面，根据中央任命的调查委员会的指示，采用了实验室授课计划。但在实行中存在一些大的缺陷：实验室授课计划和方法在许多场合是机械进行的，做的练习不能令人满意，学生独立的工作安排得不够，讨论会带有检查复习性质。最大的缺陷是对学生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统计做得很差。教研室和实验室的设备安装刚刚开始。

6. 最近提出和开始解决一些与改进教学工作有关的问题：课程调整为连续进行，在各小组之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劳动纪律性有所提高，准备对学生工作进行认真的个人统计。

但是，尽管采取上述措施，解决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学计划中的主要问题还没有保证，就是说要这样来安排整个教学工作，使教授理论课同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以便学生毕业后能够运用他们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他们的党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

（1）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科研人员、教员、教研室领导、班主任、管委会成员和翻译等干部没有保证。甚至在有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和教员的情况下，一些工作人员的校外超负荷任务，也使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满意地领导教研室的工作。例如（教授中国经济的）马季亚尔同志和（教授中共党史的）库丘莫夫同志忙于共产国际的工作。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是《真理报》编辑之一，主编《文化革命》和《工人与艺术》杂志。

其他教研室主任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只有两位教研室主任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主要工作岗位上工作。

中国阶级斗争史、党建、汉语等教研室根本没有主任。在多数教研室研究生也是兼职的，有 11 人；有 8 个教研室根本没有研究生。目前没有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的教员骨干；下面是证明这种状况的数字材料：在 70 名教员中只有 10 名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成员；不了解中国的有 50 人。

大致缺少 8 名笔译翻译和 22 名口译翻译，现在由掌握俄语的三年级学生代替。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研室的这种状况根本不能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和必要的开展。还必须补充说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部没有教员办公室主任和党务办公室主任，并且有两个班主任是暂时的。

(2) 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学计划中的特殊任务联系在一起科研工作没有保证。

(3) 编写中文教材的工作远不能应付裕如，而一些重要课程（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国际史、中国史）没有教材保证。

(4) 对无产阶级部分学生的帮助没有保证，他们多数是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在汉语方面也是这样；译文大部分是不够的。没有安排辅导课。

(5) 虽然教学计划根据中央的决定做了修订，但由于上述原因无法实行。

(6) 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组织，但在这方面开始做的一点尝试证明，绝对可以在企业里为中国学生安排实际工作。

(7) 在教学生活中，最大的不足是教员和翻译不来上课和迟到。学生的劳动纪律性差。甚至对课程漫不经心。

(8) 这一年开始前，根本没有让学生参加有组织有步骤的工作，只是现在才在这方面采取一点措施。

(9) 在克里米亚休息一个月后，学生回来有一种坚定的打算：不解决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政治问题，就不着手进行工作。教学部召开的会议不是认真地讨论问题，而变成了吵架，最后以斗殴告终。

(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没有真正给以支持，而且东方书记处还调走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离开给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由此可见，组织局给宣传鼓动出版部下达的关于必须监视执行中央作出的决定和实行改进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的措施的指示，宣传鼓动出版部没有执行。

委员会一致得出以下结论：

1.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基本上还是中央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在 1928 年指出的那些。

2. 委员会的建议和组织局 1929 年 1 月 7 日的指示基本上没有实行。

3. 由于所有上述情况，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没有从国民党大学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大学。

4.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

对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途，委员会没有统一的意见。基萨诺娃、彼得斯和普舍尼岑同志主张取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而布拉特、果帕涅尔和塔里同志反对取消，主张从根本上进行改造。

普舍尼岑、彼得斯和基萨诺娃同志 提出的意见的理由

由中国新的革命高潮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全国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迫切要求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受过严

格训练的干部。

无须证明，现在从经审查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培养这些干部，只有在苏维埃国家，只有在莫斯科进行才有保证。但要做这项工作，必须保证有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党的教育、政治教育和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教育的体制。这种教育的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不能还是我们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所看到的那些。这种教育不应该只是书本上的，领会列宁主义基础不应该是有限的、教条主义的。要记住列宁的话：“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① 理论要解决实践问题，要经受日常经验的检验，而这这就要求为脱离直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产基地，使他们能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能学习联共（布）在夺取政权方面、在准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以及在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方面的整个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经验。应该建立他们（中国共产党人）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日常固定联系。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这种日常联系，不仅可以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使他们日益腐化堕落的白色侨民气氛，而且能够创造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在日常实践中，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能接触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迫切的问题，接触到一些国家、一些共产党那里的生活问题和斗争条件。这样的基地不需要人为地去创建，它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国际列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1卷，第302页（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94页）。

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国际列宁学校有 47 个党的代表，而且成立了用汉语教课的中国部。

国际环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可以使其免遭白色侨民所具有的各种病症的传染，避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国家有限的利益范围之内，并摆脱这个范围转到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和在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之间的争论中得到思想上的列宁主义锻炼的环境中去。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宜作为独立的学校存在的第二个理由是，经过大清查，那里各年级恐怕只剩下 100 到 120 多人。此外，据医疗统计，70% 的学生患神经性疾病和肺病，我们事先可以预计，无产阶级部分遭受这方面痛苦的人数最多，而正是这部分人受到清查的威胁最少。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经过清查能够留下来的人数，由于上述原因还会减少。

第三个理由是，补充新生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据（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声明，现在我们不能指望每年为所有学校，即国际列宁学校、军事学校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收多于 75 人的新生。其证明是中共中央 1929 年 7 月 2 日来信。

“由于许多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派来的工人同志很少。一是在全国，健康的支部很少，被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同志寥寥无几。我们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新干部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是中国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即便有一些同志，在党看来可以派他们到莫斯科去学习，但这些同志本身对去莫斯科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他们觉得：‘我学不了。’三是中国工人当中很多人患有疾病：眼病、肺病和梅毒，而这种情况使我们很难进行挑选。去年派去许多优秀的中国工人同志，但他们到达赤塔经体检后被送了回来。近年来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并经历许多重大

战斗的同志几乎都没有好的身体，这就使他们不适于派到莫斯科去。最后，多数中国工人都有家庭负担，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此他们不能离开中国。由于所有这些情况，派去的工人同志很少。当然，我们不会停止挑选并会尽量派工人去。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的事情。”

现在党的工人成份不到 5000 人。党要派出多于指定的人数，就不会不给工作造成损失。

此外，中共中央代表作出原则性声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世隔绝，不能消除产生派别斗争、无政府混乱状态、孤僻和庸俗的偏见的原因；这种隔绝状态将是中国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有人建议把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工作交给国际列宁学校。

1.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作为独立单位存在，还会造成多余的、不必要的开支（设立单独的行政管理机构等）。

2. 取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个独立单位，会影响为中共培养干部工作的集中，影响为这项工作聚集科研力量和党的力量。

至于说取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建议，似乎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革命形势，但这个论据很容易这样来加以驳斥：我们不是建议取消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这项工作本身。我们只是建议修改培训体制、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我们建议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出发重新加以武装。中共的任务是由目前的时期，即新的革命高潮兴起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旗帜下聚集革命群众的时期决定的。

在中共中央代表向委员会作出的声明中写道：“取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这样的‘取消主义’，是用集体经济的机器取代小农的木制耕具。”

我们建议：

1. 承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作为独立单位的存在不能保证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干部。

2. 立即着手在清党基础上进行大清查。在学校里无疑只留下经审查忠实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那些以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动证明自己忠诚的知识分子。

3. 为留下来的学生修订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学习期限。

4. 将留下来的学生交给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相应的部。

5. 现在要制定补充新生的指示和原则（要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

布拉特、塔里和果普涅尔同志反对取消，主张改组。

同志们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取消学校是错误的方针，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革命形势。把大清查后留下来的学生交给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意味着分散力量和分散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物质方面积累的所有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此外，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交给国际列宁学校会降低国际列宁学校的水平，这个学校的任务是要成为所有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高级党校。

一旦取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建议不被采纳，委员会会一致提出为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所必要的建议方案。

关于改造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建议

为使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为真正能够为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并使这些干部结合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了解马列主义理论和善于在工作中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和政治方面的经验，必须做到：

1. 立即对全体学生进行大清查，清除阶级异己分子、思想动摇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留下来的只能是经过审查的、可靠的工人和农民、小手工业者和那些已经以参加中国革命的行动表明自己忠诚的知识分子。

2. 用新生力量加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人员的领导班子。

3. 根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上述目标和任务更新和加强行政管理、技术和教学组成人员

4. 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整个教学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之尽量接近生产，并安排对（冶金、纺织、铁路专业的）一些生产程序的认真学习，而且不少于一半的生产实践活动，学生应该直接在工厂里进行，同时要积极参加我们企业的整个生产活动、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

5. 在修订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工作方法时，要注意使之不仅要适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整个任务，而且要适应它的无产阶级成份。

6. 保证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有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教学干部，要满足各个阶段在校学生的需要，为此要对教员和翻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动员，并把他们配备给学校。满负荷地保证对中国基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7. 立即着手从中国同志中培训教员，以便保证和向俄国同志提出学习汉语的任务，逐渐保证用汉语授课。

8. 在加快中国化的同时，学校要想方设法加强（包括靠俄国汉学家来加强）俄语教学，以期至少在最后一个学年学生能根据俄文原著领会基本的马列主义理论文献。

9. 造就翻译干部，并为他们安排能够保证提高他们理论素养的工作，目的不仅在于编写必要的教材，而且也在于编写一些服务于中国群众性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

10. 成立学术委员会，制定基本的中文马列主义术语。

11. 用布尔什维克汉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加强科研工作。并把该所同计划成立的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家协会和东方学学会联系在一起。

12. 在通过中国共产党直接从中国招生的同时，还要做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的补充工作，减少每年招收 75 人的定额。每年也可以从定居在苏联各地、经历过卫国战争并有在我们的企业里和党内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招收 50 人左右。

13. 认为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变成就中共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进行争斗的舞台是不正常的，支部的整个党的教育工作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作出的指示进行。

14. 取消俄国行会支部，将所有共产党员并入学校总支部。莫斯科州委和革命委员会要采取一些措施，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学校俄国党员的核心力量。认为学校支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中国人，而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队伍，通过让中国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党的工作、苏维埃工作和群众工作和通过同生产的联系，使清查后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部分学生布尔什维克化。

15. 在最短期限内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大清查。为了准备鉴定材料和清查用的材料，成立由革命委员会、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央和国际监委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16. 联共（布）区委和全苏列宁共青团革命委员会要制定和实行一些实际措施，想方设法加强和改进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的工作。

17. 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以及莫斯科州委和革命委员会应该保证在这方面给以果断而紧急的帮助。

18. 在作出本决议 6 个月后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具体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中央提出为东方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必要性问题。

中国、印度、安的列斯群岛、南美、墨西哥、巴勒斯坦等地的运动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由于缺少干部和工作经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共产党工作的极端薄弱、完全缺少领导反帝同盟的共产党干部，等等，现在很尖锐地提出了为这种运动奠定布尔什维克理论基础的必要性问题和为这种革命运动造就领导干部的必要性问题。

中国的经验表明，培训这些干部的工作，我们做得太迟了。中国的经验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造就这些干部的迫切性。而我们自己的经验，即联共（布）的经验表明，培养干部的工作不仅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从由战争威胁所产生的任务的角度和从夺权斗争的角度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从夺取政权后为完成伟大任务时期掌握政权的角度来说也是必要的。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日益发展的运动培养干部的任务，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殖民地共产主义大学来解决，并可以把准备到殖民地国家工作的欧洲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列为该校学生。

要根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经验组建这所大学，并把中国部列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这个建议。

所附的一个学生年学习费用表，说明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5/1926 学年至 1928/1929 学年间的费用，总额为 4443037 卢布，不包括外汇开支（见下页）。同时必须注意到，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走上工作的 146 人中，党只使用了 33 人，40 人转到了反革命阵营，而其余人处在这两个阵营之间。

全宗 17，目录 161，卷宗 15，第 1—2、5—22 页。

记录为手写稿，原件，无签字，附录为打字稿，原件。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5—1926 学年至 1928—1929 学年即四年间一个学生一年的学习费用

	1925—1926		1926—1927		1927—1928	
	400人预算 经费 770001	268人开支 770001	600名学生 经费 1313694	488名学生 开支 1303729	750人预算 经费 1029495	557人开支 1041559
一个学生						
1. 工资	523—75	791—54	698—44	759—50	494—69	745—45
2. 管理费	101—88	165—96	111—16	142—45	124—33	200—83
3. 组织费	167—87	248—73	101—16	142—49	146—48	42—90
4. 生活费	588—38	850—00	825—80	1016—92	476—50	629—80
5. 学习费	267—62	361—48	143—34	207—18	97—33	187—30
6. 大修费	168—00	299—45	309—59	403—04	33—33	63—09
7. 疗养费	107—50	155—98	—	—	—	—
总计	1925—00	2873—14	2189—49	2671—58	1372—56	1869—37

续表

	1928—1929		1925/26—1928/29		1人开支与经费相比	
	750人预算 经费 147900	591名学生 开支 1327748	2870名教员 经费 4592190	1904名教员 开支 4443037	多出	占开支总额
一个学生						
1. 工资	714—23	748—42	2431—11	3044—91	613—80	6.4%
2. 管理费	113—33	143—82	450—70	653—06	202—36	2.1%
3. 组织费	150—10	136—66	565—61	570—78	5—17	—
4. 生活费	623—22	702—65	2513—90	3199—37	685—47	7.3%
5. 学习费	303—12	371—18	811—41	1127—14	315—73	3.3%
6. 大修费	68—00	143—88	578—92	909—46	330—54	3.4%
7. 疗养费	—	—	107—50	155—98	48—48	0.5%
总计	1972—00	2246—61	7459—15	9660—70	2201—55	23%

注1:如果1925—1926学年开支是100%,1926—1927学年是96%,1927—1928学年是90%,1928—1929学年是95%,那么后来平均降低7%。同样如果1925—1926学年开支是100%,1926—1927学年是86%,1927—1928学年是121%,1928—1929学年是86%,那么后来平均降低4%。

注2:如果根据2870名学生在4年的预算经费4592190卢布和1904人的实际开支4443037卢布计算,那么在学生满足额的情况下,开支总额会是6697319卢布,即比预算经费多出2105129卢布,或多43.7%。

1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①

1929年12月17日于上海

全体出席^②。

罗伯特^③：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④中，我们简要地谈了在我们看来中共政治局的最重大错误。我们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政治局有错误和摇摆。但总的来说路线是正确的，因为政治局纠正了这些错误。为什么我们就谈这三个问题呢？因为只有通过无条件无保留的纠正这些错误，不仅在长篇通告中和12小时的发言中加以纠正，不仅在口头上加以纠正，不仅通过学院式的和理论上的承认来加以纠正，而且在整个实际工作中和在整个日常的组织和鼓动工作中加以纠正，党的领导才能够完成中国党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我们谈了红色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谈论在群众中的革命工作，而对这个问题上又不很清楚，那只能是瞎扯。为使你们在这个问

① 除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用英文举行的会议的记录的俄文译稿外，在档案馆里保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较短的中文记录译稿（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489，第14—18页）。

② 见第187号文件。

③ Г. 埃斯勒。

④ 见第180号文件。

题上纠正错误，我们争斗了几个月。难道你们没有阐述这样的理论：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一个工厂里不能有两个工会？难道实际上这不是取消红色工会的理论？因为它们的数量与国民党工会相比是很少的。这个问题不仅与白色恐怖有关，并且不是偶然现象，而你们的整个立场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的。你们能否认你们阐述了取消中国工人的革命传统之一——建立红色工会的理论吗？如果实行正确的政策，这一传统就会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动员作用。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特别是同项英同志斗争了多久啊！当时项英同志客气地声称，我们的指示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应用于中国，他和政治局最终还是还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错误，没有纠正策略。

当然，你们在辩论工会问题期间，一直反对右的倾向，写了很多文章，讲了很多话，经常指责党和工人群众摇摆和落后。但是你们不想承认，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由于你们在你们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难面前表现出一定的软弱，你们对右的倾向、对我们党的一般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员的不理解和消极情绪是负有责任的。党员犯错误时，你们的药方是：打他的头。但你们犯这种错误，我们提醒你们，讲你们的责任时，你们想打我们的头。确实，你们在我们的指导下同右的危险作了斗争，尽管你们自己在工会问题和工会工作问题上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办。但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你们没有给党作出正确的指导，并且你们本身有右的倾向。由于我们在决议中指出了这一点，同时指出了你们终归还是纠正了这个错误，李立三同志就出面以政治局名义说：“这个决议是以调和主义的精神起草的；请你们去掉调和主义，写出称赞我们的新的决议来。”同志们，我有些难为情，因为你们好像还不明白工会工作在中国的意义。否则不能理解，像你们这样聪明和负责的同志竟宣称：“谁指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我们就同谁斗争到底”。你们在这次斗争中开始使用一些手段（我在下面要更详细

地谈），说明你们有走上歧途的一定危险，因为这也是你们的斗争的政治意义所在，你们显然还没有完全理解革命工会工作的整个意义。否则你们不会这样激动，不会攻击我们指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决议（我要说，不是不带有某种派性思想）。同志们，谁也没有指责你们说，你们是右的中央。但是你们对我们指出你们主要错误的做法（这是我们履行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所作出的反应，说明你们有走上歧途的危险。这条道路会使你们采取十分错误的立场，而不是去掌握最好的策略，当然在实行最好的策略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犯错误，但为了党的利益和进行较好的领导是会纠正这些错误的。

决议还涉及另一个对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和我们发现你们那里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确实，我们的决议没有过于详细地谈你们的美德。这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决议表述了我们对中共政治局在一些十分重要问题上的立场的印象和观察。而对所谓“左翼”军阀和改组派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中共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想承认，你们对俞作柏有过幻想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舞台上又出现了这个“左翼”军阀，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过能否接收他人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据李立三讲，它是在中央的专门和直接领导之下）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在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我们经常告诫同志们不要去同左翼军阀搞任何联合。确实，我们经常告诫你们，经常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有某种搞不清楚的地方和摇摆，因为我们的责任是警告已在萌芽中的这种错误；其实，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会在中国有为所谓左翼军阀设立的舞台，他们会不止一

次地尝试同我们的党组织进行周旋。左翼军阀，确实是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他们企图控制起义的群众，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你们要想想过去的沉痛教训和党在这方面所犯的极为有害的错误。由于我们在决议中谈了政治局在这个在党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的一时摇摆，李立三就以政治局的名义声称：“你们的决议是调和主义的，请你们修改这个决议，并要称赞我们反对右倾的斗争。”

当然，后来政治局痛斥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特委。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决议和发言中你们写了和讲了反对左翼军阀的话，但你们要进行自我批评，要主动赞同这样的看法：你们本身的一些摇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下面党组织的摇摆负有责任的。你们根本不想这样做。你们想编出政治局完全没有任何过错的理论，并把错误都归咎于党和工人群众。

在这里还必须谈谈你们反对改组派的斗争。你们指责奥斯特廉^①同志说，他过高估计了改组派，并针对这种估计提出了以下所谓革命的理论：在中国，没有工人贵族的基础，因此左的和右的改良主义在中国都是很短命的。大家都很清楚，在中国，工人贵族没有广泛的基础，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归根到底，不可战胜的革命在中国会得到加强，归根到底，国民党及其左右派要彻底垮台。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政治局不是谈论国民党不可避免要垮台的哲学，而是为促使国民党的彻底垮台进行加以正确领导的坚决斗争，那么国民党的垮台会到来得更快。可是过去旨在使改组派遭到彻底失败的日常工作做得怎么样呢？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被这种似乎革命的哲学搞得大大失去了作用。三个多月以前，我在翻阅了你们的报刊之后，以远东局的名义给宣传鼓动部写了一封信（由于地下状态造成的一些困难，我无法同宣传鼓动部负

^① H. A. 雷利斯基。

责人李立三同志见面），指出在我们的日常报刊中完全缺少反对改组派的运动^①。在后来同李立三和向〔忠发〕的辩论中，他们二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个缺点，但两个月过去后，直至现在，没有看出你们的报刊有什么大的改进。我们不得不给你们写另一封警告性的信^②。现在总结一下这些情况（你们在关于俞作柏问题上的摇摆、实际上缺少认真的反对改组派的运动），难道我们在决议中指出这个错误时有夸大吗？当然，你们写了反对改组派的长篇通告，但你们对需要从我们的报刊中得到我们的日常口号的群众作适当的引导了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的立场对党的倾向也负有责任吗？难道你们不明白，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也要求你们表现出自我批评精神和接受批评吗？由于我们在决议中指出了这一点，李立三就以政治局名义要求修改这个决议的“调和主义的精神”和完全承认政治局进行了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

我不多谈我们决议的第三个原则性问题，即富农问题，因为奥斯藤同志已经作了足够的说明。我只提醒你们在我出席的二中全会会议上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来自广东的一位同志^③报告了以下情况：“在一些农村，农民在我们的领导下，成功地开展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党的组织为了富农的利益，拒绝了贫雇农的要求。这在农民当中引起了很大变化，后因反动派的反攻他们遭到了失败。”当然，你们批评了这些同志，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是否对这种摇摆也负有责任？这种“情况”是否表明有必要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我们的同志式的批评呢？我认为表明了这一点。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何人不知。

难道李立三同志不明白，如果在游击战这个主要问题上不搞清楚怎么办，如果不让党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现在指责我们，说我们曾反对游击战，因为我们在二中全会之前曾试图使同志们相信，农民运动不能只从暴动开始，那么他在二中全会之前的辩论期间所唱的关于游击战的革命歌曲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吗？由于我们指出了在农民问题上的这个错误，李立三就以政治局的名义声称，我们的决议是调和主义的，我们应该指出在政治局里一切都是顺利的。不，不是一切都顺利。这就是对这三个主要问题和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意义没有完全理解并使政治局采取了它现在的立场。我已经说了，政治局对它的错误的的不正确态度，孕育着犯新的错误的危险。为了及时警告同志们，我要举出不久前的几个例子。

在同项英举行的会议开始之前，乔治^①同志刚得到通报，非正式地告诉他说，奉天头目要求以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同苏联举行会议。乔治说，这意味着苏联在反对中国军阀和国际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的进攻被苏联打退。可是现在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政治局的一位同志^②在政治局和远东局的联席会议上利用这个声明攻击远东局。这使人不能不抱住脑袋问，往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严肃而负责的同志、中国政治局委员怎么能采用这种手段呢？难道那不是苏联取得了胜利？难道中国同志没有为苏联的这次胜利做工作和动员全党？如果陈独秀采用这种手段，我会说：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中国反动派被打败而感到难受。多么肮脏的爱国者呀！既然你们这些诚实的革命者这样讲，那么这表明，你们顷刻间降低到了什么水平，由于你们不懂得在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中进行自我批评，你们试图掩盖自己

① 乔治·哈迪。

② 何人不知。

的错误。

另一个例子：在关于第十次全会结果的报告中，奥斯藤同志在谈到英美之间以及所有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说，尽管它们在中国有冲突，但它们一起支持中国反动派来反对苏联，所以我们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中应该谈到它们的这种联合。可以认为，没有必要解释这个人人都懂得的真理。但在这里又得抱住脑袋了。李立三同志出来，就英美之间的纠纷和它们在中国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政治局的名义教训了我们一顿。你们把陈独秀驱逐出党，这完全正确。这个人在中国反动派在国际反动派支持下向苏联发动攻势时有以下发明：“我们不再讲反对苏联的战争，我们讲在目前形势下的世界大战，或许是英美之间的战争。”这是十分微妙的反对党的方法，因为党提出了正确的口号：“中国和国际反革命分子已在进攻苏联，要保卫苏联！”看来，李立三和政治局在力求驳斥我们的批评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陈独秀的牺牲品，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而忽略了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都知道，李立三是军阀之间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专家。我们满意地在长篇发言和通告中看到了这些矛盾。我们推崇他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但当这种天才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不是首先给群众指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而是开始用哲学给群众造成混乱，不是去动员群众时，当我们看到政治局对李立三同志的这种专门爱好作出太大的让步时，我们不得不起来反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且我认为，由于我们在决议中指出，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他对保卫苏联的态度问题，所以李立三同志攻击我们的决议，这个情况也是与他忽略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主要矛盾有关。李立三同志知道，我们在一篇长文^①中非常尖锐地谈到了陈独秀的所有错误。但是在进攻苏

^① 文件没有找到。

联刚刚开始时，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第一次和很迅速地成了怎样的主要问题呢？我们的资产阶级、我们的反动派和直至保卫苏联的斗争的失败，这是问题。国民党曾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组织过一个爱国主义派别，并且不无一定成绩，对这个派别的反击是主要问题，是革命的中国党和这个取消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而对于李立三同志来说，这只不过是许多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主要问题，即对遭到进攻的苏联的态度问题，就使我们的决议具有了调和主义性质。李立三在极力捍卫政治错误方面就是走得这样远。此外，我们曾同他详细地谈到如何在党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开展反对陈独秀的运动，他开了个轻浮的玩笑，说我们对陈独秀抱有幻想。

概括起来说：不错，你们同右派作过斗争。如果你们不作斗争，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在我们的决议中说，你们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实际上李立三同志在想什么？谁开始怀疑我们承认政治局反对右的主要危险？李立三同志是否以为在目前形势下不搞这种斗争的策略总的来说可能是正确的？很想知道，在不反对右的危险的总的路线的正确性问题上，李立三同志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但是，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不准备承认，反右倾的斗争只有在包括政治局在内的领导机构无情地研究和揭露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党所面临的三个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时，才能顺利地进行，那这种斗争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立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党内许多摇摆，对一些优秀的同志成为左右倾向的牺牲品负有责任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对一些无产阶级一般工作人员批评不够或把不可靠的人开除出党时，你们没有毫不动摇地首先用自己明确的策略说明党在所有问题上应走的道路，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而只注意墨水瓶了吗？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不是游戏，不是纯理

论之争，并不排斥批评。它是同革命的基本任务。同久经锻炼的中国党的定型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开展革命的工会工作，以便把革命所需要的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谁建立导致取消革命工会或在黄色工会中无所作为的理论，谁就会为党和群众之间设置障碍。因此为了革命事业要反对这种理论，站在革命一边的广大贫农群众，不想为富农敏感阶层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谁看不清这一点，就应该同谁作斗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应该彻底清除军阀和改组派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

如果政治局不准备接受这样的批评，一切决议和通告就没有任何意义。谁承认错误，认真仔细地加以思考，谁就能教会自己和党如何避免犯错误，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你们现在的态度，我们希望能是暂时的，不说明你们要启发自己并同所有这些弱点进行无情的斗争。此外，我以前指出过，有这样的征兆：你们现在的立场会造成新的错误。这是同你们进行的这次辩论所表明的一个严重问题。

你们阐述了与任何自我批评和批评相敌对的理论。贯穿你们所有发言的一条红线是担心“我们的敌人可能利用这一点”。这是很糟糕的立场。在我们这里，敌人始终是会有的，直到建成无阶级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恐怕自我批评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是严肃的政治义务。你们的敌人，即革命党的敌人，将会利用党所犯的错误，但他们不能从政治局自己承认并试图纠正的那些错误中捞到好处。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你们将更好地在工会中、在农民中和在反对改组派的斗争中进行工作。不是拒绝自我批评而是改进工作，就能减少我们的敌人。而要反对一切为派别目的试图利用政治局的弱点和错误的行为，一旦你们准备接受自我批评并在日常工作中实行自我批评，那你们就始终都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同志们，这次辩论表明什么呢？第一，你们不想承认在我们

所指出的三个问题上的错误。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政治问题的意义。第二，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立场和错误，你们开始阐述“打倒任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

同志们，我们非常严肃地劝你们停止这种做法。对这些问题要采取政治的态度，不要讨价还价。毫无疑问，你们已开始进行讨价还价，而不是进行认真的自我剖析。我们完全坦率地说，形势要求这样做。你们知道，在现在的远东局中，有一个同志在来中国之前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不是别人，就是我。在极力维护自己的时候，你们以为，也许对远东局进行一些调和主义的指责会有好处，也许因此我们会造成较好的印象并能作点小的政治投机。同志们，抛掉这些投机行为吧。问题不是关于罗伯特或李立三，而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我们党的发展。地下状态迫使我们同党员群众、同无产阶级相隔绝。我们只是绕弯子从口头的和书面的意见中感觉得到广大群众的情绪，但无数的事实和征兆表明，革命在开始高涨。在中国又有了革命气氛。尽管最近一个时期党有种种错误和弱点，无疑党还是前进了，但它还需要深入群众。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自己学到一些东西，如果有缺点的话，同志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完全说服你们，我们在以后还要尝试像迄今所做的那样来做这项工作，尝试同志式地改变这种状况。但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我们的观察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来告诉你们真实情况，哪怕这些情况使人感到有些痛苦，哪怕你们不喜欢。

决议完全符合事实，不能去掉一个字。你们认真地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会有好处的。你们这些革命者，不要犯你们的发言所预示的那些错误，不要停留在错误的立场上。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不要这样做。

奥斯藤：我们看了政治局12月6日会议的记录，我们就远东

局决议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议^①。在前两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第一，我以远东局的名义发表的声明，第二，李立三的发言，而昨天我们收到了中国政治局标明日期是12月14日的反决议^②。现在你们也听取了罗伯特同志以远东局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远东局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要讲的了。看来，在远东局和中国政治局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们先向共产国际寄去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中国同志也可以寄去他们认为需要寄去的文件。我们将及时通知你们邮班出发的时间。因此这次争论直到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之前还是敞开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局是由共产国际任命的，我们认为并强调指出，我们的决议和我们的决定直到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之前对中国同志是有约束力的（共产国际的决定可以改变远东局的观点）。我们再一次强调指出，这个决议没有预先规定要发表。如果中国同志要发表它，我们无法阻止。一旦要发表，必须将有远东局或代表团名称的地方都删掉，以便使国民党不知道在中国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双方都应该认为问题已得到解决，为了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利益，我们要回到实际工作中去。

向忠发：听了同志们所有发言，我没有从中找到对核心问题的答复。在农民问题上，你们的批评我们已经接受，不仅党的领导机构接受了，而且所有党的基层组织都接受了。在红色工会问题上，我们也接受了你们的批评。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在所有会议中和辩论中，我们都承认了错误。至于中国党六大之后反对改组派的运动，我们在所有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不仅有中央的决议，而且也有基层组织的决议。我们在《红旗》上发表了关于改组派的文章。在基层党组

① 见第186—188号文件。

② 见第189号文件。

织会议上，经常讨论反对改组派的运动，并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和决议。但是你们在答复中说，我们没有接受你们的批评，并且你们没有对我们的核心问题作出任何答复。这是很危险的。至于俞作柏，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次。你们提到的情况不是事实。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必须实事求是地执行指示。我们要求远东局纠正这种做法。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党反对远东局。

至于陈独秀问题，在今天罗伯特同志的发言中，没有提及一个与他有关的核心问题。你们只指出了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口号。你们没有指出陈独秀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重要的东西，没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组成了几个小派别和破坏我们的组织系统的情况。你们没有提及整个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而相反，应该反对你们的意见。我同意奥斯藤同志的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你们寄去了声明并且我们起草了电报^①。请立即将它寄给共产国际并答复我们12月14日的声明。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以后，如果中国党犯错误，远东局可以给以纠正，同样，如果远东局犯错误，我们也要与之作斗争。除了电报，我们还打算派一名中国同志去莫斯科。

奥斯藤：我们要发电报，同时就派一名中国同志的事征询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80，第 39—5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指第 196、197 号文件。

1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9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1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210）——关于按旬出版英文和法文《共产国际》杂志和关于出版中文和西班牙文《共产国际》杂志问题。

决定：1——（1）将英文和法文《共产国际》杂志改成旬刊。

（2）责成出版部就《共产国际》杂志发行问题给法共中央和英共中央写一封信。

（3）认为可以尝试定期出版中文《共产国际》杂志，一个月出一期，把出版的《共产》杂志并入其中，以使中文《共产国际》杂志专门为中国的条件和需要划出版面^①。要吸收《共产》编辑部的同志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和农民国际代表团中的中国同志参加中文《共产国际》杂志的出版工作。

听取：5（214）——罗伯特斯^②同志关于他继续留在中国的声明^③。

① 《共产国际》杂志 1930 至 1937 年在莫斯科出版，《共产》杂志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机关刊物，1929 至 1930 年在莫斯科出版。

② Г. 埃斯勒。

③ 见附录。

决定：5——这个问题推迟到同从中国来的同志^①弄清楚后再审议。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和库西宁同志同从中国来的同志会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秘密

声 明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7月12日会议上，奥斯藤和乔治^②同志反对我的意见作出一个决定，即根据警察监视情况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将我从中国召回，而在这之前要完全解除我远东局负责成员的工作。因为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对的，是绝对不符合警察监视情况的，所以我给共产国际发电报对这个决定表示抗议^③。

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这样情况：6月16日在《前进报》^④上刊登一则简讯，说我被派到了中国（这则简讯上指出的名字是我在党内的名字^⑤）。由于加藤^⑥被捕和鉴于警察把注意力转到上海这个中心，远东局有两名成员认为，由于在《前进报》上刊登这则简讯，我对警察局来说是个危险人物，因此我容易引来

① 可能是 A. 马西。

② 分别为：И. А. 雷利斯基和乔治·哈迪。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前进报》是日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76至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1891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

⑤ 格哈德。

⑥ 佐野学。

警察对中央的跟踪，因为无论如何不能使中国政治局和与阿尔诺^①的联系受到威胁，所以作出上述决定无疑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形势很复杂。但应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一方面要可能地减少对中国政治局和对阿尔诺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远东局的工作能力。远东局成员的职责是采取符合这两个任务的措施。

因此作为实际措施，我建议：1. 建议共产国际尽可能在近期内派另一位同志来取代我；2. 在这之前我应继续工作，但要采取很严密的预防措施（我再不同中国人见面，只参加远东局特别重要的会议，精心安排同远东局其余成员的会晤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共产国际未派来另一位同志之前，我可以继续在远东局工作。我不认为《前进报》上的这则简讯，如果给予一般注意的话，会很快起作用。下面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约在三个半月以前，我们从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得知，布兰德勒的报纸报道了把我派到中国一事。这和将这则消息刊登在《前进报》上是同样情况，因为社会民主党和警察看布兰德勒报纸，目的是要从中获取用于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在上述电报中表示意见说，我可以继续工作。已经过去的几个月时间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远东局根据这个简讯作出的决定是过于仓促的，我至少短期内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工作，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威胁。

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被客观情况证明是正确的，而经过较短的时间会使远东局的整个工作化为乌有。乔治要长时间去符^②，奥斯藤，就像他说的，在工作中特别受到缺少翻译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取消远东局的工作，那我不认为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可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个决定有足够的理由。如果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防止垮台，那我们同样有责任保存远东局的工作能力。因为远东局两位成员反对我的意见作出的决定不能保证远东局的工作能力，所以我对这个决定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我承认，主导两位同志的唯一动机是想为中国政治局和阿尔诺排除一切危险。但我很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声明，因为至今远东局的工作，尽管处境艰难，还是进行得很齐心协力的。

请将这个声明交给共产国际。

1929年X月12日^①

罗伯特斯

全宗495，目录4，卷宗7，第1—2、19—20页。

记录为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未标明月份。

1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记录

（摘录）

1929年12月24日于上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①

出席：特（生）^②、伯（山）^③、江（钧）^④、（关）向（应）、少（山）^⑤、罗（登贤）、（徐）锡（根）同志。

主席：特（生），秘书：少（山）。

一、远东局问题

特（生）：今天会议的议程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远东局决议问题^⑥；一个是远东局同志对于争取废除领事审判权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政治局最近的两次会议上，柏山同志作了报告，我们作了讨论并决定给远东局写一封信^⑦。此后我们同远东局举行了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莫洛托夫、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耶夫、曼努伊尔斯基、别尔津、洛佐夫斯基、青年共产国际。

② 向忠发。

③ 李立三。

④ 项英。

⑤ 周恩来。

⑥ 见第180号文件。

⑦ 见第189号文件。

联席会议^①，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同志^②答复了柏山。这个反驳意见的中心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央的错误上，并且说中央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答复我们的抗议。这以后，我以政治局的名义作了简短的答复，说明我们根本不拒绝承认我们对待富农和红色工会问题的错误，并且指出，远东局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央旨在反对右的倾向的基本路线和工作，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③。既然现在他们不答复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承认提出抗议是错误的，那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我们刚才就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和电报^④给了他们。他们同意发电报。既然情况变得如此严重，我们只好专门派一个人去。远东局从它的工作一开始，毫无疑问就有右的倾向，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由共产国际来解决。至于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在莫斯科解决。也完全有必要派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谈骨干力量和经费问题。现在到处需要人，而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的200到300人当中，适合做工作的不到50人。况且在莫斯科学习的人是反对派工作的最大来源^⑤。况且我们的莫斯科代表团不是完全一致的，有组织帮派的倾向，有机会主义的残余，这涉及……同志，很清楚，余飞是陈独秀在莫斯科的代表。因此在过去。代表团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不可能齐心协力地工作，当然，给党的帮助不是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派一个人去。考虑到做上述工作的必要性，政治局应该派一位有才干的同志去，尽管这样做可能对现在的政治领导有损害。毫无疑问，工作要求这样做，也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建议派一名同志去。

① 见第191号文件。

② Г. 埃斯勒。

③ 见第187号文件。

④ 可能指第196、197号文件。

⑤ 原文如此。

伯（山）：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了两次，最后我们同远东局一起进行了讨论，但远东局把我们抗议的所有问题放在一边，不作任何答复^①。它只是渲染这个事件，说我们在富农问题和红色工会问题上没有承认错误。它说在广西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实际上这是没有的事。它说我们没有同改组派作很有力的斗争。它说我们反对谈论苏联的胜利，反对谈论陈独秀的错误。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大部分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诽谤。特生说，远东局实行的是右倾路线，实际上它有右的妥协倾向。例如，远东局在所有政治辩论中和在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中都采取了不确定的立场。在中东路问题上，我们说，如果进行关于胜利的宣传，那就要讲和平原则的胜利，而他们说这不够，在废除领事审判权问题上，他们表现出倾向于废除平等条约，同时我们知道，远东局成员中的德国同志实际上是个调和主义者，波兰同志^②的历史我们根本不了解。如果他们已经抛弃调和主义倾向，这当然很好，但是他们一年多的工作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一点。最好派……同志去，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此外很熟悉那里的情况。当然，最好也派……同志去，但这里有另一些不便。至于报告内容，我认为还需要再讨论一次。

江（钧）：从特生同志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绕开了我们抗议的重要问题，有意渲染这个事件，从另一个方面批评中央。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特别大的障碍。至于远东局的立场，他们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愿承认自己的调和主义错误，其结果无疑会妨碍整个工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肯定对我们工作的前景会产生影响。如果发生争论，我们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对，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派……同志去，他熟悉情况和对共产

① 见第 187、188、191 号文件。

② H. A. 雷利斯基。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做法，此外，他能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和代表团问题，因为代表团的观点未必都一致。我们报告内容的中心点应该是这种斗争，因为不然就会掩盖这个问题的主要意义。

（关）向（应）：我完全同意特生同志的报告及伯（山）和江（钧）的意见。需要特别注意他们继续实行调和主义路线的危险。最好派……同志去。报告内容的中心就应该是这个问题。

（徐）锡（根）：根据特生同志的报告，我认为，同远东局的争论应该在共产国际解决。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安排。在人员问题上，我认为必须派一个人去，因为那里在党内斗争方面肯定也会议论纷纷，肯定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财政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因此完全有必要派一个人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赞同派……同志去的提议。我们报告内容的中心就应该是这个问题。关于工作的报告当然应该专门发出。

罗（登贤）：从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远东局的调和主义路线在日益发展。因此只好将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因为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完全赞同派……同志去的意见和你们对报告内容的意见。同时还必须解决学生的问题，因为需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在中国学生当中公布取消派的所有反共产国际和反中央行为。此外，还要号召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和搞清楚学生中的各种倾向。至于代表团问题，也要十分果断地加以解决。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就要很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

江（钧）：为防备代表团达不成一致意见，必须赋予……同志解决这个问题或履行改组职责的全权。

伯（山）：代表团问题可以讨论一下。第一，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上，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同志^①持调和主

^① 可能是张国焘。

义倾向，路线是机会主义的。第二，代表团的复信^①只有瞿（秋白）、（邓）中（夏）和某某^②三个成员签署。（张）特（立）^③和（余）飞没有签署。因此我认为，中心应该是提出同取消派的斗争问题，报告就应该这样来起草。我认为，要要求他们表态。如果他们不同意，并坚持调和主义倾向，那就要剥夺他们的全权，同时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否则代表团无法代表中国党。

（关）向（应）：我在莫斯科期间讨论中国问题时也可以研究代表团问题^④。当时周^⑤很明确地坚持另一条路线，而（张）特（立）有调和主义倾向。在解决学生问题上，瞿（秋白）和（张）特（立）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结果暴露出在我们代表团内部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影响了所有学生并造成了不好的印象。

少（山）：第一，关于远东局在其决议中所阐述的政治路线中暴露出来的错误问题，我觉得这是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决议发表后，调和主义会很清楚地显露出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将来在每一个新的问题上都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他们认为中央有右的倾向，就是因为中央坚持同右的倾向作斗争的正确路线，因此能够很迅速地纠正右的倾向。至于远东局，它坚持调和主义路线，所以它竭力为其右的倾向作辩解和作掩饰。此外，在每一个问题上，毫无疑问都可能产生右的倾向。我们争论的核心就在于此。我们有过右的倾向，但我们现在已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了自我批评。而他们犯了错误，但仍顽固地坚持这些错误。因此一定要在共产国际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关于我们所派代表的任务：1. 报告同远东局进行的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

③ 张国焘。

④ 原文如此。

⑤ 可能是周恩来。

论；2. 报告中央一年来同右的倾向的斗争；3. 报告在中国，革命的发展日益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必须要求加强领导和加强远东局；4. 要向莫斯科反映一年来党反对右的倾向的斗争情况并从代表团到学生支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代表团内部暴露出取消主义或调和主义倾向，那就必须停止代表团的工作。同时学生在当中必须号召对右派进行严厉的谴责和清洗，不惜清除极少数人；5. 要看看我们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召回有才干的工作人员。此外，还要要求联共（布）注意这个问题；6. 开支问题，我认为这是很难办的问题。在其余问题上要自己承担责任，但在人员和开支问题上不能完全抱希望在那里解决；7. 关于派人问题，特别是现在，这是必要的。我完全同意……同志应该去一趟。

第三，在报告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使它的中心内容是这次争论本身。其中也要指出代表的任务。

特（生）：第一，关于同远东局的斗争。在过去的工作中，中央确实也犯过右的错误，但已公开承认了。这些错误是无意识的，是在同右的倾向作坚决斗争的情况下犯的。因此一发现，我们就承认了。至于远东局的精神，它把决议交给中央后，中央立即就觉得决议中贯穿着调和主义的精神。既然中央的信发出后，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未来的工作肯定成问题。换句话说，既然他们有这种调和主义的路线，那么出现新的他们还是不承认的错误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现在就存在，所以需要在共产国际那里解决。同时在同他们工作时，无疑我们应该注意出现新的错误的可能性。

第二，关于莫斯科之行的任务。要特别认真地注意第二点。必须进行有力的争论，在人员问题上特别要突出军事人员问题。还需要经济援助。

第三，对于代表团问题，我同意大家提出的方法，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而代表团无疑有两条工作路线，这

是非常危险的。要采取一种方法，使我们派去的代表作出报告并要求代表团作出答复。凡有调和主义倾向的人都应剥夺其全权，而有机会主义路线及从事反对派和取消派活动的人，应给以严厉谴责。因此代表团要进行改组。

第四，学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长远计划，并要对他们进行训练，分出他们学习技能的类别。此外，还必须关心他们的未来。要把好的学生和好的骨干派回来。

第五，出差时间最多不要超过5个月。

第六，要改组代表团。邓中夏、黄平和满^①要回来，瞿秋白留在那里，派去的代表一定要回来。

第七，（关于……动身后的分工问题，可以放一放）。

柏（山）：（关于工作和职责分工问题，可以放一放）……^②

二、关于一个策略问题

特（生）：同远东局会谈时，我们谈到了唐山的工作。在措施方面，他们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补充了两点：第一，群众代表会议不要太多。我们已经作出答复说，根本不是太多，而只有两次，此后要有行动。第二，他们说，工厂委员会非常重要，不管是否所有工人都参加工会，都要建立工厂委员会。我们向他们作出了同意的答复。剩下一个单独的问题：他们说，国民党已经宣布从1930年1月1日起废除领事审判权，并说，这是明显的欺骗行为，我们应该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履行这个诺言。归还还在军事上很明显无足轻重的镇江租界，就是在搞这种欺骗^③。至于问题本身，我们答复他们说，我们建议他们回过头来讨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

② 下面删去文件中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和建立中共中央地区局的部分。

③（江苏）镇江英租界于1929年11月9日正式交给南京政府。

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策略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伯（山）：我先对特生的报告做个补充。当时我听了远东局同志的报告。该同志没有把报告题目讲清楚，因为他说，我们应该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同帝国主义的串通，而这个问题是人人皆知的。他们的核心指示说，需要组织群众性示威游行，他们认为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归还领事审判权。提出这种办法本身就含有错误的方针，他们想让党和群众组织发表声明和组织示威游行。我在深思这里是否含有不正确的策略，因为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让国民政府以革命的方式归还领事审判权”，一个是“只有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之后才能归还领事审判权”。这两个口号中的第一个口号符合他们的观点，这个口号简直可以说是对陈独秀的诠释，是他的“政治使国家误入歧途”的口号^①。要记住，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已不抱大的幻想，他们只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因此使用这两个口号中的第一个口号，简直就等于使用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和关于“政治使国家误入歧途”的口号。问题在于，是否需要开展运动。我的看法是，围绕这个问题恐怕未必能把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因为广大群众根本不一定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对动员群众工作本身就有怀疑。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何况现在紧接着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游行能否再举行游行还是个问题。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赞成反对国民党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的斗争，而只是意味着需要讨论动员群众的方法。远东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应给以注意。

少（山）：他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归为路线问题。如果他们的意见是认为需要要求国民党以革命的方式归还领事审判权，那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这样提问题：1. 统治阶级可能是稳定的，并且政府能够实行改革政策；但在中国不存

^① 指陈独秀为评价南京政府在中东路冲突时期的立场和行为提出的口号。

在这个前提条件。2. 1917年，（在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政府，我们^①可以提出立宪会议问题，同时积极为建立苏维埃做准备，但在中国，现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正相反，统治阶级在走向垮台，没有改革的基础，如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与陈独秀的国民会议^②没有任何区别，那完全可以肯定这是机会主义观点。为什么在他们那里出现这个问题？他们的立场是：他们觉得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不能立即建立苏维埃，所以他们竭力寻求有“实际内容”的口号。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我们提出国民党欺骗群众问题，那么“只有在推翻国民党统治之后才能归还领事裁判权”的口号在目前形势下就是很实际的了。而如果我们像外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做，那就等于帮助国民党，帮助巩固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远东局同志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放弃镇江租界，是为了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欺骗，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只应该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的欺骗，消除群众的幻想，应该沿着直接革命的道路率领群众前进。

特（生）：我越想这个策略问题，越觉得它危险。这里很明显是有总的路线的。

江（钧）：这是个路线问题，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断定，统治阶级有可能是稳定的。现在是如何宣传我们的纲领问题。

（关）向（应）：这是调和主义的路线。

特（生）：星期六我亲自去同远东局谈判，争取（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而明确的解决。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21，第 334a—341、346—34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他们，俄国布尔什维克。

^② 指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

1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0 号记录
(摘录)

1929 年 12 月 30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7（229）——关于屈维它^①回国问题。

决定：7——见特别文件^②

听取：8——关于开除陈独秀问题（报告人：斯特拉霍夫同志）。

决定：8——主席团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③。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把关于陈独秀的材料分送给主席团各位委员。

① 即瞿秋白。

② 见附录 1。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549—555 页。

[附录 1]

特别文件

一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29 年 12 月 30 日会议第 30 号记录

（摘录）

听取：7. 鉴于最近中共一些政治局委员被捕，远东局提出的让屈维它同志回国的建议。

决定：（1）认为目前不能让屈维它同志回国。

（2）立即从在苏联学习的人员中派遣 1—2 名有政治经验的同志。

（3）要在东方书记处的工作中使用屈维它同志，让他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以便使他在回国之前能够取得国际经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2]

绝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1929 年 11 月 21 日信

（摘录）

“我们认为，有必要让瞿秋白回来。”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8，第 1—2、381—38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95

瞿秋白给库西宁的信^①

1929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同志：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和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②都进行了讨论。学校里的情况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确实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因此关于它以后是独立存在还是应该成为未来殖民地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部的争论，其实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重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并且要立即进行。

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就是要加强领导，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不留情面地清理现在的学员组成成份。

中国党代表团从共产国际六大时起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其第一点谈到了根除派别斗争等的必要性）^③是在中共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讨论通过的。我本人当时未

① 文件上有作者补写的文字：库西宁同志：我最后一次发表自己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因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事件”迫使我这样做。那里有反对“代表团”的运动。斯特拉霍夫（瞿秋白）。

② 指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9年12月16日会议。

③ 指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29年1月7日会议决议。

能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六大以后我病的很厉害，后来忙于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①。只是今年4月我才开始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做工作。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我们再次提出了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这次是书面建议^②。总之，我们多次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谈到这些情况。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或“将被采纳”，但后来都没有贯彻执行，正如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谁也没有认真地同我们讨论过这些建议。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原因，部分是从中国招的新生不理想，学生的社会政治成份也没有得到改善。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真的要认真地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干部，那就必须着手立即从根本上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改组。为了真正认真地完成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党培养干部的任务，成立独立的中国大学和其他国家单独的大学，或者在总的殖民地大学里成立单独的民族部，就必须：

(1) 根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共产国际的经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职工运动、党的建设等等）实践上加紧实行国际主义教育。不仅需要，比如说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实行“中国化”，即研究中国问题，而且需要使用中国工人确实明白易懂的语言来教授所有课程，把理论同实际知识和工作结合起来。国际主义教育应贯穿到各个方面，打破现在学校与世隔绝的生活。

(2) 拥有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和较好的“美国式”机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79页。

②、即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1929年4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③ 原文如此

关^③。当然,不一定所有领导人都是学者,即马克思主义汉学家,因为在大学里还有许多工作领域需要有熟练技能的工作人员、科研和行政人员,以及一般有工作能力的人员。

例如,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有过这种情况:(1)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作过报告,但支部没有讨论应该怎么做。(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五月来信^①,也没有认真讨论,甚至长时间没有印成中文,只是到11月份同志们才从杂志^②上了解到信的内容。(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会的决议^③也是这种情况。这次是我本人译成中文的,过了两个月我问:“对这个决议是怎么讨论的?”答复我说,还没有印出来。(4)为了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给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派”的十月来信^④印成中文,我不得不4、5天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教学部到出版部,从出版部到玻璃版印刷车间,为的是能及时出版。只有这样同志们才来得及在作报告之前阅读这封信。这就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理想”支部局和整个机关。支部局在反对右的倾向时,甚至都没有考虑为同志们研究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提供哪怕仅仅是技术上的条件。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所有课程,至今都没有明白易懂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即使说有许多优秀的教员和汉学家,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学生能够得到这些汉学家将出色地用俄语教授的东西,拿这样的机关也没办法。

(3) 应该尽可能多地吸收有经验的教师、有威望的老练的党

① 该信1929年6月7日通过。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② 见《共产杂志》1929年第1期,第94—105页。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2—195页。

④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5—203页;《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01—110页。

务工作者和坚定的党员参加这些学校或总的殖民地大学的一些部的工作，以期他们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研究中国问题和相应的其他殖民地国家。如果我们只寻找“现成的汉学家”，那我们就会被“东方学家危机”搞得透不过气来。这些学校应该有这样一些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善于“把最优秀的分子、殖民地革命工人和苦力团结在领导周围”，对他们采取相应的态度，研究他们，了解他们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任何落后状态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偏见，以便消除这些偏见和对他们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教育。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来教育中国或印度的积极分子，因为没有讲自己母语的民族积极分子和服务人员，就不能为殖民地劳动人民创建大学，而这些劳动人民除部分外是很难学会欧洲语言的。我们至今拥有的优秀翻译都来自知识分子。如果不本着他们应该如何学会对待工人和苦力的精神来对他们进行教育，那么就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书本”知识分子玩弄群众陌生的科学术语，不是去帮助工人进行学习和分析复杂的政治问题等等，而只是在工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渊博学识，引起后者的马哈伊斯基^①情绪。

(4)坚持要为基本上用汉语等语言进行教学创造条件的方针。为此需要有步骤地做工作，而不只是起草决议。在分配翻译力量时要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应该把将来的学校想象成这样：基础班用汉语教学，不超过三年，最好是两年；而专修班（有很少量的青年工人学员和经受过考验、俄语较强的知识分子）前6个月一定要用汉语进行教学，并要借助于（俄语语法与汉语语法作比较的）比较法，而不像现在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甚至不懂英语或对英语懂得很少的知识分子，学习几乎三年时间，而收效

^① 马哈伊斯基派是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流派，按其首领B.K. 马哈伊斯基姓名得名。马哈伊斯基认为，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寄生阶级，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则是革命的基础。

还是很小。这个专修班应该是五年制，在第三年，视学员对语言的掌握水平逐步开始用俄语进行教学。这样这个专修班不仅可以培养真正的翻译，而且是提高类型的班（也许，除中国外，其他殖民地国家也得从这种专修班开始）。

（5）培养翻译和建立人民群众明白易懂的中文和相应其他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 通俗易懂的涵盖所有最基本的必要的知识领域的政治常识性读物；2. 翻译和修改共产主义大学的教科书和参考书；3. 翻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所有这些工作也都需要认真地、有计划地和有步骤地去进行。不做这些工作就不能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建立马列主义文献。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只是处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开始进行“语言革命”，即建立“民族语言”。而且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西欧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如印度的资产阶级满足于使用英语（甘地写诗也用英文）；对他来说“民族语言”并不那么重要。而印度支那千百万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学会讲俄语。殖民地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有意识地为语言改革设置障碍。如果党是群众性的党，而且它也应该是这样的党，对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对工人和农民，就不能用俄语、德语或其他语言来进行教育。

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缺乏的这些东西外，尽管它已存在四年，但还需要立即着手对它进行清理，因为它将是未来殖民地大学的基础。要不留情面地清除所有不需要的、异己的国民党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尤其要清除那些早在1924至1925年间就是（比当时的国民党更反动的）反国民党分子的人，甚至不只是清除反共分子。同时，如果要拯救像在中央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中和在基萨诺娃同志在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到的那“很大一部分同原领导决裂的优秀分子”，如果要拯救他们，如果要消灭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托派集团，那就极有必要让原领导公开承认基萨诺娃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和工作中

的不足。实际上这些错误不一定产生于它的正确路线。为什么不去为完成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根本改组任务减轻困难呢？在这里，可以不留情面地大胆地把那些坚持认为党的路线是错误的的人清理出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屈维它（斯特拉霍夫）

又及：我们支持基萨诺娃同志作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新校长人选。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01，第 11—16 页。

打字稿，原件，补写和又及为亲笔真迹。

196

中共中央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9年12月^①于上海

绝密

关于中共中央和远东局之间争论问题给
共产国际的报告^②

致共产国际主席团

远东局领导中国党的工作已经9个月了。在这9个月期间，远东局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中国党的某一策略，确实为中国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它经常暴露出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和选择不正确的策略。中央不止一次地同它进行过认真的辩论，这之后，这些错误的东西，一些被抛弃了，对另一些错误，它默默地承认了中央的观点，但对其余的错误，它至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当时中国党中央认为，远东局观点上的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的，不成熟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出现的，虽然同远东局就每个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争论，但是没有深刻地感觉到远东局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右倾路线。最近远东局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问题上，英美之间可能妥协”。特别是在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明的。

② 在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同志。

决议时，远东局在其决议涉及中国的部分^①中，暴露出了完全错误的精神。从这时起，中共中央深刻地感觉到，远东局有一条严重的右倾调和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远东局纠正其决议有关中国部分的基本精神，同时要求对过去的许多争论作出最后的明确结论。远东局完全拒绝满足中共中央的这个要求，并继续坚持其错误观点。中共中央深深地意识到，这无论对中国党还是对中国革命来说都是很大的危险，意识到，根据远东局的路线来领导工作，无疑会使中国党陷入右倾调和主义的泥潭，甚至导致放弃革命。所以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关于这次争论的正式报告，并要求共产国际详细加以讨论并作出最后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最近一年的工作路线

中共中央从其工作一开始就根据党的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路线，一方面同党内盲动主义残余作斗争，另一方面加强反对党内右倾危险的斗争。当时盲动主义残余肯定在（湖北、河南）一些地方党委中还有表现，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直隶问题上，对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出了动摇，已发展到讨论如何迎接北伐军问题的地步；在江苏问题上，错误地解释了六大决议的精神；在广东省委中，存在对资产阶级的错误看法，以致说什么它还起革命的作用。当然，直隶和江苏的问题主要是无原则的争论，但是这种不是在原则性问题上的纠纷能够出现，只能说是机会主义的历史残余的反映。此外，由于革命不断遭到惨重的失败，工农革命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盲动主义已失去了它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失败和残酷的白色恐怖，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变得越来越弱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尤其扩大了，这就成了机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因

^① 见第180号文件。

此盲动主义倾向经中央不断纠正渐渐减弱，而机会主义的危险，尽管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批评和斗争，但在党内仍然在发展。这期间暴露出了十分严重的“和平发展”和“合法运动”的倾向（后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农民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指示信^①，我们更明白了，当时中央主张同富农联合，主张在黄色工会里不建立与它们相对抗的红色工会基层组织，这恰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然，更加证明了右倾危险的严重性）。根据这些原因，中央在第33号通告中指出，党内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并号召全党同志同右倾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②。恰恰在这个时候，远东局来到中国，它听取中央的报告后，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同右倾作斗争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路线。远东局认为，“在中国党内，目前左倾危险和右倾危险完全是一样的。”中央认为远东局的这种评价是不对的，并举出各种理由和事实来加以证明，对这种评价竭尽全力进行了争论（这次争论情况将在下面详细谈）。经过三次会议，远东局相应地同意了中央的路线。二中全会^③就是本着这条路线的精神举行的并确立了党的策略。全会后，中央还坚定地本着全会决议精神同党内右倾危险进行了斗争。

客观形势的发展证明当时中央采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全国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日益加深，群众性的斗争在日益发展，新的革命高潮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和越来越残酷的阶级斗争，党内的不稳定性和机会主义妥协倾向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成了党在动员广大群众和领导群众斗争方面的严重障碍。因此在五卅和八一周年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195页。

② 见中共中央1929年3月15日第33号通告《军阀战争的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5—77页。

③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日^①，中央坚决指导全党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游行，虽然这种活动卓有成效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对群众的动员工作还不够充分，而最大的障碍是同志们的动摇和他们的妥协倾向。（1929年）8月1日后，机会主义反对派更加明显地加强了活动。陈独秀等人公开提出其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中央的路线，反对共产国际和六大的路线。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封建阶级势力，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因此南京政府在走向稳定，而革命在消退。出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他们诽谤党，称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结合，并提出用“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取代党的“推翻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取代党的“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没收所有帝国主义银行、工厂和企业”的口号。在中东路问题上，他们提出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取代党的“武装支援苏联”的口号。此外，他们竭尽全力反对党组织群众举行政治游行，反对举行总罢工，反对游击战策略，称它是“耍弄群众”，是“盲动主义”，很清楚，这种系统的看法完全是取消主义路线。提出这种取消主义路线后，他们立即转入在党内搞派别组织，竭尽全力做支部工作，同时开始借助于种种欺骗、耍花招、诽谤等肮脏手段来攻击中央，竭力破坏它的威信。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还不牢固，因为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分子还没有清除掉，而主要是因为理论水平太低，所以当时党内的少数积极分子和少数基层组织表现出了小小的动摇（如报业支部、上海的几个街道支部、香港“泰古”造船厂支部等）。调和主义倾向变得尤其强大了，因此反对右倾的斗争具有更加严厉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动摇，并更加积极地动员全党同志同取消主义思想作坚决的

^① 指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8月1日纪念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红色日。

斗争，同时中央指出，党内的所有右倾思想一定会变成取消主义发展的基础，在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阶段要清除全部右的思想。在重要城市的基层组织中，特别是在产业支部和各级领导机构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辩论，最后完全接受了党的路线，并且它们都表示反对取消主义和调和主义的路线。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挽救了许多动摇分子，提高了同志们的积极性，提高了所有同志对我们党的路线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另一方面，少数仍坚持其取消主义错误思想的分子（例如，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郑超麟、尹宽、王平等取消派首领）被支部正式开除出党。至于陈独秀，中央不止一次试图教育他，但他丝毫不考虑中央的批评，并更变本加厉地从事派别活动，成立中共反对派执行局^①，不接受中央责令他停止派别活动的警告，并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完全脱离了列宁主义，表明他走上了公开同党作斗争的道路。这时中央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并向广大群众揭露已经成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取消派^②。除了一两个取消派反对这个决定外，决定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党又更加积极地开始按照中央的路线进行工作。由此可见，这场反对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更加巩固了党，提高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他们的政治水平，同时它还提高了同志们对党内一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的注意力。这场斗争恰巧发生在革命形势更大发展的时期。中央担心党内斗争会影响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工作，向全党发出指示说：“我们应该在党内进行反对取消主义思想的坚决斗争，但同时应该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更加向前推进革命斗争，以便让革命形势的客观发展来证明取消派的错误。”^③

① 不清楚讲的是哪个执行局。可能指1929年9月成立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左翼反对派临时领导小组”。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③ 引文出处不详。

所以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取得了广泛的发展，党的组织和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相应地扩大了。这证明中央总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取消派的活动绝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党活动，公开在群众中进行诽谤说，“共产国际、它在各国的支部和中国党的领导机构，全都掌握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派别手中”，并提议“要求让托洛茨基回来，改组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领导机构，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确定党的路线和改组中央”。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可见，取消主义危险因此没有减少，当然，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也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正是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特别值得认真对待的时候，远东局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中央把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看得过于严重”。把陈独秀开除出党时，远东局认为，开除得太不谨慎，并说“还没有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此外，远东局还问：“为什么事先不征得远东局的同意？”实际上，中央同远东局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开除陈独秀的问题，而远东局默认了中央的看法。此外，在批评陈独秀等人的文章^①时，远东局只指出了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错误，而根本没有提他的取消主义路线。当时中央认为，远东局也许偶然没有作出充分说明，所以没有建议远东局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对于远东局的前两个说法，中央竭尽全力同它进行了争辩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上述文章问题，并注意到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偶然的。

在总结中央一年来工作的指导路线时，应该说，这条路线总的精神是反对右的倾向，这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中央采取了坚定的反对右倾的路线，所

^① 文件没有找到。

以才能相应地战胜取消主义危险,战胜党内的整个无原则斗争,战胜党内的各种摇摆、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并使党摆脱意见分歧状态,使之能够更加巩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这证明党的六大、共产国际六大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也证明中央正确地贯彻了这条路线。但是现在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具有严重的客观基础。特别是由于中国党内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在党内右倾危险能更容易地反映出来。因此我们更应该指出中央在它反对右倾的总方针中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一,发出第37号通告^①以前,在对客观政治形势的分析中,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没有搞清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同它的母体—封建买办分子彻底断绝关系。特别是在(1925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内部派别之间冲突的更加尖锐化,在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些彼此对抗的资产阶级派别,但无疑不存在整个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总对抗。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容易成为右倾思想的基础。第二,在农民运动问题上,过高地估计了富农的作用,忽视了它的反革命性质,因此产生了极其错误的同富农联合的策略。第三,在工会运动问题上,在黄色工会工作中,认为只需要加强反对黄色首领的斗争和推翻他们,使黄色工会变成红色工会,而不要与黄色工会并行成立红色工会基层组织。结果由此自然会产生取消红色工会的机会主义错误。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和远东局的批评后,中央坚决纠正了这些在分析上和策略上的局部错误,此外,在党内公开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建议同志们详细讨论这些错误和新的路线。由于中央坚持了同右倾作斗争的总路线,所以它在发现自己右的倾向后,能够坚决而迅速地加以纠正。另一

^① 见中共中央1929年5月15日第37号通告《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26—146页。

方面，即使坚持同右倾作斗争的总路线，还是经常会陷入右倾危险，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这种右倾危险实际上是何等严重，这又迫使中央更加坚决地反对取消派，另外还要更准确地控制自己的策略和工作，同一切右倾危险作斗争。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后，中央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接受这个决议时，中央特别强调了同取消派和整个右倾思想的斗争，特别是同布哈林调和主义的斗争，并号召全党进行详细的讨论和清除一切机会主义思想。

目前党的状况是这样：虽然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挫败了取消派旨在分裂党的活动，但是这种危险还没有被消灭。此外，虽然各级党委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执行党的策略时，还是经常出现摇摆和右倾危险。而特别重要和最重要的是尾巴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目前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阶级斗争都在非同寻常地发展，而党经常不能跟上这种发展。这一点在到处爆发的工人群众罢工运动中尤为清晰可见。只在少数情况下，罢工运动是由党组织和领导的，而在多数情况下，罢工爆发后，党才去寻找联系，有时还找不到，这就造成许多罢工斗争受到国民党的欺骗，被镇压和遭到失败。有一些罢工，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斗争的，但是党常常放弃这种领导，之后中立和动摇分子就把这种领导交给反动的妥协分子。这种尾巴主义和取消主义，在许多同志不相信群众和存在机会主义观点（认为不能坚定地领导群众和组织群众）情况下还会产生。因此现在党应该更坚定不移地同取消主义和调和主义思想作斗争；同时它同样还应该坚定地同党内一切右倾危险，而特别是同尾巴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中央目前的路线，这就是它自始至终的路线。

二、远东局在领导中国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右倾错误

在领导中国党的过程中，远东局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根据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它的来信纠正了中央的一些右倾错误，例如，正确地批评了富农问题、黄色工会工作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对中国党的很大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它确实经常暴露出许多右的错误信念，对于这些信念，中央进行了认真的争论。

第一个问题出现在第一次讨论中国形势和党内路线的时候（1929年4月）。中央指出，当时党内的最重大危险是右的倾向，所以党的路线应主要是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远东局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在中国党内左右倾向的危险是一样的，党的路线应该是同样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当时中央提出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实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直隶、江苏和广东问题和当时很流行的和平发展和合法运动倾向），特别强调了客观条件，指出了改良主义影响的增强，认为这是右的倾向普遍发展的基础。就这样论证了中央的路线。但是远东局依然不同意中央的观点。此外，它还引用了1928年的一些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经过四次会议和激烈的争论，最后它同意了中央的指导思想：“右倾是最大的风险”，但它还补充一句：“左倾同样是危险的。”这证明，当时远东局总的路线不是建立在同右的倾向作坚决斗争的立场上的。

第二个问题属二中全会时期。全会讨论农村游击战问题时，中央指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由于农民争取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不断深入，而特别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和保卫团）日益加强，农村的日常斗争很容易演变成武装冲突，因此游击战可能变成农村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此外，革命形势恰恰开始高涨，一定会再次转为革命高潮；因此党的策略应该是坚定地领导自发的暴动和发展游击战。当时远东局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认识不是很坚定（这在第一次讨论中央的政治问

题时暴露出来了)。因此远东局对游击战产生了取消主义的信念。它认为,目前游击战必定会遭到失败,党在农村的任务应该是争取广大群众,党应该劝导群众“不要进行这种不能取胜的游击战”。当时中央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指出,“到处的农民自发暴动,而特别是朱毛红军的两年存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于土地革命的日益扩大和深入才发生的;只有在坚决领导自发斗争和游击战的情况下,党才能够争取广大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对待游击战态度上的任何摇摆,最后都一定会导致取消农村的一切斗争,导致和平发展,实际上这将意味着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此外,缺乏领导游击战的勇气定会导致缺乏领导一切斗争的勇气,最后导致完全放弃农民的信念”^①。经过两次辩论后,远东局才同意中央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是在最近(10月)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时出现的。远东局在口头报告中提出英美在中国问题上有互相妥协的可能性(主要是由于同日本的矛盾,其证明是英美之间在海洋会议^②上达成的协议)。在中国军阀战争中,美国积极帮助南京政府。由于英美之间有妥协,所以将来南京政府会改组为蒋汪联合政府。远东局虽然在给中央的指导性信件^③中没有很明确说明这一点,但基本意思完全是这样的。在这封信中首先指出,“英美妥协是表示要排除日本”。接下来非常雄辩地述说了日美之间矛盾的加剧,但只字未提英美矛盾。结论是改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出山不可避免。听到这些观点后,中央认为它们是极其错误和十分有害的右倾观点。

① 引文出处不详。

② 指英美在筹备伦敦限制海上武装会议(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问题上达成的初步协议。见胡佛和麦克唐纳在麦克唐纳访美结束时(华盛顿,1929年10月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载《1929年的国际政治——条约、声明和外交信函》,莫斯科1931年版,第31—33页。

③ 见第176号文件。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英美角逐是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中心。在中国问题上，英美矛盾确实很大，同时英日之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英美矛盾也很尖锐，无疑这里没有调和和妥协的可能性。因此军阀战争当然会反映出英美的矛盾，但英国肯定不会站在美国一边，它一方面要反对两广军阀的南京政府，另一方面则要竭力掌握南京政府的领导权。改组派的活动中心是香港，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他们在利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假如英美有可能实行妥协，那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南京政府在英美共同支持下暂时会是稳定的，势必得出对革命发展的怀疑。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认为如此严重的英美矛盾有可能由于麦克唐纳同胡佛的碰杯欢宴而立即得到缓解，因为这会造成在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破灭问题上的动摇。这是地地道道的右倾观点，充其量也不过是像瓦尔加同志对杨格计划所作的论断那样^①。所以中央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这种观点，并同远东局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远东局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毫无根据地否定这些观点，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虽然现在在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远东局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但它没有向中央宣布取消它以前的观点，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最近中央就远东局这个决议开始进行争论，同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远东局作出明确答复时，远东局完全否认“过去它有过关于英美可能实行妥协的观点”。远东局声称：“过去我们只指出英美在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方面可能实行妥协”，并且还问中央：“你们看，难道在进攻苏联方面英美不是一致的吗？难道它们在镇压中国革命方面不是一致的吗？难

^① E. 瓦尔加：《杨格计划对赔款的新调整》，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29年第26期，第32—42页。

道现在的事实还没有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吗？”远东局的这种态度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转为借助于耍花招来进行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如果远东局过去曾指出“英美有可能一致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那当然在这里就没有丝毫错误了，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争论，因为中央在自己的观点中强调说：“帝国主义列强在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不会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一致而减少，相反，会因此而更加尖锐和加深。”^①

远东局可以否认它口头的声明，但绝不能否认在给中央的指导性指示中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话。当然，必须让远东局从根本上纠正这个观点；承认不承认过去的错误问题是第二位的，但是不充分意识到过去的错误，肯定不能搞清楚问题和理解正确的观点。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央在研究了客观形势和党主观上的弱点之后，断定右倾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取消派（陈独秀等人）活动开始活跃时期，中央认为这是党内的重大问题，坚决号召全党同志反对取消派、反对一切右倾危险。此外，在党的报纸上还发表了政治局的提纲和对陈独秀的信的批评意见^②。远东局发表了不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央过高估计了取消派问题，不该在《红旗》上为这种文章提供版面。中央则认为远东局还不完全了解党的状况，它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对此远东局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不久，取消派的活动变得更加严重了。在上海和香港，少数受到取消派欺骗的基层组织表现出动摇。因此中央

^① 引文出处不详。

^② 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95—506页。

作出关于动员全党反对取消派的决议^①，并同远东局就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远东局依然声称“中央太过高估计了这个问题”。经过中央的争辩，最后决定，远东局应同陈独秀谈一谈并作出最后决定。当远东局邀请陈独秀谈话时，陈公开反对中央和共产国际路线并没有丝毫掩饰地承认在搞派别组织活动，说这是“迫不得已”。毫无疑问，这次谈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表明，陈独秀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放弃了在共产党中的地位。甚至远东局的同志也说“陈独秀再也无法挽救了”。这次谈话后，陈及其一伙的反党活动更加活跃了，同时各级党委开始非常坚决地同改组派作斗争。上海、香港等地的中心基层组织经过这种辩论一致拥护中央的路线，开除了取消派首领，并要求中央开除陈独秀。同时陈及其一伙在群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公开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这清楚证明，他们已由党内反对派变成了阶级敌人。当然毫无疑问，陈独秀被立即开除出党^②。当中央向远东局报告关于把陈独秀开除出党的这个决议时，远东局的同志说：“中央开除陈独秀太不谨慎了”。中央当然反对这种看法，并竭尽全力解释了这样做的绝对必要性。远东局依然说：“开除陈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长时间的工作就更好了。”同时作为例子，援引了联共（布）对托洛茨基采用的方法。中央再次解释说，陈独秀已经变成了阶级敌人，这就是他与当年的托洛茨基的区别所在。对此远东局没有作出答复。当时中央还是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远东局不完全了解实际情况，但是现在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对取消派抱有幻想。此外，因为实际上远东局表示反对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议，所以过去对同取消派作斗争的忽视和在开除陈独秀问题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上的摇摆，显然不是偶然的。上面只是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不谈在不太重要问题上的争论。在每一个这样的问题上，中央都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但总认为，远东局的所有这些错误都是偶然的或无意识的，还没有感觉到远东局有右倾调和主义的路线。但是在它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最近的决议中，这种调和主义的路线非常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这证明所有这些右倾的错误的论断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产生于调和主义的信念。从这时起，问题就变得特别严重了。

三、我们不同意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笼统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在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上和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远东局决议第二部分是专论中国党的部分。中央认为，这个部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完全是调和主义的，中央坚决不同意。

第一，决议中甚至没有提及中央反对右倾的总路线、近一年来反对右倾的坚决斗争，相反却说“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这等于说，好像中央完全抵制反右倾斗争。实际上正相反，中央总的路线是完全彻底地反右倾的，而远东局确实经常在反右倾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最明显的例子是同中央的第一次争论和远东局最近对取消派的态度。

第二，决议中正确地指出了中央在富农问题和红色工会问题

上所犯的右倾错误。但是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①后，中央已经完全纠正了这些错误，并在党内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至于广西改组派和军阀，在俞作柏问题上，决议中说：“在过去的军阀战争中，政治局使广西军阀俞作柏变成了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革命捍卫者。因为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政治局的正确指示，所以广西省委同俞作柏就党在他的军队中的工作和他取得胜利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会谈。因此省委发出通电，命令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支持张发奎和俞作柏联合。此外，在这个通电中还说：‘如果这个联合不成功，党就应该立即组建自己独立的游击队。’”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诽谤。在俞作柏的军队中党在做秘密工作，不仅在俞作柏军队中，而且在蒋介石或阎锡山的军队中，多多少少也有秘密工作和秘密组织。但是中央从来没有因此对任何一个军阀抱有幻想，对反对军阀的斗争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对于俞作柏，鉴于他的历史，鉴于许多广西同志同他有私人关系，尤其是这样。所以中央特别向广西特委（广西还没有省委）指出，在整个工作中和策略方针上，要研究俞作柏以及任何其他军阀，同时要加强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此外，专门派广东省委一负责同志^②去广西视察，召开代表大会和说明中央的方针。代表大会也一致接收了中央的路线，没有丝毫动摇（见中央给两广的指示信和广西省委的报告^③）。

在对改组派的评价和对他们的策略中，中央在工作一开始就在1928年9月8日的第三号通告^④中指出了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195页。

② 邓小平。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中共中央第三号通告《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90—603页。在选集里第三号通告标明的日期是1928年9月18日。

他们的计谋和他们欺骗群众、扼杀革命的反革命作用，指出了改良主义是党在争取群众工作中的最大敌人，指出了必须同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它的欺骗，这之后才能争取群众，把他们引导到进行坚决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在1928年11月8日的第三十号通告^①中还指出：“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变成了现在群众斗争的最严重问题”，“要特别注意同改良主义、同改组派的斗争，注意消除群众的幻想”。在每一个政治通告中，都特别强调同改良主义、同改组派和同第三党作斗争的重要性。此外，在每次实际斗争中，都坚定地运用了 this 策略。在一年的工作中，在这方面没有发生过丝毫的动摇。只是有过反改组派的工作做得不够充分的情况，这是事实。省委同样也坚定地贯彻执行了这个策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动摇。共产国际最近来信^②中的指示更加证实了中央的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在军队中做工作的少数同志，由于政治知识浅薄，由于军事冒险主义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他们确实暴露出一些错误观点，但这不仅没有动摇党的方针，而且在收到中央的指示后大部分都得到了纠正。只有陈独秀先生的取消派在进行诽谤，说什么中央在同军阀和改组派搞联合，并把这种诽谤作为攻击中央的材料。在远东局的决议中出现这样的句子，无疑是夸大了中央的右倾错误，旨在证明所谓“中央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远东局把中央的右倾看得过于严重，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将批评取消派置于次要地位。

第三，批评取消派（陈独秀及其一伙）错误时，决议只指出了中东路问题和他们反对中央关于支援苏联的口号的错误，但对他们的整个取消主义路线（认为统治阶级趋于稳定，革命在消退，

^① 原文如此。1928年11月8日发出了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目前形势与群众工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89—694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5—203页。

党必须开展争取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六大和中央的路线）都没有提及。由此可见，远东局有意缩小取消派的错误，它对这些问题还有怀疑，未敢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从任何方面看，（这个决议）到处都是错误，到处都是毫无疑问的调和主义观点。

第四，陈独秀及其一伙早就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六大，反对中央，并成立了新党的实际组织——执行局，所以中央坚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然而远东局在其决议中却说：“如果陈独秀及其一伙想保留他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的党员名称，他们应该悔过和纠正错误……”这不仅暴露出对陈独秀及其一伙抱有幻想，而且在客观上是宣布不同意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在目前反对取消派的严重时期，只字不提中国党应该如何坚决地同取消派作斗争，同时作出了这样动摇的决议，这很明显意味着对中央同取消派的斗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

所有上述四点（抹杀中央反右倾的总方针，夸大中央的右倾错误，缩小取消派的错误和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动摇）完全证明，远东局是以调和主义的精神对待中央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这种调和主义的精神和路线，无疑只能有助于取消派的发展；这必然有损于中国共产党，有损于中国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央极其反对这个决议，它要求共产国际重新讨论和修改远东局的这个决议。

四、同远东局一起对这个决议的讨论和中央采取的方法

远东局决议上标明的日期是10月，而中央是在12月初收到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远东局这样晚才交给中央。收到这个决议后，中央经过详细讨论后认为，决议涉及中共部分的基本方针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同远东局一起进行详细的讨论，并要求对它

作出修改。

有鉴于此，一方面向远东局提出了相应的书面建议^①，另一方面在同远东局举行的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同远东局在三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②后，远东局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建议，没有同意修改决议，而且甚至根本没有答复中央提出的四个重要问题，而是找出几个零散的小问题来攻击中央。最后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所以中央政治局在第二次讨论后作出以下决议：

1.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电报，要求重新讨论和修改这个决议^③

2. 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最后决定之前，保留以前同远东局的所有关系。

3. 立即派一位同志^④去共产国际报告这次讨论情况，以及一年来中央的工作情况和现在的策略方针，同时解决中共代表团问题和学生问题。

中央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所有问题将由他口头作详细报告。我们非常希望共产国际重新讨论和修改远东局的上述决议。

签字：（中共）中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1，第 12—3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89 号文件。

② 见第 187、188、191 号文件。

③ 见第 197 号文件。

④ 周恩来。

197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9年12月^①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

政治局^②同意远东局在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③中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虽然本应对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赋予更大的意义。政治局不同意决议中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因为它故意不谈中央反对右派的斗争，夸大中央在失去了现实意义的广西问题上的错误，缩小陈独秀分子的错误并在同他们的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显然，这种立场是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④并请求重新讨论这个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 向忠发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17，第2页。

英文手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明的。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

③ 见第180号文件。

④ 见第196号文件。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八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页数=345

SS号=11039432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二部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中“左的”倾向的加强(1928年9月—1930年初)

13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9月4日)

13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1号记录(摘录)(1928年9月6日)

132．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65号记录(摘录)(1928年9月17日)

133．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6号记录(摘录)(1928年9月18日)

134．阿龙施塔姆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9月29日)

135．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28年11月9日)

136．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28年11月12日)

137．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11月15日)

138．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11月24日)

13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12月10日)

140．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1928年12月12日)

141．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12月

14日于莫斯科)

14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举行的会议第5号记录(192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143.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91号记录(摘录)(1929年1月7日于莫斯科)

1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8号记录(1929年1月29日于莫斯科)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7日于莫斯科)

1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29年2月8日于莫斯科)

1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22号记录(摘录)(1929年2月8日于莫斯科)

148.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电报(1929年2月12日于上海)

1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小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0号记录(1929年2月18日于莫斯科)

150. 皮亚特尼茨基给托夫斯图哈的便函(1929年2月27日)

151.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9月27日)

1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布尔塞维克》杂志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3月6日)

153. 米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3月26日)

15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3月31日)

155. 阿布拉莫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1929年4月3日)

156. 卡佐夫斯卡娅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不晚于1929年4月3日)

15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4月)

1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5月3日)

15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5月6日)

1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摘录)(1929年5月23日)

161.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2号信(摘录)(1929年6月4日)

16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8号记录(摘录)(1929年6月7日)

163.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29年6月7日)

164.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3号信(1929年6月7日)

1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29年6月8日)

166. 伏罗希洛夫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摘录)(1929年6月8日)

167. 别尔津和苏达科夫给希夫列斯的信(1929年6月20日)

16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4号信(1929年7月8日)

169.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30日)

1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90号)记录(摘录)(1929年8月8日)

1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八一国际红色日情况的决议(1929年8月)

172. 米夫和库丘莫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29年9月7日)

1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号记录(摘录)(1929年9月13日)

174.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56号记录(摘录)(1929年9月27日)

175.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摘录)(1929年9月30日)

176.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3日)

17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1929年10月7日)

1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2号(特字第100号)记录(摘录)(1929年10月15日)

1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9年10月24日)

1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1929年10月)

1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

18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11月6日)

1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11月21日)

184. 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1月14日)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12月4日)

18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1929年12月6日)

1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0日)

1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3日)

18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

员的信(1929年12月14日)

190.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记录(摘录)(1929年12月16日)

1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7日)

1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9号记录(摘录)(1929年12月23日)

1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记录(摘录)(1929年12月24日)

1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0号记录(摘录)(1929年12月30日)

195. 瞿秋白给库西宁的信(1929年12月30日)

19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9年12月)

197.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9年12月)

附录页